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社会史研究之一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编



专题论文

中国历史学如何回应时代思潮（1978 － 2008）

精英的社会史如何可能

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

超越地域的疆界——有关区域和区域比较研究的若干思考

向“新革命史”转型——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中共革命史研究

身份认定与籍贯问题——以明清之际金门及邻近海域“海盗”的研究为中心

中韩日三国民间祖先崇拜中的祭祀权问题

南瀛地区庙会的绕境模式——兼论祭祀圈、信仰圈与交陪境

学术评论

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

资料选编

山西临汾龙祠水利碑刻辑录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社会史研究之一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历史与社会·社会史研究)
ISBN 978-7-301-18125-6

Ⅰ.中…　Ⅱ.①山…　Ⅲ.①社会发展史-研究方法-中国-文集
Ⅳ.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2296 号

书　　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著作责任者: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编
责 任 编 辑:岳秀坤
封 面 设 计:高海云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8125-6/K·0719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mm×1020mm　16 开　13.75 印张　232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致读者

我们很早就想创办这样一份“学术刊物”了。按照章法没有刊号不称其刊，“发刊词”之类更是不敢攀缘的，但还是有几句话需要向读者作个交代。

取名“社会史研究”，宗旨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刊登有关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实证、评论等相关的研究成果，是社会史研究同仁学术交流的共同平台。就像社会史研究的五彩缤纷一样，《社会史研究》辑刊持守开放的姿态，绝不画地为牢。

鉴于社会史研究现状的纷繁芜杂，也就是人们担心的“碎化”，《社会史研究》辑刊每集突出一个主题，但这个主题又必须是我们以为的研究前沿和热点，也就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是辑刊取舍稿件的唯一标尺。

除了每集刊登相关的学术论文外，《社会史研究》辑刊每集专设两个小栏目。一曰“学术评论”，以本集主题为中心展开有关学术史的评论；一曰“资料选编”，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藏资料整理选编。适当与否，有赖以教。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人文社科类刊物已有数千种。《社会史研究》辑刊能否在林林总总的学术出版物中立稳脚跟，有赖学界同仁的支持和呵护。我们是要把她作为严肃而又可亲的“刊物”来培育的。

行　龙

2009年12月

目　　录

专题论文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历史学如何回应时代思潮(1978—2008) …………………… 杨念群(001)
精英的社会史如何可能 …………………………………………… 许纪霖(013)
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 ……………………………………… 行　龙(040)
超越地域的疆界
——有关区域和区域比较研究的若干思考 ………………… 唐力行(051)
向"新革命史"转型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中共革命史研究 ………………… 李金铮(062)
身份认定与籍贯问题
——以明清之际金门及邻近海域"海盗"的研究为中心 …… 陈春声(079)
中韩日三国民间祖先崇拜中的祭祀权问题 …………………… 钱　杭(095)
南瀛地区庙会的绕境模式
——兼论祭祀圈、信仰圈与交陪境 ………………………… 谢国兴(105)

学术评论

三十而立
——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 ……………………… 行　龙　胡英泽(122)

资料选编

山西临汾龙祠水利碑刻辑录 ………………………… 周　亚　整理点校(144)

中国历史学如何回应时代思潮(1978—2008)

杨念群*

2008年是学术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年份,许多学者都对以往30年中国不同学科发展史的演变脉络和方法论意义进行了各种系谱分析和研讨,本文也拟从中国历史学与时代思潮演变的角度尝试勾勒出一幅中国历史学主题变化的路径图,以为进一步讨论和反思之助。

一 从论证政治"合法性"到诠释社会"现代性"

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转型不是一种孤立的学科内部演变的过程,而是与时代思潮、政治转轨、社会剧变相互激荡的产物。因此,要回顾1978—2008年这30年的变化,就不能仅仅从近代学科产生的实证脉络上去单独勾画这种发展态势,用一种静态的自我延续的方式去描述其逻辑的自洽性;或者仅仅把历史学中提问方式的演变看做学科史内部争论的结果,而是应把历史学放在一种与时代变革氛围相互纠葛渗透的状态下去体味其变化的动因。

如果纠缠于细节的话,这30年史学方法演变之细微可述处可谓数不胜数,寻究其种种专门之学的变化特征并非本文的篇幅所能容纳和胜任。本文的目的是追究"历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制度安排的一个分支,在回应时代思潮的脉络里是如何不断调整自身的方法路向的,这种调整背后的深层意义何在?

毋庸讳言,"历史学"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的位置一度相当微妙,其存在的基本功能是为刚刚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论述统治的合法性,它毫不妥协地服务于至高无上的政治目的,具有鲜明的"党性"特点,总体特征是社会学式的"巨型理论"大行其道,历史的细节完全受控于对历史长程演变的趋势解读。具

*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体来讲，对古代史而言是“五种生产形态”的解说占绝对统治地位，对近代史而言是“三大高潮，八大运动”成为梳理近代历史变迁的主要线索。在这两个框架的制约下，许多中层命题如“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地主土地所有制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都是服务于这个总体目标的，这些中层命题就像庞大意识形态机器里的一个个零件，拼装组合成了对中国历史宏观趋势的考察框架。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同时也不乏出于政治敏感和道义责任的需要，努力释放出一种憧憬未来的浪漫激情，尽管这种激情大多是以过度诠释历史为代价的。中国古代每个帝王的登基均会通过对历史的再解读为新朝的建立提供合法性支持。从这点而言，50 年代直至 60 年代的历史学可谓淋漓尽致地发扬了中国古代的“资治”传统，为新政权获取历史合法性的支持不遗余力地工作着，许多老一辈史家更像扮演着传统“史官”的角色。特别是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改朝换代之初的历史观必须符合新生政权确立其合法性与正统性的角色要求。

但和以往帝国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史学”还直接传承了 20 世纪初期梁任公所提出的“新史学”的理念，即必须把中国史看作是一种民族国家诞生和成长的历史，同时也就被视为一种全球历史普遍化演进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孤立的自身延续的历史，在这个视野下，中国历史并不应该具备自己的特殊性。梁任公对新史学的呼唤使以后的历史学家大多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如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等都企图把中国历史理解为整个世界史演变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不惜削足适履地把中国史套用到世界史的规定模式之中予以描述。这样就使得新的史学观在论证中国共产党掌权的合法性时，与传统意义上的王朝“正统论”史观有所区别。只不过，以“革命史叙事”为依托的政权合法性解释，总透露出古代史观中对“鼎革”意义的解释的隐隐传承。所谓“鼎革”的观念在前近代有以下含义：一是对“大一统”理念的认同与接纳，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观也同样突出了中国共产党拥有对“多民族共同体”统治的合法性具有无可置疑的继承性；二是“改正朔，易服色”，中国共产党对传统风俗道德的改良，无疑是古代观风整俗政治统治理念的延续，只不过对文化的改造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要彻底和坚决，故有人称之为“共产主义新文明”建设；三是对“历史书写”的严格规定，所谓“新春秋笔法”，对“阶级”、“封建”、“爱国”、“革命”等等一整套历史名词的发明和利用，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新时代史家如何具备“春秋笔法”意识的成功改造。

由于受到改革开放政策的全方位影响,中国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开始发生重大改变,1978年以后的历史观与五六十年代相比开始出现巨大的差异,历史观的转变体现出中国更加无法抗拒地受制于全球化经济发展逻辑的制约。摆脱封闭和贫困的功利经济目标及其探索实践严重形塑着中国历史学的品格。对被开除"球籍"的恐惧使得历史观的道德是非意识被完全限制在了对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无条件认同上。更严重一点儿说,其选择方式还特别被限定在了美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视野之内,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历史观是整个国家和民众对"现代化"目标一种近乎狂热的追求心态的某种反映。东西方文明交往的复杂逻辑甚至在《河殇》这样的政论片中被简化为一种"黄色文明"扑向"蓝色文明"的简单过程。对西方世界的开放无疑在不断削弱中国历史学对"政治合法性"的解释力量,同时也使一些在"政治合法性"框架下得以成立的历史观在面对时代巨变时显得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如原来在"革命史叙事"和"帝国主义论"的论证前提下对传教士作用的解释、对洋务群体作用的理解、对作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众行为的解释等等都显得难以服人,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但调整的结果却对原有历史观中的政治"合法性"观念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这并不是说,诠释政权合法性的"革命史叙事"完全消失或不发挥作用了,而是说"革命叙事"已让位于对现代化道路合法性的解说,或者说是"革命史叙事"已屈从于"现代化叙事"的逻辑制约之下,再也无法具有其至高无上的控制地位。

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学表现出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探究的极度热衷和盲目崇拜,这种热衷也与当时学术界对现代化道路及其所发生效果的极度狂热的迷信行为有关,甚至各种理论探讨均时髦地被冠以"新启蒙"的头衔。历史学也被视为这种启蒙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种历史讨论都被席卷到了论证现代化道路历史合理性的大合唱中。这个时期思想界的总体氛围是,中国的发展道路被简单地归结为世界"现代化"演变道路的一个翻版和个案,而"现代化"的历史道路也被简单归结为一种经济发展的道路,由此推演出一种相当武断的逻辑,即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和文化问题即可迎刃而解,甚至认为经济发展必然以消灭传统文化的残余势力作为基本代价。具体到历史自身的演进脉络里,可以表述为如下命题:经济史的变迁逻辑制约和规定着其他历史层面变化的性质和特点。历史学的"启蒙主题"受制于以下时代思潮的诉求,学者们预测,只要80年代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各项预期指标,那么,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前景就是乐观的。中国历史学也一度为这个论题激发出颇多的灵感同时也受其左右,只要翻翻这个时期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目录，就会发现，大部分的题目几乎都在正面或变相地论证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合理性，而很少对现代化道路的西方扩张主义征象及其普遍的霸权性质提出置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传统主题被渐渐边缘化了。

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合法性的无条件认同不断冲击着50年代形成的对政治合法性的诉求，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学的品格。但时隔不久，对现代化道路合法性的论证中一个最为支柱型的结论，即经济因素决定文化社会变迁的命题同样遭到了现实社会变化本身的无情挑战。90年代的中国改革实践中出现了一个悖论现象：一方面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财富迅速而大量的积累，同时这种积累的不平衡性随着财富的无限制集中也同样以极高的速度展示出来；另一层悖论关系是：经济发展必然带动社会文化向良性的方向转变的乐观预期受到沉重打击，人们发现，经济发展固然摧毁了一些被视为传统的旧秩序，其遗留下的空隙却无法用新的制度安排加以取代，社会上种种回归传统的自发现象的出现使原来经济发展必然摧毁旧文化的"现代化"合理逻辑受到置疑，并由此诱发了基层文化传统的全面复兴。

"文化"在变革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再次变得十分尴尬，它似乎并未在经济的凯歌高奏声中得到新生，反而可能需要从几成废墟的残存历史中获取自身的位置。与此同时，90年代初期，南方大量宗族组织的复活和对族谱修纂的热心赞助，以及修复神庙和祭拜神祇所形成的热潮似乎都在验证如上的悖论，我称之为"逆现代化行为"。这些现象的发生都不能仅仅从政治控制松弛这个简单的结果中加以解释，而是人们对日益处于消逝状态中的传统价值与社会遗存再度焕发憧憬向往的一个时代表征，甚至可理解为某种对现代化道路日益走向武断和褊狭性的失望与抗议姿态。这些悖论现象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历史学问题意识形成的走向。中国史学界开始从对"现代化叙事"的迷恋转向了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方向。

二 "逆现代化行为"出现后的"国学"和"地方史研究"

在目前中国学术界，"现代性"已经是被反复滥用的一个名词，出现频率之高相当惹人反感。本文不打算纠缠于如何诠释"现代性"的复杂语义，我只是想指出，"现代性"问题的出现深深影响到了历史学方法论意识的自我调整，进而

改变了一些固有的历史评价机制，同时，现代性问题的出现往往与“逆现代化行为”的频繁发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所谓“现代性”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现实中的表现，简单地概括就是：经济发展的乐观逻辑由于无法包容和决定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内涵，由此遭遇到了对现代化单线发展逻辑的普遍质疑。这种质疑观点认为，一些我们曾经嗤之以鼻的“文化”要素，在经济发展逻辑的制约下不但不应该寿终正寝，而且应该发挥相当独立的作用，甚至成为经济恶性膨胀发展的解毒剂，这背后还有一个潜台词是现代经济的发展模式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支配下的产物，如果盲从于西方的经济发展公式，其后果有可能会造成中国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迷失自己的位置，因此，上个世纪90年代初文化界发起的所谓“人文精神”的讨论，以及对中国文化从无情批判转向自觉认同的努力就逐渐成为摆脱这种纯粹西方式道路的一种尝试。类似的质疑在许多学科中均有反映，在哲学界的反应是所谓“国学”研究的兴起，具体表现是“新儒家”的复兴；文学界采取的是在“后现代”“后殖民”思潮影响下对现代化的抗议姿态，以致这些人一度被贴上了所谓“后学”的标签。

“现代性”问题在历史学界的反映大致在以下领域中有所表现，在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领域中的表现就是大量“文化保守主义”人物及其相关论题被从边缘化的角落中挖掘出来，一跃变成了讨论的中心，我们不妨把这些思潮称之为文化精英中的“逆现代化行为”(注意“逆现代化”并非“反现代化”)。特别是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学术论点和精神状态的研究突然变得十分热门，学者们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中国历史中所具有的超越性特质，以此来对抗社会学模式对历史必然性的阐释和屈从。与之联动和呼应，在社会史领域中则出现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热潮。

“国学”在各种讨论中其实是个很暧昧的名称，“国学”一词可以说完全是现代的产物。理由很简单，古代无所谓“国学”，因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只是由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分子出现以后，“中国”在面临西方冲击时才不得不被迫重新划定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内涵，“国学”的被标举实属一种无奈之举，故有人已认为：“国学”一名将恐不立。[①] “国学”之名虽已不立，恢复旧学的“新儒家”们的活动也大多局限在了小众之中，无法真正影响到政治与社会的深层变

① 刘梦溪：《论“国学”》，《中国文化》2006年第2期。

化,但就历史学本身而言却形成了一股对传统思想持守者进行过度迷恋和美化的浪潮,一时之间,梁任公、陈寅恪、钱穆甚至辜鸿铭均成为学术界竭力追捧的"文化英雄"。知识界如此兴师动众地唤醒这些"集体记忆"自然也影响到了中国史学从"思想史"向"学术史"论域的转变。

这一时期的史学界也包括一部分文学界曾热衷于从传统学术的坚守这个角度重新定位清末民初的许多历史人物,其反现代化的目的是极为明显的。在具体对近代知识群体的研究中,也相继出现了某种二度转向,如对中国近代"洋务群体"和"清流群体"的评价就发生了逆转,在"现代化叙事"框架之内,"清流派"总是被设置成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洋务派"的对立面,其形象是负面的,而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洋务派"由于仅仅考虑"富国"而非"富民"的问题,其角色就被颠倒过来打扮成了一种"经济进步主义者",形象因此大受损害,"清流派"则因固守"富民"的立场,身上染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气质,从而得到了正面肯定。[①] 有趣的是,"洋务派"在这场"保守"与"激进"的论述中已经是再次被否定,第一次被否定是因为他们充当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第二次被否定则是因为他们都是对经济力量过度迷信的"经济至上主义者"。第一次否定是从"革命史叙事"中转换出来的一种努力,第二次否定则是要摆脱"现代化叙事"制约的一种尝试。

"区域社会史"研究广义上也可看做是脱离现代化叙事的一种努力,其更大的背景是人类学方法意识对历史学界进行的大规模冲击和渗透。以往的中国历史学研究主要是受社会学宏大理论的影响,比如马克思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学家,在西方,马克思和韦伯、涂尔干并称三大社会学家,中国历史学号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学科,所以必然强调的是对社会历史大结构和大趋势的把握和观照。从"革命史叙事"中强调用生产方式的变迁透视中国历史的阶段性,到"现代化叙事"中所强调的对未来发展方向坚信不疑的憧憬,都时时透露出社会学的结构变迁论对这个阶段历史观形成的决定性支配作用。人类学方法的进入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则与社会学模式的制约方式有相当大的不同,人类学的初衷是致力于发掘现代化过程中传统要素的积极作用,比如一些人类学家就提出了所谓"传统的再造"问题,他们认为,对现代化进程过多的正面描述,忽略了传统在现代化形成中的作用,他们强调的是,传统在现代化中不仅扮演的不是负面的

① 参见杨国强:《晚清的清流与名士》,《史林》2006年第4期。

角色,而且可能通过再造的尝试对现代化历程中如何保持中国化特征产生正面积极的支持作用。人类学有关研究单位的划定对中国社会史向区域化趋势迈进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社区"概念的理解直接使得社会史研究具有了以某种区域(村庄、庙宇、祭祀圈)范围为研究对象的鲜明而自觉的探索意识。特别是对长期受社会学研究关注大趋势模式影响的历史学向更加细致的具体研究场景转换具有决定性的启发意义,在此之后,对"宗族"、"祭神"等行动逻辑的研究开始在中国社会史中占据主导的位置。

中国社会史研究蔚然兴起的动因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他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中国基层社会却会出现许多"逆现代化行为",人类学提出的"传统的再造"问题也是对各种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逆现代化行为"的一种解读尝试。同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后基层出现的许多"逆现代化行为",如大修族谱宗谱、盖庙拜神的现象,一般都是呈区域性的分布格局出现的,更概括地说大多都是集中于南方地区,这就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地图涂抹上了一层不均匀的色彩。其具体表现是,正因为人类学家所关注的现象一般都集中发生在南方的地区,北方往往表现得不是十分明显。所以中国社会史的"区域研究"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在地化"特征,即研究区域史学者的出生地和生活的区域往往和他们的研究区域部分或完全的叠合,或者干脆说均与特定的某些南方区域相吻合。[①] 这样一方面使他们具备了特定语言和区域习惯探索的优势,节约了再学习的成本,而且在进入具体历史场景时所具备的身份资格使之无疑具有更大的发言权。这种发言权也很容易转化为现场观察的优势。因此,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作品具有相当细腻的现场感和更为具体的历史感,即与这种在地化身份与研究对象的有机结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尽管如此,"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不平衡性仍然是相当明显的,南方出现的一些区域史要素如宗族、神庙等在北方地区要么是形态有异,要么是功能有别,大多都不足以用南方学者"在地化"的研究方式予以把握。比如北方在多年的政治运动后,尽管有改革开放的背景加以支持,但大多数神庙都没有很好地恢复,其原因是一方面惧怕政治运动再起,所以一些地区往往用许多替代的办法来恢复传统,如用柏树代替墓碑,没有祠堂就用在各家轮流祭谱的方式维系宗族的

---

① 参见杨念群:《"在地化"研究的得失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传承,没有神庙就在山坡上堆石为祭等等,我称之为“象征替代”现象。即使是一些著名的大庙宇,其祭祀仪式往往也是采取“社会动员”式的祭拜方式,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日子举行象征意义上的仪式表演,而不是像南方的庙宇一般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差别自然会影响到“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在传播过程中的适用性问题,也对“区域社会史”研究框架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三 “大叙事”的回归与史学方法的多元性发展

“地方史”和“区域史”的研究深受人类学方法的影响,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向更深层次的拓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但也面临着必须回应中国历史“局部”与“整体”解释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挑战。许多批评“区域史”研究的学者认为,“区域史”研究过于把眼光局限在某个局部的范围之内,并试图把局部的解释放大为对中国整体历史演变的解释,有可能限制其对中国历史全景图像的完整认识,尽管“区域史”研究者强调应在区域发展的内部脉络中去理解政治的表现形式,并且确已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解释路径。但这种过度关注底层社会层面之运转的趋向,很容易忽略对上层制度和政治运行机制的把握。人们注意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伴随着传统政治史和经济史的衰落而发生的。历史学界往往简单而又迅速地抛弃了“政治史”解释的一些陈旧观点,直接介入了下层社会的研究,这样一来,“眼光向下”不仅变成了一种新鲜时髦的方法,而且发展到后来似乎已经越来越构成一种意识形态,更似乎拥有了某种“政治正确”的合法性意味。仿佛只要做的是下层社会研究,就一定比研究上层的政治史和精英思想史的人拥有更多的合理性,至少在方法新奇和与前沿问题接轨的评价上具有相对更强势的地位,尽管“区域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的庞大格局中仍然不能说已取得了完全主流的位置。

鉴于这种情况,有学者提出了“重归政治史”的主张,“重归政治史”并不意味着要倒退到原有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政治史研究的状态,那种状态更多地是服务于中央政府建立统治合法性的要求,而是要重新寻找政治与地方社会之间互动博弈状态形成的内在根源。也就是说,要把对政治演变的理解建立在充

分吸收"社会史"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1] 既不把上层政治理解为孤立于下层社会的独立现象,也不仅仅局限在基层角度去理解局部中国的历史变化,而是要在多次博弈的互动状态中逼近历史的整体特征,同时要注意到近代社会变化中跨地区因素所起的作用,而防止把区域性的条件看做局部人群的创造和延续历史的静态因素。因此,对社会动员与革命起源的重视,对长程历史演变的再度凝视,对上层制度与下层机制互动关系的探讨,成为目前历史学反思自身方法得失的新起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跨学科学者的介入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对传统史学的治学格局造成冲击。如果说人类学学者对"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一批素有训练的文学研究者纷纷转向思想史研究则对历史"大叙事"的回归有所贡献。葛兆光与汪晖分别以一人之力撰写成多卷本的《中国思想史》和《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虽在若干观点和框架设计等方面备受争议,但却在中国史学内部的思想史研究谱系之外另辟出一片新的天地,特别是汪晖的著作,虽被批评为过度依赖当下的问题意识架构其对中国历史长时段的理解,有过度使用理论暴力的嫌疑,但其独自擎起如此巨大之思想叙事构架的勇气则足以令人感佩。

说到跨学科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到90年代有关"学术规范化"的那场讨论,这场讨论对历史学的意义在于使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在历史学中的运用进一步合法化了。"学术规范化"的讨论发生在90年代中期,这场讨论的结果是形成了针对不同时期思想界的一种比较性看法,即认为是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意思是说80年代的学者学术规范化训练不够,总是用极简单的方式处理复杂的问题,有激情没规矩,90年代条件好了,学者的外语能力普遍提高,翻译的东西也多了起来,所以提出和解决学术问题就应该按照规范进行,不能随心所欲地做结论。历史学受规范化讨论影响的一个方面是,不同流派的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大批引进,并得到广泛的使用,以至于形成了学术"概念化"的浪潮。比如有关"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讨论就是突出的例子。"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首先由德国理论家哈贝马斯提出,后来被运用到对中国近代基层社会组织的观察和研究中,一时模仿之作叠起,这些作品至少在外貌上亦属"规范",显示出"学术规范化讨论"在史学界发生了明显的制

---

[1] 参见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约作用，但如果放在对中国历史的深层理解的程度这个标准中予以衡量，却总显僵硬拘谨，不够贴切。因为“公共领域”的兴起和西方市民社会的产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中国所谓的“公共空间”却很难找到类似可以和“市民社会”相匹配的要素，如此急切地横向移植，其合理性自然会受到置疑。于是人们开始发出疑问：对西方概念的移用，在多大程度上能对准确地理解中国历史有所帮助？

其实从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家一直在苦苦努力地从西方社会理论中寻找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钥匙。因为中国步入近代确实不是一个自愿的过程，而是西方势力反复逼迫的结果。在这样的威慑之下，西方任何被引进的东西似乎都有比中国更多的有效性。这不仅反映在各种器技和制度上，也反映在文化理念的对比和屈从上，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总被形容是鲁迅所说的盗火运动，传统史学陷于“循环论”，对“变”的反应迟钝不敏，确是它的一大命门。一旦被人捏住了，就似乎动弹不得，这才有了梁任公对“新史学”的拼命呼唤。梁任公的呼唤是一种解放，同时也是一种束缚，解放出来的是旧史学，束缚人的却是新框架，中国历史的一切标准似乎被放在了西方理论的刀俎板上由新潮的学者们任意切割着，梁任公和以后追随者的功绩是给中国史穿上了一个世界史的外套，不管合不合身，都要穿上，梁任公的痛苦变成了史学界的集体失语，才有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回归，但“文化”被保守下来只是作为化石形态，儒学成了“游魂”，与“制度”建设始终无法衔接在一起，于是才变成了一小撮人的心灵自我按摩！

“学术规范化”的提出是在急于与国际接轨的情形下展开的小型运动，在史学界发生的效果是培养了一批习惯用西方的理论眼光审视中国历史的学者，他们会熟练地使用不同社会理论中的若干概念，对中国历史的场景进行合乎规范的拼贴。不过“问题意识”的增加和强化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理解就真正拥有了透彻通达的能力，也可能效果截然相反，往往这些研究让人感觉到总有点儿像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技术产品。90 年代以来的史学界基本上分化为以下几个群体：一是持有传统马克思主义结构分析方法的老一辈学者，这批学者除个别人如陈旭麓先生外，仍然强调经济发展和历史趋势之间建立合理关系的重要性；并习惯从事件史的角度把握政治和社会之变迁，具有鲜明的党性立场。第二个群体强调对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和积累，试图以客观呈现历史之全貌为自身的首要任务，这批人的意识形态色彩很淡，主要致力于“文本”的解读和学术史研究，对古人持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的基本主张。但因确信史料具有绝对之真实性，信仰“求真”有时却有过于拘泥迷信史料的嫌疑，不免显得刻板拘谨。第三个群

体是对西方社会理论十分敏感,也善于移植和运用其精髓,却易跌入极度“概念化”陷阱。如前所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就受到人类学理论思维的直接影响,同时也继承了老一辈经济史学者如傅衣凌先生的学统,注意和国际学术界保持良好的关系,通过各种讲习班和研讨班的形式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与此三类学者有所不同,个别学者则在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时,更注意避免西方理论的无限制钳制,主张在培养学术嗅觉的基础上建立真正具有本土风格的“问题意识”,试图逃脱过于专门化的训练给历史感觉带来的伤害,同时也强调要恢复中国史学优秀的叙事传统。中华书局版《新史学》辑刊的出版即是这种趋向的一种尝试。

另外一个不得不涉及的话题是“后现代思潮”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后现代思潮”中的一些观点,最初是在文学界被广泛引用,所以才出现了一些诸如“后学”、“后主”之戏谑的称谓。但文学界的所谓后现代论题大多仅涉及一些皮毛理论,而缺少有说服力的具体研究。不少“后学”中坚后来又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对当代电影风格与城市的生活方式的演变加以描述和关注。史学界受后现代影响主要表现在学术史研究和性别研究等若干方面。其实,后现代的许多学者的著作已经被大量译介过来,经过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转述,慢慢对中国史学界的一些观点发生影响。如艾尔曼对清代常州学派的研究,贺萧对上海妓女的研究,高彦颐对江南妇女生活圈的探索等等,都对中国史学问题意识的提升有所助益。不过,由于中国并非像西方那样经历了由“现代”社会自然转向“后”现代社会的过程,所以,中国史学界打着后现代旗号的一些作品往往变成了对前现代的一种“怀旧”和景仰,也就是说“后现代”变成了“前现代”的同义词,或者说在中国史学界,“后现代”碎片化历史的策略变成了无原则地肯定“前现代”历史价值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态度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学界“后现代”探索的这种取向无意中与“国学热”对传统文化无原则的极度弘扬相互配合了起来。从而使现代的历史观表面上拥有反现代叙事的特征,却因一味倡导走回“旧社会”老路而跑向另一个极端,我认为这也是缺乏批判能力的表现。“国学热”和“后现代”一旦合谋起来,史学就会出现另一种尴尬,那就是为反“现代”而回归“传统”的尴尬。批判现代并不意味着要当一个现代的逆流者,可目前把“传统”和“现代”相对立的思维仍占主流,本来,学界形成了一种共识是要从中国历史内部看问题,以防止把“现代”标准当作裁割历史的工具,以为这样的手法可以避免“现代”切断“传统”后会带来视觉盲点,可一旦国内的“后现代”和“国学”的

学者联起手来,"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就立刻成为一种新的惯性,评价这种现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政治风潮中最常使用的那句诛心之语:"复古逆流",剔除当年的政治语境所赋予的含义,用这句话概括现实学界盲目崇古的行径未尝不算贴切。这些现象给我们的提示是,如何守持住一种平衡,当是对未来中国史学界是否真正具有创新力的严峻考验。

另外,"后现代"与"后殖民"的理论如何在中国历史中得到有效应用也是一个难题,"后现代"主要是指西方国家内部对经历"现代"之后的各种历史现象的反思,而"后殖民"理论则主要是探索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的一些非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历史困境。严格意义上说,这两种理论体系对中国史学界均不十分适用,中国是个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国家,在这种过渡过程中又同时并存了许多"后现代"现象,如前所说的修谱建庙。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无法用整齐划一的标准理论予以解释。同时,中国又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西方殖民地,这和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境遇也有所区别,所以单纯地运用"后殖民"理论显然也无法解读中国本身的复杂历史状况。因此,一切机械的套用均无益于真正了解中国在近代发生巨大转变的历史原因。

本文从三个方面概要分析了中国历史学近三十年来演变的内在逻辑,以及这种演变逻辑与社会思潮变化之间所发生的错综纠葛的关系。中国史学研究视野和方法的演变历程无疑比这篇文字概括的要远为复杂多样,但某些属学科内部论题所产生的细微变化显然不是本文的讨论所能够容纳的,我只是从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在不断应对政治社会变革思潮的冲击时如何成功或者不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方法论转换这个角度来浓缩把握中国历史研究的总体态势,历史学对时代思潮的应对目前还在不断发生着,因此,在以后的观察中需要持之以恒地进行跟踪才能明晰其演变的轨迹和内涵。

精英的社会史如何可能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许纪霖*

199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在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这之前，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和思想史一直是史学界的主流，史学基本是精英人物的历史。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世俗化过程的展开，同时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中国的史学开始逐渐眼光往下，从研究政治人物、知识精英的历史，转向研究底层社会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历史，社会史、文化史开始取代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和思想史，成为史学界的主流。这一转变，为中国史学带来了面目一新的气象，史学在更广阔的研究空间之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社会史的研究，不仅具有与传统史学不同的新的研究对象，而且也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史学理念。社会史对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和思想史带来的冲突是毋庸置疑的。从中心走向边缘的传统政治史、思想史研究如何自救？如何获得新的生命和新的立意？我以为，吸取社会史研究的优秀研究方法，将政治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打通，可能是一个新的探索途径。社会史研究通常研究的是底层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历史，但有无可能以社会史的方法，研究精英阶层和精英人物的历史，建立一种精英的社会史研究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史学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探索问题。也就是说，首先要做出一些范例式的研究，以此作为精英社会史的实践。

本着这样的愿望，我在这几年尝试改变从传统的思想史的角度，转而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知识精英，试图在思想史之外，另辟一条知识分子社会史的研究路径。自2004年以来，我先后为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开设了新社会文化史的课程，系统研习国内外新社会文化史的基本理论、核心理念、研究方法和经典著作。与此同时，我与我的研究生一起，尝试以这一新的研究方

*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法,从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私人脉络、共同体形成以及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关系等角度入手,梳理1895—1949年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史。本文作为这一研究的初步成果,特提出向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各位先进和同行报告,以期得到批评和指教。

一　从"士绅社会"到"知识人社会"

在漫长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之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那么,到了近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了?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①,他所提出的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的看法,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同和回应。② 余先生的看法固然有其道理,道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下行的一般趋势,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下行趋势,并非知识分子的全盘溃败,相反的,现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有很大的提升。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一文中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就其人数而论,当然不能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力绝不下于士绅阶层。……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他们是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人物(余英时的话),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所以要了解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政治边缘性和社会游离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的文化核心地位。"③事实上,这两种趋势在历史上乃是同时发生的: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高。为什么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是悖论性的现象会同时发生?个中又有什么样的

①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1991年8月号。

② 关于对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比较有价值的进一步研究有,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载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载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载张灏:《时代的探索》,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43页。

内在关联？为什么掌握了舆论权力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后依然被边缘化？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溯到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历史。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四民社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乃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①] 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形成了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分层。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不同，四民社会的等级分层，是上下之间有流动的社会分层，作为社会中心的士大夫阶级，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保证了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也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的整合和稳定

士大夫阶级，在古代中华帝国，是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其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士大夫阶级所信奉的道统——儒家价值观既是帝国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宗法家族社会共同的文化传统；其二，士大夫阶级（亦称为士绅阶级）一身兼二任也，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在乡野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以士大夫阶级为重心，古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浑然一体，表现出有机的整合。

明代以后，这一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虽然还是在士之下，但已经在农工之上。到了晚清，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抵抗外国列强的需要，出现了地方士绅领导的私家军，本来一直被压抑的军人集团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渐渐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军人和商人地位的上升，士农的位置急剧滑坡，特别是士大夫的核心位置，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激烈的社会大动荡之中，“四民社会”逐渐解体。

不仅“四民社会”解体了，而且士大夫阶级也被彻底颠覆了。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乃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之中，士大夫虽然不是世袭的贵族，具有阶级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但士大夫具有法律和文化规定的各种特权和威权，是礼治社会的精英和领袖。晚清以来所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士大夫而言，无疑是自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处于不断的解体之中。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乃是士大夫与过去那个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与制度发生断裂的转折点所在。传统的秩序崩盘了，新的秩序尚待建立，在这历史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士大夫以自己的

---

①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5、8章，《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思想和实践参与瓦解着旧的秩序,同时又被旧秩序抛离到社会,再次成为流落民间的自由流动资源。①

读书人成为社会的游士,并非自 1905 年以后起,事实上,在科举废除之前,日益扩大的科举规模已经造成了大量过剩的功名人士,而洋务运动和军事地方化所带来的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恰恰给这些无法向传统仕途发展的读书人以新的拓展空间:买办、商人、出版家、律师、医生、幕僚、军人等等。即使没有功名,通过这些职业,一个读书人也同样有可能通往权力的高层。报人出身的王韬、买办出身的郑观应和幕府出身的薛福成,都是成功的例子,而到了晚清,他们已经不再是个案,而是相当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了。

晚清的知识分子游士化,与春秋战国时代不同的是,这次不是从宗法封建政治关系中,而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出来,成为下移到民间的游士。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指出,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繁荣"②。虽然知识分子失去了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失去了法律上的政治和社会的特权,但他们依然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特殊的平民,依然是社会的精英,在这礼崩乐坏的大时代里,充满了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说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③

梁任公所说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指的就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到民间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社会。这些知识人,虽然成为了职业各不相同的游士,但他们并非互相隔绝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着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网

① 根据陈宝良的研究,由于明代生员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而仕途依然狭窄,游士化倾向在明中叶以后就开始出现。不第秀才或者做塾师,或者当儒医,或者做幕僚,或者经商,或者成为通俗文化的创作者。参见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25—326、499 页。

② 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张旅平译,三联书店,2002 年,第 83 页。

③ 梁启超:《新民说·论政治能力》,《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732 页。

络。这样的社会文化网络，我称之为“知识人社会”（intellectuals society）。[①]

“知识人社会”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年间出现，到民国初年发展成型。差不多在张灏先生所说的“转型时代”（1895—1925年）间发展起来。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传统士大夫自我演化而来那样，“知识人社会”的产生并非平地起楼，而是与传统的“士绅社会”有着历史的血脉联系。所谓的“士绅社会”（gentry society）这一概念，最早由费正清提出[②]，按照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描述，“士绅社会”是一个有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它处于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领域之间。[③] 士绅与士大夫，指的是同样一群人，他们在传统中国都是享有国家功名的读书人，有着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共同的文化趣味和社会地位。当说他们是士大夫时，更多指的是他们在帝国内部的官僚职能，当说他们是士绅的时候，更多指的是他们在乡村社会作为地方精英的公共职责。概而言之，汉唐时代的儒生们走的是往政治发展的上行路线，更多地体现为帝国的士大夫，而宋明以后由于佛教和理学的内在转向，士大夫们从单一的上行路线转而下行，注重民间的教化职能，从士大夫变为士绅。这些士绅虽然具有科举考试所正式赋予的国家功名，但他们的权威更多地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④] 由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只达到县一级，在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有很大的权力真空，这一权力真空正是由地方士绅们所填补，形成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士绅社会”。瞿同祖指出：“士绅是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精英，与地方政府所具有的正式权力相比，他们属于非正式的权力。……他们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这一特权从未扩展到其他任何社群和组织。”[⑤]

宋明以后，在政治权力之外所出现的“士绅社会”，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

① intellectuals在中国一般翻译为知识分子。但余英时先生认为所谓“分子”在中国的语境中含有贬义，“把‘人’变为‘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他强烈主张用知识人代替知识分子（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新版序第2页）。不过，在中国的语境中，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约定成俗的一般概念。本文为行文的方便，在谈到intellectuals society时，用知识人社会，在谈到intellectuals，用知识分子，二者的内涵是同样的。

② 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第104—106页。

③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④ 关于士绅的威权论述，参见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4—19页。

⑤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82—283页。

其一,这一社会具有相当的自主性。作为"士绅社会"中的精英,士绅们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标准、文化趣味、社会身份和法律特权的社会阶层。[1] 他们自身通过科举、书院、讲学等方式结合成一个内部的关系网络,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本,垄断了古代中国的知识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礼治社会之中,文化和知识是最重要的威权来源。其二,"士绅社会"与中国基层社会有着非常内在的密切结合,镶嵌在乡村的家族宗法关系和城市的地域、邻里关系之中,通过乡约、乡学、社仓、赈灾、调解以及举办各种公共事业,士绅在乡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地方精英角色。而在明清年间,随着城市商业化的成熟,一批中上阶层的士绅移居城市,他们又在城市的公共生活中继续乡村社会的精英角色,有些研究者将由这些士绅所主导的城市生活视作为中国式的"绅士管理型的公共领域"。[2] 其三,"士绅社会"虽然具有自主性格,在管理城乡基层社会之中也具有自治的性质,但并不意味着与国家权力完全分离,相反的,中国的"士绅社会"与欧洲的"市民社会"不同,士绅们与国家权力有着经常性的密切互动,不仅他们的士绅身份来自于国家赋予的功名,而且作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性精英,在一些情况下是国家权力向基层展开的非正式的延伸,在另一些情况下,又是作为乡土利益的代表,与国家进行利益博弈的讨价还价者。[3]

到19世纪中叶,借助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机会,地方士绅的权力从地方性的社会文化事务,扩展到拥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军事领域。随着朝廷中央权力的逐渐衰落,地方士绅在新政和自治的制度化名义下,进一步扩展权力的基础,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晚清是"士绅社会"权力扩张的登峰造极,同时也因为其过于政治化而自我瓦解:一部分士大夫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而失去民间的身份,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则在新式的建制之下蜕变为新式的知识人。在清末民初年间,传统的"士绅社会"渐渐自我转型为一个"知识人社会"。

"士绅社会"与"知识人社会"的最大区别首先是其主角的不同:从传统的士绅易为现代的知识分子。何为传统士绅,何为现代知识分子?自然我们可以这样区分:前者有功名,基本是传统教育出身,而后者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以学校的文凭代替了科举的功名,然而,从历史的演化来说,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晰的

---

① 参见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

② 参见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玛丽·兰钦:《中国公共领域观察》,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杨念群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③ 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326—330页。

界限。大致而言，晚清一代读书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是从士大夫到知识人过渡的一代，而到五四，陈独秀、胡适、鲁迅，再加上更年轻的傅斯年、顾颉刚、闻一多等，则是比较纯粹意义上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了——尽管作为第一代，依然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许多精神和文化遗产。[①]

比较起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转换，"知识人社会"与"士绅社会"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内部建制的变化。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说："只有近代社会提供了制度化条件，使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②]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指出：晚清以后，在城市社会之中，渐渐出现了使现代知识分子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媒介，这就是学校、传媒和结社。张灏将这三者称之为基础建构(infrastructure)，即"知识人社会"得以凭借的三个基础性的公共网络。[③] 1890 年代以后，随着新式的学堂、传媒和社团的出现，出现了一个"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儒家德性为中心的礼治社会，传统士大夫之所以在政治和社会上有影响，不仅因为他们是礼治秩序中的道德表率，而且还掌握了礼治背后的道德价值的解释权。这些道德价值具有超越的意义，是天的意志之体现。天德赋予人间心灵秩序和政治秩序之正当性权威，但天之意志在中国通过"二重权威"的方式得以展现：一方面是帝国的王权作为天子秉承天意实现政治的统治，另一方面具有内在善性的心灵也有可能直接与天命相通，为天地立心。[④] 中国的士大夫们通过个人的心性修养所拥有的，正是那种以天理为中心的道德解释权。

晚清以后，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催化和中国思想传统内部发酵的双重因素之下，传统的天理观逐渐演变为科学的公理观，以道德为中心的规范知识逐步让位

---

①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演化，参见许纪霖：《20 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载《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② 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 5 页。

③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载张灏：《时代的探索》，第 37—42 页。

④ 关于"二重权威"的论述，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 年，第 45—53 页。

于以科学为中心的自然知识。[1] 而能够掌握、控制这一新的科学知识的生产、流动和消费整个过程的，正是从传统士大夫那里蜕变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取代宗教和道德成为社会正当性的来源，也同时成为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力的渊源。知识的再生产，就是权力的再生产，知识分子在生产知识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权力。

在整个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学校和传媒是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知识分子因为控制了传媒和学校这两项核心资源，晚清以后使其在文化和舆论上的影响力，比较起传统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掌握了知识和舆论生产、流通权力的知识分子，本身又是组织化的，形成各种知识分子的社团共同体。于是，借助学校、传媒和社团这三个重要的建制性网络，具有多种身份和职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替代传统“士绅社会”的“知识人社会”。

二 “知识人社会”的公共网络：学校、社团与传媒

晚清的思想家们如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将学堂、报纸和学会，看做是开发民智和社会改革的三个最重要的途径。[2] 虽然他们不曾意识到这是即将出现的“知识人社会”的基础性建构，但已经将之视为新式士大夫得以施展社会影响的重要管道。梁启超、谭嗣同的想法并非移植于西方，也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来自于晚明的历史遗产。前面说过，宋明以后，士大夫的重心下移，从庙堂转移到民间，在基层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在“士绅社会”之中，各级士绅们通过各种方式互相串连，形成了多个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交往网络。到明代，这一士大夫的交往网络已经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明季士大夫的书院林立，讲学成风，士大夫们的结社也蔚成规模。[3] 晚明的东林党、复社这些士大夫群体之所以对朝野拥有影响，乃是拥有书院、讲学和结社这些公共交往的网络。

---

① 关于中国思想史上从天理观到公理观的转变，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 年，第 1395—1409 页；关于从规范知识到自然知识的变化，参见费孝通：《中国绅士》，第 34—44 页。

② 早在 1896 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就详细讨论了学校、学会和报纸的重要性，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下》中明确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觉醒士民之道有三：一是创学堂，改书院，二是学会，三是报纸。

③ 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 年；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群体：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张荣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年。

鉴于晚明士林气焰过于嚣张，清廷统治者吸取教训，严禁士大夫结社、自由讲学和民间的书院，清代的士气归于沉寂。到了晚清，当内忧外患再度泛起，中央王权逐渐式微之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在野士大夫试图重新担当挽救危亡的使命，赋予他们思想灵感的，首先不是域外的新学，而是明代先人留下的历史遗产。

从功能的意义上说，学校、报纸和结社，既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产阶级为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以新式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①] 而这一切，恰恰与明代士大夫的书院、讲学与结社有着非常密切的历史和精神联系。现代中国"知识人社会"的公共网络，只有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脉络之中，才能理解其特殊的发展形态。

首先来看学校。中国的文化重心在历史上曾经有多次迁移。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重心在私学，先秦的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私家学校，以吸引门生。到两汉时期，文化的重心转移到太学，五经博士与帝国的官僚政治有着紧密的结合。魏晋南北朝贵族门阀崛起以后，文化中心转移到了世族，在黑暗混乱的中世，那些世家大族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燎原火种。[②] 唐宋以后科举制度确立，虽然科举吸引了芸芸学子，但许多有识之士痛感科举制度害人，无法培养出儒家所期望的有德性、又有经世能力的人才，他们将三代的学校理想化，并按照这样的理想开设书院。书院成为宋明时代的文化重心。然而书院再繁荣，也毕竟有限，它并没有被建制化，虽然是士大夫公共交往的网络，但并非国家正式体制的一部分。只要有科举，一般读书人就会舍书院、奔仕途而去。有清一代，书院堕落为科举的附庸，而文化世家特别是江南的文化家族成为学术文化的重心。[③] 直到

① 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史林》2003年2期。

② 关于魏晋时代士族与文化的关系，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0—278页；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

③ 关于清代的文化家族与学术文化的关系，艾尔曼（Benjamin Elman）做了很好的研究，参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1905 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学校才最终替代科举，成为国家建制所承认的精英培养的正式机构。从此，学校的文凭、特别是海外留学获得的洋文凭，替代了科举的功名，成为通向政治、文化和社会各种精英身份的规范途径。

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之中，精英是在社会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的人物。在传统中国，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先后成为国家建制中的精英选拔机制。科举废除之后，虽然不再有类似科举那样规范的精英选拔制度，但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些非制度性的共识，将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名牌大学出身的，视为上流精英。

胡适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中说："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千年来，差不多没有一个训练领袖人才的机关。贵族门阀是崩坏了，又没有一个高等教育的书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没有一种教育是训练'有为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①]胡适的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事实：从古代到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有一个从家族到学校的大转移。无论是太学时代，还是科举时期，学在官府，衡量文化和精英的标准也在朝廷，士人的独立性有限，哪怕有儒家的精神道统，也只有少数人才抗得住。宋明士人如此重视书院，原因亦在此。六朝隋唐时期士人之所以比较有力量，文化灿烂，乃是有世家大族的支撑，明清时期尚能保持一点学脉，也与文化家族有关。

晚清以后，传统家族逐渐衰落，但书院挟着欧风美雨的威力摇身一变为现代的学校，成为文化生产的重心。1904 年的"癸卯学制"和 1912 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两次学制的大改革，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校的基本建制，从此，知识分子改变了依附于王权政治的历史，开始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职业空间。新式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带来了两个悖论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学校使得知识分子无论在身份上，还是心态上都获得了独立，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附于朝廷王权，这一次的独立不仅是精神上的独立，仅仅靠一脉道统支撑自己，而是有了一块实实在在的社会地盘，有了自己独立的建制化资源。读书人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再一次疏离仕途，获得了相对于王权的自由。但这一次，凭籍的不是门阀世家，而是学校——是真正属于知识人自己的社会建构。儒家追求了两千年的学统，到了 20 世纪终于找到了学校这一肉身，精神的灵魂终于获得了安身立命之地。

在近代中国，不须说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即使是国立大学，国家权力的干

①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独立评论》第 12 号，1932 年 8 月 7 日。

预亦相当有限,大学有相当的自主性。大学的自主性又基本掌握在教授手中。学校拥有自身的文化标准和精英选拔标准。由于学校掌握了知识生产的核心权力,又将这套文化标准推广到社会,通过对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技术精英的培养,以现代的学统为网络,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精英网络,从而拥有了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文化权力。

但独立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也带来了另外一个趋势:独立以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游离于社会。当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以隔离的智慧,以学术为志业的时候,也就将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可以与乡村没有关系,与所在的城市没有联系,也可以与政治隔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种自我的边缘化。不少成为象牙塔人的知识分子,当成为某个专业的专家学者之后,不必再有社会担当。特别在乱世之中,如同魏晋时代的名士一般,清谈学术以自得,到1930年代,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文化贵族。

传统的精英网络是以宗法血缘和地域关系为核心的。到了现代社会,由于原来的宗法家族系统的解体,精英的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加速,精英的关系网络认同转而以共同的教育为背景,特别是学校出身为中心。比较起同乡、同宗,校友更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共同的师长关系、共享的校园文化和人格教育,使得校友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和感情认同。虽然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内在地镶嵌在现代学统关系之中,然而到1920—1930年间,一个以现代学统为中心的等级性精英网络基本形成。

在一个非民主社会之中,精英是社会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的人物。在传统中国,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先后成为国家建制中的精英选拔机制。而科举废除之后,虽然不再有类似科举那样规范的精英选拔制度,但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些非制度性的共识,将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名牌大学出身的,视为上流精英。科举社会摇身一变为文凭社会。

在等级性的文凭社会之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留洋归来的留学生,其中欧美留学生处于金字塔尖,留日学生其次。处于第二层次的是诸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以及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名牌学府毕业生。第三层次则是一般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出身的学生,最后一个层次是遍布全国的师范院校和专科学校毕业生。其中,上一个层次的毕业生通常在下一次层次的学校任教,逐渐形成了一个层次鲜明的师生网络。这一以学统为中心的知识人网络,替代了传统的以科举和书院为核心的同年、同门关系网络,渗透到行政官僚、商

业金融、知识生产和公共传媒各个系统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权力。

中国两千年以儒家为中心的文官政治传统,使得政治不得不借助文化象征符号,才能获得其合法性。中世的士族门阀,凭借的是世家大族本身所拥有的文化优势,近世转为官僚政治以后,科举出身又成为士大夫最重要的文化象征资源。晚清科举废除之后,文化象征资源便出自文凭和学问。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的领袖之一曾琦在五四时期这样说,从前鄙视学问的政党,“现在因受战后潮流的震动,也渐渐的知道‘学问势力’不可侮了”[1]。在民国年间,虽然政权掌握在新旧军阀手中,但从中国政治传统来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未必拥有政治的正当性。大部分北洋和国民党军阀对读书人相当尊重,争相延揽人才,以获得士林精英的好感。近代中国的大学,有点像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也是国立的,是齐宣王为了争取霸业养的人才,但那些“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们,一方面自由讲学,一方面自由议政,与秦的博士们不一样,他们不是吏,而是师,与君王不是君臣关系,而是在师友之间。[2] 同样,在民国头二三十年,由于权力中心像战国年代那样一直不稳定,各路政治势力纷纷礼贤下士,招徕人才。不要说政治势力,连杜月笙这样的地方青红帮,都注意私门养客,善待文人。特别是1930年代以后,国民政府的用人逐渐改变过去延用私人的混乱局面,开始讲究学历和文凭,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名牌学校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内部比例越来越高。[3]

学校是“知识人社会”的中心,经过大约近半个世纪从洋学堂到现代大学的新式教育,到1930年代前后,中国开始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知识精英阶层。这一精英阶层的标志是受过国内外大学的高等教育,拥有现代大学的文凭。之所以称为半封闭,乃是因为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新式高等教育对所有阶级开放,但由于其成本比传统的科举教育高得多,不是一般的贫寒弟子所能承受。在传统

---

① 曾琦:《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第54页。

② 参见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载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67页。

③ 根据统计,民国初年国会议员和两大政党的重要党员和职员都是留学生。但留日居多。而在国民党政府内阁官员中,留美的超过留日的。1948年198位国民党大员中,留美34人,留欧22人,留日32人。在学界,留学生也占了可观的比重。到1936年,中国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44%是留学出身。参见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0、214、271页。

的科举之中,由于考试科目比较简单,即使对底层读书人未必形成致命的障碍。[①] 科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反门第的,是门第的敌人。然而,晚清以后兴起的新式教育增加了教育的成本,无论是声光化电,还是人文博雅教育,无论是学费,还是素质成本都非常高,尤其是出国游学或者进国内的名牌大学,只有家境比较好的才能负担。而过去,家族承担了读书人的成本,也期待着中举以后的回报。然而,五四以后,家族意识在农村逐渐式微,新式教育产生的人才也未必会给家族带来实际利益,因此能够游学海外或受到名校教育的,多是殷实人家。贫困家庭的,只能上地方的师范学校,被排斥在主流精英层之外,这些师范生或者作为地方精英在乡间施展影响,或者流落到上海,成为城市的波希米亚人,或者甘于社会边缘,变为主流体制的反叛者。

新式教育的门第化趋势,到民国年间已经十分严重,竺可桢在 1936 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指出:"今日高等教育,几全为中等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敷应用。即如江苏富庶甲于全国而据该省统计,居民每年收入在 90 元以下者,占 66%,浙江尚不及此数。则因经济关系,不能享受高等教育之子弟,实占全数 90% 以上。埋没人才,至为痛惜。"[②]而外出留学的,阶级分野更严重。由于官费留学逐年减少,有实力到国外尤其是英美留学的,大都是富家弟子。[③] 据统计,1946 年度留学生考试录取生的家庭职业中,商人占 32%,家居 16%,官员 14%,教师、医生 13%。这四项加以来占三分之二。[④]

近代的文化家族研究表明,凡是能够跻身上层精英阶层的,大都是文化世家,即三代以上有功名,有一定经济实力,书香门第,世代相传。事实上,即使在明清的科举制度下,仕途的真正优势者也是那些文化世家,这些文化世家特别是居于开风气之先的沿海一带文化世家,到晚清民国的新式教育背景下,比之传统的科举教育拥有更明显的优势,继续传承下去,如浙江吴兴的钱氏文化家族就是

① 关于新式教育的成本问题,参见罗志田的研究:《数千年中大举动:科举制的废除及其部分社会后果》,《二十一世纪》(香港),2005 年 6 月号;《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 期。

② 竺可桢:《浙江大学设置公费生》,《申报》1936 年 5 月 9 日。

③ 参见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第 44 页。

④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 171 页。

一个典型的例证。[①] 不过，现代的知识生产主体已经从传统的文化家族转移到了大学。大学不仅生产知识，而且通过等级化的文凭，参与了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一定的大学毕业生总是与一定的社会阶层有着固定的、制度化的联系，叶文心的研究表明：晚清、民国期间上海的不同层次的大学所培养的学生，与社会的分层制度有关，顶尖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培养的是金融、工商业的上流人士，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私立大学的毕业生更多地进入中产阶级的队伍。[②]

大约到 1930 年代，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中国社会之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学术贵族阶层，他们大都出身于文化世家，在海内外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其中很多人留学海外的留学生。他们有很高的工资收入[③]，有着比收入更体面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学贯中西，谈吐文明，教养深厚，对西方和中国的高级文化和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了解和体验，在融合中西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现代的精神贵族传统。这一新式知识贵族不必像过去那样依赖家族门阀或王朝官学，他们有了大学这一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在这块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中，握有相当的自主权。

大学内部的学者们不屑与政治与社会共舞，保持着精神贵族高傲的冷漠，但是，近代中国的大学毕竟渊源自古代的学校传统，不仅是纯粹的知识和现代人才的生产场所，同时也是公共舆论的空间。这一传统来自于传统士大夫对三代学校的想象，并且试图将学校理解为一个代表公论、制约王权的士大夫公共机构。为晚清和民国的知识分子所再三致意的黄宗羲的"学校"论，就为现代的大学的提供了历史的自我理解。黄宗羲所设想的"学校"，是独立于皇权和官僚的公众舆论机构，是"天下是非"的仲裁之地。其领袖与成员的产生，不是由朝廷选派产生，而是由士大夫通过自身的公议推举和更换。"学校"是民间的，但又对权力中心拥有制度性制约，每月初皇帝必须率领文武百官到"学校"，像弟子一般坐在下面，听取"学校"的学长讲学，该学长由"当世大儒"担任，地位与宰相相等，政治若有缺失，可以当着皇帝和宰相的面，直言批评。天下之是非，不是产生于

① 邱魏曾经研究过浙江吴兴的钱氏家族，从第一代的钱振伦、钱振常兄弟中式进士，到第二代的钱玄同、第三代的钱三强，构成了一个从传统士大夫家族向现代知识分子家族的完整脉络。参见邱魏：《吴兴钱氏家族研究》，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5 年，未刊稿，收录于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② 参见叶文心：《疏离的学院：中华民国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1990）。

③ 关于 1930 年代大学教师的工资收入，参见马嘶：《百年冷暖：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第 65—163 页。

朝廷，而是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①。

这一东林书院式的学校范式，在中国公共领域的历史建构之中，曾经发生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民国以后按照西方的学科体制所建立起来的大学体制，为了保持大学纯粹的学术传统，防止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公共领域的功能有所削弱。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几任北大校长，都对大学的过于政治化有所警惕。不过，作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传人，他们希望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不仅是有现代的知识，同时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大学虽然不直接生产公共舆论，代表公共良知，却有责任为公共舆论和公共良知提供知识的基础和理性的能力。

“知识人社会”的第二个网络是社团。大学为现代知识分子所提供的是知识生产的基本生存空间，但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和社会文化实践，却是通过各种社团而实现的。

根据阎步克的研究，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除了士族这一社会基础之外，还有士林这一公共空间。在东汉年间，士林有两个中心：一是以跨地域的太学为中心，二是以大名士的个人声望为号召，成为各地士人的凝聚中心，形成士大夫的交往网络。② 不过，传统的士大夫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文化趣味和社会身份的阶层，虽然在历史上由于地域、利益和经学内部学派的差别，分为不同的群体，但长期的“君子群而不党”的观念和王权对士人结社的限制，使得士大夫阶层无法以建制化的方式组织起来。③ 不过，宋代以后，朋党的观念有所改变。欧阳修说：“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④明中叶以后，东林党自认代表天下舆论，他们通过书院网络，形成了一个迥异于传统朋党的有着共同政治信念的同志式团体。晚明的士大夫结社成风，形成了对抗朝廷的非常大的民间压力。⑤ 从各方面来说，晚清所继承的正是晚明的精神遗产，士大夫结社又起狂澜，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⑥根据张玉法的统计，从强学会封闭到戊戌政变之前，全国成立的重要学会有 62 个，发起者基

---

① 以上有关黄宗羲的思想，均见《明夷待访录》中的“学校篇”。

② 参见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载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76 页。

③ 参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

④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十七。

⑤ 参见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⑥ 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全集》第 1 册，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28 页。

本上都是新式士大夫。[①]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社团是在儒家文化传统崩溃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当士大夫所共同拥有的思想框架解体,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首先发生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分裂。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结社而自我组织起来,形成了政治权力无法控制的士林,另一方面,这一士林由于缺乏共同的宇宙观、价值观和知识背景,又分裂为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团体。现代知识分子通过结社组织起来,又因为结社而相互冲突、自我分裂,成为同时出现的悖论性的现象。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体,基本上以各种政治和文化的意识形态为基本分野,比如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新潮社、改造派、学衡派和少年中国学会等。但是,也可以发现在那些知识分子社团内部,传统的地域和现代的学缘关系同时发挥着重要的凝聚作用,比如新青年早期群体基本上都是安徽籍的知识分子,国家主义派的核心成员曾琦、李璜等都是四川人;现代评论派的核心是留英学生,学衡派的主要成员都出身于哈佛等。现代的意识形态认同、现代的学缘关系与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地相互镶嵌,构成了复杂的人际交往网络。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团,或许是受到传统的"君子群而不党"的影响,他们很少以正式的团体名义出现,通常以同仁刊物为中心,形成一个松散的、志同道合的同仁共同体。从五四时期到1940年代,胡适组织过多个同仁共同体,都是以同仁刊物为中心:20年代的《努力周报》,30年代的《独立评论》,40年代的《独立时论》。[②] 之所以不愿正式结社,而以同仁刊物为中心,乃是因为胡适等人对政治的态度是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不是具体的政治参与,而是通过公共的舆论影响社会和政治。

知识分子社团的舆论影响,通过公共传媒得以实现,而公共传媒是"知识人社会"中,除了学校之外最大的公共网络。

现代传媒不仅控制了知识的传播与消费,而且生产与再生产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而后者正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无疑是报纸、杂志、书籍这些现代传媒的产物,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它们是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国的公共领域,假如与欧洲的历史比较,有许多非典型的形态,甚至可以判定其不成为公共领域。不过,假如将其放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里

① 张玉法:《清末的立宪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第199—206页。

② 《独立时论》不是一份刊物,而是一本系列文集。是1945年以后胡适手下的一批北大自由主义同仁相约,为各报纸刊物写稿,最后结集出版,形成团体的影响。

面来看，可以发现其自有渊源所在。公共传媒虽然是到近代才出现的，但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公共舆论，却是历史悠久。如今被称为公共舆论的，在传统中国叫做清议，它是士大夫的专利。士大夫的清议传统，最早恐怕是春秋时代的“乡校”，那是贵族社会中众人议政的公共空间。子产不毁“乡校”，乃是对古代清议的一种尊重。[①] 战国时期齐国创立的稷下学宫，那些被君王养起来的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或“不任职而论国事”，也是一种清议。秦代所设的博士，其职掌是“通古今，承问对”，与“不治而议论”大体相同。[②] 到西汉年间，清议传统表现为乡议，乃是察举制度下考察选拔地方精英进入政治系统的基本依据。到东汉年间，大批士大夫云集京城，在太学里面议论国是，这些太学生的言论形成了对朝廷压力非常之大的清议。清议乃是与朝议相对，可以视为民间的批判言论。[③] 东汉的清议就其批判性而言，足与现代的公共舆论媲美，然而由于太学依然是在王权体制之内，太学生的身份亦官亦民，民间的色彩打了一些折扣。到明代中晚期，王学讲学之风的盛行、东林书院的崛起、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清议出现了。各地纷纷出现的书院、讲会和结社，正是明季士大夫清议的建制化基础。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分析说，清议强调的是言论的合道德性，往往突出其非官方性质，清议是由士人议论构成的言论场。虽然清议不能等同于士论，但“在舆论的造成中，士的主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民论’接受‘士论’的‘导向’”。[④]

在明代，清议也叫公论，很接近现代的公共舆论。之所以被称为公论，乃是因为在激进的王学左派们看来，君主不能代表公，只代表一家一姓王朝之私。而公论者，出自人心之自然，所以君主不能夺匹夫之思想。匹夫之想法，乃真诚之见，是天下是非的标准。[⑤] 如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说：“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⑥]士大夫的公论，被看做是维系人心之本和国家之元气，士大夫最应在清议上着力。如果士大夫不主持清议，那么清议就必出于匹夫匹妇之心，游谈处世之口。[⑦] 明代中后期是民间士大夫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公共舆论最嚣张

---

① 据史书记载，子产对“乡校”表现出统治者的宽容：“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② 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见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611 页。
③ 参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第 35、56 页。
④ 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09、212—213 页。
⑤ 参见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国立编译馆”，1994 年，第 8—9、242 页。
⑥ 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 · 自反录》。
⑦ 参见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第 243 页；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第 27 页。

的年代,“处士横议,品核公卿”,成为晚明的一大景观。

晚明士大夫的精神遗产到晚清被重新发扬光大,书院演化为现代的学校制度,讲学变迁为现代的传媒,而结社光大为现代的知识分子社团。这些都是“知识人社会”得以形成的制度化条件。其中最重要的革命性事件,乃是公共传媒的出现。明季王学士人的讲学,还是局限在士人圈里面,尽管有面向民众的讲会,亦有限。然而,晚清所出现的以报纸为中心的公共传媒,以前所未有的现代传播方式,将本来仅仅属于士林内部的清议,放大为影响全国的公共舆论。

现代公共传媒的出现,与印刷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报纸的前身是邸报,有研究表明,明末士大夫的结社与邸报大有关系。邸报成为社会舆论、形成天下的中介。[①] 到了晚清,邸报逐渐演变成为民间的《京报》,由民间的书坊印制。由官方的邸报到民间的报纸,其影响从中上层的士大夫,逐渐向民间的一般知识公众扩张。之所以如此,乃是与不断改进的印刷业提供了技术基础有关。报纸的出现,使得分散在各地的士人们有可能从聚合为现代的公众,形成一个“想象的舆论共同体”。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公共领域有两种形态:主题性的公共空间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前者是指区域性的集会,公众们以共同关心的主题聚集在一起,那是一个有形的空间,比如沙龙、酒吧、广场、街道、学校、社团等等。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则是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和电子传媒在内的公共传媒,它们是一个无形的、想象性的舆论共同体,以共同的话题将分散在各地乃至全世界的将陌生人,结合为一个现代的公众。按照查尔斯·泰勒的看法,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不一定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而是一群有着共同主题的陌生人群。他们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是现代社会想象的一部分。[②]

在晚清中国,当出现了《申报》、《新闻报》这样的公共传媒,特别是1896年出现了《时务报》这样以舆论为中心的现代公共领域之后[③],以公共舆论为中心的“知识人社会”才拥有了可能性基础。报纸不仅传播现代知识,也是事实真相和公众舆论的生产者。现代的公共舆论从其自我理解来说,从传统的清议演化而来,但清议只是在士大夫阶层内部,并不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而现代的公共舆

① 参见王鸿泰:《社会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明清的信息传播与“公众社会”》,载陈平原等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3—145页。

② 参见 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③ 根据笔者本人的研究,《时务报》的诞生可以视为中国公共领域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史林》2003年2期。

论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公众有着直接的动员作用，影响非过去的清议所能比肩。

所谓的社会公众，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固定的存在，他们是被现代传媒和公共舆论建构起来的，是一群流动的、临时的、想象性的人群，比如阅读公众、戏剧公众、文学公众等。[①] 参与公共舆论的知识精英在大多数的时候，其实并不与大众直接接触，他们只是通过公众而影响大众。与宋明时期的士绅不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其实并不是直接面对底层民众，而是通过传媒所连接起来的知识公众，是在特定的公共空间之中所聚集起来的各个阶层的知识人。而这些公众即报纸的读者，通常是底层的士绅和新式知识分子。与此相对应，全国的大报、地方性报纸以及面向基层的白话小报。形成了一个等级性的传媒网络，它们各自面对的公众也是不同的，这一公众中的大部分，其实就是中国的"知识人社会"中的等级性网络。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都处于一个相对的位置，全国性大报的读者，可能是地方报纸的作者，而地方报纸的读者，又可能成为家乡小报的作者——公众就这样一层层蔓延展开，形成一个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以中大城市为中介、最后遍布全国城乡的知识分子公众网络。而这一网络，正是通过公共传媒的"想象的舆论共同体"建构起来的。

钱穆先生说，中国士绅的影响一在清议，二在门第。[②] 到了现代，清议演变为公共媒介和公共舆论，门第嬗变为学校和文凭。无论是公共舆论还是学校出身，都成为现代社会公认的建制化力量。知识分子也通过传媒和学校，构建了一张等级性的、遍布全国的文化权力网络。而知识分子的各种社团和同仁刊物，则成为这张文化权力网络的网结点。这些网结点似乎没有中心，彼此联络的人脉网络也各有交叉，却使得这张文化权力网络实实在在地形成为一个整体，同时又互相对抗、平衡和互相抵消。不管如何，这一正在崛起的"知识人社会"，其在现代中国社会获得的文化影响力，是过去难以想象和比拟的，从晚清到 1930 年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传统中国政治的"二重权威"之中知识分子所拥有的道统权威，如今因为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三大"基础建构"，而变得空前的强大，令掌握枪杆子的军阀、把持政权的政客官僚、拥有金钱的财团和握有底层势力的秘密社会，都对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所借重，奉为上宾。

现在的问题在于，既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舆论影响和文化权力如日中天，空前膨胀，为什么他们最终还是无法成为社会的重心，衰败下来呢？

---

① 参见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第 80—81 页。

② 钱穆：《再论中国社会演变》，载其《国史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 年。

三 为何重建社会重心失败?

从晚清到民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影响力,大致经过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世纪末到1920年代末,是知识分子影响力的上升时期,知识分子借助大学、传媒和各种社团的公共网络,与城市资产阶级一起建构了一个可以足以与中央权力平行抗衡的民间社会。第二阶段是1930年代初到1940年代末,是知识分子影响力的下降时期。关于前一个阶段的情况,前两节已经有较多的论述。而1930年代以后之所以影响力开始下降,与政治权力的变化有关。在晚清,由于清廷在各种内忧外患之中权力逐渐衰落,地方势力日益崛起以及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多种政治权力的并存,社会重心不断下移。民国的头二十年,北洋政府和继之而起刚上台的国民政府忙于军阀内战,缺乏权力中心,顾及不了社会的自主发展。1930年代以后,随着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一一击败各路军阀,中央权力稳固,也开始加强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控制,特别是1940年代以后,政府以战时集权的名义,控制更加严密。虽然战后的一段时间,知识分子的舆论影响一度强劲反弹,但终究昙花一现,最后,曾经是那样生气勃勃的"知识人社会",被战争、内战和革命所彻底摧毁。

1932年在"九一八"事件周年之际,胡适写了一篇《惨痛的回忆与反省》,文中以沉痛的口吻,反省了中国为什么近代以来如此不中用,民族自救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胡适指出,其中一个大困难"就是我们的社会没有重心"。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没有失去社会重心,但在中国,"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①]。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中枢,近代以后的知识分子通过学校、媒体和社团的力量,试图重建社会的重心,之所以功亏一篑,不是仅仅用外部政治权力的变化便可解释的。我们要追问的是,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不再成为社会重心的内部原因究竟是什么?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的自我转型,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我们在上文已经分析过,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在从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同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是知识分子的中心化,社会的重

---

①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2页。

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知识精英大批城居，他们控制了教育和传媒这两个重要的知识和信息平台，拥有了独立的知识空间和文化空间，并通过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使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正是独立，使得现代知识分子失去了传统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和国家政治的那种内在的制度性联系，他的文化权力变得虚拟起来，仅仅以一种话语的方式而存在。无论是对社会的启蒙，还是对政治权力的影响，都是如此。由于不再拥有与社会和国家的体制性联系，又缺乏市民社会的有力支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虽然曾经不可一世，最终却孤军作战，沦为边缘。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不仅与地方社会和帝国政治有着内在的制度性联系，而且其内部由于有共同的儒家宇宙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士大夫集团也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共同体。然而，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知识分子虽然组成了一个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社会"，却出现了一种内外断裂的局面：在其外部，独立了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逐渐分离，失去了文化之根和社会之根；而在其内部，因为失去了共同的信仰、价值和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不仅意识形态发生了分裂，而且城市精英与乡村精英之间也失去了有机的联系。[①]

到19世纪末，随着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大量的新式学堂在城市出现，无论要接受新式教育，还是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士绅们都不得不往城市迁移。知识精英的城居化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如前所述，传统士绅之所以有力量，乃是扎根于土地，与世家大族和地方网络有着密切的血肉联系。晚清以后，精英大量城居化，移居城市以后的知识精英，逐渐与农村发生了文化、心理乃至关系上的疏离。有研究表明，在城市发展的新式文化家族对宗族和家乡的认同感日益淡薄，比如吴兴的钱氏家族中的第二代钱玄同就是如此。即使是留在乡村的士绅，也大量移居县城，对村庄事务不再关心。[②]

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知识精英，特别是海外归来的顶尖精英，谈起西方来，如数家珍。讲到中国农村，却一无所知，可以说是面向海外，背对乡村。晏阳初批评说："一般留法留美留英的博士，没有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空口讲改

---

① 关于晚清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村精英的疏离，杨国强有非常精彩的研究，参见杨国强：《20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载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62—173页。

② 参见丘巍：《吴兴钱氏家族研究》，第19页，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未刊稿，收录于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邓若华：《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载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革，没有到实际的生活中去做工作，所以终于找不着实际问题。”[①]一般知识分子来到城市以后，就不愿再回农村，早在五四期间，李大钊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却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智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李大钊号召青年“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②]。不过，好不容易走出乡村的知识分子，还回得去吗？即使愿意回去，也困难重重。1930年代吴景超在谈到知识分子下乡难的问题时说，乡村中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业，乡下也缺乏研究学问的设备，乡村中物质文化太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生活程度上的需要，而最亲近的家庭宗族、亲戚朋友也都不希望他回乡。这些都是知识分子不肯下乡的原因。[③]

即使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这些致力于乡村建设、乡村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有当初士绅们回到故里那种水乳相融的感觉，对农民来说，这些城市读书人是外在于乡村生活的外面人，无论是他们的知识、语言，还是生活方式和趣味，都与农民们格格不入。传统士绅与宗法乡村的文化一体化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难以跨越的文化隔阂和城乡断层。难怪当年梁漱溟要感叹，我们搞了多年的乡村建设，“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④]。

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大批士绅流向城市，乡村的“士绅社会”开始解体。同时，也使得本来比较明确的地方精英身份，也变得暧昧起来。地方精英指的是地方舞台上具有支配力的个人和家族。它比士绅的概念大得多，具有较多的异质性，包括有功名的士绅，也包括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长老，以及各种职能性精英，如绅商、商人、士绅经纪人，以及民国时代的教育家、军事精英、资本家、土匪头领等。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举废除以后的地方精英，已经从过去比较同质的绅士阶层蜕变为多元化的异质群体，而且不同的省份、地域中的地方精英差异非常大，有些地区还是传统的士绅，有些地区商人占了相当的地位，而有些地方是有能力维持地方秩序的强人。在江南地区，承继江南士大夫文化的历史惯性，科

① 晏阳初：《农民抗战与平教运动之溯源》，《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36页。
②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1—183页。
③ 吴景超：《知识分子下乡难》，《独立评论》第62号，1933年8月6日。
④ 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73页。

举废除以后的江南地方士绅虽然不一定都有功名，但社会要求他们要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诗书琴画、文物鉴赏等，才是获得体面的重要标志[①]；在云南地区，传统的乡绅还是存在，但大地主和地方政客替代了旧式学者[②]；而在河南地区，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主要是一些有能力领导地方民团抗击土匪的人，而不再是受过教育、有财富的人。他们高度依赖暴力的力量。张信对河南的研究表明：民国以后地方的权力从传统的精英那里，转移到了具有不同个人背景、有能力利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增强其在共同体内部影响力的人物手中。而地方自治为这些新精英的崛起提供了适当的机会。[③]

科举废除以后的地方精英，虽然与传统的士绅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联系，但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根据邓若华对江苏常熟地区20世纪前半期地方精英的研究，发现民国的地方精英与传统士绅相比较，他们的精力开始注重于对财富地位的追求，而不是提高自己的品行和修养；地方精英开始职役化，更多地向国家权力渗透；他们从原先由士绅们主持的慈善、教育领域中退出，将这些公共的职能让给地方权力；最后，上层的地方精英们的活动精英们也基本局限在县城，对基层乡村没有兴趣，与乡村的关系慢慢淡化。[④]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指出："如果贵族领主和农民一道生活在农村，导致农民起义的可能性便会大为减少。"[⑤]当无论是城市精英，还是地方精英，都纷纷放弃基层农村的时候，那里便成为了革命的温床。

当大批精英从农村转移到乡村，失去了传统的社会文化之根，是否意味着他们在城市重新找到了新的存在基础？从现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些公共建构而言，可以这样说。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游离于社会而存在，不仅对于农村生活如此，在城市生活中也是如此。虽然学校和传媒是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最重要的空间和渠道，但由于它们自身的性质，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关系却变得虚拟起来，从实体化转为话语化。

北京是现代中国的学术中心，是国立大学、教会大学最集中的城市。在这些

---

① 参见邓若华：《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

② 参见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第5页。

③ 张信：《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岳谦厚、张玮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295—297页。

④ 参见邓若华：《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

⑤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69页。

著名的大学里面，云集了中国大部分优秀的学者。五四以后，大学势力之强，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京政府，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然而大学是学院的象牙塔，大学教授与北京民众的社会生活其实是不相干的。老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一元是全国性的“知识人社会”，另一元是本土的地方社会，这两个社会之间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学院精英与地方精英也相互脱节。到 1930 年代，大学校园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贵族，他们与农村隔离，也与身边的这个城市不相干。直到卢沟桥的炮声才打破了象牙塔里面的平静。当北大、清华的教授们随着难民的队伍向南方撤退，他们才真正走近社会，走近民众。当闻一多等师生们徒步从长沙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一路上所看到的底层民众生活让他们震撼不已。但此时战争却削弱了学院自身的力量，“知识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了。

真正与城市社会发生联系的，是上海的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上海与北京不同，国立大学只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等有限的几所，而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民营报纸和出版业却十分发达，是全国的传媒中心和出版中心。以民间的教育、报业和出版为基础的上海“知识人社会”与沪上的地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身就是后者的一部分。这一格局来自晚清的传统。自从上海开埠以后，在黄浦江畔，就出现了一个绅商阶级，以张謇为代表的江南士绅，亦绅亦商，他们以地方自治为契机，形成了上海城市的地方精英。民国以后，传统的绅商阶级逐渐为新式资产阶级所取代，而士大夫阶级也演化为现代知识分子。但上海的知识分子，比北京的成分复杂得多，除了大学教授、文化人之外，还有报业、出版业人士、律师、医生和各类专业人士等等。他们以各种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与商界、金融界和工业界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最有名的是张謇、黄炎培为领袖的江苏省教育会，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中，联合上海的资产阶级，在晚清和民初的政治中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上海的知识界与商界、青红帮联合，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城市精英网络，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背后有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支持。最典型的是，1932 年“一二八”抗战中成立的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是执媒体牛耳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副会长是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和青红帮领袖杜月笙，秘书长则是前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著名文化和社会活动家黄炎培。这些地方名流有知识分子，有实业界人士，也有黑社会领袖。他们周旋于中央权力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借多元权力的孔隙，控制了上海的地方社会。

不过，上海这一城市社会与传统的乡村社会还是有区别的。在乡村社会之中，士绅始终是主角，但在现代的城市精英之中，核心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成为上海这个城市的英雄，像史量才这样的报业大王，既是知识分子，又是资产阶级，沿承晚清绅商的传统，具有亦绅亦商的双重身份。

在历史上，士大夫们之所以力量，除了掌握文化权力之外，乃是有世家大族和宗法地方势力作为社会的后盾。近代以后，知识分子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校、媒体和社团，但这些文化权力需要寻找新的社会基础。士大夫自命为“中等社会”的中坚，但也意识到要与其他“中等社会”的力量，特别是商人阶级结合，才能真正有力量。清末的杨笃生说，在中等社会中，“唯自居于士类者成一大部分，而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附属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者附属焉。而主持全省之议论思想者，惟士林而已”[①]。士大夫自然是“中等社会”的中心，但也需要团结“中等社会”中的其他阶层：绅商、军人和自由职业者。“中等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复杂的社会实体。[②] 虽然在上海，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结成了有限的同盟，但就整体而言，并不成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力量一度如日中天，但内战一爆发，他们就失去了仲裁和制衡的力量。储安平在《观察》杂志撰文检讨说，近代的民主政治可说是一种以中产阶级为骨干的政治。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阶级虽然居于领导地位，士影响至远且久，但在组织及持久上，总觉较为消极。“要中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先得使中国有一个有力的中产阶级。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正在缔造之中。”[③]

在现代中国，不仅知识分子弱，而且资产阶级更弱。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像欧洲那样，是在自治城市的传统中发展出来，从其产生的一开始，就带有官僚资本的印记，即使以后转化为民间资本，也与国家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以后所出现的上海地方精英同盟，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就受到战争的毁灭性打击，江浙资产阶级和青红帮势力内迁到西南之后，从此一蹶不振，只能仰仗政府过活。中国的“中等社会”，无论是知识分子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一毁在战争之中，二毁在内战手里，到1940年代后期，虽然借助国共之间暂时的力量平衡，回光返照，但比较起抗日战争之前，内壤全然空了。一叶孤舟，如何挽狂澜于既倒！

---

① 杨笃生：《新湖南》，载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0年，第629页。

② 参见《陈旭麓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14—415页。

③ 储安平：《知识分子、工商阶级、民主运动》，《储安平文集》下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49页。

最后终究昙花一现,江河日下,无可奈何地被边缘化。

知识分子不仅与社会外部断裂,而且其内部也发生了断裂。在传统中国,士绅阶层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他们以科举制度为基础,有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形成了一个由全国名流、地方名流和基层名流三个等级的流动网络[①],这一网络在晚清以后发生了内部断裂,在城市,士绅阶层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在农村,士绅阶层虽然依然有其影响,但也被渐次崛起的其他精英集团所稀释。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农村的精英阶层,如同现代的城乡关系一般,区隔为两个互相独立的精英共同体,虽然从个体而言可以在两个集团之间流动,但从整体来说,无论从学校出身、知识结构和文化趣味,还是各自所借助的社会关系来看,分解为两个互相脱节的群体。

即使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当儒家不再是共同的价值观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可以替代的公共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朦胧地形成了一段时间的新文化联盟之后,1920 年代以后很快地就分裂了,分裂为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流派。在传统士大夫之中,每个时代虽然也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宋学和汉学、古文经派和今文经派等,但基本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是相通的,拥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框架。然而,现代知识分子内部的断裂,最主要的是失去了共同的知识框架,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知识纠缠在一起,形成了知识阶层内部种种的冲突和紧张。

问题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分裂,在一个阶级冲突、政党冲突的大时代里,知识分子又被严重政治化了,逐渐从独立的"传统知识分子"蜕变为政治附庸的"有机知识分子"。1930 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力量的下降,与此有密切关系。在此之前,知识分子以"中等社会"自命,俨然是一独立的中流砥柱,不屑成为任何阶级的附庸。1930 年代以后,国民党的权力在加强,城市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联盟力量在减弱。到 1940 年代,战争和内战全然摧毁了民间资本和文化权力的社会基础之后,失去了资产阶级支持的知识分子,被夹在两股非此即彼的党派力量之间,被迫进行政治选择。战后中国知识分子最悲哀的,莫过于此。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战后从美国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试图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学统体制,制订了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当胡适兴致勃勃地将这个计划拿到北大教授会上讨论时,却受到了同事们普遍的冷遇,大家谈的

---

① 参见孔飞力(Philip Kuhn):《中华帝国晚清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4—5 页。

不再是学术,都是吃饭问题。向达教授讽刺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功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1]为饥饿和内战所激化了的知识分子无心学术,逐渐政治化,并深刻地卷入到党争之中。1946年底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成为知识分子非左即右的最后选择,民主同盟内部决裂,胡适、张君劢等人向右转,更多的知识分子向左转,逐渐失去了"知识人社会"自身的空间。到1940年代末,知识分子普遍地党派化,大学衰落,学术跟着政治走,媒体围绕着党派转,文化权力屈从于政治权力。"知识人社会"衰落了,无论是大学,还是公共传媒和文人社团,深陷党争而不自知。晚清以后建立起来的知识学统完全崩溃,最后被革命的政统所取代。

1913年,当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不久,梁启超撰文呼吁中国须有中坚阶级[2]:

> 必有少数优异名贵之辈,常为多数国民所敬仰所矜式,然后其言足以为重于天下,而有力之舆论出焉。夫有力之舆论,实多数政治成立之大原也。……国中必须有少数优秀名贵之辈,成为无形之一团体,其在社会社会上,公认为有一种特别资格,而其人又真与国家同休戚者也,以之,夫然后信从者众,而一举手一投足皆足以为轻重。

从梁启超到胡适,两代读书人都热烈地期望知识分子能够"成为无形之一团体","统率多数国民"。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之中,在一片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人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人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在身份上依然是自由浮动的游士,在心态上更是没有安顿下来,总是要依附在某个阶级、党派或社会政治力量身上。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是一个奇迹,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战争、内乱和革命纷至沓来时,终究倒了。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过乱世。

---

① 胡适日记1947年9月23日,载《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82页。
② 梁启超:《多数政治之实验》,《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599—2600页。

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

行　龙*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社会史的异军突起尤为引人瞩目,说社会史是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富活力和最具创新意义的领域大概不会为过。有关30年来社会史研究的回顾及成果介绍的文字已有很多,反思以往,面对未来,成为目前学界讨论的热点,而已有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走向未来的起点。本文试从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切入点,也来谈谈步入"而立之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未来走向。

几年前,赵世瑜教授曾在《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名为《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的专题论文,通过检讨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试图对其未来的发展走向提出可能的路径。现在我把这个题目借用过来,并增加了"中国"二字,意在强调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对今后的研究取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就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而言,毕竟是一个更大的题目了,在此不再多加展开论述。

一　"碎化"或"碎片化"

无论从西文中转译过来的"碎化"与"碎片化"确切与否,"碎"字在汉语中最一般的理解就是破碎、粉碎,另一个意思是琐碎、细碎。碎片则是散乱一片,"一地鸡毛"。笔者接受社会史研究应当碎化的做法,就是要把研究对象咬碎嚼烂,烂熟于心,化然于胸,然后付诸笔端。而"碎片化"则是研究者需要力戒和摒弃的,这是因为只有碎片一地,却没有那个"有似绳索贯穿钱物"(陈旭麓语)的东西,只能是碎片越来越多,景象越来越乱。反之,如果有了那个"有似绳索贯穿钱

---

* 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物”的东西把一地的“碎片”再串通提起，这样的“碎片化”倒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其实，说社会史研究“碎化”或“碎片化”，主要还是批评其研究对象和选题的琐碎罢了。

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碎化”的现象，其实与其学科的特性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现象。我们知道，社会史首先是建立在对传统史学的反思、批判的基础上。西方传统史学以实证为重，注重叙述事件而缺少推理分析；注重抄录史实而不做概括归纳；注重研究个人而忽视集团；注重上层人物而忽视下层民众，有人将此概括为“事件的历史”。在中国，梁启超在倡导新史学的同时猛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那就是一种“帝王将相”的历史。社会史研究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异军突起，又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树立起旗帜，这个旗帜的核心就是代表着新史学发展趋势的“总体史”。勒高夫在谈到伏尔泰等“新史学的祖先”时明确指出：“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王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有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滞的、描述性的历史；是有分析的、有说明的历史，而不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①

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除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时代背景推动外，史学界本身的自省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研究被浓厚的政治意识所笼罩，以政治史尤其是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史学，不仅不能反映历史的全部和真实，而且使研究越来越苍白干瘪，在一片“史学危机”的呼声中，“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恩格斯语）成为复兴社会史研究的最强音。复兴最初的中国社会史，无论“专史说”还是“通史说”，都在强调一种全面的历史或总体的历史。于是乎，人口、婚姻、家庭、宗族、城市、农村、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习俗、教育赡养、自然灾害、会党土匪、宗教信仰等等均被纳入社会史研究的视野。柳暗花明又一村，具有新史学色彩的社会史研究大大地超越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一时间给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正是在这样一种复兴初期扩展领域和“占领地盘”的过程中，1990年代初期，即有学者批评中

① 〔法〕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国社会史研究的“碎化”，好像社会史学科也是一个杂物筐，什么东西也可以往里面装。

应该说，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碎化”现象，实际上就是在“总体史”的旗帜下自然产生的一种学术现象，西方社会史研究亦复如此。最近，笔者刚看过一本《碎片化的历史学》，即是对年鉴派史学进行评介的书。[①] 问题是，研究者如何在自然的“碎化”过程中自觉地避免“碎片化”，依我之见，还是要回到总体史的路子上来，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总体史。只有如此，才可能使社会史研究真正摆脱“碎片化”的境地。

在我看来，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并不简单的就是要追求研究对象上的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甚至是越多样化越好，越琐细化越好，也不是单个社会要素连续相加重叠的混合体，而是一种多种结构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多层次的统一体。布罗代尔特别强调，“所谓总体，指的是一个统一体”[②]。他所倡导并实践的结构、局势、事件“三时段”历史，首先就是一种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的总体史。马克·布洛赫说：“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的结构与信仰及思想最基本、最微妙的反映都概莫能外。”[③]社会史的选题应该没有大小之分，再小的选题也可以是社会史的选题，关键是要“以小见大”，在总体史的眼光下寻找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作用。同样，只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把握总体性，“保持总体化的眼光”，再小的区域也可以作出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书，其研究对象虽只是中世纪法国南部一个拥有数百人的小村庄，但它却试图把构成和表现13—14世纪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一一揭示出来，“明确表示了新史学的总体研究愿望”。我想进一步强调的是，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与唯物辩证法中整体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也是息息相通的。

避免“碎片化”的办法就是从总体的观点进行多学科的交融。彼得·伯克有言：“各个学科的结合是对碎片化的补救”，“揭示地域、社会群体与各个学科之间的关联，是与碎片化进行战斗的一种方式”。[④] 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本来就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征，年鉴学派自创始一直到如今第四代学者80年

---

① 〔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 〔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③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80页。

④ 〔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8—179页。

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多学科不断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即使当今西方流行的微观社会史，也有许多优秀的能够体现总体史的著作。“由于教科书是通论性质的，你并不必须对每一个小问题都进行研究，而一部好的微观史却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总体史的雄心。”“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的事件的关联。”①

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可惜的是，我们仍有一些研究者并没有把总体史的眼光贯穿到自己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对此，早在1950年，布罗代尔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就引用年鉴派创始人费弗尔的话大声疾呼：“最好不过的是，每一位学者在从事他自己的正规专业、忙于开垦他自己的花园时，也应该努力注意邻人的工作。但是，往往由于院墙太高而被挡住了视线。倘若这些不同团体之间的智力交流更频繁一些，那么将会有多么丰富的关于方法和关于事实解释的珍贵建议，会有怎样的文化成果，会在直觉上迈出怎样的一步！”②应该说，“碎化”或“碎片化”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碎而不通，碎而不精。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良好势头，也有一些较为成功的著述出现，但未来的路程仍然十分漫长。

二　关于“进村找庙，进庙找碑”

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从整体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的学术转向，也就是从社会史学科性质、概念、范畴及宏观的、一般的“大而化之”的讨论层面向更为深入的、以特定区域为取向的研究模式转换。这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以来近十年时间后出现的又一个新的潮流，也即是人们所熟知的区域社会史研究。

可以说，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固然受到了“中国中心观”、“区位市场体系”、“国家与社会”等西方史学思潮比较的影响，但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① 〔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前揭书，第76页。

② 〔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理论和方法更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学术资源。1980年代后期，陈春声、郑振满、刘志伟等“华南学派”同行即与海外人类学机构和专家合作，开展华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并与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多期“历史人类学研讨班”，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随即挂牌成立，历史人类学在社会史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受到了极大关注。依笔者粗浅的理解，“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其研究特色主要是在历史学为本位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吸收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从“历史与田野”的视角进行事区域社会史研究。或者说，他们注重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过程的结合，在把握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从过去如何造成现在、过去的建构如何诠释现在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以宗族、绅士、族群认同、械斗等为切入点，研究华南地区作为特定的地域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何逐步纳入国家的过程及其复杂的生成关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他们的研究对象大都选择在基层与乡村，凸显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路径，所以对村庄及庙宇的田野考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师兄杨念群教授曾将此形象地描述为“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在我看来，这样的描述一方面表达了“华南学派”进行区域历史研究的特色，另一方面又似乎在提醒我们不能只是一头钻进村庙而不顾外面的世界，此外，它还试图表明了把历史与田野结合起来对推动整个中国史研究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其实，杨念群教授后来倡导和讨论的“感觉主义”及“在地化”研究，以及笔者近年来提出的“走向田野与社会”治史理念，也都有着这样的学术蕴含。显而易见的是，走进历史“现场”，寻找过去的遗迹，充分地将文字史料在田野中激活，已经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建构大历史进程中特定地域社会变革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正如我们不必为什么是社会史争论不休、悬而不决一样，我们也不必为历史人类学争什么学科地位。重要的是，社会史研究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充分吸收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历史学为本位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工作，应当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需要长期坚持的方向。可以说，人类学家从事的微观个案研究，他们到研究对象的生活圈子里进行长期的田野工作，并对其观察和体验到的“他者”世界进行“深描”和“文化的解释”，这些都是社会史研究者，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工作者应当在实践中认真加以体悟和感受的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进村找庙，进庙找碑”与解读历史文献的功夫割裂开来，更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离开基本的历史文献无法去做历史的研究，也不可能拥有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的眼光”，进行田野工作恰恰是为了进一步的激活文献，读懂读通

文献。为了直接体验特定空间里的历史，到研究对象的实地进行人类学式的田野考察，不仅可以发现一些文献上没有记载的内容，而且会把文献上死的历史记载变为有了切身感受的活生生的历史“现场”。把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察结合起来，把象牙塔里的历史学家变为“田野里的历史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史的田野调查还是要以历史学为本位，人类学倚重参与观察和口述资料，历史学则强调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对地域历史的体验、感觉和文本资料的搜集。我们也可以将这看做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社会史的田野调查的差别所在。我曾经指出要想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真正地有所创新，就需要不断地走向田野与社会，将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融为一体，这实际上也是在强调史料的搜集在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性。①

目前田野调查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已经蔚然成风，但基本仍限于研究者个体的行为，像年鉴派那样真正的“集体调查”我们做的还非常有限。勒高夫在谈到费弗尔的《为史学而战》时写道：“费弗尔在书中提倡‘指导性的史学’，今天也许已很少再听到这一说法。但它是指以集体调查为基础来研究历史，这一方向被费弗尔认为是‘史学的前途’。对此《年鉴》杂志一开始就做出榜样：它进行了对土地册、小块田地表格、农业技术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贵族等的集体调查。这是一条可以带来丰富成果的研究途径。自 1948 年创立起，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的历史研究中心正是沿着这一途径从事研究工作的。”②显然，对集体调查的强调事实上也是与社会史的总体史关怀相一致的，它可以使研究者更为全面地兼顾到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真正地从特定的区域历史构建中凸显出整体性的面貌来。

因此，社会史研究者要走向田野与社会，并不能被简单的视为身处乡野，即是我们所追求的田野调查，而是一个发现史料、发现问题、发现历史的综合作用的研究过程。依笔者有限的了解，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对清代贵州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文书的发现整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对集体化时代山西百余农村基层原始资料档案的搜集整理，或可视为我在此所强调的“集体调查”的开始。可以说，此类历史与田野有效对接的具体方法，无论是在原始资料的发掘上，还是在问题假设上，都对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研究者在抱怨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完整的教会档案和

① 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② 〔法〕勒高夫等主编前揭书，第 14—15 页。

系统文献,从事社会史研究的资料难以搜集,其实那是我们的功课还没有做好,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到位。中国如此之大,资料搜集的空间也很大。除了研究者个人的田野工作和资料搜集之外,进行整体性的"集体调查"实在是应该大加提倡的,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文化遗产的抢救。而且,我相信社会史研究在从田野调查中寻找到新的创新点的同时必将推动整个中国的历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三 "除去政治史"与"重提政治史"

自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后,传统的政治史就似乎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其实,这也是中西方新旧史学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其典型表现就是以"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对传统政治史路径的直接挑战与反叛。正是在强烈反对政治史统领全部历史的声浪中,一种"排除了政治的人民的历史"成为西方社会史最初的一家之言,屈威廉的《英国社会史》便是其代表。加纳在 1980 年代进行评述时说,屈威廉的这个定义"成为关于社会史的最著名的定义,它经常为人们所引用,又不断遭到批判,而且迄今为止未被充分理解"[①]。勒高夫用"同政治史的一场斗争"作为小标题,即谈到第一代年鉴派代表人物费弗尔和布洛赫在初期反对政治史、尤其是外交政治史的斗争。在他们看来,传统的政治史一方面是一种叙述性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由各种事件拼凑而成的历史,那就是一种"事件性的历史"[②]。

其实,年鉴学派反对传统的政治史写作,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排除政治史。丹尼尔·罗什就认为,"政治史从未在法国消失过","在早期的年鉴群体中布罗代尔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要让人做政治史。马克·布洛赫不仅写了政治史,而且也开了政治史方面的课程"[③]。中国社会史复兴以来,并没有明确的排除政治史的说法,或许我们可以说,由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建立在以反对政治史为主导,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史学书写框架的基础上,因此在其复兴和发展的过程中,政治史的内容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这倒是需要我们认真反

① 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48 页。
② 〔法〕勒高夫等主编前揭书,第 9 页。
③ 〔英〕伯克编前揭书,第 148 页。

思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后，在倡导“新史学”“新社会史”的实践过程中，杨念群教授又力争重提政治史。2004 年，《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了杨念群的《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一文。他有感于政治史终于被碎片化，“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提出了要复兴政治史，就必须在与其他研究取向、特别是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对话中寻求灵感，同时也要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义。笔者以为，重提政治史研究，并不是要回归到旧史学笼罩下的那种传统的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史，而恰恰是一种与社会史沟通的超越传统政治史的“新政治史”。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如何实现政治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如何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政治史。政治史与社会史并不相互排斥，社会史可以丰富政治史的内容，政治史可以凸显社会史的意义。我们知道，社会史的重要特征就是注重多学科的交融，“长时段”的观念，总体史的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甚至是田野调查的方法等都可以很好地运用到政治史或政治领域的研究中去。所以，“重提政治史”的一个关怀实际上就在于提醒社会史研究者，即使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去书写普通民众的历史，也应该关注到那些对大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影响的精英人物、国家政治、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和在场。这也是追求“总体史”的一种内在体现。

笔端至此，我还想强调一个相关的话题，这就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有必要延伸到现当代史，从社会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乃至当代中国史研究。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史复兴 30 年来，主要的成果和研究队伍相对集中在中国古代史、近代史领域，1919 年以后，尤其是 1949 年后的所谓现当代史的社会史研究显得相当薄弱。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该在 1949 年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具体的研究往往难以延伸下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史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展开。正如田居俭教授所指出的：“无论从中国通史的一个断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角度审视，还是从中国正在经历并将长期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史（社会主义史）的角度审视，当代社会史都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①]可以说，把社会史研究引向现当代史，必将为中国历史的整体推进作出新的贡献。因为“现当代史距我们当今的现实社会最近，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与过往不久的中国历史紧密相连，把社会史研究引入中国现当代史是中国社

---

① 田居俭：《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

会史研究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也是社会史研究者应当担负的一份社会责任"[①]。

我们知道，社会史首先是一门"问题史学"，通过过去而理解现在，通过现在而理解过去，这也正是法国年鉴派史学方法论的核心。勒高夫明确指出社会史"比任何时候都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②]。而中国现当代史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变革紧密相连，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把它割裂开来。如果我们的社会史研究仅限于古代、近代的探讨而不顾及现当代，那将是社会史研究一个巨大的缺失和遗憾。倘若将社会史的视角延伸至中国现当代史之中，则有助于我们重新解释或评判很多的问题。例如，我们如何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现当代史和革命史模式；如何突破人为的历史时段划分，进而从整体的角度研究中国革命史；如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互相结合来研究中国革命史；如何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角研究中国革命史，如此等等，都需要社会史研究者努力思考并付诸实践。近年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李金铮教授已开始提倡一种"新革命史"的研究取向，即"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说就是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角度进行研究，是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点"。[③] 在我看来，这种不同于以往革命史范式的研究路径也将大大丰富和增进我们对中国革命及其现代性转变的认识与理解。

四　走向多元开放

2009年3月24日，《光明日报》史学理论版整版发表赵世瑜教授、常建华教授和笔者三人的笔谈，题目是《走向多元开放的社会史——中国社会史研究30年的回顾与前瞻》，我以为这个标题加的很好，多元开放应该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下一步的基本走向。

先看开放。中国社会史研究的30年是开放的30年，这里的开放首先是我们对国外史学、尤其是与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开放。建国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前的

① 行龙：《"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② 〔法〕勒高夫等主编前揭书，第13页。

③ 李金铮：《何以研究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详见《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暨纪念乔志强先生诞辰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8年10月。

中国历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深受闭目塞听教条主义之害。在改革开放时代复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就受到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史研究以及美国关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影响尤其突出。现代化模式、"中国中心观"、长时段、"自下而上"、"内卷化"、"过密化"、"权力的文化网络"、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历史人类学、"地方性知识"、后现代、"后社会史"[①]等等林林总总的各式理论和方法，都随着不断的翻译引进而耳熟能详。然而，这样的耳熟能详更多的恐怕只是对作者的耳熟能详，对西方社会史研究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切实吸纳，尤其是把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借鉴运用到中国社会史的具体研究中仍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放还表现在它对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开放。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等都对社会史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社会史也同时促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眼下，社会经济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城市社会史、水利社会史、医疗社会史、生态社会史等不仅一一登上史坛，而且已有一些优秀的成果陆续出现，社会史真的由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它也像一个盛大的花圃，培育出千姿百态百花齐放的璀璨景象。

同走向开放一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走向多元。多元本与开放互为一体，开放必定带来多元，多元能够进一步促进开放。面对不断翻新目不暇接的西方各式理论，我们会有一种难以跟进的感觉。早年在国内从事社会史研究后来又长期在海外研究的孙江教授就曾不无担忧地说道："在当代世界新史学变化的时间表上，值得我们痛加反思的是，限于学术信息的不足和学术语境的不同，我们和欧美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用同一种声音发出了'史学危机'的呼声，但是内容却根本不同，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要否定的是整体的结构历史和历史学过分社会科学化的倾向，而这恰恰是我们视为社会史研究的范本来加以追求的目标。"[②]我想，中国社会史研究要走向多元，学习西方是不可或缺的功课，但是我们也不必为跟不上西方而过多地担忧，西方与我们有不同的"学术语境"，更有与我们不同的历史内容，我们要与西方的社会史进行对话而不能仅限于"自话自说"，我们更要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建立自己"本土化"的中国社会

① 不久前读完一本〔西〕米格尔·卡夫雷拉写的《后社会史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② 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1 页。

史，该补的功课还是要认真地补上。

走向多元，笔者还想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阶级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的整体的观念、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等在社会史的研究中都有其一定的方法论指导意义，我们不能因为过去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而漠视它的存在。年鉴派史学就认为，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并非互不相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与新史学注重研究普通民众的历史不谋而合，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很多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①]。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其充分地纳入到具体的社会史研究中去，也将有助于大力提升我们中国历史研究的整体水平。

可以说当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出现了走向多元的发展趋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各种理论方法的各类社会史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以其鲜明的特性更加为人称道；医疗社会史、生态社会史、城市社会史等新领域方兴未艾；"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革命史"以其探索性的精神崭露头角；以探讨历史总体性为旨归的"新整体史"仍然引人注目；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甚至"集体调查"式的资料工作已渐次展开，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无穷魅力和美好前景，中国社会史研究也必将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史研究自 1978 年后复兴以来，已有 30 年的发展历程，在我而言，这本身也应该成为我们史学工作者进行认真反思的一段学术史，或者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知识考古学"。就像人类学界早已对其田野工作这一学科本领不断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一样，我们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社会史研究者也应该对走过"而立之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重要的研究路径一一进行了探讨与反思，进而去推动整个中国历史的深入发展。本文即是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思考的产物，并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进一步的讨论。

① 〔法〕勒高夫主编前揭书，第 35 页。

超越地域的疆界
——有关区域和区域比较研究的若干思考

唐力行*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在我国蓬勃兴起，学者们以整体史的新视野重新审读历史。不再满足于政治史和精英史，而是将目光向下，关注长时段的文化、心态、习俗、信仰、仪式、组织、结构、区域、普通人的生活、地方社会对国家的制衡等等。而这些长期被忽略的历史要素大多是沉淀于具体的区域社会中的。因此，社会史的研究必然导向区域史研究。怎样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这是需要我们在一个个具体入微的研究中思考的问题。本文拟就笔者在徽州和江南研究实践中的若干思考，诸如守住疆界与超越疆界，超越疆界的区域比较等问题，略陈浅见，以就正于同好。

一　守住疆界与超越疆界

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小可至一村、一镇、一县、一城，大可至一省或数省，以至一国、一洲。但是，每一个特定的区域总是有其疆界，而疆界又与区域之自然地理环境大致对应。徽州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以山区为主，“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土产微，贡赋薄”[①]。“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②]所以，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中说徽州疆界的特征是，“徽郡保界山谷”。道光《徽州府志》卷一《地理·形势》，记述了疆界的四至：“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

* 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① （明）弘治《徽州府志》，卷二，《食货一》。

② 方弘静：《方氏家谱序》。

险，北有黄山之阨。"徽州府下辖的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便在这"险阻四塞"的疆界之内。多山的地理环境赋予徽州区域以特定的气候、物产、交通、经济、乃至人文景观。徽州区域史研究是以该区域的整体历史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因此，举凡该区域曾经出现过的人以及因人的活动而形成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事物均属其研究范畴。举其大端则有经济方面的商人、土地制度等；文化方面的方言、文书、教育科举、民居园林、地方戏曲等；社会方面的宗族制度、民间组织、风尚习俗、社会生活、社会分层、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等。那么，是不是我们将区域内所有的人和事一一研究过来，它们的总和就是区域整体的历史呢？显然这是做不到的，即便能做到，也是与我们整体史的概念是大异其趣的。

这里，要充分注意的是系统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整体不是局部相加之和，整体大于局部相加之和。因此，当我们研究区域时，首先要将该区域的要素（即局部）提炼出来，从局部与局部以及局部与整体的互动中来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以徽州而言，它与一般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区域社会不同，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区域社会。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徽州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了经济上的徽商、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科举理学这三个富有特色的要素。[①] 在经济方面，康熙《休宁县志》就徽商的兴起论说道："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而商之通于徽者取道有二：一从饶州鄱、浮，一从浙省杭、严，皆壤地相邻，溪流一线，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莩，五日不至有昼夺。"[②]在社会方面则是宗族制度最为严密。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是一个避乱的理想世界，避乱是徽州移民的第一位原因。根据我对《新安名族志》的统计，中原士族向徽州的迁徙，主要分布在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这三个时期正是中原地区战祸连天，社会动荡，北方人民南迁的三次高潮。而其中唐末五代移民人数最多，占54%。从移民的原因来看，不明原因的始迁约占29%，而因战乱和"爱山水清嘉"者达0.523，占一半以上。可见，因动乱而突现的地理要素是历史上世家大族迁徙徽州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这些世家大族在群山怀抱的谷地中定居下来，将古代中原地区消失了的宗族制度保存了下来。汪道昆《太函集》云："新安

① 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② （清）康熙《休宁县志》，卷七，《汪伟奏疏》。

多世家强盛，其居室大抵务壮丽，然而子孙能世守之，视四方最久远，此遵何德哉！新安自昔礼义之国，习于人伦，即布衣编氓，途巷相遇，无论期功强近、尊卑少长以齿。以其遗俗醇厚，而揖让之风行，故以久特闻贤于四方。"[①]在文化上，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宋代淳熙《新安志》的作者罗愿勾画了徽州文化变迁的大致走向："其（新安）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寝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歙风俗礼教考》中有相近的记载："若文艺则振兴于唐宋……而元明以来，英贤辈出，则彬彬然称东南邹鲁矣。"在科举与理学上，徽州被称为"故文献国"，"朱子阙里"。

徽州社会以其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造成了一个特有的区域社会生活体系：徽商、徽州宗族与科举理学始终处于互动互补的状态中。中原士族在徽州复制的宗族生活，是酿造程朱理学的酵母。反之，程朱理学又加固了徽州的宗族秩序。新安文化的内核就是程朱理学酿造出的宗族文化。宗族为了在山地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争得生存发展的权利，必得依靠科举张大门第。徽商为宗族聚居、为文教科举提供物质条件。宗族组织、宗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又是徽州商帮特别强固、富于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徽商借助宗族势力，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借助宗法制度，控制从商伙计；借助宗族势力，投靠封建政权。徽商投资教学、培养子弟业儒入仕，正是他们成为官商、取得商业特权的捷径。[②] 区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又使大多数徽商成为儒商、具有较高的商业素质。汪道昆曾精辟地指出徽州贾儒互动的关系："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岂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③]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上述三要素构成良性循环系统。徽商在明清时代数百年间执掌中国商界之牛耳；徽州科举在明清与苏州并驾齐驱，成为全国府一级科举之最；徽州宗族则是"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徽州区域社会是一个独立的方言区（语言学界将全国分为8个或10个方言区），它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系统，崇山峻岭把徽州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使徽州区域社会系统能稳定运行，新安江、阊江、青弋江又把徽州与江南联系起来，通过商人、士子与外部世界保持密切的物质与信息交流，使徽州区

① 汪道昆：《太函集》，卷一，《黄氏建友于堂序》。
② 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③ 《太函集》，卷五十五，《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

域社会能持续运行。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系统便是徽州区域社会的整体特征。

区域整体史的研究，最为要紧的就是要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当我们把握了区域的整体特征后，我们对区域的每个局部，就会有深刻的认识。反之，我们在对局部研究逐渐深入的情况下，也较为容易去把握整体的特征。但是，区域整体特征的揭示，绝不能以区域的疆界为限。因为，除了区域内部的互动外，区域与外部环境间的互动，也是揭示区域整体特征的重要方面。以上我们所揭示的徽州经济、社会、文化三要素以及它们的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整体的系统，都是超越了徽州的疆界。区域内在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区域疆界外的环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外在的环境是指该区域的区位、对外的交通及与其相邻的区域。徽州的地理环境虽然封闭，但它的区位却是具有优势的，它位于中国最为富庶的江南边缘[①]，有新安江可直达杭州，借道大运河可北上苏、松、嘉、湖、常、镇、扬等江南核心地带；有青弋江北上芜湖，入长江，可东去江南，西溯九江、武汉、蜀中；有阊江入鄱阳湖，抵江西、进入去广州的商路。这一区位优势，在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中原世家大族避乱南迁，首选之地是交通便利的苏南、浙北的江南核心地区。随着江南的开发以及战乱向江南平原地区的蔓延，中原士族南迁的避难地便因地理之便而逐渐深入徽州山区了。在经济上，徽商的形成和强大更是得益于区位优势。万历《歙志・货殖》指出："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徽商"出而糊其口于四方"，最为便利的就是富庶的苏杭，并最终造成江南"无徽不成镇"的局面。徽商的主干行业是国家专榷的盐业。明初，盐政实行开中制，外商多为山陕商人，内商多为寓籍淮扬的山陕商与徽商。嘉靖初"西北商贾在扬者数百人"[②]，势重于徽商。万历四十六年改行纲盐制后，徽商势力迅速增长。万历《歙志・货殖》云："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我邑。虽秦晋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徽商之所以在竞争中力克山陕商，从而操商界之牛耳，地理上就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文化

① 我曾在《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一书中将江南的范围定为苏南、浙北和徽州。朱小田教授在为该书所作的评论（《安徽史学》2007第6期）中进一步指出："作为整体的区域空间结构，江南地理呈环形梯级分布：西边和西南边沿缘饰着山丘，有宁镇山脉、天目山、黄山、莫干山地，山体一般在700米以上；中部核心地带是苏南平原和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以太湖为中心，呈浅碟形，一般海拔2.5米；介于高低层级之间的是垄冈高地，从北部沿海而西而南而东，连属成环。整个江南以太湖为枢纽，上纳山地之水，倾注入太湖，下泄至东海；苏州主体位于中部水乡，而徽州位于边缘山区，苏州与徽州之间的互动便在特定区域内部生生不息地展开。"

② （清）康熙《重修扬州府志》，卷二十五，《闾里》。

上，徽州也经历了内外的互动。徽州的原始居民是山越，其原始文化则是单一的山越文化。山越文化的特征是"鲜知礼节"，慓悍尚武。这种尚武精神与中原士族"保捍乡土"的观念相结合，形成"武劲之风"。同时，士族带来的中原汉文化，渐渐使徽"俗益向文雅"。深厚的文化积累，使徽州在明清时期成为与苏州并驾齐驱的府一级的科举之乡。大量的徽州人通过科举而走向全国。文化辐射自然是双向的。从朱熹、戴震、胡适到陶行知，从理学、反理学到科学民主，徽州文人影响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走势。徽州文人与徽商将各地的习俗风尚带回徽州，《歙事闲谭》云："冠服采章，普天率土，悉遵时制，罔敢或异。而女人服饰，则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扬，休近苏松，婺黟祁近江右，绩近宁国。而歙休较侈，数十年前，虽富贵家妇人，衣裘者绝少，今则比比皆是，而珠翠之饰，亦颇奢矣，大抵由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持久之道，尚其知所节欤。"[①]反之，他们也将徽州的宗族制度、文化心理、行为方式带到各地。例如，徽州每逢年节有演戏的风俗，戏剧更是宗族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由此徽剧日渐成熟。徽商在扬州、南京、苏州等地蓄养家班。家班演戏是徽商炫耀财富、攀结权贵、洽谈商业的交际手段。《扬州画舫录》卷五提到的在扬州的七大内班中，可以完全肯定为徽商所有的就有徐尚志的老徐班，黄德、汪启源、程谦德的昆班，以及江广达的德音班和江春的春台班。由于徽商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往往自己编剧、度曲、导演，如汪廷讷著有杂剧六种，潘之恒、汪季玄、吴越石等则"自为按拍协调"，"招邀导引"。乾隆五十五年(1790)徽班进京，此后，徽剧逐渐吸取汉剧、昆腔之长，发展成为京剧，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瑰宝。又如，饮食文化中的徽菜以及徽商在扬州所发展出来的淮扬菜，就占了中国八大菜系的1/4。再如徽商遍天下，徽州会馆、公所也遍天下，在全国各地城镇到处可见徽派建筑。当然徽商带去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比如徽商的商业道德、徽商刻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可以说，没有这样疆界内外的互动，就不会有徽州区域社会的整体特征，也不会有近世徽州的辉煌历史。

研究区域社会我们要守住疆界，因为你是研究某一个特定的地域社会，而地域社会总是有其疆界的。在徽州研究的学者群体中，对研究对象的界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或称之为徽州学，或称之为徽学。前者有明确的地域界定，后者则是模糊的，一方面与徽州学有相同的含义，另一方面则有疆界模糊的危险，因为

---

① 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

现在就有把徽学扩大为安徽学,徽商扩大为安徽商人的倾向。这种疆界扩大的做法,实际上与区域史研究是大异其趣的。

但是区域社会的研究又必须要超越疆界。胡适先生曾就他的家乡绩溪纂修县志发表过意见,他说:"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如金华、兰溪为一路,孝丰、湖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自绩溪至长江为一路。……其间各都虽不各走一路,然亦有偏重,如面馆业虽起于各村,而后来成为十五都一带的专业;如汉口虽由吾族开辟,而后来亦不限于北乡。然通州自是仁里程家所创,他乡无之;'横港'一带亦以岭南人为独多。"[①]胡适先生关于大、小绩溪的论说告诉我们,在区域史的研究中,要根据"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来确定"大绩溪"的范围。这里的"大绩溪"其实就是我们研究区域的外在环境。套一句胡先生的话来说,徽州学若无大徽州,徽州学也难成局面。可见大徽州是徽州学研究内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推而广之,每一个特定区域的研究,都存在一个小区域与大区域的关系。这个大区域其实就是小区域的集散效应圈。笔者在界定徽州区域的集散效应圈时就认为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徽州本土是它的核心层次;中间层次涵盖沿长江、运河的市镇农村,其中心区乃是无徽不成镇的江南;外围层次则遍及全国远至海外了。三个层次互相作用,应当注意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说核心层次是小徽州的话,那么中间和外围层次可称之为大徽州。这样一来,就把徽学区域研究纳入了徽州社会系统与环境互动的框架之内,把单一、静态、直观的研究变成了整体、动态的研究。

超越疆界,除了要注意横向的区域集散效应圈,还应注意纵向的地方与国家的互动。任何区域都是在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下,因此从事区域史的研究不能从一个极端(只看中央不看地方)走向另一个极端(只看地方不看中央)。前揭明清盐政的变化对徽州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便是一例。区域史研究必须要放到纵横结合的历史坐标上去。明清以来,中国开始受到西方的冲击,因此就有必要把区域史研究放到世界的大局中去考察。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区域的本质特征,才能把研究推向深入。

---

① 《绩溪县志馆第一次报告书》,《胡适之先生致胡编纂函》。

二 超越疆界的区域比较

在区域与其环境互动的研究中,区域比较是其中的一类。一般意义的区域比较研究,并不一定要求两个区域之间有直接的互动关系,比较它们的异同,区分区域发展的类型,也可以为我们探讨区域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提供有益的思考,在这方面,美国尔湾加州大学的历史学者做了很好的工作。[1] 在区域比较研究中,最具难度、最有挑战性的是两个具有互动关系的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因为研究者必须对两个区域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有全面把握与深入研究。任何区域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会与其他相关区域发生人员、经济、文化等的交往与互动。一方面,各个区域的地理、物产、区位、交通、文化、乃至经济社会结构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互动互补也是各区域形成并保持这些特点的必要条件。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内涵与变迁规律,只有在区域比较中才能凸显出来。因此,区域互动关系的研究必将把区域研究引向深化。

在区域研究中,应该怎样超越疆界选择可资比较的区域?一般来说两个互动的区域往往又同属于一个较大的区域,而且它们的集散效应圈是相交叉的,例如我们进行中、日两国的比较,它们都属于东亚地理圈,自古以来就有着经济文化的互动。在江南大区域的范畴内,徽州可以与众多的地域进行比较。例如江南经济文化中心的苏州,徽商"殖民地"的扬州[2]等地。有鉴于此,我于 1998 年申报了国家社科规划项目:《16—19 世纪苏州与徽州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选择苏州与徽州进行比较研究也是与我个人的学术积累相联系的,我曾参与编纂或主编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江南区域研究论著目录(1900—2000)》等,这些学术积累使我有可能从事这两个区域的比较研究。

进行区域比较,首先要注意两地地理区位条件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区域经济

---

① 代表作有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

② 《五石脂》云:"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徽扬互动研究之代表作有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三联书店,1996 年。

文化的异同。如前所述，徽州地处江南边缘山区。而苏州与徽州虽同在江南，其地理、区位却迥然不同。苏州东有大海，西有太湖，运河傍城而过，乃长江冲积平原和太湖水网平原地区。江南大运河开通后，优越的区位和地理条件，使苏州成为唐朝江南的雄州。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苏常（州）熟，天下足”[①]，苏州被称为“天堂”，逐渐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及全国财货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的中心，有状元、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徽州则由于地理闭塞、物产瘠薄，只有用当地山产竹、木、茶、漆及新安四宝笔、墨、纸、砚来换取粮食，因而徽州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要之，宗族与徽商可以说是徽州的两大土产。

其次，要根据研究对象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这方面并没有现成的理论与方法可供借鉴。在进行苏州与徽州的比较时，我们从区域互动的角度出发，将区域互动划分为区域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作用和相互知觉三个层面，在这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里展现区域比较的历史画卷。

第一个层面：相互沟通。如果从地图上看，苏州与徽州的直线距离仅为270余公里，应该说是相邻相近的。但两个区域的互动并不便利，因陆路交通十分困难，水路就成了两地互动的主要通道。但徽州的河流与苏州不同，苏州的河流平缓、四季盈盈，而徽州的河流湍急、季节性强，从而形成难进易出之势。生存的需要是沟通的第一要义，徽州对粮食等物资的需求与寄居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核心地带的南迁望族对避难的需求，是两地沟通的大前提。千百年来徽州商人和南迁望族不避艰难，或攀行于山间鸟道，或挽舟逆水而行，将徽州与苏州沟通起来。

两个区域的沟通总是双向的。但是它们之间存在一个位势的问题，即主要由某一区域流向另一区域。从经济社会的发展来看，历史上苏州的发展总是比徽州要领先一步。从经济上来说，早在汉武帝时，苏州已成为“东南一都会”[②]，而当时的徽州乃是山越居住的蛮荒之地。从文化上来说，《吴郡志》载，唐肃宗时，由于官绅倡导文化，苏州一改六朝之前吴人好剑尚武之俗。而徽州文化由尚武至尚文的变化要慢一步，直至宋代才实现。两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位差，决定了两地基本的流动趋势。

从历时性的纵向线索看，两地人员的沟通可以宋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宋代之前，徽州虽然经济文化落后于苏州，但是由于其封闭的地理条件及区位，适合于躲避战乱，历史上社会动荡的乱世，北方移民多由吴地或经由吴地沿新安江

① 陆游：《奔牛水闸记》。
②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进入徽州[①]，给徽州带来中原及吴地的文化。可见，苏州、徽州最先的互动是由北向南互动的继续，是在江南范围内的东西向的互动。这种互动，主要体现为逃避战乱的中原移民对徽州的经济与文化的开发，是由苏州向徽州的流动。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至民国年间，则是由徽州乡村向苏州都市的自西向东的移动。其原动力主要为经济因素。徽州商人进军江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苏州，为两地密切互动创造了条件。阊门外十里街市，是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也是徽商麕聚之地，苏州与徽州互动的力度前所未有地加强。苏州与徽州两地的互动，是沿海与内地的互动、平原与山地的互动、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互动，这就决定了沟通的媒介主要是依靠内地、山地和落后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徽商来充任。

第二个层面：相互作用。在16—20世纪的传统社会转型期，苏州与徽州两区域之间相互作用的总趋势是：在经济上，苏州是江南的经济中心，并孕育资本主义萌芽；财力雄厚的徽商将巨额的商业资本汇聚到苏州，大大增强了苏州的活力。在社会发展上，苏州随人口和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渐渐变动，承接着传统的经济优势，自发、缓慢地发生社会转型，徽商的经营活动客观上推动着苏州等地的社会转型。徽商在苏州异常活跃，获取大宗商业利润。其商业利润输回徽州，却加固着徽州宗族社会的旧秩序；徽州由于宗族制度普遍存在，束缚了社会转型。在文化上，苏州和徽州都是儒学发达之地，清代又以吴学和皖学相对峙，教育、科举昌盛，人才辈出。徽商把苏州等大都市的经济文化信息和生活方式输入徽州，使徽州社会经济发生变动；同时，徽商把徽州深厚的宗族制度和文化带到苏州等大都市，凝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一些徽州的精英也在苏州定居下来。徽州、苏州两个区域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发展的不同路径，体现在一系列具体的经济、社会、文化要素的异同上，诸如苏州与徽州的家庭—宗族结构、妇女、宗族、教育科举、市镇、基层社会控制、基层社会保障、民俗风尚、民间信仰等。这是历史的主体，需要我们展开深入而细致的比较研究。

区域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也应超越两个区域的疆界，将它们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共时性背景下加以考察。明清以来徽商在江南的中心苏州以及江南市镇造成一个由坐贾、行商与海商所构成的商业网络。汪直、许二、徐海等徽州商人，是海外贸易的核心层次；苏州和江南市镇是海外商品的生产地，属海外贸易的外围

---

① 曹志耘：《语言学视野下的新安文化论纲》，载《'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

层次。徽州行商则是将核心层次与外围层次联结起来的中介层次。这一网络又使苏州与徽州的互动、平原与山地的互动，带动起江南与大海的互动。这个互动也就与16世纪形成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了。

三　区域间的相互认知

作为苏州与徽州互动的媒介，徽商来到五方杂处、市曹繁荣的苏州后，他们希望为苏州人所认同。徽州人在苏州经商，以儒商自居，讲究以义取利的长久之道，但良莠不齐，不免有欺诈和刻薄的行为，引起苏州人的反感。在苏州流传有"徽州人往往多奸巧"，甚至詈为"徽猫"、"徽狗"、"徽鳖"、"徽州厌子"、"徽州人生性十分蛮"、"徽州人喂勿饱"等。[1] 所以徽商力图改变苏州人对徽州人的认知。士大夫是社会舆论的中心，徽商在苏州十分注意与士大夫的交游。歙县潘之恒，经商苏州，"以文名交天下士"[2]。婺源李贤，"乐与贤大夫亲，故随所在，吴士大夫咸愿与之游"[3]。徽商与文人相交而相知，这对他们融入苏州社会和经营活动是很有好处的。一些徽州望族移民苏州后，经过数代人的发展，于经商之外，在科举上也大获成功，从而融入苏州社会，例如乾隆时状元潘世恩家族。苏州文人对徽州真正深层的认知，是在亲临徽州大好山水之后。《歙事闲潭》云："王弇州先生来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俾吴来者，各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伎，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弈、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槊、歌吹之属无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纷，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弇州大称赏而去。"苏州人与徽州人相互的认知越深，则相互吸引力越大，互动越易成功和顺畅。

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进入社会文化、大众心态的核心层面。由沟通而相互作用、相互认知，这是一个循环往复而逐渐提升的过程。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使这两个江南小区域不断走向繁荣，同时

---

① 弹词话本《描金凤》十二卷，光绪孟冬重刻本。

② 汤显祖：《汤显祖集》，卷四十一，《有明处士潘仲公暨吴孺人合葬志铭》。

③ 张海鹏、王廷元、唐力行、王世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68页。

又保持了各自的社会发展路向，从而使江南社会呈现多元的局面。

超越疆界的区域比较无论从理论上或是方法上都应该是多元的。我们关于苏州与徽州区域的比较只是一次尝试。超越疆界的区域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区域的特质，而且通过揭示区域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更为深入、全面地认识社会运动的规律、社会的结构等等，把对整体中国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区域史的研究是推动整体史研究深入发展必由途径。中国疆域辽阔，地区差异很大。各个地区因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与中央王朝距离远近不同，交通难易不同，传统和风俗不同，物产、地理、民族构成不同，因此，它们对中央王朝政令的执行有相当大的差异。每个区域也有自己特定的集散交往圈，和往来互动频繁的相邻区域。只有对各个区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把一个个区域钻研透了，才有可能对各个区域进行综合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区域比较研究，我们的整体研究才有可能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上。一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例如江南、徽州等，都具有研究传统中国的范本价值。

向“新革命史”转型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中共革命史研究

李金铮*

一　中共革命史无法“告别”

百年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史，更是一部中国革命史。当现代化进程仍在继续前行之时，近代史上的中国革命包括中共革命，却随着时间的流逝，渐行渐远，淡出了一些人的视线。甚至有人指出，20世纪中国史研究已有“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①]。事实的确如此，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中共革命，都发生了由热变冷的趋势。

究其原因，我以为有以下三点：

一是“文革”以来，极端的革命范式严重地削弱了革命史研究的学术性，结果物极必反，一些学者对此领域表现出不耐烦乃至厌恶的情绪。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经济建设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社会现实自然也会影响学者的研究取向，历史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将注意力转向中国现代化的源起和演变历程。

三是与前些年有人提出的“告别革命”论有关，或者说这一提法加剧了革命史弱化的倾向。告别革命论的核心观点是：历史上中国革命包括中共革命虽然

* 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为以下项目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度重大研究项目（07JJD84018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BDJ00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项目（06JA770022）。

① 〔美〕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学术》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1—204页。

有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和作用，但并非历史的必然，历史的发展道路还有其他可能性；革命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灾难，是错误的，改良和建设才是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好途径。[①]

在我看来，从理论上分析，改良与建设比暴力革命的成本要小，所以在今后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的确应当注意和避免暴力革命，至少不可轻言革命。但告别革命论存在三个问题：

（一）当社会矛盾逼迫到一定程度，暴力革命非爆发不可，是否仍然说它是不合理或者是错误的？

（二）中国革命是否就不是历史的必然，必须经过深入的研究才可以下结论，而这点显然他们没有做到。

（三）论者特别突出了革命的"巨大破坏"，而对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作用仅是蜻蜓点水，没有任何深入的研究。

以上三个问题，难免给人造成价值判断大于实际判断的印象。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些人没有认真阅读乃至没有读过《告别革命》，就人云亦云，或不着边际地瞎批一通，或附和"革命破坏"论，进而情绪化地厌恶乃至反对革命史研究，这也许是告别革命论带来的更大问题。

其实，告别革命论尤其是附和者忽视或违背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即：革命不全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不是革命该不该发生，而是革命已然发生，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场革命的问题。换句话说，革命为什么发生，革什么，用什么革，怎样进行，如何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这才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你可以提出告别革命论，但无法也不可能告别革命史研究。

站在21世纪的伟大时代，我认为不仅不能削弱中国革命史研究，而是应该重提革命史，并加大革命史研究的力度。这里，我只是仅就中共革命史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为什么要研究中共革命史，传统革命史研究有何问题，到底应该如何研究等等，诸此都应给出较之以往更有信服力的理由和解决方案。

---

① 参见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一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五版。

二 理性思考中共革命研究之必要性

以往学者似乎都这样认为，中共革命史研究就是为了说明中共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论证中共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这当然有其充分的理据，但问题是仅限于此，就有些老调重谈，并多少降低了中共革命研究的重大价值。我认为在此基础上还应从其他角度进一步挖掘其意义。

第一，中共革命史是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学术价值。

历史发展的进程蕴含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相应地历史学者的研究内容包罗万象、丰富多彩。也就是说，凡是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尽管如此，它并不意味着所有历史现象具有同样的研究价值，而是有的可能高一些，有的低一些，有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如何判断历史研究对象价值之高下呢？其中关联的因素相当复杂，更可能是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应该首先考量的，这就是孟子说过的："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也就是说，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观察历史的重大转变，看研究对象是否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核心问题，看它是否影响或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走向和历史命运。如果是，那它就是研究价值极高的问题，从而最值得历史学者的关注和探讨。道理很简单，关键问题搞不清楚，其他一切则无从谈起。

也正因为此，历史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不断思考哪些才是最有价值的领域和问题。按照上述标准，我以为，中共革命就是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领域和问题。在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历史风云中，中共革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是影响乃至决定中国历史走向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与核心问题。不仅如此，透过中共革命，还可以窥见中华民族的特性，包括苦难、矛盾、传统和变化。对于这样一个领域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政治和社会经济的演变。相反，如果忽略这样一个重大领域，中国近代史的最终结局将很难解释。

问题是，当今中国史学界似有忽略重大历史课题而趋于枝微末节的"碎化"现象。19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成果不断涌现，似乎已有从历史学边缘走向中心之势。这一大喜形势颇使社会史学者骄傲、自豪乃至自满、自

大。在我看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本为学科发展史的常态,社会史研究的蓬勃景象固然可贺,但如不居安思危,所谓中心可能很快沦为边缘。近几年史学研究“碎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它主要指的就是社会史研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风土民情无所不包,有的甚至一味逐新猎奇,完全失去了历史研究的严肃态度。这一倾向,在年轻一代学者身上表现得尤其严重,似乎鄙视主流,追求边缘成为一种时尚。倘此趋势继续蔓延和扩张,人们对中国社会长期趋势和重大问题的了解将愈益模糊,深陷一堆乱麻而不能自拔。

其实,社会史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本不应限于以上所谓下层“社会现象与社会关系”,而是可以研究几乎任何重大的历史现象,譬如以往被视为上层的政治制度、政治事件都可以从社会史视角进行研究。按此理解,中共革命也并不是一个传统中共党史、革命史才可研究的范畴,而是可以将革命与社会结合起来、用社会史方法进行考察,从而避免大而哗之、大而化之和深陷末节的两极弊端。

第二,中共革命在全球民族革命史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具有可资比较的典范意义。

以上主要是从中共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所做的阐述。实际上,其意义还不完全限于中国历史,中共革命还是世界民族革命的典范。20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的革命世纪,“震撼全球的绝大多数革命运动发生于因国际因素而起变化的落后的农民社会”[①]。在这个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正处于革命历史的舞台之上,亦即属于这个全球落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革命进程中,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取得全国政权这一历史性事件最为绚丽夺目。在上述宏阔的历史背景下,中共革命就不应仅仅理解为在中国发生的一场革命,而是世界民族革命的一员,它既是地方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塞尔登所说,中共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是重要的,对一切试图了解以‘中国革命’而闻名的这一重要运动的人,对一切试图理解出人意料地发生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非工业化农业社会的这场本世纪震撼世界的革命的人,都是极其重要的”[②]。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革命相比较,中共革命的确有自己的特点。比如革命

① 〔美〕撒克斯顿:《1931—1945年冀鲁豫边区的民众起义和共产党政权》,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600页。

② 〔美〕弗里德曼、塞尔登:《抗日战争最广阔的基础——华北根据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日的成功经验》,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国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90页。

的背景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劳苦大众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也都有共产党组织，但革命获得成功的却很少。在几乎相同的背景下，中共革命却获得了胜利，由此可见有其特别之处。[①] 又如战争与革命的关系，战争曾成为俄国、法国等地革命的酵母或为革命创造条件，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中被中共动员起来的乡下人和游击队与强大的日本陆军、海军和空军作战，不能不说是中共革命的金字招牌。[②]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战争期间，一般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十分便于从战时民族主义中获益，二战中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等都是如此。但在中国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形，抗战爆发后，在日本侵略造成的“战时无政府状态”中，得益者不是处于统治地位、受国际承认的国民党而是处于敌后游击区的共产党。也就是说，从外国侵略和被侵略国家民族主义兴起这个角度无法解释抗战时期中共革命的发展，共产党之所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主要不是日本侵略导致的农民民族主义的加强，而是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的社会经济政策。[③] 再如革命的武装组织，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武装组织所取得的经验，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越南、阿尔及利亚、古巴、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安哥拉、柬埔寨、萨尔瓦多、秘鲁等既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④] 诸此种种，都显示了中共革命的显著特点。

由此，我以为应立足全球视野，进行各地区革命史的比较研究，充分挖掘中共革命的独特性和世界价值。就此意义而论，研究中共革命可以为人类革命史的研究提供具体实证和理论贡献。

第三，中共革命史对新中国的发展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是研究中共革命史的又一层意义。

中共革命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后革命时代尤其是集体化时期具有十分密切的承继关系，中国许多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均渊源于此，至今仍有诸多方面

---

① 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35—536页。

② 〔美〕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07页。

③ 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36页；〔美〕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10—611页。

④ 〔美〕弗里德曼、塞尔登：《抗日战争最广阔的基础——华北根据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日的成功经验》，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国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87页。

呈现出“革命后遗症”。日本学者顾林就认为,“根据地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萌芽’”①。英国学者艾丽丝做了进一步解释:对于共产党建国的研究通常将其起点定于1949年,大规模的战争结束,国家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故这一年往往被视为“旧”与“新”的分水岭,或“解放”。就强调国家统一、体制化、经济和社会复生的主题的讨论及研究来说,1949年作为起点不是完全错误的。但如果忽略或是低估了北方根据地在战争中对于建国的努力,则可能过于简化了历史的真实过程。“建国”与“战争”实不应被视为两个不相容的过程,二者间的关系应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应将共产党的建国,视为一个包含了抗战中各个根据地的特殊经验,以及土地改革、内战,获取国家政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各经验之总成。② 中国学者陈德军也认为,大约半个世纪前,革命的红尘在中国基本落定。然而,革命从中源起、行进并且得以获取最后成功的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在随后的年月里,依然以各种变化的,或者未曾变化的形式塑造和限制着新中国成千上百万男男女女的行动和命运。在这个过程中,它愈益清晰地向人们表现出自己的一些顽强的结构性特征。③ 以上几位学者的意见,都表明了这样一个观念: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不能忽视“革命传统”的重要价值,研究中共革命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新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由此我还想表达的是,所谓传统不能仅仅限于当今热闹非常的传统文化——“国学”,它还应包括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累积而成的其他方面,中共革命的遗产就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因而具有“传统”的意义。对这一革命传统的挖掘,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轨迹。

三 中共革命史的传统书写模式与问题

尽管中共革命史(不完全同于党史)在当今受到一些冷落,但并非意味着学术界停止了关注和研究。事实上,由于中共革命的巨大历史魅力,也由于当今中

---

① 《张静如、范力沛、顾林三教授对本届学术讨论会的评议》,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57页。

② 艾丽丝:《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冯崇义等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236页。

③ 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国政治制度的要求，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学者对这一领域的论著还是相当之多。这些论著似乎更多集中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主要在于呈现其政治意义。我不否认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因为历史变迁的表现形式，往往就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点我们无须回避和否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认同中共革命研究的现状，毕竟历史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它还有更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内容。其实，即便是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如果不与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也不可能得到合乎实际的认识。现在我想表达的是，即便侧重反映中共革命中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的论著，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

大致能够反映中共革命社会变迁的论著，主要是根据地、解放区的研究。以中共华北革命根据地、解放区而言，大陆学者的成果最多，论文已达数百篇，著作数十部，最具代表性者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魏宏运《华北抗日根据地史》、谢忠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张国祥《晋绥革命根据地史》、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等。上述论著全面论述了根据地、解放区的发展演变，有力地推动了中共革命历史的研究进程，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大多学者的研究没有超出上述论著的水平，尤其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思维陈旧的简单化倾向，即沿袭着革命历史书写的传统革命范式，更准确地说是党派史观的范式。譬如中共革命为什么取得最终胜利，以往成果尤其是大陆学者的“分析术语和思维方式都和当时的历史文献十分接近”[①]，也就是和当时的革命宣传相类似。也正由于此，往往将中共革命的胜利从历史必然性角度做线性解释，亦即“好像普遍认为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失败是历史潮流。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前景的预见，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都指出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因而，革命为什么成功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有待解决的问题只是共产党如何制定正确的方略和路线以赢得这一胜利。结果，党史研究主要研究党内路线斗争，证明的无非是毛的正确路线如何导致胜利，而错误路线如何导致失败。”[②]

在此思维指导之下，问题最为严重的就是单一“政策——效果”模式。譬如，在中共革命与农民关系的关系中，基本上就是中共政权的政策演变、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以及革命斗争、革命建设积极性提高的三部曲。换句话说，因为中共政权力量的强大，大多学者可能会有这样不言而喻的认识，共产党与民众、

① 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38页。
② 同上书，第537页。

共产党与基层社会,就是单向的"挥手"和"跟随"、"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共产党正确的领导方针与农民革命认同之间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民众的一切行为都是理所应当的。民众行为似乎不如此,就不能表明中共政权的巨大权威和力量[①],中共革命被神话化了。

显然,这种认识大大遮蔽了中共革命的复杂性,因为它忽略了农民参加革命的主体性,忽略了传统社会与革命政策的关系,忽略了农民的犹豫和挣扎[②],忽略了共产党遇到的困难、障碍和教训。总之,将一道革命难题变得不费吹灰之力。我认为,这种表面上的称颂实际则贬低了共产党的伟大,"因为黑白评价,全白的任务和全白的政党好像跟超人一样万能。那么超人所做的事情不管有多么伟大,哪怕是奇迹,我个人很难感觉到什么佩服和尊敬,对超人来说,创造奇迹是很平凡的易如反掌的事。这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可以反过来说,要是把领导中国革命的人物和政党看成跟一般血肉之躯的人一样,他们所做的事才真的值得佩服尊敬。只要能够承认他们的缺点、短处、错误与失败才能够钦佩他们的天才、长处、智慧与成就"[③]。

为了对传统革命史学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解剖,我以中共民间借贷政策的演变为例,稍像比较详细的阐述。

在中共根据地、解放区乡村,中共政权以从未有过的外在强势,推行革命性的土地政策,或废债或减息,使得原来盛行的传统借贷尤其是高利贷受到空前的冲击、削弱乃至消失殆尽。也正因为此,以往的学者都有一种既定的认识:中共的革命性政策是以一贯之的,抗战时期始终是实行减息1分或1.5分,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废除债务政策。也就是说,对传统借贷从未妥协、调和,而是所向披靡,由此跳出和避免了历代王朝所遇到的困境,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的借贷难题,从而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以上似乎是顺风顺水,一路坦途地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的借贷难题,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由此跳出和避免了历代王朝所遇到的困境。这是典型的传统革命史书写模式。

事实究竟如何呢?革命政策与民间传统的关系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

① 拙作《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对此有所论述。

② 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③ 《张静如、范力沛、顾林三教授对本届学术讨论会的评议》,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56页。

以1937—1949年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为例，民间借贷政策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37年抗战开始到1941年底为第一阶段，借贷政策的主题是不论新债旧欠，一律减息。各个根据地的利率限定，大体都在1—1.5分之间。这就意味着，不管放贷者是谁，只要超过1—1.5分，即与高利贷没什么区别，不会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在此阶段，减息政策已经实施的地区，传统借贷尤其是高利贷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农民债务负担明显减轻，似乎中共已经斩断了农民与传统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的脐带，甚者说万事大吉了，这也正是以往学者所着力渲染的一点。其实这仅是问题的一面，而另一面却是：农民（曾经）对减息之后借不到债的担心竟变成了事实，地主高利贷者不再借给农民钱的威胁也变成了事实，农民借贷停滞已成为农家经济生活继续运行的障碍。减息本来是为了缓解农民债务负担，为其创造一个有利的金融环境，但减息之后令人沮丧的借贷停滞的现象，引起了中共中央及根据地领导的注意。如何解决减息政策所带来的借贷困难呢？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政府、银行向农民发放贷款，但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财力拮据，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政府又发起民间“互借”运动，鼓励有余粮余钱的人借出来，但也没有显著的改善。况且这种行政命令式的干预，常常酿致强迫借贷之事，反使得富户不敢出借。可以说，这两种方式都未曾有效地解决农民金融问题。也正因为此，政府对借贷利率过低的减息政策提出疑问，并重新审视传统借贷对农民经济和生活的价值，形成两点共识：一是农民在减租减息后必须交租交息，二是利率限制不应低于社会经济基础所允许的程度。[①] 也就是说，革命政策的实行并不是那么一片坦途，民间借贷秩序的死滞促使中共政权对乡村经济运行规律进行了解，认识到革命无法斩断传统制度的价值，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基础无法逾越，于是对传统借贷开始产生了尊重、妥协和利用的倾向。但正是这一问题，为以往学者不曾注意，或者说不愿意面对和承认的。

（二）1942年初至1946年“五四指示”颁布前，为华北根据地、解放区民间借贷政策演变的第二阶段。其主题是对旧债继续实行减息，而新债利率则自由议定，革命政策与传统借贷达成一定的调和，借贷政策开始具有革命、妥协与调和

① 刘少奇：《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1938年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434页；《中央关于华中各项政策的指示》，1940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560页；毛泽东：《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725页。

的多面性。以往对此阶段减息政策的研究,只注意如何开展和扩大减息的一面,对新债利率自由议定的政策却视而不见。具体情况是:经过对第一阶段减租减息政策的思考,中央对土地政策做一总结的决定,于 1942 年 1 月、2 月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标志着抗战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完全形成,也为根据地的借贷关系提供了指南。[1] 关于减息者有这样几项内容:一,既要减租减息,又要交租交息。此前虽已有类似提法,现在是从中央政策上予以确定。二,对旧债继续实行减息,以 1.5 分为标准。与以前新债旧债一律减息不同,强调减息是抗战前成立的债务,不是减今后的。三,新债利率自由议定。与以往有关条例相比,这一规定是最大的变化。追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文件更是从未有过新债利率可以自由议定的任何表示。还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文件中没有一处提到禁止高利贷,个中原由不得而知,但想必不是无意的疏忽。尽管如此,中共对新债利率自由又保留了一个回旋的空间。也就是说,虽然借贷双方可以自由议定利率,但如果债户遇到不可抗拒的困难无力还债,仍可以提出减息,这时就等于回到了先前的减息状态。可见,对传统借贷不尊重、不妥协不行,完全妥协也不行,反映了革命政策与传统制约的内在紧张、困难选择和调和性质。

(三)1946 年"五四指示"颁布至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之前,为华北根据地、解放区民间借贷政策发展的第三阶段。借贷政策的中心是废除封建旧债,但在某些地区仍然实行减租减息;与此同时,继续沿用新债利率自由议定的政策。在此阶段,由于土地改革的大规模推进,革命政策对传统借贷的冲击空前激烈,已由减息提升为废债了。尽管如此,激烈之中也有些许调和。与上一阶段类似,以往对这一阶段借贷关系的研究,只注意到如何开展废债运动的一面(尽管是主要方面),对新债利率自由的一面忽略了。其实,但从文件上看,如果说 1942 年以后中央及各根据地对新债利率自由仍有一定的限制,而解放战争时期 1946 年《五四指示》、1947 年《土地法大纲》之后,中央及各解放区在正式文件上对新债利率没有表示任何的限制。[2] 这说明,尽管土地改革和废除封建旧债非常激烈,但在新的借贷关系中,中共对传统借贷方式仍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这一态

---

①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附件,1942 年 1 月;《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942 年 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年,第 11—22 页。

② 《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1948 年 2 月;《中共中央关于借贷问题的指示》,1948 年 2 月,《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第 223、259 页。

度取向，一是因为地主高利贷者的旧债消灭之后，新债主要是普通民众之间的借贷关系，普通债务当然是受到鼓励的；二是即便号召新债利率自由议定，实际上很难执行，这一结果反而又成为中共强调新债利率自由的因素，二者是相互作用的一体。

不过，新债利率自由议定的政策比抗战时期更难实施。在砸烂旧世界的土地改革中，地主高利贷者及其剥削受到史无前例的蔑视和痛恨，它已成为干部、群众最觉可耻的东西。应当说，这本属正常心态，但也容易走向另一极端，将反封建剥削扩大化。这种意识也反映到私人借贷关系之中，一些人甚至认为只要有利息就是剥削，私人借贷不能认利。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所谓新债利率自由议定就成了一句空话。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高利贷者，农民欢呼雀跃的同时，借贷困难继续困扰着农民，而且比过去更为凝滞。可见，在此阶段，封建旧债废除与新债的自由约定仍是一对极难解决的矛盾，对传统借贷的妥协与调和并未取得明显的实效。民间借贷在革命期间始终未能活跃起来，农民借不到债的痛苦一直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和平建设的今天，国家金融法令与民间借贷制度的关系仍是一道难以求解的问题。

以上所述才是中共民间借贷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真相，而传统"政策——效果"的论述模式却大大掩盖了中共革命斗争的复杂、曲折与痛苦。表面看来，真实的往往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恰恰是这种艰苦的努力彰显了中共革命的光辉。

四　中共革命与"大乡村史"的连接

如何改进传统革命史的书写方式？中共革命史研究究竟从何处突破？上节所举例证，实际上已经显示了我要提出的研究取向，这里再从两个角度做进一步申论。

第一个角度是中共革命与"大乡村史"的连接。所谓二者之间的连接，也就是将中共革命纳入大乡村史范畴。这一方法并非人为臆造，而是中共革命和中国乡村两者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

历史已经证明，中共革命的成功与中国农村、中国农民有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从1927年中共发动武装起义开始，毛泽东率先在井冈山地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随着各个根据地以及中央根据地的建立，中共政权初具规模并形成独特

体系。而后经过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不断发展壮大，直至建立新中国，政权组织日益复杂和完整。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始终是中共革命的主体力量，农村一直是中共革命的重要依托。所以，中共革命实质上是农村革命、农民革命，中共政权与农村、农民的关系是最值得重视的核心问题。也正因为此，著名中共历史研究专家塞尔登指出"半个世纪以来引起人们对中国革命展开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中共与农民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决定了中国的游击战争或人民战争的特色"①。

中共革命与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它在中国乡村史尤其是近现代的乡村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正因为此，才使得我们有可能也必须从大乡村史视角考察中共革命问题。也只有将中共革命纳入"大乡村史"范畴，才能避免就中共革命论中共革命，从而真正理解中共革命的变迁。

反过来，从乡村史而言，中国乡村史包括中国近现代乡村史的研究也不能仅仅限于传统乡村以及向现代转型的乡村，还应将中共革命纳入乡村史研究的范畴。否则，就很难说是完整的乡村史，也不能理解中国乡村史的发展走向。

就以上想法而言，目前的研究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中共革命史与中国近现代乡村史似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老死不相往来。中共革命史学者虽然都认为农村与农民是中共革命的核心问题，但很少有人从乡村史角度理解这一问题，结果就会导致我上节所举民间借贷政策的例证中忽视传统乡村社会因素对革命策略的制约，以为中共革命性借贷政策一以贯之，所向披靡，这就简化乃至回避了中共革命政策实施的复杂和曲折。因为他们不懂得或不熟悉中国传统乡村历史，不知道农民离开借贷无法运转自己的经济与生活。如果了解这一历史现象，就会明白，通过政府命令的方式虽然可以削弱乃至废除高利贷，但只能是奏效于一时，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借贷问题。

反过来，中国乡村史学者很少有人关注中共革命史，在他们的论著中几乎没有中共革命中的农村、农民问题的位置。这种倾向同样导致了对中国历史认识的偏离，比如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土地分配关系和封建剥削关系，现在学界似乎越来越认为土地分配是高度分散的，租佃关系比例不大，地租剥削不严重，主佃关系和睦。如果说这种认识对以往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极端化理解有一定纠偏作用，但同时也走入了另一淡化社会矛盾的极端。倘

① 〔美〕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07页。

若对中共革命历史有所认知，就会明白，果真如此，中共革命尤其是得到农民支持的一场革命将无从谈起，难道革命的发生是一个偶然的意外吗？显然，不研究中共革命史，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就难有准确的把握。

五、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

第二个角度，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

如前所述，用社会史角度，将革命与社会结合起来，是研究中共革命史的重要方法。其实，早在 1991 年著名中共党史学者张静如就发表过一篇论文《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①，号召中共党史学者参与社会史研究、丰富党史研究的内容。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共党史学者的关注，随之也出现了注重从民众视角进行研究的社会史成果。但总体来看，效果不够显著，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的复杂关系仍未真正揭示出来。

我以为，要想实现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的真正突破，固然应该增添和丰富为以往忽视的社会史内容，譬如中共政权下的家庭宗族、衣食住行、风土民情等，但最关键的恐怕还在于研究思维的转换和研究视角的创新。否则，即便是从社会史方向研究中共党史或革命史，仍然会出现我上面所谈到的弊端，或者研究陷入碎化，或者走向民众视角的另一极端，而更多的是表面上强调社会史方法，实际上仍未摆脱传统革命史的研究范式。进而言之，这实际上不仅是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史研究应该反思的问题。

在所有的方法转换中，最应强调的应该是改进上述传统革命范式下的简单思维模式，将此作为今后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首要目标。简单地说，就是回归实事求是的学术轨道，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揭示历史的复杂性。其实，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应有之义，但对于长期受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束缚的中共革命历史而言，仍是值得注意和提倡的。在回归实事求是基本精神的同时，应进一步寻求新的研究视角，注入新的理论与方法。

在新的理论与方法中，我以为，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

① 载《历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双重互动角度研究中共革命史，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的切入点和突破点。

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已越来越成为分析人类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有效路径，而以西方学者的成就最大。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政府权力的实践形态以及民间社会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早先的主流意识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单向地施加权力，将政府与社会仅仅表现为二元对立、排斥与冲突的关系。而今理论界已改变了这一看法，普遍认为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重叠的互动，研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是研究来自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和来自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谓互动既包括两者间的排斥、冲突，也关联到二者的融合与转换，或者排斥中有融合，融合中有排斥，总之是排斥、融合乃至转换的互动过程。

就此而论，我不太赞成目下中国有些社会史学者特别强调的“自下而上”的单一视角。自下而上尽管对传统的自上而下模式是一种纠偏，但矫枉过正，犯了传统模式同样的错误，也不可取。所谓自下而上并不能完全取代自上而下，自上而下仍有其方法论价值，当然，比较合理的还是上下互动的方法。

这一视角与中共革命的历史实际是契合的。自清末民初以后，政府力量逐渐向农村渗透，但真正比较彻底进入乡村、控制乡村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从1927 年中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经过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解放区不断发展壮大，直至建立新中国，中共革命依靠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取得了成功。也就是说，中共革命实质上是农村革命、农民革命，中共政权与农村社会、农民群众的关系是最值得重视的核心问题。

由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像共产党那样，对农村社会面貌进行了巨大规模的改造，传统的单向度思维对此过于渲染甚至神化了。实事上，中共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这样简单，而是一个相互排斥、融合乃至转换的互动过程。民间社会、广大民众并非完全被动的角色，民间传统运行方式、民众传统心态及其行为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共产党的政策，塑造着中共政权本身，由此可以说“我们的革命是在改造社会，但社会也在改造我们的革命”①，甚至还可以说，这种传统的“连续性比那些表面的明显变

① 《陈旭麓文集》第 4 卷，《浮生录》427 条与 442 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化更基本"①。也正是由于民间传统对革命策略的制约,中共革命策略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张力是经常存在的,也就是政府法令与具体实践、实际效果之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中共革命政策、方针的贯彻实施并不像有些人所描绘的那样一路高歌,还应正视反面的例证,因为"在其操作层面上,则往往难于避免层层加码和层层过滤,发生各种变通和扭曲。正因为此,在考察乡村社会转型时,不仅要重视关于乡村转型的各种理论、学说,解决乡村问题的相关路线、方针、政策,而且更要重视研究所有这一切如何落实于乡村社会实际,以及乡村社会本身如何接受、消化这些理论、学说、路线、方针和政策"②。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看表面的政策、法令,更应重视实际发生了什么,并探究为什么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背离的。

以上观点在中共革命进程中的证据俯拾皆是。前述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所遇到的农民借贷停滞的困境以及将政策调整为新债利率自由议定,就充分体现了传统民间借贷习惯的强大惯性以及对中共革命政策的反作用力。再以土地改革时期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为例,中共政权的官方建构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存在于多个层次,阶级斗争的主要舞台是村庄,但真正的大地主通常都是不在村地主,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逃过了阶级斗争。在村庄里面,那些被作为地主和富农进行斗争的人中,只有一部分符合土地改革的划分标准,其他根本不应该但又确实被划为地主和富农的人,绝大多数是在土改的激进阶段被当做斗争对象的。一些人被划为阶级敌人,并不是他们的阶级身份,而是因为他们的逾越规范的行为:参加或同情国民党,皈依外国宗教,当过汉奸,或者做过错事、坏事;另外一些错划分子,仅仅因为是干部的对头。③ 由上可见,共产党的宏观政策与各地的具体实践之间是有相当距离的,农村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对中共政策进行了过滤和变通,反多来对中共政策的调整又会产生影响。此例表明,要想对中共策略的制定和实施进行深入研究,就必须改变以往革命史研究自上而下的固化思维,从革命权力与农村社会的互动视角来考察、理解中共革命的复杂轨迹。

在革命策略与具体实践的张力之间,还有一点须做进一步的说明,即不同层

① 〔法〕毕仰高:《抗日根据地中农民对中共动员政策的反应:一些西方的观点》,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50页。

② 姜义华:《革命与乡村》总序,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第5页。

③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2页。

级干部、不同阶层群体和不同个体对革命策略的态度，既可能做出相同的反应，也会因利益的差别而有不同的选择，从而影响着革命策略的实施。以参军——此谓中共革命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例，传统描述多为中共政权和军队一号召，就出现了"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似乎是农民都有高度的革命觉悟。实际上，面对扩军动员，农民参军的动机是非常复杂的。在山东莒南县，解放战争时期农民参军有以下类型："甲、快胜利了。这是一般的动机，占大多数。乙、快'实行了'要翻身，不受压迫，打倒大肚子。这是一般党员和工人的动机。丙、八路军生活好。丁、为了学习进步。这是一般青年的动机。戊、老六团武器好。这也是青年，尤其是慰问团员的动机。己、抗战后找个好老婆。这是没老婆或夫妻不和的参军动机。庚、家庭压迫，如兄弟父母叔伯等等压迫。辛、升官。中农成分及少数英雄思想较浓厚的村干部，都有这种动机。壬、报仇，或怕斗争。这是个别的。"[①]正是根据以上具体情况，莒南县委要求领导干部要善于把握各种对象的参军动机，进行具体动员。参军如此，入党也类似，不再赘述。此例再次表明，只有通过政权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才能看到传统革命史学经常忽略的东西。

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年已有少数学者开始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研究中共革命史。其中，成绩较为突出的是人类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代表作有：弗里德曼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黄宗智的论文《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何高潮的《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的分析》（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丸田孝志的《太行・太岳根据地的追悼仪式及民俗利用》（《近きに在りて》第 49 号，2006 年）、《国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1937—1949）》（《アジア研究》第 50 卷 3 号，2004 年），以及大陆社会学者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郭于华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杨念群主编：《新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张佩国：《山东"老区"土地改革与农民日常生活》（《二十一世纪》2003 年 4 月号），黄道炫：《洗脸——1946 年至 1948 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2007 年第 4

① 《滨海区莒南县委关于拥军参军工作具体总结》，莒南县档案馆编：《无私奉献的人们——莒南县战时拥军参军档案资料选编》，1991 年印，第 80—81 页，转引自王友明：《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年，第 113—114 页。

期),韩晓莉:《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以上论著都对中共革命政权与普通农民的关系进行了颇富价值的探讨,其注重田野调查、注重理论分析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近年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发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等论文。尽管这些成果仍是零散的、初步的,距离全方位透视中共革命政权与农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仍相差甚远,但仍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综上所述,中共革命史虽然是一个老问题,但它的研究远未走到尽头。只要继续开拓新视野,老树仍可以绽放新的花朵。我以为,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视角就具有这样的使命和价值,它将为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构架,从而实现中共历史研究的突破。其实,这一视角的价值不仅限于此,它还可以为建立和谐的国家与社会、为当今新农村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为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提供新的实证支撑和理论贡献。

身份认定与籍贯问题

——以明清之际金门及邻近海域“海盗”的研究为中心

陈春声*

在历史学家眼里，明清之际福建、广东交界地区及其邻近海域的政治局势与社会变迁，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意义。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自飞黄、大木（笔者按：飞黄为郑芝龙号，大木为郑成功号）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①]。金门位于这一地域之中，是一大批在16至17世纪的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风云人物活跃之所在，其中也包括了许多在时人和后来者的记述中被称为“海盗”的人物。本文试图以明清之际在金门及邻近海域活动的所谓“海盗”的身份及其籍贯为中心，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面相，是如何随着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的变迁而被型塑出来并发生变化的。

金门位于福建与广东交界海面，控制着厦门湾（明清时期又称“嘉禾海”）和九龙江的入海口，其周围海域在明代是受所谓“倭寇”和“海盗”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也是明清时期民间近海帆船贸易最活跃的地域。《金门志》对金门及其临近的厦门岛的地理形势，有如下的描述：

> 闽地濒海者虽多，而金、厦最著。盖其间有平原广陆，可以牧马屯兵；有曲港深洲，可以泊舟结砦；有豪门巨贾，可以助饷资粮。故为海外诸夷所必争之地，不独台湾藉辅车之依、有桴鼓之应。[②]

---

* 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系教授。

本文初稿曾提交2008年6月14—15日在台湾中兴大学举办的“第二届金门学国际研讨会”，文章的修改定稿，从各位与会者的评论和讨论中获益良多，谨致衷心谢忱。

①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727。

② 《金门志》卷二，分域略，形势。

清代道光年间曾任闽安协台副将的孙云鸿著有《嘉禾海道说》，其中更详细地表达了当时人对该海域重要性的观感：

> 厦门，在宋为嘉禾屿。屹然海中，周五十余里。环嘉禾者，为嘉禾海。北望高浦，西界海澄，东厄烈屿；南临大海，汪洋浩瀚，障以太武。外与金门相为犄角，二嶝防于内（大嶝、小嶝），二担捍于外（大担、小担）；浯屿则孤悬海表，控制要冲。于是东南海口布置扃钥，固若金汤。潮流岐分，因地屈折：南分三门（大担门、小担门、青屿门），东岐二派；南流从南而转北，东流由东而旋西。岛居泉、漳交错之地，故潮流亦达焉。自东来者，由北而至同安；自南而来者，西绕鼓浪屿而抵漳州。诸溪汇流，朝宗于海；潮汐潆洄，常一日而再。至港汊孔多，喷余波以四达。斯大小帆樯之集凑、远近贸易之部会也。自担门东渡黑洋至于台、澎，上接沙埕、下连南澳，据十闽之要会、通九译之番邦，则在嘉禾海以外矣。[①]

一　金门所与明清之际周边海域“海盗”的活动

明代洪武年间建立的以沿海卫所为骨干的军事防御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沿着全国海岸线较完整构筑的海防体系。众所周知，明太祖沿着整个帝国海岸线普遍建立卫所的直接理由，是为了防御倭寇的侵扰。[②] 一般认为，明代海防体系的真正构筑，即沿海卫所的普遍设立，始于洪武十七年（1384）。[③]《明史·汤和传》记录了当年方鸣谦向洪武帝提出的有关海防的建议及其实施情形：

> 既而倭寇上海，帝患之，顾谓和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也，习海事，常访以御倭策。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帝以为然。和乃

---

① 转引自《厦门志》卷二，分域略，形势。

② 可参见氏富生：《试论明朝初年的海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第13—20页。

③ 参见黄中青：《明代福建海防的水寨与游兵》，见汤熙勇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七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第391—438页。

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①]

在浙江之后，福建也开始在沿海地区系统地设立卫所。洪武二十年（1387）四月，朱元璋派周德兴前往福建巡视，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缘海卫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军卫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兴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凡选丁壮万五千余人，筑城一十六，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分隶诸卫以为防御。[②]

这批新设立的"缘海卫所"中，也包括有金门千户所：

（洪武二十一年）置福建沿海五卫指挥使司，曰福宁、镇东、平海、永宁、镇海。所属千户所十二，曰大金、定海、梅花、万安、莆禧、崇武、福金、金门、高浦、六鳌、铜山、玄钟。以防倭寇。[③]

一般说来，明代卫所军士的来源，包括有"归附"、"踩集"、"谪发"和"抽丁"等各种名色。[④] 从前引《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可以知道，洪武二十一年（1388）包括金门所在内的福建沿海卫所戍兵的来源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缘海卫所戍兵"，即以抽丁为主。据各种史料记载，福建沿海卫所抽丁籍军之初，实行的是就地戍守的原则，即本地人在本地当军，结果，"本地军顾恋乡土，有误防守"[⑤]，卫军经常跑回家中，卫所军官很难约束，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终于对浙江、福建沿海各卫所戍兵进行了大规模互调：

诏互徙浙江、福建沿海土兵。初闽、浙濒海之民多为倭寇所害，以指挥方谦言，于沿海筑城置卫，籍民丁多者为军以御之。而土人为军，反为乡里

① 《明史》卷一二六，列传一四，汤和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754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一，洪武二十年三月戊子。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己酉。
④ 关于明代军户的来源的名色，可参阅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第1147—1166页。
⑤ 弘治《兴化府志》卷四八，页12a—12b。

> 之害，是有言于朝者，乃诏互徙之。既而以道远劳苦，止于各都司沿海卫所相近者令互居之。①

可以想见，当时金门千户所的戍兵也就不是本岛民户的子弟，而是来自邻近地区的兵丁。

金门所设立不久，其军官、兵丁和民人即因捕获"海寇"之功而得到升赏：

> 前军都督府掌府事隆平侯张信奏，海寇至福建，金门千户所副千户李敞督众追捕，焚贼船，斩首五十八级，生禽贼首金总管等男妇十一人，获船二艘。
>
> 上谓兵部、礼部臣曰，海寇为民患久矣，今敞等捕获之功可嘉，其议升赏之。于是礼部议奏，统兵副千户升指挥佥事，赏银百两，钞百锭，彩帛二表里；领军百户升正千户，所镇抚升卫镇抚，其杀首贼所镇抚亦升正千户，各银五十两，钞五十锭，彩币一表；禽杀首贼军升百户，杀从贼舍人升所镇抚，总旗、小旗升试百户，小甲军人升总旗，俱赏银五十两；小甲军人被创死者，其子皆升总旗，仍赏银十五两；弓兵、民人协助禽贼者，各赏钞二十锭，有被创死者加十锭；其送贼徒到京官军，应升赏者，即循例升赏，仍与路费钞二十锭；未至者，即所在升赏。从之。②

有意思的是，在同时期的另一个文献中，这些所谓"海寇"又被称为"海岛逃民"：

> 永乐元年……六月丁卯，泉州卫金门千户械送所获海岛逃民至京师，言其数尝劫掠海滨，请诛之。③

所谓"海岛逃民"，当是居住于周边海岛上的不属"编户齐民"的人群。实际上，当时福建、广东、浙江沿海的海岛上，此类居民比比皆是，他们往往被沿海卫所的官兵指为"海寇"。邻近金门的大嶝岛和小嶝岛，洪武二十年（1387）曾就被朝廷放弃：

---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三，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甲午。

② 《明太宗实录》卷二〇上，永乐元年五月辛巳。

③ 《大明太宗文皇帝宝训》卷五。

> 大嶝屿。在浯洲西北，隔水；周广十里，多村落。洪武二十年，徙大小嶝民，二都遂墟。[①]

同一时期被朝廷放弃的距金门不远的另一个更重要岛屿，是南澳岛。[②] 这些被朝廷放弃的岛屿，实际上仍有许多居民，他们就常常被称为"海岛逃民"。

这样一来，沿海卫所的设立，实际上在沿海地区的百姓中划出了"民"与"盗"的界限。卫所所在地的百姓，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开始按照国家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来规范和解释自己的日常生活，从而努力型塑符合朝廷礼治的地方文化形象。以金门为例：

> 浯洲海外一沤，地不足三十里。当有明隆、万、启、祯间，名流辈出，宏才硕学、经济气节，史不绝书。近复以武功显，搴节钺、膺五等者比闾相望。皆足为温陵之文献增光。[③]
>
> 浯洲为泉、漳门户，地辟民聚；鸡犬相闻，缙绅杂遝。号称海滨邹鲁。[④]
>
> 浯岛科第辈出，不独以文章重；诸德业可师者，亦足以示仪型而风后进。[⑤]

这种文化形象被诉诸文字，表现的是地方文人和地方志编修者不懈的努力。不过，到了风云激荡的明清之际，在朝廷和来自外地的官员看来，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岛屿，不管其居民是否已经归附朝廷，仍然与"海寇"、"海盗"、"倭寇"之类的活动，脱不了干系。嘉靖年间在浙江指挥抗倭的都御史王忬，在其《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中，就把广东至浙江沿海的主要岛屿，都描述为"贼巢"：

> 臣访得番徒、海寇往来行劫，须乘风候。南风汛，则由广而闽、而浙、而直达江洋；北风汛，则由浙而闽、而广，而或趋番国。在广则东莞、涵头、浪

① 《金门志》卷二，分域略，山川。
② 参见拙作《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中山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第 24—32 页；第 3 期，第 46—52 页。
③ 《金门志》卷九，人物列传一。
④ 《金门志》卷十五，风俗记。
⑤ 《金门志》卷十五，风俗记。

北、麻蚁屿以至潮州之南澳；在闽则走马溪、古雷、大担、旧浯屿、海门、浯州、金门、崇武、湄州、旧南日、海坛、慈澳、官塘、白犬、北茭、三沙、吕磕、崳山、官澳；在浙则东洛、南麂、凤凰、泥澳、大小门、东西二担、九山、双屿、大麦坑、烈港、沥标、两头洞、金塘、普陀，以至苏松丁兴、马迹等处；皆贼巢也。①

在王忬眼里，大担、旧浯屿、海门、浯州、金门等等地方，都是海寇活动频繁之所。当时另一位主持过抗倭战争的官员胡宗宪，也这样描述金门及其周边海域的情势：

三、四月东南风汛，番船多自粤趋闽而入于海。南澳云盖寺、走马溪，乃番船始发之处、惯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铜山、玄钟等哨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则有以遏其冲而不得泊矣，其势必抛于外浯屿。外浯屿，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探知虚实，何不直捣其巢穴）；附海有浯屿、安边等哨守之兵，若先会兵守此，仍拨小哨守把要紧港门，则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势必趋于料罗、乌纱。料罗、乌纱，乃番船等候接济之所也（等候之所，尽可乘虚以计破之；但未得的实耳）；附近有官澳、金门哨守之兵，若先会兵守此，则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势必趋于围头、峻上。围头、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风之门户也；附海有深扈、福金哨守之兵，若先会兵守此，则又不敢泊矣（自铜山、玄钟等哨至此，堪拟连珠炮，令人应接不暇）。来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济，舶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将有不攻而自遁者；况乘其疲而夹力攻之，岂有不胜者哉！②

在胡宗宪的描述中，外浯屿乃"番人之巢窟"，料罗、乌纱"乃番船等候接济之所"，而围头、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风之门户也"，可见，在外地官员眼中，金门及其周边地域无疑是与"倭寇"和"海盗"有密切关系的地方。清代道光年间编撰的《厦门志》，根据各种史料记载，概述了金门及其周边地区嘉靖年间受"倭乱"和海寇影响的连续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倭泊浯屿，掠同安。

三十七年，倭泊浯屿，火其寨；攻同安，知县徐宗奭拒却之。五月，海贼

① 《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三，王司马奏疏。

② 《明经世文编》卷二六七，胡少保海防论。

洪泽珍巢旧浯屿。冬，倭再泊浯屿。

三十八年春正月，倭自浯屿掠月港、珠、浦、官屿。五月，掠大嶝。新倭自浙至浯屿焚掠。

三十九年，新倭屯浯屿。四月，漳贼谢万贯率十二舟自浯屿引倭陷浯州，大掠。知县谭维鼎率义兵救援，泊澳头。五月，参将王麟、把总邓一贵追击倭寇于鼓浪屿及刺屿尾，大败之。①

二 明清之际"漳潮海寇"的社会身份

近二十余年关于明末"倭寇"问题的研究，有若干引人注目的进展。其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明代官方史料所记载的"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的事件，大多数乃中国沿海的"海盗"与"势家"所为，"倭寇"问题的症结，主要不在于中日两国间"朝贡"贸易关系和日本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有必要在中国社会内部去寻求其更基本的原因。"倭寇"问题实际上是由于明朝政府所厉行之"海禁"政策，与嘉靖以后东南沿海高度发展的商品货币经济产生深刻矛盾所引致，所谓"倭寇"实际上是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海商"集团。②

明代后期东南沿海所谓"倭寇"和"海盗"问题的产生，直接与明王朝厉行"海禁"的政策有关。明朝立国之初，一反宋元时期政府容许、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除有限度的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③，以严刑峻法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洪武四年（1371）为禁绝陆上居民与方国珍等余部的联系，禁绝由海道通外邦而引发寇乱的可能，朱元璋下诏"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④。同月，又要求对据闻私自派遣人员出海行商的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等人进行调查，"有犯者论如律"⑤。此后多次下诏禁止民人私自出洋贸易⑥。成祖即位之后，在其登极诏书中即有重申通番之禁："缘海军民人等，

① 《厦门志》卷一六，旧事志，纪兵。
② 可参见戴裔煊：《明代嘉靖年间倭寇海盗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林仁川：《明末清初的海上私人贸易》，厦门大学出版社，1985 年。
③ 《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市籴二。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七〇，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条。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七〇，洪武四年十二月乙未条。
⑥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至二五二。

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1]永乐二年(1404)再禁民下海：

> 时福建濒塘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因而为寇，郡县以闻，逐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2]

《大明律》对私自下海贸易者的处罚，有如下规定：

> 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3]

然而，东南沿海的粤、闽、浙诸省百姓至迟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海上贸易，从中获利颇丰，这种地方文化传统与明王朝的法令之间的矛盾，蕴含了由此而引发地方动乱的可能。有明一代，东南沿海民间非法的海上贸易活动始终未曾停止。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时的东南沿海地方官员和市舶太监出于稳定地方社会、增加军需供应和贪图贿赂等各种考虑，对这种状况实际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嘉靖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嘉靖皇帝即位之初，重申了明初有关海禁的规定，嘉靖二年至嘉靖八年(1523—1529)一度停止广州市舶，嘉靖二十六年至嘉靖二十八年(1547—1549)间，提督浙闽海防军务的朱纨进剿宁波附近“下海通番”者聚集的双屿港，上疏揭发浙闽势家通倭谋利，又追击海上私商和葡萄牙人于福建诏安之走马溪，大获全胜。这一系列事件，正好发生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货币关系空前发展，商人和地方势家力量增强，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力结构正在“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而引发了长达百年的东南“海盗”之患。正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福建巡抚谭纶所奏：“今岂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无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

---

① 《明成祖实录》卷一〇上，“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壬午”条。
② 《明成祖实录》卷二七，永乐二年正月辛酉条。
③ 《大明律附例》卷一五，兵律。

相率而勾引为盗也?"[①]。

对于东南沿海的百姓来说,从事海上贸易本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他们祖祖辈辈以来的最重要的生计来源之一,海上活动已经成为地方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前述朱纨的奏疏就这样描述金门(即"浯洲")及其周边地区百姓与士绅与盗贼"内外合为一家","民"、"盗"不分的情形:

盖福建多贤之乡,廷论素所倚重;而滨海不理之口,流言亦能动人。故官斯土者,率以因循迁就为自全计。虽有巡按御史除奸革弊,然巡历不过一年,交代则成故纸;盖威福之柄移于乡评,是非之公乱于野史久矣。

……夫所恃海防者,兵也、食也、船也、居止瞭望也;今皆无所恃矣。贼船、番船则兵利甲坚,乘虚驭风,如拥铁船而来;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为"接济",内外合为一家,其不攻劫水寨、卫所、巡司者亦幸矣。官军窜首不暇,奸狡者因而交通媒利,亦势也。

如今年正月内贼虏浯洲良家之女,声言成亲,就于十里外高搭戏台,公然宴乐;又八月内佛狼机夷通艘深入,发货将尽,就将船二只起水于断屿洲,公然修理。此贼、此夷,目中岂复知有官府耶!夷、贼不足怪也。

又如同安县养亲进士许福先被海贼虏去一妹,因与联姻往来,家遂大富。如考察闲住佥事林希元负才放诞,见事风生;每遇上官行部,则将平素所撰诋毁前官传记等文一、二册寄览,自谓独持清论,实则明示挟制。守土之官畏而恶之,无如之何。以此树威,门揭"林府"二字;或擅受民词私行栲讯、或擅出告示侵夺有司。专造违式大船,假以"渡船"为名,专运贼赃并违禁货物。林次崖有高才而不偶于时,便以自放,不为检束。夫所谓乡官者,一乡之望也;乃今肆志狼籍如此,目中亦岂知有官府耶!

盖漳、泉地方,本盗贼之渊薮;而乡官渡船,又盗贼之羽翼。臣反覆思惟,不禁乡官之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也;故不恤怨谤,行令禁革以清弊源。[②]

朱纨有意与闽浙地方势家过不去,其结局众所周知:

日夜练兵甲,严纠察,数寻舶盗渊薮,破诛之。遂镌暴贵官家渠魁数人

① 谭纶:《谭襄敏公奏议》卷二。

② 朱纨:《阅视海防事》,《明经世文编》卷二〇五,朱中丞甓余集。

姓名，请戒谕之，不报。于是福建海道副使柯乔、都司卢镗捕获通番九十余人以上，纨立决之于演武场，一时诸不便者大哗。盖是时通番，浙自宁波定阳，闽自漳州月港，大率属诸贵官家咸惴惴，重足立，相与诋诬不休。[①]

纨执法既坚，势家皆惧。贡使周良安插已定，闽人林懋和为主客司，宣言宜发回其使。纨以中国制驭诸番，宜守大信，疏争之强。且曰："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闽、浙人益恨之。[②]

于是御史周亮等劾纨注措乖方，专杀启衅。[③]

最终的结局是"纨恚自杀"，临死前自己说"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所谓"欲为国家杜乱源，乃为势家构陷"[④]。可见所谓"中国衣寇之盗"，即沿海地方势家力量之大。

朱纨描述的"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为'接济'，内外合为一家"行为，实际上有其广泛而深刻的群众基础。明代以前，朝廷的制度允许进行海上贸易，彼此就一直相安无事，明代厉行海禁，沿海百姓赖以谋生的习惯做法成了"违法行为"，为了生计继续下海贸易者，就被官员和士大夫描述为成"海盗"、"海寇"或"倭寇"。崇祯三年(1630)兵部尚书梁廷栋对其时福建沿海地区海盗兴起的缘由，也有如下的讨论：

闽地瘠民贫，生计半资于海，漳、泉尤甚。故扬航蔽海，上及浙、直，下及两粤。贸迁化居，惟海是藉。自红彝据彭湖而商贩不行，米日益贵，无赖之徒始有下海从彝者。如杨六、杨七、郑芝龙、李魁奇、钟六诸贼皆是。此贼起之一。

闽之土既不足养民，民之富者，怀资贩洋，如吕宋、占城、大小西洋等处，岁取数分之息。贫者为其篙师、长年，岁可得二、三十金。春夏东南风作，民之入海求衣食者，以十余万计。自红彝内据，海船不行，奸徒阑出，海禁益严，向十余万待哺之众，遂不能忍饥就毙。篙师、长年，今尽移其技为贼用。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② 《明史》卷二〇五，朱纨传。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④ 《明史》卷二〇五，朱纨传。

此贼起之二。[①]

上引文字中提到的“杨六、杨七、郑芝龙、李魁奇、钟六诸贼”，均活跃于金门一带海域。值得注意的是，梁廷栋特别强调福建沿海百姓“航薮海，上及浙、直，下及两粤。贸迁化居，惟海是藉”，“民之入海求衣食者，以十余万计”的，说明“篙师、长年，今尽移其技为贼用”，是出于“不能忍饥就毙”的不得已之举。这样的描述，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百姓日常生活方式与朝廷制度之间的矛盾与紧张。

与外来官员的描述不同，金门本地文献着重强调的是地方官员和本地乡绅、民众抗御海盗、倭寇的事迹，略举数例如下：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海寇阮其实大掠小嶝，知府程秀民发兵攻之；再战再克，诛其魁。余党溃奔，金门指挥张文昊尽擒之。[②]

张凤徵，字舜夫，号治庭；青屿人。生而颖敏，襁褓中辄能识壁上字；九岁，通五经大义。嘉靖辛酉举人，乙丑进士，观政御史台。素善病，力疾视事；辰入申归，不少懈。病剧给假，行至张家湾而卒。凤徵性笃实，嗜善若渴；见不善，谨避而已。岁己未，里中倭，凤徵与弟凤表皆将缧去，乃出金求免其一；凤徵曰：“吾弟幸有子，其负若子出，营金赎我。即不能办，幸毋以我为念。”凤表曰：“兄善事父母，且未有子，不可留。”相推良久，贼怒叱，几剚刃；已感其义，获免。人以急难争死，两难之。[③]

张宏纲，青屿人。倭寇之乱，其父遂夫与弟宏猷皆被掳，索金赎。宏纲家贫，无所得金；度父无脱理，乃入巢泣说贼曰：“某年幼，虽假贷无与，不如归吾父，则金可得。”贼质之，为刻期而归其父。父归不得金，至期，贼酋令缚宏纲与其弟斩之。宏纲复绐贼曰：“父归必有金，可遣弟速之。”贼又如言。宏纲度弟已至家，乃告贼曰：“家贫甚，金实不可得，吾以全吾父与弟耳”。贼怒曰：“黠儿敢戏我！”悬于树焚之。祀孝悌祠。[④]

吕诚源，字以渐，号东涪；金门诸生。事母以孝闻，为人坦夷无城府，临财不苟取予，所交皆知名士。患倭寇，徙居所城；捐金数百，筑东堡以护逃寇

① 《崇祯长编》卷四一，三年庚午十二月乙巳朔。
② 《金门志》卷一六，旧事志，纪兵。
③ 《金门志》卷九，人物列传一。
④ 同上。

者。沿海渔人,藉其赀营生;时以所获来馈,却不受。晚年,邑令数延大宾,间一赴之。卒后,蔡献臣为之铭。[1]

那么,这些被成为"海盗"者的社会身份到底是怎么样?如前所述,明初东南沿海的岛屿上,并非所有居民都已经编入里甲,成为编户齐民,而是有大量的"海岛逃民"存在。这些不是编户齐民者,更加是以海为生的人。朝廷禁止百姓从事海上贸易,沿海那些不受朝廷管辖的海岛,就更容易成为没有里甲户籍的百姓聚集交易的场所。笔者曾经指出,明代漫长的海岸线上,相互间距离达数十里至近百里的沿海守御千户所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帝国海防的象征意义。[2] 所以,即使是地方官府进行了户籍编审,其百姓已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的海岛和沿海地方,官府的控制力量也是相当薄弱的,百姓"违禁"仍然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盗"、"民"部分实乃当时东南沿海社会的实态,而且,"盗"与"民"之间的对立与紧张,仍是了解朝廷典章制度的文人和对地方统治秩序负有责任的官员们制造出来的,对于一般的百姓来说,除了战乱发生,特别是官军前来围剿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他们并未觉得日常生活中"盗"与"民"之间真的是势不两立的。前引资料中描述的"贼虏浯洲良家之女,声言成亲,就于十里外高搭戏台,公然宴乐"和"同安县养亲进士许福先被海贼掳去一妹,因与联姻往来,家遂大富"两个个案,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 "漳潮海盗"的籍贯问题及其结局传说

根据文献记载,明清之际在金门及其附近海域活动的,包括了当时漳州、潮州沿海几乎所有重要的海上活动集团,其主要人物包括许栋、许朝光、吴平、曾一本、谢策、杨六、杨七兄弟、李魁奇、钟六、洪迪珍、林国显、徐碧溪、林道乾、杨老、魏朝义、郑芝龙等等。作为有时拥有数万之众的海上武装集团,其活动范围远远不限于海上贸易,而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军事性质。这些海上活动集团的活动范围遍及闽粤两省沿海,也到达日本、吕宋、交趾、苏门答腊、柬埔寨、暹罗等地。

有意思的是,这些被当时人和后来者一再提起的重要的"海寇"首领,在这

① 《金门志》卷九,人物列传一。
② 参见拙作《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

些记载中，许多人籍贯似乎都不是非常确定。仅以曾一本为例，曾一本早年追随大海盗吴平，嘉靖末年吴平在南澳的城寨被官军攻破，吴平逃到海外，曾一本集其残部，先侵寇广东西部的高州和雷州一带，扩张势力后再度回到闽粤交界沿海地区，继续为祸地方。隆庆元年(1567)曾一本自己到官府要求招安，为安插地点事绑架广东澄海知县为人质达三个月之久，后被安插于潮阳下浍地方。三个月后又再次造反，终于惊动朝廷。隆庆三年(1569)在广东、福建两省会剿之下，曾一本蹈海死。会剿曾一本的官兵，就是在金门集结的，据时任福建巡抚的涂泽民记载，"照得广贼曾一本入闽、广，奉旨夹剿，两省兵船大集浯屿"①。

关于曾一本的籍贯，万历年间任潮州知府的郭子章有这样的说法：

> 曾一本者，福建诏安人，招亡纳叛，聚党数万，出入闽、广，大肆猖獗，攻城掠地。②

但越到后来，说法越是不同。清代顺治年间吴颖修《潮州府志》，仍记载"海贼曾一本，诏安人，吴平党也"③。乾隆齐翀修《南澳志》，这说曾一本是潮州府澄海县人："曾一本，澄海人，贼吴平党也。"④而且在"澄海人"后面特别注明"潮州志作诏安"，以示纠正。而到了民国年间陈光烈再撰《南澳县志》，又写成"曾一本，海阳薛陇人，吴平党也"⑤。

可能引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这些所谓"贼首"可能本来就是无籍之人，所谓"素不受有司约束"⑥者，本来就没有所谓籍贯的问题；二是从事海上活动的人群"出入风波岛屿之间"，流动性很大，不能仅仅从陆上人的行政地域观念出发去理解他们；三是在传统时期，并无真正可靠的能够"验明正身"的技术手段，许多海盗的首领也没有机会被陆上人所认识，军事将领和地方官员就常常为确定所捕获的"贼首"是否为本尊而大伤脑筋，在许多情况下，一个成名的"大盗"的名号，也常常可能为他人所冒用；四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地方官员为了推卸责任，更加愿意把这些"大盗"说成外地人氏，结果，不同地方的文献会有不同的

① 涂泽民：《行巡海兴泉二道》，《明经世文编》。
② 郭子章：《潮中杂记》卷一一。
③ 顺治《潮州府志》卷七。
④ 乾隆《南澳志》卷八。
⑤ 民国《南澳县志》卷三四。
⑥ 李龄：《李宫詹文集》，"赠郡守陈侯荣擢序"，《潮州耆旧集》卷一。

记载。

正因为如此，许多海盗集团被官军平定之后，其首领的下落就一直成为历史的疑案。仅以林道乾为例。道乾原"为潮州府吏，有罪亡命海上为盗"，与曾一本互为犄角，隆庆元年攻破溪东寨，"诸寨风靡。于是拟饮马鳄溪，心窥府城。海、潮、揭、澄诸村落，皆其啖肉饮血区矣"①。其时官军正忙于围剿曾一本，无力应付对林道乾，故一开始就作姑息招安，冀图"以贼制贼"的打算，将其安插于广东潮阳县的招收都下尾地方。被安插后，道乾"阴蓄异志，大治宫室苑囿，拟王侯居。门列戟，乘舆张盖，着蟒龙，登堂传呼"②。这些严重违制、无法无天的行径终于为官府所不容，万历元年（1573）朝廷发大兵进剿其"安插"之地，据说林道乾逃往海外，继续贸易活动：

> 扬帆直抵浡泥，攘其边地以居，号道乾港。③

清初浙江人郁永河撰《海上纪略》一书，更把林道乾的结局写得活灵活现：

> 林道乾，明季海寇，啃聚在郑芝龙、刘香老前；图据闽粤不遂，又遍历琉球、吕宋、暹罗、东京、交趾诸国，无隙可乘；因过大昆仑（山名，在东京正南三十里，与暹罗海港相近），见其风景特异，欲留居之。其山最高且广，四面平壤沃土，五谷俱备，不种自生，中国果木无不有，百卉烂熳，四时皆春，但苦空山无人。道乾率舟师登山结茅，自谓海外扶余，足以据土立国。奈龙出无时，风雨倏至，屋宇人民，多为摄去；海舟又倾荡不可泊，意其下必蛟龙窟宅，不可居，始弃去。复之大年（国名，在暹罗西南），攻得之。今大年王是其裔也。台湾有老人，经随道乾至大昆仑者，尚得详言之。④

吴平的下场是另一个结构类似的例子。吴平长期在金门、南澳一带海域活动，《明世宗实录》对吴平有多处记载：

---

① 康熙《澄海县志》卷一九，海氛。
② 同上。
③ 《明史》卷三二三，外国四，鸡笼山。
④ 郁永河：《海上纪略》，大昆仑。

广东巨寇吴平等驾船四百余艘，出入南澳、浯屿间，谋犯福建。把总朱玑协总王豪引兵击之海中，贼奄至，围官军数里，玑、豪俱陷没。事闻，诏闽广抚镇官严督兵将，协心夹剿，以靖地方，不许推调误事。其各官功罪，俟勘议处。[①]

诏安贼首吴平先闻二省官兵夹剿，惧而请降。总兵俞大猷受之，使居梅岭杀贼自效。至是复叛，造战舰数有（百），聚众万余，筑三城守之，行劫广东惠潮及诏安、漳浦等处。福建总兵戚继光督兵袭之，平尽移其辎重入舟，率众遁入海，保南澳。[②]

有意思的是，《明世宗实录》同一年份的两处记载中，关于吴平的籍贯说法截然不同，四月份吴平被称为"诏安贼首"，当是福建人氏，而同年八月他又被说成"广东巨寇"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吴平本人可能本来就没有户籍之外，还可能因为他所经营的南澳岛地处闽粤交界海面，"旧番舶为患，洪武间奏徙，遂虚其地，粮因空悬"[③]，即与大嶝、小嶝一样，被朝廷所弃守。弃守后的南澳岛成为海上走私贸易的理想场所[④]，"番舶、海寇之舟，多泊于此，以肆劫掠"[⑤]，在这个朝廷放弃的海岛上居住的人，其籍贯自然也就变得模糊了。

嘉靖四十四年（1565）戚继光率军在南澳登陆，吴平被驱赶入海，不知所终。民间对于吴平的下落，也有诸多传闻：

旧志载吴平遁走，继光遣兵穷追于交趾万安洋。诏安旧志言平变姓名浪迹江湖，有人亲见平鲜衣肥马在江浙间为大贾，平灸其面人无有识者，后又复归故巢掘取所藏金宝而去，不知所知。潮州旧志又谓在海岛抱枯树而死，其说不一。[⑥]

这么多海盗的首领失败后遁走海外，继续从事贸易活动的说法，除了可以印

---

①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九，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丁丑。
②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五，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已丑。
③ 嘉靖《潮州府志》卷一，地理志，页32a。
④ 有关明初弃守南澳岛的详细情形，可参见拙作《明代における潮州の海防と沿海地域の社会—泉漳潮州における海上勢力の构造およびその影响—》，《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2007年8月），第103—128页。
⑤ 《东里志》卷一，疆域志，页19。
⑥ 乾隆《南澳志》卷八。

证前述传统时期缺乏可靠的"验明正身"的手段,许多海盗的首领与居住在陆地上的官员和其他人很少有机会谋面的说法外,还说明在当时一般人的观念之中,这些首领原来的活动圈子就遍及环南中国海的周边地域,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事业失败后,到这些地方继续活动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四　简短的结语

本文讨论了从明清之际在金门和周边海域被称为"海盗"的从事海上活动人群的身份及其与地域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说明,中国东南沿海地方的百姓至迟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海上贸易,从中获利颇丰,海上活动已经成为地方文化传统和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的变迁,这些从事海上活动的人群的社会身份和公共形象也随着发生变化。要理解明清两朝的海上贸易活动,不仅要关注商品、交通、市场、利润等等更多地属于经济层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对朝廷典章制度和地域社会变迁的整体面貌有更多的理解,更加富于同情心地去解读历史资料和地方文献,理解当时人的生活与情感。

中韩日三国民间祖先崇拜中的祭祀权问题

钱　杭*

祖先崇拜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尤其在东亚和东南亚受到儒家文明影响的各个地区，祖先崇拜更是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体系庞杂；不仅成为民间风俗中的一大特色，而且对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特征也有深远的影响。在对东亚祖先崇拜的关注和分析中，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祖先崇拜所具特征的比较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意义，是一个应该花大力气进行的课题。崔吉城在其名著《韩国的祖先崇拜》中指出：

> 东亚是一个特殊的祖先崇拜地区。祖先崇拜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儒教文化圈的突出现象。日本和韩国虽同处于中国式祖先崇拜的影响圈内，但各有其特征。……然而，东亚范围内的比较研究至今尚未充分地展开。这一缺陷应当通过今后对于中国的调查来加以弥补。[①]

崔教授敏锐的眼光，并不限于指出东亚地区比较研究目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而是认为弥补此一缺陷的主要途径在于加强对中国问题的调查。这就追本溯源、触及到了推动比较研究的关键之所在。笔者拟从中国复杂庞大的与祖先崇拜有关的观念和制度体系中，选择一个角度，分析若干事实，提出若干观点，为韩国和日本的学术界同行在进行比较研究时提供一个参考系统。

一

对于祖先崇拜的研究，可以有两种目的、内容和方法各有偏重的研究。

---

* 钱杭：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① 崔吉城：《韩国的祖先崇拜》，1991 年增补版，1992 年日文版序。

第一种研究所要揭示的，是祖先崇拜的内在根源，也就是人类之所以需要进行祖先崇拜的情感根据、心理根据、哲学根据和信仰根据，以及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本身的结构层次。这一研究的方法接近于宗教学；它所注目的，主要是祖先崇拜观念的“内源性”(inner directed)意义。

第二种研究所要揭示的，是人类在进行祖先崇拜活动时发生的社会化过程，包括主持进行上述祖先崇拜活动的各种祭祀组织的构成、再构成原理；以及在参与祖先崇拜活动的过程中，各社会阶层的利益满足和互动。这一研究的方法接近于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它所注目的，主要是祖先崇拜行为的社会功能意义。

对于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来说，第一种研究当然会很有意义，并且也是相当缺乏的。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宗教传统，祖先崇拜始终没有或主要没有被人们理解为如同佛教、道教、基督教那样的宗教；祖先崇拜的内在根源问题在中国只是被高度地简化为一种历史的和血缘的传承。对于中国人来说，祖先崇拜之所以值得关心和参与，主要在于它有可能影响自己的社会生存状况，是一种对现存人际关系的认定和安排，具有极强和极现实的社会功能。一旦社会外在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使得祖先崇拜失去了这类传统的功能，祖先崇拜的观念和行为，就可以很轻易、很迅速地退出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比如生活在近现代城市和主要由各类新移民构成的村落、村镇中的人们，就很少有在超出家庭的范围内进行祖先崇拜活动的内在需要。因此，在中国，真正需要祖先崇拜的，是那些必须依靠祖先崇拜来认定和安排现存社会关系的人们；换言之，只有那些一直把历史作为必需品、因而不断地回味历史并将历史进行着再生产的人们，才需要并且实际进行着祖先崇拜。这里所谓的“历史”，并不是指广义的社会的历史，而是指以本家族(宗族)、本族群的一位(或一组)祖先为起点的历史。这一规定固然相当狭隘，但却是构成中国汉人传统世界观的基础。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人们对此已经开始陌生了。

依靠祖先崇拜来认定和安排现存社会关系的实质，就是所谓的祭祀权问题。“祭祀权”，主要是指谁有权利来主持或参与对某一级祖先的祭祀。这里的基本前提是参与，因为只有参与了对祖先的祭祀，才有可能依靠祖先来对现存的社会关系加以“认定和安排”；但“参与”并不是普适性的。不同的人们将祭祀不同的祖先，不同的人们通过在祭祀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反映了高低不一的等级身份。中国祖先崇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论证现存的社会秩序。在这一点上，正如英国社会人类学家 Fortes 所说：“祖先崇拜是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反映。”根据这一观

点，中国式祖先崇拜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其实是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传到汉民族生存环境之外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主要从经济的角度讨论中国祭祀问题的方法，事实证明是有缺陷的。崔吉城教授所谓"构成韩国祖先崇拜中心的儒教祭祀"传统，严格说来，也已非真正意义上的"儒教祭祀"传统。

最早从上述祭祀权意义来揭示中国祖先崇拜真谛的儒家经典文献，是《仪礼·丧服经传》。其文称：

> 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大宗者尊之统也。

照作者的意见，从禽兽、野人（即"乡曲之人"）和都邑之士，到大夫、学士、诸侯、天子，代表的是一种逐级递增的社会身份。由他们进行的祭祀活动——祭父、祭祖、祭大祖、祭始祖"之所自出"，就相应的反映出了这一渐次上升的社会地位。这不仅是外在的、具有强制性的规定，而且从所谓"知"、"则知"等语可见，这种等级还与祭祀者内在的精神境界和文化教养相联系。因此"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一方面是一个对于祭祀者包括身份等级和文化教养在内的综合性评价；另一方面则说明，在中国古代儒家理论体系中，并未首先从亲子伦理（父祖与子孙的血缘关系）、宗教仪礼（关于灵魂的不灭性、继世性、不死性）以及财产多寡的角度来规定祖先崇拜。他们考虑的主要是社会身份的"尊尊"、"长长"，其次才是血缘性的"亲亲"；并且"亲亲"也不是指小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而是指宗族内部的世系宗亲关系。世系宗亲关系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差序。《礼记·丧服小记》规定宗族内的祭祀等级是：

>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祢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这里的"别子"、"继别"、"继祢者"、"继高祖者"、"庶子"，虽然都是宗族内互相之间拥有血缘关系的重要成员，但由于身份不同，所"继承"（即祭祀）的对象就不同；与此相关联，他们所能奉祀的祖先也就有远近多少的不同。由于这一

不同,这些成员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及在宗族内实际的等级关系(比如丧服级别),亦出现了系统的差别。在这种为中国所独有的严密的宗法制度中(即上引“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云云),最主要和最复杂的内容,就是关于宗族成员具有何种祭祀权的规定。宗族成员的血缘—世系地位或许是一个常数,而祭祀权则是被另外规定,并可以被随时改变(授予或剥夺)的。因此,在宗族的规范体系中,祭祀权不仅反映了宗族成员的身份,更关键的,是可以通过它来确认、巩固并改变宗族成员的身份。

关于祭祀权与社会等级继承和财产继承的关系问题,留待下一节详细讨论;这里所要说明的,主要是中国古代儒家祭祀理论的根本目的,是在宗族范围内通过祖先崇拜来认定和安排人们现存的社会关系。在儒家的祭祀理论中,固然不能说不存在一定的宗教和信仰因素,但毫无疑问,这些因素绝不占据其宗族祖先祭祀的核心位置。就祖先崇拜活动所体现的基本目标和基本精神而言,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规范的中、韩、日三国,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随着历史的逐渐演变,这些差异朝不同的方向发展,最后就异彩纷呈,形成了目前这种状况。因此,欲对三国的祖先崇拜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中国儒家祭祀理论的上述基本特点应给予足够的关注。

二

祭祀可以在家庭内举行,但更多的是在超出家庭的范围内举行。家庭祭祀活动中的“祭祀权”,与我们所讨论的宗族和地域祭祀活动中的“祭祀权”并不能完全等同。后者的内涵远比前者来得复杂和多元。

据上节所述,“祭祀权”主要是指在超出家庭范围的祖先祭祀活动中,主持或参与对某一级祖先的祭祀的权利(以下所论述之“祭祀权”,除另作说明外,都根据这一定义)。在中国先秦儒家的祭祀理论中,祭祀权是血缘—世系身份和社会身份的体现,或者证明。不同的身份拥有不同的祭祀权,反之亦然。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已有的血缘—世系身份是稳定的,但社会身份却经常会出现变化。一旦出现这种变化,就会使祭祀权也随之发生变化。《礼记·曲礼下》对祭祀权存在的这一变化的可能性就有相当形象的说明,即所谓“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这里的“田禄”,是指以地租形式表示的官职俸禄,是政治身份

的一个象征。按其逻辑，得田禄者可得祭祀权，得而复失者自然就将失去祭祀权。无论在血缘—世系团体之内（宗族），还是在地域范围之内，凡要对祖先进行祭祀，人们都不希望主持者的社会身份得不到当时社会的普遍尊敬；即使他在本家、本族内居于血缘—世系的高端位置上也是如此。中国民间所有的族谱都会在其《编修凡例》（或同类文件）中，列举详细的清单，指出凡具有某类身份的人就不能参与（遑论主持）对祖先的祭祀活动。剥夺族人已有之祭祀权（如不许入谱和不许入祠），一向是对犯有过失、触犯忌讳的族人最严厉的惩罚。

韩国学术界同行对祭祀权的问题进行过相当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不管在对韩国本身祭祀特征的看法上存有多少分歧意见，但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了，在中国传统的祭祀习惯中，祭祀权是一个变动的因素，并与韩国关于祭祀权的规定有着明显的区别。比如金光亿在比较了中、韩两国的基本情况后指出，在中国的宗族内，祭祀权与财产的继承权之间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而韩国则不同。一般说来，在韩国社会中，长子不必依据其对财产的优势占有就可以在祖先祭祀上拥有绝对的主导权。李光奎在对照和考察了日、韩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异同之后，也指出了日本的祭祀权与经济性财产继承权密切相关这一重要特点。他们两人都认为，在祭祀权的构成问题上，中、日之间虽互有区别，但基本类型大致相同；而韩国则显然为另一类型，即在祭祀权与财产权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换言之，中、日的祭祀权随着财产权的变动而变动，而韩国的祭祀权则相对稳定。任敦姬一方面明确肯定不能将祭祀权理解为一种一次性分配完成的权利，因为它是一个变动的概念；另一方面她又反对将财产权从属于祭祀权，似乎只是为了进行祭祀，长子才接受较多的财产，这与普遍的事实不相符合。崔吉城则主张，如果要从财产权和祭祀责任的相互关系上来考虑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祭祀责任显然是一个从属的变数。也就是说，由于长子接受了财产，所以才具有了祭祀的责任。

韩国学者的研究可以说明许多重要的现象。中国传统的家庭祭祀权与家庭财产的继承有着密切的关系，未继承或放弃继承财产的子孙，即不具备祭祀祖先的权利和义务；而继承了家庭财产的诸子则拥有了祭祀祖先的权利和义务。同样，在宗族的祭祀活动中，承担祭祀责任者往往以分支（房）为单位；而之所以会形成分支（房），即源于该宗族最早一次的家庭财产分配。民间常见祭祀权在族内各房之间采取“年度轮换制”，就是典型的表现。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国与日本在祭祀权的规定上确实是与财产权有着对应的关系。但能否因此就将中、日

两国传统的祭祀权特征归结为同一类型，则还要慎重考虑。中国的宗族是世系单位，而日本的家庭、家族则是财产单位；中、日两国民间在关于家内、族内财产继承权的基本制度上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区别。一般来说，中国的家内、族内财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兄弟均分，而日本则是长子优先继承。日本族内财产的长子优先制，导致日本在祖先祭祀权上奉行长子独承制；而中国族内财产的兄弟均分制，则导致在祭祀权上出现了相应的兄弟均承制。在财产继承的长子优先制，以及祭祀责任主要由长子负担等方面，其实日、韩两国更为接近。在韩国，长子继承父母的大部分财产，同时也承担主要的祖先祭祀和赡养父母的责任。次子、三子以下虽然也得到部分财产，但与长子所得部分相比，比例相当低。财产分割以后，长子的家庭称之为“大家”；次子、三子以下的家庭称之为“小家”。诸如此类的问题当然还可以做进一步讨论，这里只是要说明，在进行中、日、韩三国祭祀权的比较研究时，应对上述基本问题加以细致的区分。

与日本、韩国的情况相比，中国的祭祀权问题还有更为特殊的一面。在中国，祭祀权与财产继承权的关系可以很紧密，也可以很松散，有时甚至可以完全分离。特别是以“大、小宗”制度为标志的先秦宗法制度解体以后，以世系为唯一前提的“宗子承重”制，逐渐被遵行世系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等综合选择标准的族内长老制取代，祭祀权与财产权分离的现象就更加突出和明显。这一观察角度可以深刻地揭示中国祭祀权问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且证实第一节以及本节开始时所提到的中国儒家祭祀权理论中特重社会身份这一基本特征。

能够反应祭祀权与财产权分离的实例很多，本文主要讨论联宗的问题。

联宗是中国宗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若干分散居住在一个（或相邻）区域中的同姓宗族组织，出于某种明确的功能性目的，把一位或一组祖先（该姓的始祖或首迁该地的始迁祖）认定为各族共同的祖先，从而在所有参与联宗的宗族间建立起固定的联系。这个过程就是“联宗”的过程。联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参与联宗的各宗族除了应对某一个或某一组祖先加以必不可少的认同以外，互相之间并不一定需要有真实的世系联系，特别是不需要有确定的旁系世系联系。而在宗族这类世系群组织中，所有的权利与义务都必然根据世系原则进行分配。由于联宗可以与世系原则脱节，因此，作为联宗主要成果的对于共同祖先的祭祀权，当然就可以与世系群内部的财产继承权分离。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实例来分析这一问题。

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广东省东莞县出现一个"都庆堂邓氏大宗祠",该祠的核心成员是分居于东莞、新安两县境内的粤语系邓氏"五大房"。他们以北宋初邓汉黻为"粤一世始祖",以第四世邓符协为"五房共祖",以第七世邓元英、邓元禧、邓元祯、邓元亮、邓元和为"五房始祖"。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大宗祠创建时共供奉168位祖先神位;年代的上限为北宋初年,下限为清康熙年间,前后约七百余年。在该联宗祠内,所有参与联宗的宗族与"粤一世始祖"、"五房共祖"和"五房始祖"的直系世系关系都非常明确,但是各族之间已不存在具有实际意义的旁系世系联系。他们与"五房"中其余各房的关系,虽然在有必要时仍可追溯至共同的历史渊源,但在实际生活中,只留下了地缘性质的同姓乡邻关系。创建大宗祠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和表彰科举人才。发起和主持大宗祠祭祀活动的,全是各代有功名、有身份的乡绅。较早的有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进士邓文蔚;主持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都庆堂重建工程的怀德邓士楫是举人;随后的主持者是锦田邓文蔚的儿子邓世绩,以及邓文蔚的孙子,后来于清乾隆元年(1736)中举的邓与璋。相反,经济条件富裕、但未在科举上涌现出成功者的宗族,则不能在祭祀上争得重要的位置。如屏山邓氏,虽然在明初出现过一位担任过宁国府正的族人,但至少在明末清初时,还没有在科举上出现过贡生以上的人物。因此,屏山邓氏在大宗祠中的地位相对较低。此外,大埔头、厦村等地在这之前一直没有出现著名的人物,只是通过献金捐款,才勉强在祠堂里供奉了本村开基祖的牌位,贡献很小。

这一地缘性质到清雍正十年(1732)重修都庆堂时被进一步明确。当时,除补充了原属于"五房"的11位祖先牌位之外,居住于广东省广州府七县(顺德、三水、南海、增城、从化、番禺、新会)境内、其族群系统、历史渊源与"五房"系统完全不同的邓姓,抱着同样的目的,通过捐款的方式,也入祀了25位祖先牌位。这样,整个都庆堂大宗祠所奉祀的祖先牌位总数达到了204位。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了解,所谓"五房"的房次序列其实只具有历史的、而不具有现实的意义;构成都庆堂大宗祠的各邓姓宗族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血缘性的"五房",还不如说是地缘性的"五村"更为准确。在都庆堂大宗祠这个所谓的"宗族组织"里,仅仅在进行历史追溯时才部分地、有限地体现了宗族系谱关系中的纵向性直系世代位次(即祖、父、子、孙……关系);而宗族系谱中必须同时具备的另一要素:各成员间的横向性旁系差序位次(即兄弟、从兄弟、再从兄弟……关系),则被地缘性因素取代了。换言之,联宗后形成的联合组织内部所

体现的是不完整的系谱关系：它只在与某一共同祖先之间进行追溯时才存在历史的、有时甚至是随意认同的纵向性系谱关系，但在各参与宗族之间则不存在包含了权利与义务内容的横向性系谱关系。因此，只具备某种程度的直系世系而不同时具备确定的旁系世系的宗族系谱关系，不能算是完整的宗族系谱关系；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宗族祖先崇拜，其祭祀权当然就不会与宗族财产的继承权（如果有的话）发生对应关系。①

当代中国农村中也出现了大规模的联宗活动，所体现特征与上述实例相同。1981 年至 1991 年，浙江省平阳县陈氏宗族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联宗活动。据当年所撰《新修颍川郡陈氏联宗谱》（以下简称《联宗谱》）称，居住在平阳县境内的陈姓宗族，目前共有 74 个（其中有两个陈氏宗族的住地现属紧邻的瑞安市）；为各陈姓宗族共同认定的肇基祖，是可追溯至唐高宗弘道和唐中宗嗣圣年间（684）的顺溪始祖瓒公兄弟，距今已一千三百余年。根据《联宗谱》对陈姓各族肇基始祖的尊号、迁平（阳）年代与路线，以及各肇基祖源流派系的记载，只有几个陈姓宗族之间存在着有可能进行历史追溯的世系联系，但到底能够追溯到何种程度，进行联宗的人们自己也没有确切的把握。

在 1981 年《联宗谱》修成以后，又陆续有一些当时没有参加大联宗的陈姓宗族（大部分现住于邻近的苍南县）加入到联宗的行列中，其中只有很少一些宗族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的世系联系，绝大多数都没有发现存在着某种可以对纵向的或横向的世系联系进行历史追溯的、比较确定的关系。因此，各族的宗系排列，及其各族互相的房份位置根本无从划分；各宗族之间在面对共同祖先时的系谱地位只能是平等的，完全体现不出尊卑高下之别。这一特征也充分体现在 1991 年建成的陈氏联宗祠“陈姓纪念堂”中。“陈氏纪念堂”内建有长条形彩绘神龛；根据开间的大小，分隔成九个互为独立的单位。中间为主龛，安放经陈姓各族共同认定的祖先神主，一是舜帝、满公、陈寔、陈武帝、陈宣帝等据说对陈姓的发展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古代帝王的画像；二是唐代始祖瓒公、瑄公、全公兄弟的牌位。其余各龛则祭奉陈氏各宗族的肇基祖和历代祖先牌位，按地域分组，几组共用一龛，神主总数超过一百。新增神主的安放依据入祠的先后顺序，分列各组神龛内，以两侧对称为原则，不再体现传统宗庙内“左昭右穆”的昭穆制度。由此可知，平阳陈姓的联宗行动，其性质亦如邓氏“五大房”联宗，不是血缘性的

① 以上材料参见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第三章及本人的“解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第 65—97、271—276 页。

世系联接,而是地缘性的团体结合。“陈姓纪念堂”也和“都庆堂邓氏大宗祠”一样,是由同姓人们组成的一个地缘性的同姓关系网络。所有参与宗族都不与任何性质的财产继承制有关,他们只是把进入纪念堂视为一次确立本族社会地位的机会。负责“陈姓纪念堂”整个祭祀事务的水头陈氏,与陈氏始祖之间除了同姓以外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关系,他们之所以在祭祀上占据了优势位置,完全在于他们现在具有的社会地位。[①]

对于联宗这一特殊现象,传统儒家的评价历来不高。批评者的主要理由,一是其动机的功利性;二是其对祖先认同的随意性;三是对官僚政治体制潜在的危险性。功利性与危险性的问题因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故暂不涉及,而对祖先认同的所谓“随意性”,恰恰说明了联宗在祭祀上的特征。联宗对祖先的认同之所以能够表现出“随意性”,就在于参与联宗的人们与祖先之间可以没有任何财产关系。显而易见,如果在对祖先的认同上受到财产继承权限制的话,肯定是不会发生“随意性”问题的。然而这一切并不是发起和参与联宗的人们背离传统的独创。事实上,中国正统的宗族祭祀理论中,也并非不存在允许祭祀虚拟祖先的余地。比如在第一节所引《仪礼 · 丧服经传》中,作者就把祭父、祭祖、祭大祖、祭始祖,看作代表了祭祀者身份等级的一个渐次上升的系列(即都邑之士、大夫及学士、诸侯、天子),称之为“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祭祀者身份等级越高,所祀祖先就可距己越远,就越能包含某种虚拟的成分。特别在祭祀始祖和远祖的宗祠内,就明显地存在着与联宗祠性质非常接近的祭祀特征。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联宗对祖先认同的“随意性”,其实根植于中国祖先祭祀的基本原理之中。

三

关于中国传统祖先祭祀的理论,本文希望阐明的是:

第一,中国的宗族祖先祭祀的实质,是通过祭祀宗族的祖先来认定和安排现存的社会关系;在中国,祖先崇拜不是、或主要不是一种表现骨肉亲情和宗教观念的方式。

---

① 以上材料参见拙著《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年,第 290—307 页。

第二，中国宗族祖先崇拜中的祭祀权，是变动的，不稳定的。宗族成员现有的血缘身份并不能保证他一定拥有祭祀权，同时，也不能保证他在违反宗族规则时也始终能拥有祭祀权。

第三，影响中国祖先祭祀权变动的基本要素，有财产继承和社会地位等等；其中祭祀者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的社会地位，对于祭祀权的变动和归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导致祭祀权出现等级差序结构的，主要是祭祀者的社会地位。

第四，中国的祖先祭祀权与财产继承权之间，可以呈现出某种对应关系，也可以不呈现、甚至与财产继承制度完全分离。中国宗族发展史上的联宗现象，就集中表现了这一重要特征。

笔者相信，以上诸点对于希望从事中、韩、日三国祖先祭祀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不应忽视的。

南瀛地区庙会的绕境模式
——兼论祭祀圈、信仰圈与交陪境

谢国兴*

一 前 言

“南瀛”为台南县、市一带的通称，位于台湾南部，濒临台湾海峡，曾拥有台湾最大的两处潟湖台江内海与倒风内海，瀛海风貌为明显之地理印记，故称南瀛。此区域为台湾最早移民开发之区，荷兰统治及明郑时期的主要治地即在台南一带，终清朝统治台湾之世，台南（原称台湾府，后改台南府）是全台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台湾的传统民间信仰活动以台南一带最盛，保存之传统民俗内容与文化形式最为丰富，也较具特色。过去台湾学界（主要是人类学者）研究台湾汉人社会的聚落组织及人群关系，曾聚焦在民间信仰的祭祀圈与信仰圈之探讨，其研究取材之样本主要是台湾中部地区[①]，台湾南部尤其南瀛一带保存传统质素较丰富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组织运作，反而较少被探讨。虽然祭祀圈的议题曾被广泛探讨与检讨，甚至提出“后祭祀圈”的研究方向[②]，笔者基于最近几年对台湾南部庙会活动的田野观察，认为相关议题的探讨对理解台湾区域社会文化差异与特色仍有助益，故以庙会绕境为例，提出“交陪境”在南部民间庙会中是

* 谢国兴，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① 包括 1971 年开始由张光直教授领导的“浊水溪、大肚溪两流域自然与文化史科技研究计划”，形成对信仰圈议题讨论的典范，以及后来林美容教授对信仰圈的归纳演绎，都以中部的彰化、南投一带为主要田野样本。

② 张珣：《打破圈圈——从“祭祀圈”到“后祭祀圈”》，《台湾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思维》，台北，南天书局，2003 年，第 64—107 页。

一值得研究的议题，可以补充祭祀圈与信仰圈理论的不足。

二 绕境缘由

“境”指“香境”，在台湾民间信仰是一个具有宗教意涵的“区域”，一般可视为祭祀圈。[1] 绕境或游境，在南瀛地区也常被称为“瘟庄”，“瘟”在此作动词解，很明显的是与瘟神信仰科仪法式相关。绕境巡游的原始目的是消灾祈福，如果是消除瘟疫性质的庙会活动，则可说与今日卫生机关所执行之“消毒”无异；当然，瘟疫性的病毒之外，如果另有邪煞鬼怪，也可请神明在绕境过程中驱除净尽，自不在话下。

绕境的主体是神明，台湾民间信仰中的各式神祇均具有绕境镇邪压煞的本领，不过号称“代天（南）巡（北）狩”的王爷系统神明通常是绕境活动中更具代表性的神明。绕境的基本队伍（组织）是神明、神轿（四辇或八人抬大轿均可），轿前通常有凉伞，加上锣鼓伴随，更慎重的是由武阵在前开道护卫，香客在轿后随行，如此形成一“阵”。有时为增加热闹气氛，兼具娱乐功能，各式“阵头”（表演团体或宗教仪式性队伍，如八家将等）也参与巡游绕境队伍中，就构成“一大阵”。

上述的“一阵”，基本上以一顶神轿为单位，一顶大轿通常代表一座宫庙（有时一座宫庙也可能出动两顶以上神轿），因此如果是几座宫庙共同参与的绕境，阵头、神轿的数量相对就会增加。2006 年台南市土城圣母庙举行丙戌科禳灾祈安香醮，绕境三天，第三天达最高潮，参与的神轿多达 108 顶。[2]

绕境为庙会活动中与“境”内居民关系最密切的项目，并非所有庙宇的活动

---

① 祭祀圈的定义或解释可能存在争议，台湾民间信仰中的祭祀圈自 1930 年代冈田谦提出之后，经 1960 年代人类学者的界定与使用，大致指一定地域内的居民在宗教事务上的权利与义务：有担任庙宇执事人员（炉主、头家）、要求主神绕境、迎请庙中神明至家中主持仪式之权力、有分摊庙宇修建维护与举行各式宗教活动所需费用之义务。参见许嘉明：《祭祀圈之于居台汉人社会的独特性》，《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1 卷 6 期（1978 年 6 月），第 61 页。林美容从共神信仰、地域范围、共同祭祀活动与组织、共同祭祀经费等角度进一步加以发挥，并说明祭祀圈有部落性、村落性、超村落、乡镇性等不同层级与大小范围之区别，而且大祭祀圈有包含小祭祀圈的现象。参见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湾民间社会的地域构成与发展》，收在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88 年，第 98—99 页。

② 《正统鹿耳门圣母庙丙戌科香醮活动手册》，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文宣组编制，2006 年，第 40 页。

都有绕境，一般庙宇在神诞日只演戏酬神，同时举行简单的祭拜，绕境通常在几种情况下举行：

（一）主神圣诞绕境：有些庙宇每年在主祀神明圣诞日前后举行绕境，有的限于村庄范围内（祭祀圈），也有进香（或会香）、绕境兼含的方式，如大甲镇澜宫每年新港“会香”，通霄白沙屯拱天宫每年北港进香，时间均长达八天七夜，但真正绕境范围仍限于“本境”（祭祀圈）。

（二）固定香科活动绕境：有每三年、五年、十二年等不同年期，但基本上定期举行。定期绕境又分两种，一种是纯粹的“祭”祀，如嘉南平原许多村落有定期“送火王”的习俗，或者定期进香、谒祖（过炉）时，同一天举行村落绕境；另一种是较大型的“建醮”[①]，可大分为清醮与王醮，台湾中部以北几乎全为清醮，南部则以迎送王爷系统神明的“王醮”居多，其中有些举行烧王船活动，较受瞩目；这种醮祭几无例外的会有大型绕境活动。

（三）不定期的庙会绕境：包括请水（请神）、进香（会香）、过炉、作醮（神明指示、新庙落成、庙宇大修）、南巡北狩（交陪境联谊）等。

三　绕境的范围

绕境的范围，就原始意义来说，应限于主办绕境活动的庙宇所管辖的“境域”。庙宇的辖境，从祭祀圈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五营”的范围。在民间信仰观念中，一个聚落公庙（境庙）的神明辖有神兵神将，分散布置在聚落的五个角落（东、西、南、北、中），暗中保护整个辖境的居民，免遭邪祟疫疠侵扰。因此，最基本的绕境范围是聚落（角头）或含数个聚落而成的祭祀圈范围。

祭祀圈范围可大可小，小者等同村里，大者一般可达乡镇规模，有时亦可跨几个乡镇（但不一定是每个乡镇的全部范围）。南瀛地区跨乡镇的绕境民间信仰祭典组织，比较著名的包括：赤山堡五庄（角秀、乌山头、洲仔、中胁、渡仔头）伽篮尊王过炉巡境，曾文溪流域的西港香、佳里香、土城香、麻豆香、学甲香，均为三年一科；安定乡的长兴宫、真护宫王醮（三年一科）、台南市湾里万年殿王醮（十二年一科）、盐埕北极殿香科（十二年一科）；不定期举行的如后壁下茄苳泰

---

① 醮者祭也，原指带有还愿酬神性质的大型祭祀活动，台湾之醮祭一般称建醮或做醮，专指聘请道士设坛依科仪诵经作法祈福之祭典活动。

安宫（五十八庄）香科、白河镇马稠后关帝厅香科、台南市安南区鹿耳门天后宫妈祖南巡等。这些香科绕境区域有的跨乡镇，有的跨县市。

绕境大多数在祭祀圈内进行，但也有庙宇绕境时分本境与外境，本境等同祭祀圈，外境则近乎“信仰圈”[①]，或者说“交陪境”较接近实际情况。

规模较小的绕境，如一个角头（聚落）、村里、或只跨越几个村落之间，通常涵盖的是祭祀圈范围。乡镇型或跨乡镇型的祭祀圈，其地域内的成员往往不可能以个人（或家户）为单位直接行使类似小规模祭祀圈的宗教性权利与义务，往往只能透过村落庙宇（代表）间接发生，因此是一种较松散的准祭祀圈。林美容教授所定义的信仰圈，最早是从台湾中部（彰化）地区的志愿性祭祀组织（神明会）运作中观察归纳而来，南瀛地区并不存在类似的神明会，至少在跨乡镇的祭祀绕境活动中，几无神明会参与的情形，而是一个（乡镇格局的）主办大庙号召周围村落境庙性质（标准祭祀圈型）的各庙宇共同参与（志愿性），重点不在“一神及其分身”（因村落境庙的主祀神与乡镇型大庙的主祀神往往不同），而在共同的仪式（如出巡与建醮），因此林美容以她所定义的信仰圈来界定“西港刈香”，实无法清楚说明其主要特征。南瀛地区的许多跨乡镇型庙会，如西港香、佳里香与土城香，并无本境与外境之别，巡绕范围均属其“香境”。比较特别的是，台南县关庙山西宫的香境限于关庙乡中心区的主要街市，而山西宫建醮时，关庙乡北端与南端的各宫庙，以及隔邻龙崎乡、归仁乡的不少庙宇则出动神轿、阵头前来助阵绕境，也就是外境宫庙助绕本境。

四　绕境的代表性范例

每年神诞日定期举行的庙宇绕境，有时会与进香、谒祖（过炉）同时举行，进香、谒祖通常是到分香祖庙或神格较高、历史较久的相同主神庙宇进行晋谒，回程中可能前往一些交陪（交谊）庙参拜，最后回到本村绕境禳灾祈福，这种绕境规模较小，组织形式简单，神轿一顶，阵头一、两队（甚至省略），时间也短，往往

---

① 信仰圈是林美容教授从祭祀圈概念演绎分离出的台湾民间另一种祭祀组织与运作形态，“以一神及其分身之信仰为中心，区域性的信徒所形成的志愿性的宗教组织”，“只有跨乡镇的地域性祭典组织才有可能被界定为信仰圈”。参见林美容：《台湾区域性祭典组织的社会空间与文化意涵》，徐正光、林美容主编：《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经验研究篇》，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 年，第 70—71 页。

半天即足够。村落型庙宇不定期的请水、建醮,就比较隆重,会邀请交陪境友宫的神轿、阵头助阵,绕境虽然也只是半天、一天,热闹的景况则明显不同。

(一)丁亥年(2007)农历10月16日台南县安定乡大同村村庙镇安宫"往鹿耳门天后宫、四草大众庙进香谒祖暨往台江乞水请将回驾绕境"。

安定乡大同村是一个迁村新建的村落,居民原来住在目前村落南方复荣村,旧称"牛肉寮"的地方,疑因牛肉寮地区地下水质不佳,居民多染皮肤怪疾,故于1957年在地方政府协调下全村迁来今址,称大同村。1959年重建村庙镇安宫①,奉祀主神为镇海元帅(俗称大将爷),分灵自台南市四草大众庙。大众庙为台南市安南区(旧台江内海区域内)两大古庙之一(另一为鹿耳门天后宫),主祀神为镇海元帅。镇海元帅在台江区域内有不少庙宇分香奉祀,如安南区南路寮保镇宫供奉镇海二元帅,安南区十二佃南天宫供奉镇海三元帅,台南县七股乡台潭村供奉镇海四元帅,大同村镇安宫则供奉镇海五元帅。"乞水请将"简称"请水",通常是不定期举行。所"请"(招募)的是神兵天将,也就是请来成为村庄神明所统辖的五营兵将。招兵请将通常在水域举行,可藉机普化水中冤魂(民间信仰中鬼、神之间转化并不困难)。

大同村镇安宫另供奉妈祖为主神,此次请水地点在鹿耳门附近水域,故藉请水之便,一兼二顾,同时往鹿耳门天后宫、四草大众庙进香,谒祖与招兵请将一次完成。为了壮盛这次为期一天的宗教仪式之旅,镇安宫邀请了十一间交陪境庙宇,出动十三顶神轿,加上镇安宫本身两顶,共十五顶神轿,另有宋江阵一队、金狮阵两队压阵。请水的庄重严肃性超过进香,毕竟是要跟水中"阴的"打交道,一般庙宇只要张罗许可,都会设法出动宋江阵获金狮镇随行。计参与这次请水的宫庙有:

轿号	村落	庙名	参与神明	阵头	行政区属
先锋	许中营	顺天宫	天上圣母	宋江阵	台南县安定乡中荣村
2	鹿耳门	天后宫	天上圣母	排班	台南市安南区
3	新寮	镇安宫	天上圣母		台南市安南区
5	本渊寮	朝兴宫	普庵祖师		台南市安南区
6	港口	慈安宫	中坛元帅		台南县安定乡港南村
7	港口	慈安宫	天上圣母	金狮阵	台南县安定乡港南村

① 《安定乡大同村镇安宫》(简介,无出版时间)。

续　表

轿号	村落	庙名	参与神明	阵头	行政区属
8	中仑	忠安宫	清水祖师		台南县安定乡中砂村
9	安定	保安宫	保生大帝		台南县安定乡安定村
10	安定	保安宫	天上圣母		台南县安定乡安定村
11	四草	大众庙	镇海元帅		台南市安南区
12	南路寮	保镇宫	保生大帝、镇海二元帅		台南市安南区
13	十二佃	南天宫	池府千岁、镇海三元帅		台南市安南区
15	台潭	龙安宫	池府千岁、腾风元帅		台南县七股乡大潭村
帅	大同村	镇安宫	天上圣母、镇海四元帅		台南县安定乡大同村
帅	大同村	镇安宫	镇海伍元帅	金狮阵	台南县安定乡大同村

这次请水包括祖庙大众庙镇海元帅本尊及交陪境三座庙宇的镇海元帅分身（腾风元帅为镇海四元帅的别称）全员到齐；参与此次庙会的各交陪境庙宇中，鹿耳门天后宫、四草大众庙、安定保安宫为跨村落性（接近乡镇层级）的公庙，其余8间庙为村落型公庙（港口、中仑、许中营与大同村同属安定大庙保安宫绕境的交陪境），各庙的主祀神包括天上圣母、普庵祖师、清水祖师、保生大帝、镇海元帅、池府千岁等，加上慈安宫的中坛元师，神明就有八种之多。以大同村这种小村落（2007年11月统计，全村245户，857人），能动员附近供奉镇海元帅的4座兄弟庙，以及另外7座交陪庙，15顶神轿，三队大型武阵，浩浩荡荡出发进香、请水，可见镇安宫主事人员平时在庙境联谊上下了极大的功夫。

当天活动由凌晨开始，主人大同村镇安宫神轿、金狮阵人员集结参拜完成后，即在庙门口迎接各友宫神轿、阵头莅临；凌晨一点整，各友宫神轿、阵头到达并完成参拜，开始“过油”（煮油净秽），两点全员上车出发，先到鹿耳门天后宫进香，天后宫事先准备了点心供参与人员用餐，香阵参拜完成，稍事休息，五点整出发前往四草大众庙谒祖，七点香阵离开大众庙，前往四草大桥下盐水溪出海口的台江旧海域请水，九点至十点半进行请水科仪，结束后返程经过参与此次活动的交陪庙本渊寮朝兴宫、新寮镇安宫，香阵依序参拜，并用庙宇准备的午餐，之后前往大同村的祖居地牛肉寮绕境（牛肉寮目前并无居民，仅有农地及旧庙前的一座水池）。牛肉寮位于台南市安南区“外埕”隔邻，外埕有三座聚落型公庙兴护宫、崇圣宫、和济宫，位于香阵进入牛肉寮必经之路，故香阵也前往这三座庙一一参拜行礼（虽然这三座庙并未参与此次活动），三座庙也各自摆好香案迎接，并准

备茶水点心招待香阵人员。

下午五点半左右到达旧庄牛肉寮，开始祭祀及绕境，晚上七点半回到大同村，全体香阵在大同村境内绕境一周，十点，镇安宫神明绕境完成回庙安座，各友宫神轿、阵头到镇安宫参拜行礼后各自返家，结束全程约二十四小时的活动。这是小规模绕祭祀圈本境的典型例子。

（二）安定乡苏厝长兴宫瘟王祭

长兴宫是曾文溪流域举行王醮历史最悠久的庙宇之一，如果依照当地的传说，曾文溪流域下游一带至今繁盛的三年一科王船醮典，很有可能发源自苏厝一带。[①]

苏厝旧称苏厝甲，明郑时代已经开发，为当时称永定里的一甲，滨台江内海，位于今日台南县安定乡的东北角落，由西南迤东北与西港乡、麻豆镇、善化镇为邻。苏厝甲包括苏厝、林厝两个自然村（聚落），目前行政区划则分属苏厝村与苏林村，两村人口合计近5,000人，为安定乡最大的聚落（安定乡共16村，人口约3万人）。长兴宫为苏厝（两村）的境庙，据说创建于康熙18年（1679），乾隆年间开始举行三朝王醮，[②]日治时期及之前王醮实际举办情况不详。1948年为台湾光复后第一次办理王醮，1961年开始每逢丑、辰、未、戌年（三年一科）举行，成为定制。[③]

苏厝长兴宫因祭祀需要，将整个聚落（两村）分为八甲（仿古代里甲制），每甲选出一位有名望或热心地方事务者为“甲首”，加上每次王醮举行前依掷筊产生的“五主会”与巡按官，共14人，为每科王醮的决策中心（相当于“建醮委员会”）。[④] 传统庙宇祭祀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居民分摊的“丁口钱”，此一习俗在台湾部分农村区域仍见保留。苏厝的八甲首类似一般祭祀圈中的“头家”，为协助办理庙会活动的荣誉职。长兴宫迄今每科王醮经费一大部分仍由八甲首负责收取，不过不再以收丁口钱方式为之，而采自由乐捐方式。依2006年长兴宫公布的“丙戌科建醮各甲信徒乐捐芳名录”，统计如下：

---

① 陈丁林：《王之醮——苏厝长兴宫庚辰科瘟王祭》，台南，苏厝长兴宫，2000年，第7—8页。

② 《安定乡苏厝长兴宫简介》（长兴宫印行）。

③ 黄文博：《南瀛王船志》，台南县政府文化局，2000年，第58页。

④ 因醮典事务繁复，自1997年丁丑科起“主会”增为11人，参见陈丁林：《王之醮》，第30页。

	缘　金	点心费	合　计
第一甲	214,000	52,000	266,000
第二甲	749,500	58,000	807,500
第三甲	259,000	42,000	301,000
第四甲	260,000	42,000	302,000
第五甲	301,000	45,000	346,000
第六甲	255,700	50,000	305,700
第七甲	486,200	49,000	535,200
第八甲	293,600	50,000	343,600
总 计	2,819,000	388,000	3,207,000

资料来源:长兴宫公布栏。

依八甲区分统计乐捐收入,显然是往昔祭祀圈收缴丁口钱的遗意,也可看出长兴宫的原始"境"域限于苏厝甲范围,至今基本未变,八甲首产生自本地居民,也仍合于祭祀圈居民尽义务与享权利的原始意涵。不过近几年担任"主会"与"巡按官"者(相当于祭祀形态较简单时期的"炉主"),例需高额赞助醮典经负,因此开放给外界竞逐。长兴宫的办法是醮典开始前一年的8月15日杯选主会,以掷茭杯得圣杯(一正一反)最多者获选。掷杯前长兴宫说明获选者应赞助之金额,参与竞逐者需先报名登记、上香参拜、向"千岁爷"报上自己姓名、生辰之后,开始掷杯。但照庚辰科(2000年)的资料,巡按官与11位主会(简称"会首")中,居住在苏厝的只有5人,其他7人分别来自台南市(3人)、永康市(2人)、善化镇、西港乡各1人。[①] 癸未科(2003年)12位会首中苏厝居民维持5人,永康市两人,西港、善化、台南市、安定乡港口村、六甲乡各1人,其中只有一人在癸未科曾担任主会。[②]

从主会人选的变化来看,显然已不合传统祭祀圈的定义。就绕境方式言,传统长兴宫的绕境分"顶八庄"与"下九庄",顶八庄为善化、六分寮、溪尾、什乃、胡厝寮、埃头、西卫、田寮,全数位于善化镇境内;下九庄为安定、溪仔尾、许中营、港

① 陈丁林:《王之醮》,第32页。

② 陈丁林:《苏厝长兴宫癸未科瘟王祭》,台南,苏厝长兴宫,出版年不详,第26页。

口、油车仔、内郑拐、外郑拐、岭寄、下洲仔，属于安定乡境内。[①] 苏厝甲本身的村境范围不大，一两小时就绕境完毕，而长兴宫的王醮每三年一科，醮典科仪一向讲究，绕境及于交陪境，亦所以显示“千岁爷”照拂保佑其广大信众之美意。不过顶八庄与下九庄基本上与位于安定庄的保安宫交陪境重叠，据说大约在1920年代左右，一次许中营建醮时，安定与港口的武阵发生冲突，从此顶八庄与下九庄失和，苏厝位于顶八庄范围[②]，是否因此绕境不再及于下九庄不得而知。[③] 从长兴宫最近几科绕境范围来看，仍限于顶八庄，但会前往下九庄中的安定保安宫参拜（未绕境）。

长兴宫绕境的重心在“外境”，也就是交陪境，为交陪境禳灾祈福，但绕境时交陪境的神轿与阵头也出动一起瘟庄。顶八庄交陪境紧邻苏厝甲，同属曾文溪南岸的洪泛平原区，经常共同面对洪水及水灾后瘟疫的威胁，休戚与共，长兴宫的千岁爷及定期举行的王醮、绕境是居民心灵上的重要慰藉，因此顶八庄虽是长兴宫的“外境”，但如果说顶八庄构成长兴宫的信仰圈，并不为过。这种信仰圈的重叠性很高，善化庆安宫也在顶八庄的范围内，苏厝一里外就是安定保安宫，这三座大庙的信仰圈彼此会有部分的重叠。

苏厝甲庄南“社尾角”另有一座真护宫，系1965年前后部分信徒从长兴宫分裂而出建庙，1967年开始举行三年一科王醮。真护宫因另起炉灶，交陪对象较无地缘连结性，丙戌年五朝王醮期间同时举行三天“绕境会香”，拜当代交通便捷之赐，第一天绕境会香远达百公里外的高雄、屏东（东港），第二天在台南县市，第三天在同属台江内海地区的台南市安南区及苏厝本境。[④] 这样的绕境会香，已失去交陪的意义，只合说是交际而已。

（三）西港香科大醮典

曾文溪流域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庙会绕境，首推“西港仔刈香”。西港刈香为民间俗称，根据西港庆安宫的相关资料所载，庆安宫自道光三年（1823）继姑妈宫之后接办王醮，咸丰六年（1856）起，为彰显庆安宫主祀神妈祖与鹿耳门天

---

① 黄文博：《南瀛王船志》，第62页。另一种顶八庄与下九庄的说法是：以安定为庄母，顶八庄包括胡厝寮、埃头、西卫、百二甲、林厝、苏厝、后堀潭、郑拐，下九庄为沙仑、中仑、六块寮、大同村、许中营、港口、油车仔、岭寄、下洲仔，参见陈丁林：《大道公心·妈祖情——安定保安宫香科醮事志》，台南，安定保安宫，2004年，第111页。

② 陈丁林：《大道公心·妈祖情——安定保安宫香科醮事志》，第111页。

③ 2003年安定保安宫举行癸未科王朝祈安建醮，作为安定乡镇级的境庙，保安宫此科庙会举行顶八庄、下九庄的绕境，范围并扩大及安南区外埕。

④ 《第一代天府王勅真护宫丙戌年科王朝王醮祈安大典简介》。

后宫妈祖的分香渊源，庆安宫每届王醮之期必至鹿耳门“请水”，请水通常即指请神，也有饮水思源之义，同时举行谒祖进香割火祭仪[①]，随后恭请鹿耳门妈祖来西港鉴醮，这应该是庆安宫庙会被称为“刈香”的原因。不过，庆安宫庙会的主轴毕竟是王醮，近二十年庙会活动的资料概以“○○香科大醮典暨代天巡狩○○村乡绕境”为称，如 2006 年丙戌科为“丙戌香科大醮典暨代天巡狩出巡九十六村乡绕境”，也就是进香与王醮合一的庙会。

西港香科因历史悠久，几未间断（庙方说法，仅 1943 年因太平洋战争，日本当局禁止庙会），参与的村庄及绕境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初创期的 13 庄头（村乡），扩大为 24 庄、36 庄、72 庄，1988 年增至 78 庄，1991 年为 90 庄，2000 年庚辰科起增为 96 村乡迄今。[②]

96“村乡”是庆安宫的用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 96 个“单位”参与西港香醮活动，“村乡”的单位是宫庙或神明，大多数是一村庄一宫庙一神明，有些地方一村庄两宫庙参加，也有无庙但神明设坛在炉主家中，也算一“村乡”。[③]“参与”西港香的方式有几种：第一，刈香绕境的四天中全程出动神轿、艺阵（艺阁与阵头）或至少神明（可以合轿）出席，其所属村庄为绕境香阵巡游必经之地；第二，未出动神轿参与绕境，但绕境的香阵经过时，该村庄的神轿、阵头出面迎、送，并准备饮食点心招待香阵，香阵也在该村庄内巡绕一过[④]；第三，不在绕境范围内，但主动热情要求参加绕境香阵之宫庙，包括来自台南市、高雄、屏东等地。这一类的参与者有些长期参与（如高雄市七显宝寺），也有参加数科之后退出者。

第一类的参与村庄宫庙是西港香的核心单位，大约是 70 余座宫庙，依现行

---

① 西港香王醮传统是前往传说中拾获王船的十八枞榕树凹湖处请水，到咸丰年间，可能因地形改变，原请水处已无水可请，加上妈祖分香渊源，故改往鹿耳门进香割火，仍称请水；1871 年鹿耳门天后宫毁于洪水，妈祖神像移祀台南海安宫，此后割火改为以缸汲水，名符其实是“请水”。1920 年代鹿耳门溪北岸的土城新建保安宫奉祀五府千岁，后向海安宫迎回妈祖为陪祀，庆安宫于 1940 年改向土城迎妈祖鉴醮。1958 年王醮举行时，土城人士因妈祖在醮坛座次问题与西港庙方人士闹翻，1961 年辛丑科，庆安宫改前往鹿耳门溪请水后，并向鹿耳门天后宫“割火”；1961 年往鹿耳门请水割火活动的香条内容为“庆安宫敕封天上圣母圣驾择于 4 月 13 日往鹿耳门谒祖进香合境平安”。参见谢国兴：《鹿耳门的妈祖信仰与正统之争》，《思与言》34 卷 2 期（1996 年 6 月）；刘枝万：《台南县西港香瘟醮祭典》，收在《台湾民间信仰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 年 7 月），第 348—350 页。

② 黄文博、黄明雅：《台湾第一香：西港玉敕庆安宫庚辰科香科大醮典》，台南：西港庆安宫，2001 年，第 15—17 页。

③ 李素英：《西港玉勅庆安宫香科活动之研究》，台南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 年，第 6 页。

④ 这一类的村庄或宫庙会有流动变化，每一科不一定完全相同，主要是南巡及请妈祖日经过的外堀仔、中州寮、新寮仔、什二佃、本渊寮等村庄及宫庙。

行政区划,这70余座宫庙散布在台南县西港乡、安定乡、七股乡、佳里镇及台南市安南区等五个乡镇区,这些宫庙的代表人都是西港庆安宫的董监事会或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每次庙会时出钱出力。就此层而言,西港香醮活动的"香境"具有祭祀圈的性质;但若扩大到第二类以上的成员,则香境有部分只能算具备信仰圈的性质。对西港香信仰圈的理解,还应考虑两个层面:第一,庆安宫正式绕境前约一个月,照例举行"南巡",南巡最初的用意是到台南市府城隍庙谒祖(庆安宫在康熙年间草创时就奉祀境主公),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形同一次对交陪境的绕境。1988年戊辰科,南巡谒祖进香沿途参拜的宫庙与宅第共十处,参与的阵头11阵(包括宋江、金狮、武阵三阵),神轿四顶,人员共约600人[①];2006年丙戌科时,南巡途中参拜与绕境的宫庙共13座,出动各式阵头21阵(包括大型武阵7阵),神轿八顶,人员将近1500人。[②] 第二,庆安宫自1925年开始制作鲤鱼与"王令"(等同千岁爷化身,两者合称鲤鱼旗)供信徒迎请回家中奉祀,保佑阖府平安,每科香醮开始时,大部分信徒会送鲤鱼与王令回庆安宫鉴醮,形同谒祖进香,以增加灵力。1991年辛未科的统计:回宫鉴醮的鲤鱼旗共7861尊[③],来自全台湾各县市(台南县市、高雄县市最多,合计78%)[④],换句话说,7800个左右的家庭会有成员在香醮期间到庆安宫祭拜。辛未科新乞鲤鱼、金鲤鱼、王令、浮绣王令共收入2059800元,旧鲤鱼旗回宫鉴醮共收入11791500元。[⑤] 2000年庚辰科约有6000尊回庆安宫鉴醮,每尊鉴醮费用台币2000元(光这项收入就1200万元),如果鲤鱼旗破损,庆安宫有专门人员免费修复,若属老旧不堪修复,汰旧换新也可以,每尊3600元,如果要新乞"金鲤鱼"与"浮绣王令",每尊5000元(十年前就是这个价钱)。[⑥] 交陪境与鲤鱼旗分布的主要区域,可视为西港庆安宫的信仰圈。

西港香因为参与的宫庙神轿、阵头众多,绕境队伍的组织与指挥、行进方式,都需要讲究,以免秩序大乱,妨碍交通,失去绕境祈福的庄严与神圣意象。神轿因多达七八十顶,故需先作编号,大部分顺序以抽签决定,少部分特别的宫庙则

---

① 《戊辰香科大醮典暨代天巡狩出巡七十八村乡遶境资料册》(西港庆安宫编印)。
② 同上。
③ "尊"是神像的数量单位,鲤鱼与王令为千岁爷的化身,故以尊计数。
④ 方淑美:《台南西港仔刈香的空间性》,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年,第47页。
⑤ 同上书,第101页。1991年鲤鱼旗鉴醮的费用每尊1500元。
⑥ 黄文博、黄明雅:《台湾第一香》,第82页。

有固定位置。轿号第一号为开路先锋[1]，乌竹林广慈宫的主祀神谢府元帅及其所属阵头金狮阵是一向是西港香遶境的“先锋官”，以成定例。[2] 1949 年己丑科西港香醮时另启建“水陆道场刀兵醮”，以“超拔大东亚战争陆海空为国殉难忠肝义胆无辜黎庶英灵”，在这一次醮典时，值年的余千岁“奉玉旨荣封三五甲镇山宫地藏王菩萨膺任刀兵教主”，封海寮普陀寺杨府太师“任殿后大将军”，封大塭寮保安宫广泽尊王为“副帅”，“统辖天兵神将出巡绕境，绥靖七十二庄，安祥植福”[3]。1960 年代神轿尚未编号，但有些位置是固定的，除开路先锋外，三五甲镇山宫是左先锋，海寮普陀寺为右先锋，大塭寮保安宫紧随在后，树仔脚宝安宫是“驾前”（“驾”指千岁爷王轿）[4]；另外公塭万安宫与溪埔寮安溪宫合组的蜈蚣阵（又称百足真人）因身形特殊（近百公尺长），一向自由行走。到了 1983 年甲戌科时，先锋宫乌竹林广慈宫轿号排第一，左右先锋分别为海寮普陀寺与高雄七显宝寺（轿号二、三），三五甲镇山宫排第五号（逢尾数四跳号不排），这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这一科取消了“驾前”，新设“副帅”，由竹桥庆善堂梁府千岁、溪南寮兴安宫普庵祖师、树子脚宝安宫康府千岁担任，后来续有增加，2006 年丙戌科副帅增至七座宫庙的主祀神。

西港香的绕境方式是所有神轿及阵头每天上午六时到庆安宫参拜后各神轿依编号顺序出发，绕完当日香境后返回庆安宫入庙参拜后各自返回。前两日人庙时只有开路先锋、左、右先锋、刀兵教主、顶下寮（大竹林汾阳殿、大塭寮保安宫）、姑妈宫、百足真人（蜈蚣阵）、驾前副帅可以进入（王府）衙门内参拜，其余宫庙只能在衙门前行三进三退礼，第三日所有神轿均可入衙门参拜。[5]

西港香绕境时阵头表演为一大特色，过去传统文阵（北管戏曲类）不少，近

---

① 绕境队伍中择一武阵当开路先锋是曾文溪流域庙会的特色，其他地方少见此俗。

② 乌竹林早在十三庄时期就是西港香成员，其金狮阵在西港香各武阵中组阵历史最久，可能有两百年历史。

③ 刘传心、李文同编：《王勒庆安宫辖内外庙宇宝鉴》，台南，正平出版社，1980 年，所收己丑科“令旨”。

④ 刘枝万，前引书，第 350 页。大竹林与大塭寮两村居民以郭姓为主，称顶下寮，早期两村参予西港香时大塭寮保安宫出一顶神轿、大竹林的妈祖共乘不另出轿，而且大塭寮必往台南府城西罗殿迎请广泽尊王（郭圣王）一同参加绕境，西罗殿是全台广泽尊王信仰祖庙，为示尊崇，西港庆安宫江大塭寮的神轿排在主神轿（王轿）之前称“驾前”，1928 年绕境香阵从管寮成竹筏渡曾文溪时，一艘竹筏翻覆，树子脚宝安宫康府元帅的坐骑王马机警跑回庆安宫示警，庆安宫人员迅速前往救援，幸无人伤亡；宝安宫康府元帅立下此奇功，后来获得担任“驾前”的荣誉地位，顶下寮的神轿改排在左右先锋之后，仍是固定位置。参见方淑美：《台南西港仔刘香的空间性》。

⑤ 《丙戌科香料大醮典暨代天巡狩九十六村乡绕境资料册》，第 71 页。举行王醮时例须在庙内布置王府，作为值科王爷的居所与举行醮仪的神圣空间，王府前有衙门，是王爷的办公室。

年来许多北管后继无人停止出阵,部分宫庙只好花钱催请职业性表演阵头(多为鼓花阵、素兰阵)充数,但整体而言,西港香的"庄头阵"(村庄中子弟自行组阵)数目之多、质量之精,体现传统社会文化意涵之丰富,在全台湾仍居翘楚地位。尤其是大型武阵(宋江阵、金狮阵)长期维系传统,不仅形式保存,操演内容也不打折扣,在台湾各地庙会中已十分少见。绕境时各宫庙所属阵头一早到庆安宫参拜后就各自前往当日香路所经的各宫庙参拜表演,表演内容与时间长短视两宫座宫庙之间"交情"而定,交情深厚,尽量作完整表演,以表敬意(宋江阵与金狮阵较完整的表演常在一小时以上),若交情普通,至少会表演宗教意味最浓厚的"开斧"、"排八卦"两项(约需一刻钟左右);有时多队阵头同时到达,只好浓缩表演时间。绕境有两大作用,一是宗教祈福,抚慰心灵,一是娱乐表演,解放情绪,宋江阵与金狮阵可谓两种作用兼具。武阵操练同时又极具乡土认同与社会动员的作用,对于激发乡里民心与维系地域认同有正面的意义。

绕境前阵头之间的探馆、答谢(赞助者),绕境期间各村庄家家户户热情招待香阵人员饮食点心,在在凝聚西港香参与宫庙与人群之间的认同感与向心力,长期以来西港香的核心成员(宫庙)很少变动。[①] 当地的说法是这些宫庙"份"西港香。"份"有"股份"、"一份子"的含义,"份"若作动词解,则是一种既是权利也是义务的参与,参与者彼此之间在绕境时互动联结,形成一种信仰上的共同体感觉,则又近乎祭祀圈的意义。[②]

(四)关庙山西宫的王醮绕境

关庙乡位于台南县平原与丘陵交界地带,部分居民系由西邻的归仁乡迁移而来,故民俗与宗教信仰有相当程度的互通性。山西宫是关庙地区乡镇级的"大庙",但山西宫的"香境"(祭祀圈)并未及于关庙全乡,只集中在山西宫附近的几个人口较多村落:山西、关庙、五甲、香洋、松脚、东势、北势、新埔、新光、南花、北花等十一个村,乡境北端的下湖村与埤头村自为祭祀圈,南端的深坑、布袋、龟洞、田中四村也各自有村庙,自成村庄型祭祀圈。

山西宫创建于明郑时期,历史悠久,清代多次重修,日治时代 1913 年曾大修,并举行醮祭;1935 年重建,1944 年太平洋战争期间为日军占用,1958 年修缮

---

① 1961 年土城退出西港香另组土城香为一例外。

② 艾茉莉(Fiorella Allio)称西港香境是"内倾的领域",并以祭祀圈视之。参见艾茉莉:《绕境与地方身份认同:地方仪式的历史上演》,《法国汉学》第七辑,中华书局,2002 年,第 383 页。

完成，并举行七期王醮，嗣后即定12年建醮一次。[①] 归仁乡有四个主要祭祀圈，其中境域较大的仁寿宫与大人庙（保西代天府）跟山西宫自清代就并称台湾府城东门外三大庙，彼此在庙会活动中素有交陪（支援）的长远传统。2006年12月又值山西宫12年一科的王醮，仁寿宫下五角头（七行政村）13间宫庙在三、四个月前就开始组织阵头，加紧操练，就为了参与12月9日山西宫在关庙境内一天的绕境。保西代天府的情况也相同，辖下五村八角头也在同时间开始动员准备。这次庙会仁寿宫补助辖下各宫庙新台币40万元，作为组训阵头的基本经费，保西代天府则补助每间庙30万元。总计仁寿宫共出动13顶神轿，组织文阵一（莆仙戏草鞋公）、武阵11（金狮阵4、宋江阵7），保西代天府则出动6顶神轿6队宋江阵、一队金狮阵。

山西宫庙会的绕境只绕"本境"共11个行政村，其中10个村聚集在关庙较繁华的市街区，只有一村新光村稍偏远。12月8日为山西宫祭祀圈内各阵头（金狮、宋江武阵9，蜈蚣阵1，加上其他小型表演阵头）"架棚"的日子（阵头正式成军，到大庙前参拜表演），当天下午先去新光村绕境，隔天才是山西宫绕境的重头戏。参加12月9日绕境的队伍，除了山西宫辖下（祭祀圈）的各角头宫庙外，来自归仁乡的保西代天府、仁寿宫，右邻的龙崎乡，加上关庙乡内不属山西宫祭祀圈的南、北两端各宫庙，总计参加的宫庙约70间，神轿近60顶，各式阵头60（包括33队大型武阵，2队蜈蚣阵），同一天的时间内在关庙市区约三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巡绕，锣鼓喧天，鞭炮不绝，其"热闹"情况不难想象。

山西宫庙会绕境有几大特色：队伍多，接礼时间长，绕境时间短（真正绕境时间约7小时），中午吃饭担，家家户户备香案，参拜赏红包。

12月9日的绕境准备活动从凌晨零时开始，山西宫本境内的各角头宫庙神轿、阵头、主事人员到山西宫王府、王船参拜后，整队前往进入关庙的182县道上依序列队道路旁（包括龙崎乡来的友境宫庙，共30顶神轿，25队阵头），等候交陪境各宫庙队伍的到来。凌晨一点半，保西代天府的6顶神轿、10队阵头到来，采循环接礼，即每顶神轿及每一阵头都是一个单位，主、客双方一一相互行礼后，主人在原地不动，客人继续前进。简单来说，任何一顶保西代天府的神轿需在行进中跟山西宫的队伍（30顶神轿、25队阵头）相互行礼55次，才完成接礼，接礼完之后到山西宫王府、王船厂参拜，接礼行礼的部分才告结束。来客计分保西代

① 《关庙山西宫沿革暨王朝王醮辑录》，台南，关庙山西宫管理委员会，1999年，第10—12页。

天府、仁寿宫、其他友宫三组,完成接礼、参拜仪式,天都快亮了。稍事休息,上午七时将所有队伍分成南北两大区域开始游境,山西宫庙方事先给参加绕境各宫庙一张前进路线图,事实上不久各阵头就各走各的路(所有宫庙神轿则另组队编号依既定路线前进),因绕境参拜的主要对象是各宫庙、各主会首的"坛",加上沿途民家门口摆设的香案,因交陪深浅不同,每个阵头修先前往目标的优先次序不同,队武交错杂沓很难避免;无论宫庙、醮坛、住宅,对于来参拜行礼的阵头,一般都会赏给红包,一天下来,"拜香案桌"的收入也颇可观。根据部分宫庙后来公布的资料,少者 15 万元左右,多者达 25 万元。归仁乡及永康市的大湾地区庙会绕境时也有赏给阵头红包的风俗。

山西宫庙会绕境区域内一般只提供饮料,与曾文溪流域各村庄自行准备食物点心招待香客与香阵不同,山西宫绕境采中午集中吃"饭担"的方式解决。"饭担"即午餐供应处,共分三处,采圆桌合菜(九道菜,外加白饭、饮料),每桌 2500 元,山西宫事先征求关庙本境的居民及各界人士认捐,捐助者的姓名会书写在一支小旗上,插在饭桌。由于人数众多(看热闹的民众也可以用餐),不设椅子,只能围站着吃饭。山西宫庙方统计当天共计开出 6000 桌左右,也就是有六万人(分三处)同时享用免费的午餐。

山西宫庙会这种规模如此盛大的交陪境宫庙(包括乡镇级的与村庄集的地方宫庙)前来协助绕境模式[1],为全台少见,相对的,当仁寿宫与保西代天府"闹热"时,关庙的各庙宇也会热情相挺。从信仰结构来说,这些庙宇(祭祀圈)之间谈不上有信仰圈扩大的作用,而是源远流长的典型交陪境运作模式。

(五)二层行溪下游入海口一带的绕境模式。

二层行溪今称二仁溪,为台南县、市与高雄县的界河,北岸有台南市湾里地区与台南县仁德乡大甲,与南岸的高雄县茄萣乡白沙仑、高雄县湖内乡太爷、公馆等地,长期建立"交陪"关系。湾里目前行政区划有九个里,以万年殿为公庙,祭祀圈范围十分明确。万年殿主祀三府千岁与五府千岁,是一座标准的王爷庙,建庙于康熙年间,建醮传统悠久,1945 年台湾光复至 1984 年的四十年间不定期举行过 9 次王醮(多数为 6 年一科),1984 年后定制每 12 年举行一次。[2] 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1 月将举行戊子年科五朝王醮大典。

---

① 依照民间信仰的逻辑,外境的神明来参与绕境,不仅是增加热闹与面子而已,藉重友宫神明的灵威镇煞赐福,才是更重要的意义。

② 《湾里王船庙万年殿简介》,台南:万年殿管理委员会,2007 年,第 8—10 页。

湾里与白沙仑一带建醮绕境的特色是前往交陪庙绕境，而且绕境时只有主办宫庙本身的神轿与神明出巡，本境内的各角头庙神轿不参加，仅人员、阵头出动，这种方式跟一般大庙广邀境内角头村庙共同参与以示热闹与神威广大的思路明显不同。[①] 2007 年 1 月白沙仑万福宫举行香科庙会（未建醮），1 月 7 日前来湾里绕境，1 月 14 日前往台南县仁德乡中洲地区绕境，中洲绕境当天湾里万年殿除出神轿一顶外，派出辖下各角头共 8 个各具特色的阵头前往助阵，包括宋江阵（60 人）、龙阵（60 人）、跳鼓阵（13 人）、北管（22 人）、十二婆祖阵（33 人）、八家将（30 人）、大锣阵（21 人）、南管（35 人）。[②] 万年殿举行王醮时，依例会前往沙仑、大甲、太爷、公馆、围仔内等"外境"绕境一天。万年殿王醮的另一特点是王船不火化，或者行走水路，或者陆上行舟，到外境绕行祈福。这是祭祀圈各自独立，但以交陪情谊为重，劳师动众绕交陪境的范例。

湾里、茄萣一带庙会时"庄头阵"甚多，有维持传统的武阵，也有多元创新的娱乐性现代表演团体，是一大特色。曾文溪流域绕境时阵头脱离神轿自由行动，在各宫庙参拜之外，表演也是一大重点，归仁、关庙（盐水溪流域）及湾里、茄萣（二层行溪流域）的阵头表演在绕境之前的"探馆"阶段进行，绕境当天阵头引导（护卫）神轿前进，到各宫庙仅参拜行礼，原则上不表演。

五 结 语

用祭祀圈来解析台湾民间信仰，在角头（小聚落）与村庄层级的范围是十分贴切的理论与工具，当扩大至联村或乡镇型的祭祀圈时，因香境大庙与角头公庙之间的互动方式无法完全比拟为小型祭祀圈的宫庙（神明）与居民互动模式，这时候对祭祀圈的性质与运作模式须有所调整，不过，大祭祀圈涵盖小祭祀圈的情况确实存在。林美容教授从台湾中部各种神明会运作方式归纳出信仰圈的理论，然而在台湾南部的庙会活动与民间信仰实践中，跨地区的神明会的组织较少见，或者不具重要性，反而是交陪境宫庙之间"志愿相挺"的运作模式构筑出另一种形态的信仰圈。西港的庙会与组织运作，既有祭祀圈的部分性质，同时也是信仰圈的具体展现，"份"西港香的成员中，彼此之间又有亲疏交情不同的区别，

---

① 二层行溪流域上游的高雄县内门乡两座全乡级大庙的绕境也是类似模式，其理由尚待查考。

② 《白沙仑万福宫丙戌年香科大典校棚出境游行秩序册》，第 9 页。

互动之间又显现交陪境互动的模式。

"交陪"是"结交陪对"之意,是台湾民间信仰中人藉神的名义进行互动的模式,有无交陪,交陪深浅,有各种成因与发展变化,每座宫庙的故事不尽相同,这是另一个有趣的议题。在台湾民间信仰研究中,"交陪境"模式是一个十分古老而现代在仍然坚韧存在并起作用的社会系统,也是了解台湾民间社区长期互动与社会生活文化多元样态的重要切入口。

三十而立

——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

行　龙　胡英泽*

学术总是时代和思想的反映。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社会实践和思想激荡，社会史研究已成为中国史学界最为活跃的创新点，也是中国社会科学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三十而立"，三十再思。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从社会史的复兴到区域社会史，再到新社会史，中国社会史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学术实践？从最初的摆脱政治史"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强音，到新近的"回归政治史"的呼吁，这样一个往复过程中，透露了哪些最为核心的学术思想观念？在面临挑战、不断争论的反思过程中，社会史如何进行自我调适，一步步地走向成熟，对开启一个新的阶段提供参考？这是身临"三十而立"，需要我们冷静再思的问题。

一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追想三十年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等重大事件，开启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这样一种百废俱兴的时代背景下，科学的春天扑面而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经过了一个长期停滞和冻结的非常时期之后，跃跃欲试地进入了破茧而出的"新时期"，社会史的复兴是新的时代和思想共同催生的结果。

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复兴首先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伴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始了新的航程。这一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在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领域引起了明显

* 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胡英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变化,全面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成为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回应新时期提出的社会现实问题,开展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成为史学界反思和修正“文革”以来中国史学的学术起点。在一片“史学危机”的忧虑和关切中,史学界越来越感觉到,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研究为浓厚的政治意识所笼罩,五种社会形态的简单线性进化论和近代史“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革命史范式形成了一个框架,以政治史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史学研究,并不能反映历史的全部与真实,突破旧模式,补充以往史学研究模式中丧失的历史内容成为多数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由此,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得以复兴。

中国社会史的复兴,不仅是中国史学界对国家政治形势和社会变化做出的回应,也体现了史学界改革开放和兼收并蓄的姿态。固守封闭的坚冰被打破,学术思想日渐活跃,之前拒之门外的西方学术和思想不断引进国内,都对史学界产生了冲击。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社会史尤其是年鉴学派的影响尤为重要。我们知道,西方社会史是作为反对以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为主的传统史学而面世的,倡导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注重研究人民大众的历史,追求总体的全面的历史,是年鉴派史学最初的基本特征。这一史学思想为中国社会史的复兴提供了理论资源,除一些相关的史学理论著作篇章的介绍之外,1988 年,由蔡少卿教授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一书,较为全面地译介了西方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在复兴不久的中国社会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初期发出的最强音。在这样一个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社会史学界有一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使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应该说在大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社会史”论著,也开展了一定的资料整理工作,它的部分内容虽然可以归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史所倡导的研究领域,但是毕竟不是我们所说的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史。在学术谱系溯本正源的同时,论证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合法性情结可以理解,但时过境迁,今非昔比,社会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具有了新的学术追求和内涵。

客观地讲,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讨论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复杂,如果从社会史学术史的视野来看,其中一些常常忽略却至为关键的线索,仍然可以为 1978 年以来社会史的发展过程提供思考。但从史学自身发展来看,那个时候,史学家在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中赋予了他们对历史问题复杂性的意识,中国

历史逐渐"概念化",其中一些重要概念即来自于社会学。从社会现实与史学研究的相互关系来看,老一代史学家对中国革命性变革的现实关注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随之而来的是历史研究的社会学倾向,即研究者将社会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其中,那些与经济活动最直接相关的社会要素具有逻辑的优先性。20 世纪 20 年代,关于社会和社会问题著作的突然增长,是此时中国思想界所发生的社会学转向的最明显的表征。大、中学校社会学和社会问题课程的设置以及政府性机构和社会学组织开展的社会调查,不仅提供了关于中国社会的具体资料,而且揭示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日益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扎下根来。[①] 简言之,社会史与社会学理论的密切关系,现实关注与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社会调查与资料搜集的研究方法等一些和社会史研究有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在那个时期已是端倪初显。

1978 年以后,社会学的重建对社会史复兴的推动和促发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只是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史和社会学密切关系的重建才再一次成为可能和现实。1979 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开始走出被否定和批判的禁区,并积极展开了一系列推动社会学重建的工作。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我们需要对当前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科学的研究,以便帮助党和国家解决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使社会的各方面都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向前发展。"[②]费老先生的这样一种现实关怀,在当时的学术界很容易产生共鸣,社会史的复兴其实就是一个显例。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我们可以说,从 1978 年开始中国社会史研究迈出了探索的步伐。此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讨论、学术会议的定期举办、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系列著作的出版、社会史课程的开设及人才培养等工作逐步展开。1985 年一些学者开始公开发表文章,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进行讨论。1986 年由南开大学、《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共同发起,在天津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这次会议常常被视为学术界有计划地恢复社会史研究活动的开始。此后,每两年一届的社会史年会坚持不懈、定期召开,至今已连续举办 12 届。2005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多家单位共同发起召开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亦以两年一届为期,现

---

① 〔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

② 费孝通:《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 年,第 8 页。

已召开3届。社会史学术会议的召开，不仅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开展学术交流与对话的平台，而且扩大了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是中国社会史学的标志性学术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山西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也先后成立了社会史研究机构。1978年开始招收首批硕士研究生后，为培养社会史研究工作者，一些高等院校即开始培养社会史研究方面的人才，1982年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即已确定"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方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部分高校还开设了社会史研究课程。20世纪80年代后期，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社会史丛书4种，浙江人民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合作，组织出版了中国社会史丛书20种。这些工作有声有色，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

20世纪90年代初期，几部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史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社会史体系的初步形成，也形成了社会史研究的一次高潮。1992年乔志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学界对该书虽有批评之声，但从当时社会史的发展状况来看，它毕竟"使整体社会史研究迈出了由理论探讨走向实际操作的第一步，并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① 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张静如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龚书铎先生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几部各有特色的通论性社会史的著作先后出版，在当时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划出了一个大概的研究范畴。它展示出来的意义，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把所设计的社会史的理论框架和具体史料结合起来，把它容纳、贯穿到通史和断代史的著作当中，从理论的层面开始到实际的操作，使得社会史的概念得到完整的体现。

一个学科的兴起势必要讨论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框架等问题，社会史亦复如此。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初期基本形成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以社会生活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如冯尔康先生认为："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作用和地位"②。乔志强先生提出，社会史的研究对

① 虞和平、郭润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58页。
② 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象是社会生活，它“不属于人类生活历史中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社会生活”[①]。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史研究社会全部的历史。如陈旭麓先生提出社会史应该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全部面貌”，“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所注重的是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由此延伸出来的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种种人际关系都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②]。张静如先生认为，“社会史不是研究‘经过政治、经济提取后的剩余物，而是研究社会全部的历史’”[③]。

社会史的学科性质、研究框架和研究对象紧密联系，代表性的观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专史说”、“通史说”、“范式说”。乔志强先生认为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平行相邻的从属于通史的专门史。社会史研究体系由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部分构成，是为“专史说”。陈旭麓先生不同意把社会史看做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专史，认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嬗递。张静如先生提出“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的部分，是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的学科”，他不同意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中分离出去。其著作从社会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社会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社会意识等方面建构社会变迁的整体状貌。陈、张二人观点是为“通史说”或者“总体史说”。后来，赵世瑜先生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④]。后来，他继续阐述了这一观点，提出应该把社会史理解为一种史学的范式，而不应该理解为一个学科分支。是为“范式说”。其后，行龙对上述两种观点加以综合，认为社会史的“范式说”和“专史说”并不矛盾，更没有高下之分。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学科意义来讲，社会史就是一门专史；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看，社会史以它鲜明的总体史的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还有它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旧史学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一种新的范式。[⑤] 可以说，对社会史这些基本理论的学术争鸣，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

---

① 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2 页。
② 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 5 期。
③ 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④ 赵世瑜：《中国社史研究笔谈 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历史研究》1993 年第 2 期。
⑤ 行龙：《也谈社会史的“专史说”与“范式说”》，《光明日报》2001 年 7 月 3 日。

社会史的繁荣发展和相关理论的热烈讨论,吸引了社会学界的目光,他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阐述了一些观点,有利于社会史学界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以及研究框架的建构。周晓虹经过检讨反思,认为社会史应该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是现代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并列的从属于通史的一项专史,主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以及动态的变迁。[①] 他虽然赞同社会史学的"专史说",但其具体研究框架显然有所差异。历史学和社会学对于社会史研究相关问题的讨论,充分显示了社会史学科交叉性的特征。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20世纪80年代开展社会史研究初期发出的呼唤,从复兴、探索到体系初创,社会史逐渐赢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概而言之,复兴后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其实汇聚了两类不同的学术资源,也可谓亦新亦旧。把社会史复兴的源头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及其产生的论著,是为怀旧。作为另一个资源,西方史学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理论方法的引入和学习,又为趋新。在和国内传统、国际学术实现对接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史的复兴之路可谓亦步亦趋,似乎又显得方枘圆凿。回头来看,从严格的学科意义上讲,早期的社会史论战和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尚有较大距离,而我们最初所要倡导学习的法国年鉴学派也已时过境迁,经过80年时间和三代学者的努力和实践,年鉴学派史学早已发生了学术转向。对此,步入新世纪后,孙江尖锐地指出:"在当代世界新史学变化的时间表上,值得我们痛加反思的是,限于学术信息的不足和学术语境的不同,我们和欧美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用同一种声音发出了'史学危机'的呼声,但是内容却根本不同,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要否定的是整体的结构历史和历史学过分社会科学化的倾向,而这恰恰是我们视为社会史研究的范本来加以追求的目标!"[②]是亦步亦趋地学习和"追赶"西方的理论方法,以求实现国际化的平等对话,抑或从我们的研究现实出发,实现"以中国为中心"的本土化?中国社会史研究自有其自身进一步发展的逻辑。

---

① 周晓虹:《论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② 孙江:《阅读沉默: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

二 走向历史现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初步建立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后,如果还是局限于单纯理论、概念的"坐而论道",或是停留在宏观的、一般的"大而化之"的研究层面,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史的发展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史研究发生了区域转向,社会史研究从整体社会史迈向区域社会史,这既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向广度和深度继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拓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必然。中国社会史发展迎来又一个新潮。

社会史的区域转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密切相关。中国幅员辽阔,受经度、纬度、垂直地带性影响,区域差异明显。"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既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地域特色,又存在着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经济普遍发展起来,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凸显出来,从共同富裕的观点来看,寻找不同区域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对此作出了积极反应,费孝通先生针对全国各地的差异而总结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各类发展模式,以及区域经济发展设想[①],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那么历史学者如何发挥学科优势对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呢?

社会史的区域转向受到西方社会史尤其是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影响较大。如果从"学缘"来看,区域研究在法国年鉴学派著作中也占有相当比重,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似乎顺理成章。随着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实践性成果的引进,对中国区域社会史的发展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学者开始对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研究空间由全国范围的整体研究下移到省级甚至省级以下单位,形成了中国史研究的"地方史"热。其中施坚雅在有关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晚清中国城市的研究中,引入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层级概念,使历史研究更显空间性与立体性,对区域社会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不少学者针对施坚雅的理论提出了批

---

① 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见《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评，但区域理论和分析方法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示范作用还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史研究需要以区域为单位进行研究，并建立科学合理的空间结构。区域结构不仅是一个空间结构，也是一个时间结构，要注意区域研究中空间、时间结构的差异性。市场及区域理论有助于中国区域类型比较研究，有助于从整体和区域差异来认识历史。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史界的流行语。柯文写作该书时，其“心目中的读者主要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讨论的问题主要也是针对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争论的焦点。客观地讲，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也存在诸多局限，有批评者认为这一取向本是针对西方的中国研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内地的“学情”，中国学界对近代史的研究，向来注重本国内容而忽视“冲击”中国的外国因素，本应该揭示或发现“在中国发生的历史”，即从提问层面关注特定时段里“在中国之人（包括在华外国人）”的所思所想所为。[①] 还有学者指出它是在历史变化动力上的“去冲击论”，在历史变化方向上的“去近代（化）论”以及在历史变化主体上的“去帝国主义论”，形成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②] 然而，柯文所主张的内部取向和区域系统研究却为中国社会史的区域性研究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这一时期，“市民社会”的讨论和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是一个重要的潮流。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市民社会的讨论热烈。[③] 有中国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一趋势，开始介绍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思考当代中国建立市民社会等问题。市民社会理论的引入最早始于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遂引起历史学界的兴趣。最初，学者们根据西方市民社会的几项特征来衡量近代中国有没有出现市民社会的理论性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一些市民社会的实证性研究的专著，代表性的有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年）、朱英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 1997 年），他们一致的观点是，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在清末初显雏形，社会与国家两方面均出现了明显变化，开始构建一种新的互动关系。此外，与市民社会相近的是“公共领域”。王笛较早对晚清长江

① 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5 期。

② 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

③ 〔美〕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他指出随着传统领域的演变和新领域的产生,公共领域的发展已经初步为市民社会奠定了规模和深度有限的基础。[①]他还以清末民初的茶馆为考察对象,认为茶馆是市民生活最重要的公共空间。[②]总之,受市民社会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理论分析框架,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研究者也意识到,对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的应用还需要更进一步加以完善,相关实证性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加强。[③]

西风东渐,国外学者孔飞力、裴宜理、史景迁、黄宗智、杜赞奇、马若孟、彭慕兰等人的著作也相继译介到中国,并且运用到了中国史研究并扩散到对区域社会史中。虽然学界对这些理论和著述是否适合于中国史的研究存在不同认识,但它对于中国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解释框架、问题意识、研究内容等方面都提供了新的视野。

1994 年 8 月,在西安召开的中国社会史学会第 5 届年会暨"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标志着社会史学界首次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论、方法、意义进行全面系统讨论的开始。田野调查在争议中日渐壮大,多学科渗透方法被广泛利用。这次会议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实现了与国外社会史界的正式"接轨",社会史学术会议开始出现了英、法、日和香港地区学者的身影。[④] 此后,社会史年会以及各地举办的相关学术讨论会,议题多聚焦在区域社会史研究。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发展,相关的研究中心相继成立,如中山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等单位成立"华南地域研究会",山西大学成立"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心",安徽大学成立"徽学研究中心"等。围绕区域社会史研究诸多问题,也有针对性地召开了系列会议,如"山西区域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等。[⑤]

区域社会史的发展对史料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史料范围。地方志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各类档案、日记、族谱、契约、碑刻、水册、鱼鳞册、社会调查、口述资料等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资料。就碑刻资料而言,各地文史工作者出版了大量

---

① 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

② 王笛:《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历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

③ 朱英:《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6 年第 4 期。

④ 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年。

⑤ 行龙、杨念群:《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的碑刻资料集，上海、苏州、福建、陕西等地出版了地域性碑刻资料，山西省出版了省内各地多卷本《三晋石刻总目》，碑刻等民间资料的价值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法国远东学院和中国研究者合作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水利文献四集，修正了北方水利文献不丰富的观点并推动了水利社会史的研究。从日记来看，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朱峙山日记》（分见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10、11、12 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2002、2005 年）等，在学界影响较大。档案资料如四川巴县档案、河北获鹿档案等，保存了大量珍贵档案。此外，基层村庄保存了大量的集体化时代档案，为中国现代史研究提供了最基层的资料。[1] 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推进了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迈向深入。

区域研究涉及环境、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内容，区域社会史研究使得全方位、整体的社会史研究成为可能。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深入，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和运用。这一时期，强调多学科方法交叉渗透，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中广泛地得到利用，形成了“优先与人类学对话”的场景，田野调查蔚然成风。

田野调查取向突出体现了区域社会史研究如何解决史料问题与理论方法的需要。其实，不少研究即脱胎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调查，如施坚雅的市场研究正是建立在施氏本人对四川农村实地调查基础之上。早期的社会学调查经历一定时期后转化为历史文献，“追踪调查”又实现了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的结合，如 1940—1942 年的日本在华北农村的惯行调查，后来就衍生了一批以当时惯行调查与后来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而惯行调查大部分是口述史料。这样，经过“田野—文献—田野”的往复过程，理论、史料、方法已经是水乳交融，三位一体了。

“田野工作”在人类学占据重要地位，在历史研究的视野里，它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学术传统不同的研究群体在具体实践中赋予它什么样的内涵？应当说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不同的，历史学强调史料，人类学倚重参与观察以及口述资料。对于田野调查所具有的搜集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学术训练等多重意义，研究者形成共识。我们所要强调的是资料搜集、课题孕育、现实关怀与田野调查的关系。历史学的田野调查中应更加注重文本资料搜集，即

---

① 行龙、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 5 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年。

“抢救式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把历史文献搜集和参与观察结合起来的同时，加强中国社会史研究资料的积累和建设。[①] 田野调查具有孕育新课题的意义，对于史料缺乏的研究课题必须坚持田野调查。田野调查不仅要注意学术意义，而且要有自觉的、强烈的现实关怀，“由现实出发，向历史提问”，关注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实现田野与文献的结合，微观与宏观的结合，避免“为田野而田野”的简单化倾向。

田野调查虽说蔚然成风，南北各地却是风姿各显，出现了与自身研究相契的“走进历史现场”、“感觉主义”、“走向田野与社会”等学术倡导，各具特色的“学派”逐渐形成。改革开放后，华南的一些学者较早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学术交流和对话，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如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与萧凤霞、科大伟等人的合作研究，其田野调查的方法很早就引起学界重视。后来中山大学树起了“历史人类学”的旗帜，联合相关单位有组织、有计划定期在华北、华南等地举办“历史人类学研讨班”，通过专题讲座、田野调查等形式，对青年学者、研究生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资料搜集与解读等方面的训练，扩大了“历史人类学”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影响。山西大学在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则提倡“走向田野与社会”，其中“以水为中心”水利社会史就是一个努力探索的重要方向。他们是以水利为切入点，思考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通过水利灌溉、民生用水、水土流失等不同类型的研究，关注各类因水的问题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进而研究社会运行、控制、冲突与变迁等，尝试建立“以水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解释框架。[②]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形成一个较大的学术群体。

田野调查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已经蔚然成风，但基本仍限于研究者个体的行为，像年鉴派那样真正的“集体调查”我们做的还非常有限。勒高夫在谈到费弗尔的《为史学而战》时写道：“费弗尔在书中提倡‘指导性的史学’，今天也许已很少再听到这一说法。但它是指以集体调查为基础来研究历史，这一方向被费弗尔认为是‘史学的前途’。对此《年鉴》杂志一开始就做出榜样：它进行了对土地册、小块田地表格、农业技术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贵族等的集体调查。这是一条可以带来丰富成果的研究途径。自 1948 年创成立起，高等研究实验学院

① 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②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 年。

第六部的历史研究中心正是沿着这一途径从事研究工作的。"①依我们有限的了解,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对贵州清水江流域文献以及一些省份的碑刻资料的搜集整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对集体化时代山西百余农村基层档案的搜集整理,或可视为这种"集体调查"的开始。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研究者在抱怨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完整的教会档案和系统文献,从事社会史研究的资料难以搜集,其实那是我们的功课还没有做好,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到位。中国如此之大,资料搜集的空间也很大。除了研究者个人的田野工作和资料搜集之外,这样的"集体调查"实在是应该大加提倡,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文化遗产的抢救。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区域社会史研究相继产生了一批成果。早期的主要有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借鉴中心地理论,尝试建构一个区域整体的历史,包括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人口、耕地与粮食,农村经济与农业发展,区域贸易与市场网络,手工业与工业,政治结构与地方社会秩序,新旧教育体制的变动,社会组织及其功能的变化,社区、社会阶层与社会生活,传统文化与近代意识等方面,在建构区域整体历史的同时,该著还试图揭示区域的近代化历程。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研究了明清徽商的土著化过程与盐业城镇的发展,以及与东南文化变迁的关系。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则试图从区域社会的角度对《中国近代社会史》中提出的社会史知识体系,进行重新审视和继续深化。该书从人口增长及其流动、婚姻状况及其变迁、家庭、宗族、阶级、阶层、市场交换、城市化与城乡关系、物质生活、社会风俗、民间信仰、社会心理、人际关系、农村教育、基层政权、地方自治、灾荒救治、社会问题以及社会变迁等方面,不仅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建立了横向的社会史的"知识体系",而且以纵向的"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演化"即"社会近代化"作为贯穿其中的"主线",对华北区域社会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魏宏运主编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从自然环境与社会制度、小农社会的农业变革、农村商业集市、工矿业的兴起、村落、家庭与家族的变迁、农村新文化与新风尚等多角度,对这一区域的乡村社会变迁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

① 〔法〕雅克·勒高夫等主编,姚蒙编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4—15页。

近年来的一些区域社会史新作体现了新的特点。2006 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中山大学组织的“历史・田野丛书”，包括赵世瑜的《大历史与小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黄国信的《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张应强的《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黄志繁的《贼民之间：12—18 世纪赣南地域社会》、连瑞枝的《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与社会》等。这一套丛书的特点，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立足特定区域，但不局限于行政区划的、网络状的“区域”，而是选择一些边界交错地带；重视地方文献，不仅重视包括族谱、契约、碑刻、宗教科仪书、账本、书信和传说等大量的地方文献、民间文书的收集、整理和利用，而且形成较为系统的解读乡村社会中各种资料的有效方法，或可称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独具特色的学问和方法；强调小地方大历史，力图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尝试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进行新的解释。

随着区域社会史的发展，围绕其学科定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社会史学科定位讨论的延续和深化。学界对区域社会史的学科定位大致形成两种意见，一种观点主张区域社会史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另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视角或方法。这和当初社会史学科讨论有些相似。我们认为区域社会史是社会史的一个方向，是从区域的视角出发研究社会史。研究者还强调区域社会史不等同于地方史，区域社会史虽然限定在某一区域，但它决不是地方史，或者说通史的地方化，不是中国历史区域化投影的“地方版”。在具体研究中要采取多学科方法，尤其是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通过理论反思，理解超越区域的意义。

面对区域社会史的热潮，需要冷静的反思。

区域社会史的特点是什么？恐怕还得从区域谈起。虽然研究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区域概念的界定和讨论，其中一些观点或许受到了区域理论影响，对区域的界定、表述和地理学、区域科学有些方面比较一致，但并没有鲜明强调地理学、区域科学有关区域的理论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科学规范意义，近年来这一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反思，强调区域的同质性、系统性、独特性。也有研究者认为区域因研究者的问题而定，应该淡化区域。

区域和整体，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区域社会史相加并不等于整体社会史，也代替不了整体社会史。虽然研究者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从社会的视角理解政治，但人为的区域化分割研究形成的“盲人摸象”的局

面，对研究整体历史造成了很大障碍，尤其是近代以来“跨区域”的广泛的政治动员，从区域社会出发是难以理解的。杨念群提出“跨区域研究”的角度，在尊重已有地方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政治变迁的跨地方性逻辑的问题，以求克服“宗族”与“庙宇”在区域史研究过多运用的缺陷。[①]

与此相连，常为人所诟病的是“碎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问题的“碎化”，一是研究空间的“碎化”。研究问题的“碎化”与研究者对社会史“眼光向下”出现认识偏差有关，凡是下层的、民间的各类问题都名之曰“社会史”，甚至“下层”混同于“下贱”，一时五花八门，纷杂零乱。具体到社会史知识体系的研究问题，我们认为，“碎化”并不可怕，怕的是碎而不精，流于事项罗列，浅尝辄止。区域大小也无高下之分，忧的是没有大的学术关怀，为区域而区域。如果能够就一些小的问题，精磨细研，亦能静临深渊，摇曳生姿。如果能够真正践行多学科、整体史方法，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上下打量，或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李文海先生曾对深化区域史研究加以理论思考和总结。他指出，近 20 年来，区域史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但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广阔的拓展余地。研究区域史首先树立特色观念，要着重发现和揭示这个区域同其他区域不同的特色，其次要树立全局观念，不能就区域谈区域；第三，要有综合观念，要揭示区域内各种要素的相互联系；第四，要强调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区域研究。此外，重视文明多样化是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前提。[②]

需要强调的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和人才培养相辅相成，有得有失，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学界关注。从社会史复兴发展的三十年来看，社会史研究者可谓经历了三代更替。最初提倡中国社会史复兴的老一辈学者，一方面他们具有较深的传统史学功底，尤其是受过历史文献的阅读、收集、整理、考订等系统训练。另一方面，在辩证唯物史观影响下，他们多研究过一些“大题目”，具有立足全国的视野。学养深厚、视野开阔或许是他们从传统史学转向社会史领域后能够取得成绩的根本原因。在老一辈学者的教诲下，恢复高考制度进入大学的一代人开始进入社会史研究领域，可称为社会史研究的第二代，他们大体上还能够继承先生们的一些治学传统，或多或少也都做过“大题目”，在社会史发生区域转向之后，也能持有总体性、全局性的历史观照。薪火相继，由学生而先生，到了第二代人之后的学生辈，形势却发生了深刻变化。陈春声曾谈到，随着区域社会史的发

---

① 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

② 李文海：《深化区域史研究的一点思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

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和研究者加入其列,对于他们而言困扰上一辈学者“区域”的代表性、合法性,微观与宏观的关系等问题,已经不是新生一代研究者的顾虑。区域社会史研究要么是通史的地方版,要么是强调特性的地方性知识,严重缺失追寻历史内在脉络的学术自觉。[①] 区域社会史在深化中国社会史研究、拓展史料范围、培养研究者的实践能力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负面效应随之而来,学生在选定一个区域性题目后就专注一个较小区域,埋头地方文献搜集,区域、田野考察得到过分强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传统史料少人问津,典章制度束之高阁,资料堆砌大于问题意识,田野调查代替学术训练等令人忧虑的现象。因此,面对区域社会史研究一派繁闹的景象,需要慎重处理好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关系,否则将对未来社会史研究产生难以估测的消极影响。

三　自我反思的新社会史

步入 21 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长期实践和积累,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民生问题有了较大改善,政治、经济等各项基本制度逐步完善。与此同时,国际竞争能力不强,自主创新水平不高等问题日益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立足国情,自主创新,成为时代的召唤。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思想文化界潮流涌动,如何建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加强“软实力”是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新社会史”、“新史学”、“重归政治史”等新的潮流正是对时代和史学发展要求的回应。社会史从复兴再到区域社会史转向,经历了 20 年的繁荣发展,在研究领域、理论方法等方面成绩斐然。不过,人们越来越迫切地意识到,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品位亟需提高,理论对话能力仍然较弱,缺少具有鲜明风格和原创能力的解释框架。学界已经厌倦那种生硬套用、简单移植西方理论的研究,提倡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提高国际学术对话能力。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包括社会史在内的中国史学发展受到西方学术研究的影响,尤以现代化理论、国家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影响较彰,社会史研究“概念化”倾向日益明显。这些理论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重新建立了中

① 陈春声:《走进历史现场》,《读书》2006 年第 9 期。

国史尤其是近代史的解释框架，也改变了研究者的提问方式。来自西方的理论脱离了原有语境后，运用到中国社会史具体研究中，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效应，可谓“众声喧哗”。西方尤其以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者为著，他们善于具体经验与抽象概念的联结，提出一些概念和解释框架，如“内卷化”、“文化的权力网络”、“陌生人”等理论概念层出不穷，“理论输入”源源不断。一些具有国外学习背景或与国际学术交流较为活跃的研究者，相较而言对国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概念有客观认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采取批判的立场，试图摆脱西方理论概念的笼罩，追求本土化。对西方理论相对隔膜的中国史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运用西方理论概念有“生吞活剥”之嫌，缺乏批判和对话意识，结果沦为西方理论概念的注释。还有一些研究者不太注重理论概念，强调史料搜、铺排、考据的重要性而淡化了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提炼，“地方性知识”并没有成为经验与概念连接的桥梁，客观上造成了“史料输出”。这引发了社会史学新的危机感，并促发了自我批判和反思。

“新社会史”新在何处？从《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事件・记忆・叙述》到中华书局已出版了三卷的《新史学》辑刊所录文章，大致可以看出它的一些特点。不过，“新社会史”只是代表了一个方向，可以说带有很强的“反拨”、“纠偏”色彩，由于它没有明确的定义和内涵，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理念。

新社会史是对西方史学研究理论和概念的批判和反思，更强调本土概念的提炼和建立新的解释思路，努力提高学术对话水平。“新社会史”很难撇清和以往中国社会史的关系，并没有确切的定义，所以它不是社会史研究范式的转换，也不属于简单的分类范围的概念，它更多的是对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不满和反思，它属于与本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建构范畴，厘定与传统研究方法不同的规范性概念和解释思路更为重要。研究者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社会史之所以始终形不成系列概念化方法去应对西方中国学的挑战，在于我们缺乏有效的“知识共同体”和相互驳难氛围所导致的创造性解释能力的递进式发展趋向，并成为可操作的规范体系。[①]《空间・记忆・社会转型》这部标以“新社会史”的论文集汇集了“关中模式”、“无事件境”、“象征资本”等多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有关系，并且以其为工具分析中国历史，可以说并没有完全告别西方社会理论，甚至还有照搬硬套的痕迹，但却大多通过修正与

---

① 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见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反思的途径力图设问出个性化的“中国式问题”，并力图实现其本土化的转换，令人耳目一新。

新社会史是对史料解读的批判和反思，更偏重文本和语境的关系及其解读，积极拓展史料范围和提高解读能力。虽然研究者努力开创别具一格的“新社会史”，但在具体理解上存在一定差异。孙江认为，新社会史要以当年对抗政治叙述的精神反抗“旧”社会史的僵化模式，中国新史学的再生必须以清算自身的旧历史即放弃结构的整体史的叙述和回答后现代的挑战为起点，这才是建设中国新社会史的关键所在。中国“新社会史”要想取得发展，可能要注意三个选择取向：第一，放弃构建整体史的野心；第二，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在不把文本与产生文本的语境割裂的情况下接受后现代主义解读文本的观念和方法；第三，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当然，这不是要以狭隘的民族话语否定美国中国学，而是要求指导美国中国学的文本与产生文本的现实语境结合起来放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审视。[①] 作为迈向新社会的尝试，长期被社会史排除在外的政治、事件史，在新的阅读方法下，政治史与社会史有效地结合起来；记忆之“场”、真实与虚拟的祖先、地方感等得以构建；疾病、卫生与近代秩序也成为新社会史关注的话题。

新社会史是对中国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的批判和反思，试图打破研究模式的单一化倾向，不断开辟新领域，呼唤多元化的、不同风格的社会史“学派”。新社会史最初试图打破传统整体式的研究架构笼罩，寻求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区域社会史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然而随着区域社会史的发展和借鉴人类学田野方法的广泛利用，微观、地方、区域、田野、自下而上相对于宏观、国家、整体、文献、自上而下具有逻辑的优先性。受其影响，区域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两种令人担忧的倾向：其一，研究模式的单一化。宗族、庙宇、市场、民间社会组织等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普遍利用的分析工具，在看到区域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细腻精深的同时，区域社会史研究模式的单一化、类同化趋势日益严重。其二，研究问题的分散化。局限区域，自言自语，或掌握一手民间文献，或研究一个区域性问题，在史料、方法、学术关怀等方面越来越难以形成共同讨论的话题，相互驳难的学术氛围更难形成。事实上，某一区域社会史的解释框架并不一定适用到其他区域。如何从区域出发，在旧有的理论概念

---

① 孙江：《阅读沉默：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

和分析框架之外，建立多元化的研究的解释则显得非常迫切。

新社会史还体现在新领域的开拓，成绩较彰的有医疗社会史、环境史等。相对于国外、港台地区，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以往的疾病医疗研究基本属于医学范畴。人类应对疾病的医疗观念和实践也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进而广泛具体地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藉此可以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从社会史角度切入这一过去忽略的领域，从而别开生面。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等，曹树基、李玉尚等人的研究也影响较大。

环境史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它与环境保护主义有密切关联。后来环境史逐渐淡化了其环境保护的价值判断和批判色彩，逐渐与社会史靠拢。环境史研究自然环境和社会相互关系的历史，过去忽略的自然环境成为历史演剧中的角色，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作为一种史学理论，世界史研究者得风气之先，在译介环境史论著和提倡环境史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高国荣、包茂宏、梅雪芹等人在国外环境史译介方面做了一定工作，但他们并没有结合中国实际开展环境史个案研究。2005 年 8 月，“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标志着环境史的旗帜已经在史学界树立起来，不同学科的学者济济一堂，讨论中国环境史的理论、方法、研究领域等问题，会议成果体现在王利华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目前，环境史的研究群体从大的方面来看，包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群体，从史学领域来讲集结了农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学、世界史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研究成果还较缺乏。行龙的《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 2007 年版）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 20 年来探索前行的一个缩影，也是社会史研究走向本土化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其中，“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史”的实证性研究，体现了他从环境的视角理解社会近十年的学术追求。[①] 王建革新著《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三联书店 2009 年版），有评价认为，该书以满铁乡村调查资料为基础，收集大量方志材料，进行实地考察，使华北平原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社会诸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

① 胡英泽、郝平：《如何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史？》，《中华读书报》2008 年 6 月 4 日。

的水平。

新社会史是对历史研究传统资源的重新审视，政治史、革命史与社会史的融铸有利于开拓史学研究的新局面。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史（或曰革命史）与社会史相互关系的历史。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讨论中，社会史研究就是与社会性质、革命对象等问题紧密联系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革命史排除了社会史取向占据主导地位。颇可玩味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复兴，革命史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又遭受了遗弃的命运，在"社会史就是除过政治史的历史"的旗帜下，政治史原有的支配地位迅速下跌。20世纪90年代，政治史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虽然得到一定提倡，但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研究理念中，下与内毕竟是主要的，上与外不免沦为次要性因素，政治是作为理解地方而具有合理性的。从区域社会史从地方路径来理解国家政治的渗透过程，这对认识国家制度在地方具体的实践机制不无益处，但是这种碎化了的政治史却很难回答近代以来超地区的政治是如何的。

社会史的突破和政治史的复兴其实都面临着困境，重归政治史则提供了某种可能性。杨念群强调，一方面政治史要从社会史的研究中汲取灵感，另一方面社会史要加强政治史取向的意识，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识，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系列社会实践、表象和仪式进行再研究，关注近代以来广泛而频繁的社会动员。[①]

我们认为，重提政治史，并不是要回到那种传统的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史，而恰恰是一种与社会史沟通的超越传统政治史的"新政治史"。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如何实现政治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如何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政治史。政治史与社会史并不相互排斥，社会史可以丰富政治史的内容，政治史可以凸显社会史的意义。社会史的重要特征就是注重多学科的交融，"长时段"的观念，总体史的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甚至田野调查的方法等都可以很好地运用到政治史或政治领域的研究中去。

在对新社会史的探索过程中，提倡者深感"新社会史"的理念远不能涵盖对"历史学"的整体思考，遂又标举"新史学"的旗帜。"新史学"在标榜问题意识重要性的同时，强调解读史料过程中磨砺对历史的感觉和想象力，并使其起到凸显

①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问题意识的作用；面对历史书写普遍存在的枯燥乏味现象，推崇行文叙事的流畅和运思铺陈的别出机杼；在提倡“跨学科”方法的前提下，反对学科专门化名义下对历史的规训和裁割。在西方史学研究领域，较早就注意图像资料的运用，即使如此，“左图右史”，《新史学》第一卷这种运用各类大量的图像资料的研究，还是让人眼前一亮。[1]《新史学》第二卷以“概念、文本、方法”为主题，探讨了概念史、社会史的叙事策略，指出概念史的主要工作是对文本的构成和语言进行诠释，社会史/新社会史的叙事策略则主要将文本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用以考察其背后的情境。[2]《新史学》第三卷，则以新文化史为主题，针对国内文化史冷清与西方新文化史兴起的映照，反映了自觉推进和创新研究中国文化史的追求。[3]

四　中国社会史的展望

三十而思，回顾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史破茧而出，以反叛者的姿态高呼“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中国史学的花园里一时生机勃勃，春意盎然。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再至新社会史，虽然成绩与问题共存，但社会史从来就没有裹足不前，停止过探索与反思的步伐，眼光向下，关注民众，贴近生活，多元开放，表现着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中国史学最活跃的领域。我们相信也可以预见，求新求变的中国社会史，在以下几方面会取得发展。

首先，随着社会史的发展，一些约定俗成的认识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或者说重新讨论，社会史的若干理论探讨将会走向深入。例如，社会史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其他一些史学方向，选取社会的视角，是否为社会史？“眼光向下”是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精英的社会生活，是否为社会史？在史料运用上，所谓“帝王将相家谱”的二十四史，是否就难以作为社会史的史料？因此，社会史的学科边界会伴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拓展。

其次，随着社会史的发展，社会史研究史料的挖掘还有很大空间。有研究者指出，社会史研究没有现成的史料可以利用，要靠研究者自己一点一滴地收集，这是个苦功夫。研究社会史尤其是近代社会史，大量的报纸、杂志、档案、日记、

---

① 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一卷），中华书局，2007年。

② 孙江主编：《新史学》（第二卷），中华书局，2008年。

③ 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三卷），中华书局，2009年。

调查报告和其他各种记载，给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但利用者还是不多。[①] 从近年来的社会史实践来看，碑刻、家谱、地册、契约、集体化时代的档案等史料的搜集的类型、范围还有很大空间。

第三，随着社会史的发展，社会史研究的一些新领域会不断拓展、深化。

其一是环境史（有人称之为生态社会史），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强调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探讨环境因素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让长期受到忽视的自然环境不再是历史的"背景"、"幕布"，而是登上历史舞台的"演员"，从环境视角出发，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会更加深刻。目前，环境史研究已经得到提倡和响应，相信，这一研究领域会成为一个新的方向。

其二是医疗社会史，关注人的身体与生命，关注医疗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所取成果引人瞩目。这一取向充满了对"人"的关怀，也体现了历史研究的真谛所在。医疗社会史在理论体系的建构、研究领域的确定等方面需要着力之处尚多，因而会成为一个值得期待的方向，

其三是城市社会史研究，长期以来，城市社会史相对于乡村社会史要薄弱很多，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所决定的。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是未来的趋势，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呼唤城市社会史研究。城市社会史会摆脱单纯的城市史研究，而衍生出新的研究课题，形成乡村社会史与城市社会史并驾齐驱的格局。

其四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早在社会史复兴之初，有学者呼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不过，从学界所取成果来看，实属有限。[②] 近来，又有学者呼吁，鉴于当代社会史是中国社会通史发展链条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无论从中国通史的一个断代史的角度审视，还是从中国正在经历并将长期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史的角度审视，当代社会史都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领域。[③] 近年来我们提倡开展"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搜集到数以千万计的有关集体化时代山西乡村社会的基层档案资料，多为村一级原始档案。对于这一时期的过往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学、人类学，在宏观历史背景的观照下，我们已经开始迈出了专题性研究与个案性研究相结合的探索性步伐，可谓与上述呼吁同声相和，路途艰难，前景广阔。

---

① 闵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② 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③ 田居俭：《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

三十而立，回顾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它顺应时代，破茧而出，学科复兴，高潮迭起。它自我反思，多元开放，逐步成熟，生机勃勃。展望中国社会史的未来，我们相信，中国社会史会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强的问题意识，扎实稳健地发展前行，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无穷魅力和美好前景。

山西临汾龙祠水利碑刻辑录

周　亚　整理点校

龙祠，全称龙子祠，因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西南15公里姑射山下的龙子祠泉而得名。该泉以散泉形式溢出地表，为全国最大的蜂窝泉，多年平均流量为5.07立方米/秒，最大年平均流量为8.39立方米/秒（1965年）。泉源以东200米处，有为供奉水神而建的龙子祠，是泉域重要宗教祭祀场所。在传统时代，这里既是官府和民间的雩祭场所，也是泉域水利组织议事之地。龙子祠"毓灵于晋，创建于唐"，起初仅有小庙三间。经宋、金、元三代扩建，祠庙规模不断拓展，明代庙制基本定型。中轴线自南而北为云津桥、清音亭、山门、二门、献殿、龙王殿、龙母殿；东西配殿、侧殿有斋厅、风师殿、雷师殿、山灵殿、河伯殿、财神殿、菜瓜神殿、厨库等；龙王殿和龙母殿是最重要的建筑。龙祠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保存有时间序列完整的水利碑石，记录了当地民众围绕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形成的水利规则、水利组织、水神祭祀、水事纠纷等方面的内容。自1940年代起，龙祠碑刻即得到学界的重视和研究。

1940年底到1941年初，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等日本学者曾对山西公路、铁路沿线主要古迹进行了考察，龙祠亦在其列。他们不仅对祠庙建筑做了拍摄、测绘，而且对祠内碑刻做了初步统计。据他们记载，当时共发现碑刻16通，其中金碑1通，元碑8通，明碑4通，清碑11通，民国碑2通。[①]

此后至20、21世纪之交，山西师范大学民俗学教授段友文先生以考察历史时期的龙祠水利习俗为目标，对当时龙祠所存碑刻再次做了调查和整理，发现并利用祠内10通碑刻加以研究，其中元碑3通，明碑2通，清碑5通。[②]

2003—2004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第二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

① 参见〔日〕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著，孙安邦、李广洁、谢鸿喜译，辛德勇校订：《山西古迹志》，第97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② 参见段友文：《平水神祠碑刻及其水利习俗考述》，《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

修班以考察山西南部水利系统为目的，对临汾龙祠进行了集体考察。不仅发现为数颇丰的集体化时代龙祠水利档案，而且利用龙祠水利碑刻做了历史人类学式的研究。2006年底，该研修班学员许赤瑜、郝平等分别在《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42、43期发表资料整理和专题论文，许赤瑜还以《水利制度视野下的乡村社会——以山西龙子祠泉流域为个案》为题完成硕士学位论文。[①] 郝平从龙祠水利开发、水利管理、水案与乡村社会等方面对龙祠泉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梳理，并公布了他们抄录的4通龙祠水利碑。[②] 据统计，郝平文中涉及的龙子祠碑刻数目为10余通。[③] 许文则公布了5通龙祠水利碑文。[④]

自2007年始，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周亚以龙祠泉域社会为研究对象，先后五次在龙祠泉域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适逢当地宗教界人士大规模翻修庙宇，在原有的16通碑刻基础上，新发现刚出土的龙祠水利碑刻22通。与方志、龙祠水册中的水利碑刻相互对照后，现存龙祠水利碑刻总数已达到38通。这些新发现的水利碑刻对于时下正热烈开展的水利社会史研究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学术意义。

龙祠水利碑文整理

一　金　代

1. 大定十一年《□□康泽王庙记碑》

□□康泽王庙记碑

承奉郎行平阳府临汾县令飞骑尉赐绯鱼袋黄　仲庭书丹并题额

盖闻润物莫如水，所以泒江演河，而其发必有源。行天莫如龙，所以兴云致

① 北京师范大学2006届硕士学位论文。

② 参见郝平、张俊峰：《龙祠水案与地方社会》，《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006年第43期。

③ 同上。该文对其中的四通碑文进行了整理。

④ 参见许赤瑜：《山西临汾龙子祠泉水利资料》，《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006年第42期。

雨，而其职各有处。唯晋平水源自平山，亦曰壶口山，壶口皆姑射别名。郦元《水经》云："平水出平阳西壶口山，即《书》所谓'壶口治梁及岐'，其山多铁。吕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东南二百里曰平山，水潜出其下曰平水'。"州《图经》又曰："晋水其本初，乱泉如蜂房蚁穴，觱沸于浅沙平麓之间，未数十步，忽已惊湍怒涛，盈科涨溢；南北溉田数千顷，动碾硙一百余所，东合汾流，入荣光以达于海。散泽浸淫，汇为湖泊，州人因水名曰平湖，粳稻菱芡，晋人取足。"其事见于宋名士谢景初记，宋敏求书。泉之旁有旧祠，世祀神龙，为此水之主。耆耋相传，刘元海僭据时，重筑陶唐金城，昼作夜坏，募能城者。先有韩媪，田间见巨卵中有婴儿，收养之，时年数岁，白媪曰"我能城，可旗募取"。即化蛇引前，教媪持灰随志于后，从筑而城成，蛇入岩穴不复出。元海怪之，使穷掘其处，有泉涌出，遂资以灌溉。新旧《图经》、《寰宇记》并载其事。后因祀之曰"龙子祠"，千里之内，遇旱干致祷即应。宋熙宁八年，守臣奏请封"泽民侯"庙额曰"敏济"。崇宁五年再封"灵济公"，敕曰："凡厥祷祈，应不旋踵"。宣和元年加"康泽王"。庙有唐天佑二年、宋宝元三年、政和四年感应碑传。祀既久，官民崇敬，庙制寝广，嘉木蔽翳，清流白石，为州之胜地。村连疃接，凡断岸绝涧，别架以垂虹之桥；有采莲捕鱼，则泛以画鹢之舟。当春之时，花光柳色作红云翠霞，蒸煦远近。太守为鳌头，与州人来游，箫鼓相间，车马相望，于山水清晖之际，殊不知浣花曲江之美，较此孰多。兵火荡尽将四十余载，民思所以兴起而未有唱之者。江陵黄公来宰临汾，理成化洽，实古循良之吏。始之以精勉济繁治剧，绝丝棼之乱，盘根错节，迎刃而解。申文以劝诲，田畴无不辟，树艺无不遍，浇顽无不革，忠厚无不好。终之以宽爱，家知慕而倾心，人知报而效力。昔子路治蒲，夫子称其三善。今我黄公克有记焉，故能不加敛，率无事，鞭扑一新。县署增广，后圃为堂为亭，使来者改观。创宣圣祠堂，百里瞻咏，知暇日而善之方。大修陶唐祠，旧国旧都，畅遗风而谨常祀。又且审民心，欲成就龙子祠而为之唱焉。虽因即旧址而颓垣弊宇，唯正殿及门屋仅存，略无完处，皆重易而起之。创现殿以待祷祈，设斋听以肃祭祀，又置风师、雷师、山灵、河伯之殿。庇二碑以亭，前凿养鱼池，甃以砖石，通洩泉流。长廊周步几二百间。至于厨库，靡不备具。庙门仍旧曰"敏济"，中辟三门，曰"善王政殿"，曰"康泽"，后设龙母殿，以事韩媪，承神之意也。万口欢奋，筑锸四来，愿受公成规。又得邑丞耶律公仙尉、郭公汾阳王之后赞谋咨画，以济厥事。崇墉圪然，宣樟曲然。碑庑左右，绳直而洞深；檐楹上下，翚飞而高啄。两楹足以容钟鼎之鸣，重门足以导旌旗之列。增葺溪上旧亭曰"清音"，取《选》诗

“山水有清音”之意。然后往年胜览，恍到日前。余其见临汾之民乐公善政，与此山此水为无穷。乃合众之愿以志于石，仍作迎神送神之曲曰：

神之来兮风萧萧，不破块兮不鸣条。滋多稼兮满平皋，享血祀兮闻欢谣。

神之去兮日光沉，岩穴暝兮烟云深。庙门阖兮来栖禽，空山水兮遗清音。

承信校尉行临汾县□飞骑尉耶律　同阿古□八 宣武将军行临汾县尉□□□□□□□□□□□

按：此碑存于龙子祠，下部残缺，所缺文字系以明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四之《康泽王庙碑》和乾隆《临汾县志》卷十二之《康泽王庙碑记》相校补全。从内容看，三个版本几乎相同，但碑名相左，残碑有书丹者及立碑者姓名，撰文者不可视；而通志中却只见撰文者。另，康熙二十二年《龙祠下官河志》亦录有此碑文，题曰“修增建庙庑碑文”，文后时间落款为“旹元大定十一年岁次辛卯秋九月立树”。综合来看，残碑当是碑文之原碑，碑文为金人毛麾所撰，黄仲庭书丹；“承信校尉行临汾县□飞骑尉耶律同阿古□八”等人立石。只惜此最早碑刻，如今又不知去向。

二　元　代

2. 至元二十三年《增修康泽王庙碑》

增修康泽王庙碑

平阳路府学教授张著撰

临汾县尹岳世安篆

擒昌张庭秀书

石局提领大平李泰　里人尚□刊

天下名泉不一，然若晋于太原，济于覃怀，涌金于苏门，玉泉于燕山，趵突于济南者，亦叵多得。是盖利周一方，一方故宇其神而见称于人。维平水于诸水实长雄，况平阳川狭人庶，奉神为尤谨。神既食兹土，所祷辄应，由侯陟公，由公陟王，皆宋之日锡爵，答灵贶也。侯曰“泽民”，公曰“灵济”，王今曰“康泽”。庙在治城西三十里，负山临水。水所溉，东濒汾，西并姑射，甚广。其墟落绵绎，风烟

浩渺，如江天湖景堕于目中，昔人称河东胜地，信矣哉。每春季月，农功方始，阖境杂沓迎休击羊豕，伐鼓啸籥，节迎享送为乐。故四方香火者莫不期一到，游观者莫不为一日留。按旧刻，金大定辛卯，国初丁酉，岁皆尝鸠，轮奂之功。至元乙酉夏，临汾尹岳君世安以雨故来谢，既循视以周，且有葺完意。他日语诸同僚，同僚喜白诸府，府侯耶律公刚以为宜。曰："乘农隙可举"。初，水源甃石而池，池距庙里余，甚荒。乃构殿其北，额曰"灵源"，如翚斯飞，如牙斯啄，以肃夫慢无惮者。雷风二师、河伯、山灵诸旁祠至是皆圮不支。故制混，两庑庳窄，乃因旧易新，崇足以配。至于岁月所易，风雨所蚀，黴湿所积，残败剥裂然者皆缮焉一新。费出群愿，力以叙进。渠有统诸长者实董其役，君时一过省视，由其年冬十月逮明年秋七月，内外告毕工。土木雄屹，丹碧晃灿，其沉沉郁郁，巍巍堂堂，云烟草木，旁蓊薆而葱蒨，亦改容动色。君曰："可以妥神棲矣！"是岁，麻麦霈若瑞异，耋艾交贺，以为神喜所致，皆归功岳尹。遂相与谋刻石，且介张君思诚来请文。予谓载在祀典，而山川实吾境守土者，奉其神礼亦宜。况有惠泽于斯民耶？然或委之冥冥莫问。

岳尹，京兆人，其为县，棼纷剔垢，庭无留讼，野无废田，公无废事。今又为是举，治民事神，其达矣。夫固可纪其迹且繫以诗，其辞曰：

维河东野瘠匪腴，其浸曰汾日夜徂。乐哉此土丰田庐，神有攸宇西山隅。神其来思雷先驱，风雨冥晦穷朝晡。神其去思天湛虚，山青水碧林风呼。去邪来邪人所需，绿云万顷胡可枯。东州西郡劳舞雩，我歌有年无岁无。萦云藻栋文欂栌，民知所谢营其居。向焉缺朽今焕都，凝烟不动人敢趋。问何人斯倡厥初，邑有贤宰公之余。际天所覆皆皇图，为时徼福岂一区，千秋万古神我娱。

庙官段顺　段瑞　段出　段胡　李大成

至元二十三年岁次丙戌八月　日　监修官王进　李著立石

提控案牍兼照磨宋嗣昌

将仕佐郎平阳路总管府知事张汝翼

从仕郎平阳路总管府经历古□

承德郎平阳路总管府判官张居镐

奉议大夫平阳路总管府治中沙的

中顺大夫同知平阳路总管府事主钧

中奉大夫平阳路总管兼府尹兼管本路诸军奥鲁总官阿合脱囚

太中大夫平阳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管本路诸军奥鲁总管府达鲁花赤兼管内农事塔龙丁

按：此碑现存龙子祠山门殿内。碑文又见于明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四《集文》等古籍中，但文字多有错漏，且撰文、镌刻时间及文后落款信息往往为古籍所忽略。故，从校勘学的角度而言，原碑确可补古籍中所载碑文之不足。

3. 元贞二年《重修康泽王庙碑》

前绛州儒学教授曹輗撰　临汾县儒学教谕王凤翼

奉议大夫前签河东山西道□政廉访司事杜思问

平水神"康泽王"有爵，封自宋，而庙食甚古。维其泽能长地财，资民生也。历代崇敬，缮完屡新，日以滋侈。国初岁丁酉，亦尝葺新之。尔后"灵源"有殿，"清音"有亭，风雷诸神各配享有祠。虽修护起废相继，而庙寝门庑之大旷，六十年不治，罅漏圮缺，殆不足以奉神祀，官守土者有弗安焉。至元癸巳，忠翊君肖涅来治临汾，以庙在邑境，慨然有营葺意。弟到官之初，倥偬未遑。明年四月，圣天子嗣位，诏所在长吏致祭山川而修其祠，君辄同其尹尉君茂白诸府，以命日蒇事。既而今本路达鲁花赤嘉议公沙不丁、总管嘉谢公赤老温下车复假之力，而俾终其役。水之源酾渠十二，以导其流。渠有长，既支分脉散而沟洫之。沟有老，以上下相统，平繇行水为灌溉节。又其隙则或激焉而为碾、为磨，潴焉而以蒲、以鱼。凡所利及，各有主者。自临汾入邻邑，余润之迨于襄陵者犹三之一。庙之工费亦以是叙。仍推揔众渠之治者二人，曰徐忠、崔和，使督视而课其章程焉。君与尉君间诣捡省，以赏罚操纵之。于是茨甓涂塈，一革其旧，而朽败以撤，漫漶以洁，以阶陛蹂践易毁裂，砻石扣砌，取固崖礦，周内外截如也。规制不渝而壮丽有加，岚舒飙回，歘欻晻暧，真神所游息矣。自事始迄讫功，适期月。既神有宁宇，民得事神而安享其利。来谒文将镵诸石，曰："尚无忘我邑僚之功。"

按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民所取材用者，固在祀典。河东硗陋多旱，而临汾尤甚。中田岁收亩才三四斗，或雨旸少愆，则薄不偿种。力农者寒耕暑耘，捽出粑土，胝胼焉，暴露焉，勤动终岁，而父母妻子饱糠覈不厌，矧租赋一切是取。故其俗勤俭，民多艰苦致窜徙，吏或以逋负被谴。唯是水所浸则瘠化而腴获常十五其倍，居其地者用卒岁，无凶歉忧。且数百里内遇旱暵，祷辄应，是灌溉所不及，神亦有以庇之也。故一方之人，居室衣食不恤，而唯事神者，恐或阙。二君知民瘼，悉民情，煦焉抚育之余，体上意以民迎休，非病之也，书之为宜。

若夫时和岁丰，官事暇，民用足，张乐具酒牢，荅神贶，而享其胙；车骑骈集，士女杂遝，相与乐饮于“灵源”、“清音”间，其山川游览，悦心快目，又有足诧者。然营葺之意，初不是在。故略诗曰：

平山崒垒，灵源是伏。沃彼中野，爰自其麓。高邛汙邪，可稻可麻。一溉之饶，穰穰满家。旱魃为厉，燎原以炽。遗秉滞穗，此焉丰岁。饥民嗷嗷，流捐忧劳。以饱以饮，此焉乐郊。孰民与利，繄神之惠。宜其报神，日接月继。巍巍神宫，是显是崇。神之享之，与国无穷。

元贞二年岁次丙申五月　日　都渠长徐忠　傅天祐监修　崔和等立石　徐顺刊

碑阴

上官河七分　渠长　南刘北刁义　西宜杨和　界峪刘天翼　沟头　景义　贾德　任辉　王珍　徐三　王鼎　周英　□和　神霄宫沟主　苏用　王法□　史秀　乔莲历　李进张德　徐进　乔通　李贞　孙闰　孙坚　王信　段和

下官河五分　渠长　□□□□□　□□□□　沟头　韩师　张海　王□臣　杨德　贾进　乔茂　乔通　孟善庆　尉一　翟上　李仲成　王和　海师　关庆　陈颂　张用和　堰子　张仲禄

北磨河五分　渠长　下当王岳　金店周诚　前界　下当孙显　兰村赵俊臣　五汲乔惠　金店张进　沟头　王安　孙成　杨荣　天圣宫　郭忠　李安　续福　宋伟　贾海　□□　王恩　前界　郭美　禾宁　吉信　郝闰　明师　田玉　堰子　杨进　李用　王济

上中河二分半　渠长　席坊张唐佐　小榆田子亨　沟头　李信　骆忠　单祯　范鼎　郭信　范和　刘闰　张思礼　卫和　堰子　靳用

南横渠六分　渠长　西杜崔和　双浮丁旭　沟头　□正　张虑温　崔海　李一　芦兴　崔德　王珍　□□　程和　贾弼　许兴　崔和　韩直　王正　杨忠　崔□　田信　张直　张太

南磨河四分　渠长　贾册资师　崔村段信　沟头　杜显　高四　杨全　高弼　苏安　堰子　王海

中渠河三分　渠长　东靳王道进　东紫瀾成　沟头　王德　芦秀　英师　何师　梁玉　李顺　梁直　张□　赵春　张和

高石河二分半　渠长　北陈常渊　下寺于善渊　沟头　邓二　于□诏　李义

王忠　张义　侯成　崔大　杨珪　李□　景信　李玉　柴木　柴林

李郭渠二分　渠长　郭村王安　见界孙义　李村高义　许德用

晋掌渠一分半　渠长　晋掌古义　北杜屈海　沟头　王信

庙后渠一分　渠长　下当亢泽　席坊骆珍　沟头　荆顺　段瑞　卫澄　□□

郭天瑞　乔松　董珍　高元　李元　泰南　张一　张用　贾志珍　高世安　裴渥　王直　堰子　梁二

东靳渠半分　渠长　前界段彬　禄阱李和　吴四

上官河前界渠长　王义　宋福　秦良弼　吴义　刁鹗　亢润　李思明　亢炳

都堰子　乔进　沟头　杨八老　刘一　杨定　观庄　闫玉　李官人　李建文　卫提控　刘伟　卫珪　段慰　张□□　韩顺　张五　刁升　张荣　刁副使　孟春　孟通　温院主　尉信　尉唐臣

都渠长　徐忠　景琛　傅天祐　芦炳

南横渠前界渠长　张正　张实　羽客侯志伸背书　素菴画工席翼善男　席谦

席福　渠司　贾弼

下官河前界渠长　靳卞　姚社　海师　□全　张思

庙官　保真崇德大师前平阳路道判神霄宫提点刘善时　提领王得祥　知宫王□览

友云大师神霄宫副提点郭天一　崇真大师　前解州道正神霄宫提举张善能

临汾县司吏　徐肃　郭义

都渠司　张权正

庙官　段郁　段秀　段高 小榆段岊　段璋　段美　段玉　段顺　段政　段直

神霄宫□□段念一

画工　李灿　席□　侯山　□□。

按：此碑现存于龙子祠，碑文亦见于明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四《集文》等古籍，但古籍中缺碑阴内容及相关首尾信息。

4. 至正九年《龙子祠祈雨有应记》

龙子祠祈雨有应记

晋宁路儒学教授邢台张昭撰

奉直大夫晋宁路吉州知州燕南王士元书

承奉晋宁路总管府经历夷山李惟美篆

龙神祠距晋宁路西南一舍许，在姑射山麓，有泉出其下，方流圆折，萦纡百里，溉田余万顷。神实主之，民资其利。岁时修祀惟谨。神之灵，有祷辄应。国朝加封曰普应康泽王。故事，每岁季春，守土者祀于祠。

至正戊子夏，朝廷以资善大夫同知行宣政院事相葛实理公来监是藩。先是，岁尝不稔，公至有秋。今年春，自正月不雨至于三月。公以为忧，用旧典，有事于祠。先期命文庙修告文致祷。及期，公率僚佐谨斋沐诰，旦至祠下，牲腯酒洌，恳恳竭诚，礼严乐和，人神胥悦。是时天朗气清，四无云翳，举酒享胙，比澈俎而甘澍沛然，弥旬方止。沾濡霡霂，万物遂生。于是耕耕者在野，行者歌途。识者曰雨之赐，神之应，公之为也。有司砻石将纪其事，以文见谒。予惟卓茂为密令，蝗不入境。宋均守九江，虎北渡河。江陵之返，风复火者，刘昆也。渔阳之麦，秀雨歧者，张堪也。感应之理，昭昭矣。晋宁为侯服重镇，控制郡县六十，官必择人。公尝三拜御史，四为宪长，参赞中书，亚中执法，扬历中外有年矣。僚佐皆尝驰声省部，出入阙廷，相与为治，欢然一堂之上。民安物阜，政平讼理，至诚所感，又何古人让哉！噫，天人一理也，幽明一致也，人事感于下，天休应于上。和气致祥，戾气致异，理之必然。闾阎之士，一念之诚，尚能召祥致瑞，况千里方面之寄乎！诸公之诚，神灵之惠，不可不记也，于是乎书。

公字世荣，大都人。相葛实理，名也。亚尹大都忽思剌沙清卿，别驾朔廷阿实铁穆尔、节推大都杨元善卿、参谋夷山李惟善伯元、知事太原李仲渊文灏、照磨益都叚励伯温。

至正九年岁在己丑夏五之吉日谨记

按：此文见于明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四《集文》，题为《龙神祠祷雨有应记》。许赤瑜在《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43 期中亦有此碑文底稿，名为《龙子祠祈雨有应记》，但碑刻年代为至元二十六年，部分内容也与至元二十六年之《兴修上官河水利记》相重叠，且文中错漏较多，可知为时人疏忽所致。此处以明成化《山西通志》版碑文为底稿，借鉴《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43 期中之碑题与落款部分，更显完善。

5．至正九年《重修普应康泽王庙庑记》

碑额：修康泽王庙记

重修普应康泽王庙庑记

易首以龙为乾卦之象。六爻发挥，曲尽其义。是则龙之有神也，宜矣。龙之为德也，大矣。其潜而在下也，或宅□窟，或跃于渊，润及乎一方；其飞而在上也，呼吸而云烟兴，吹嘘而雷雨作，泽被于万物，屈伸与大地，同流岂小补哉。晋宁壶口之阳有泉出，为溉沃民田周围六七成。其泉汹涌旁午，若神相之，故居人建庙于其上，以龙神为主而祠之，妆合诚敬之事也。若泉之沄革，庙之废兴，历绵邈皆不可稽，自唐宋而下有碑征焉。迨我皇元车书混一，肇举盛礼，大享天下山川之神，故加封神为"普应康泽王"，而其庙制愈广矣。太神之泽膏润一方。士庶咸赖其利。户丰家给，白之叟吻黄之倪，含哺而嬉，鼓腹而乐，虽不知□力之何有，然神之泽不能忘也。是以岁时箫鼓弗绝，仰答灵贶，亦可谓知报本之道者矣。岂若江淮间好淫祀者所视也。以其泉之峰沸泛滥，派为十有二渠，渠各有号，其序自北而南，惟庙后小渠为之冠，比他渠最秀，自山麓憧憧来，右则窦庑墉而入，贯穿庙庭，汇池为二，澄而可鉴，泠而可掬；池围怪木□护，人弗敢亵，池满复流、左则窦庑墉而出，溉田上下七八里。至正丙戌春，渠长下当里申恭、席坊里贾和，瞻其庙庑有腐坏者，感而相谓曰："我等受神之福不为牵矣，安忍坐视其圮而不为之葺？理耶！"遂乃捐赀鸠工复营缮焉。于是倾者扶之以朱楹，覆之以碧瓦；摧者基之以瓴?，涂之以丹?，风雨攸除焉。鼠攸去檐，绘彩一新功既毕。前平遥务提领段庸，下当里人也，偕申贾二渠长嘱文于余以记之。余让曰："若大庙貌之尊雄，山水之胜概，先儒文章形容悉矣。余小子复何言哉？"然以诸公勤劳之绩，固不可以不录，况此里密迩庙宇者，凡开阖庙门楗钥之具段氏宗族世掌焉，而他姓不得与，以庙地为其先祖所施故也。因敛衽以述其梗概云。

襄陵后学陈克敬撰 保义副尉前冀宁路平遥县酒醋提领段庸书并篆

至正九年岁在已丑秋八月吉日渠长申恭贾和立石

碑阴

庙后小渠同修庙庑□□开陈与后

下当渠长　申恭　沟头荆思义　□继祖　段柔孙

席坊渠长　贾和　沟头娄正夫　张信夫　杜天清　张小三　堰子王仲宁

录井　张明甫　乔善夫　辛家庄　高英甫

司庙主 段皋 段秀之 段信 段义 段秀实 段善夫 段和甫 段克明 段敬实
本村社长 宁和甫 段益
绘工 畅义貌
捧匠 李仲贤

6. 至正二十六年《兴修上官河水利记》

兴修上官河水利记

上官河水利之不均有年矣，其据上流者专其利，地未干而重溉者以月计之率三四次，昼溉□夜□人佚而财□，播种常及□□极□□□□□□□□□□富嚣。其住下流者渴其利，时旱暵而水□下，以岁计不过□□□□□□□□□□劳而财殚，播种□及其时，禾以槁死秕败□□□□□□□□□□□而与斗者百千人，至有致人命于死数起，大狱历□引□尹及临汾之县大夫数十代，或究其狱正于罪人，斯得或系以为荣□自□□□□□□□□□者，岂其才皆不足耶？不能均其利故也。盖利之所在，众必趋之，趋之不得则斗讼兴焉。□势之□者，□能均利以息讼者，其惟□□□□□□□□□。今户部尚书范中奉公乎，公以至正廿年庚子春二月由河中知府奉先忠襄献武玉□之命总管晋宁路事，既至之，越祷于普应康泽王祠，下礼成按行水源派为十二，而上官河出于龙祠之西之山之麓金龙池翼偶地，□为甚微，若蜂房蚁穴，随处涌出，□百余□□□祠□清音亭之北汇为大渠，清驶泛溢滔滔而逝。公□流而叹曰："晋民之宝，所以富庶之源乎。"未几，□讼水利于公者，公既察前弊复有□于公。公曰："□□□□常流之水自下而上，则上无邀决之患，若通利渠、丽泽渠是也。□源□流之水自上而下，则无走泄之虑，若□栅涧、望州□是也。诚能如此，则利均□□□讼水息矣。"公□然曰："斯言得之矣。"于是改纪上官河□□□署文□溉田之。今自下而上，令行禁止。信赏□罚民咸称便，又设四纲以维持之。曰"任人"，曰"行水"，曰"水则"，曰"陡门"。其"任人"之法，置四渠长以巡水而司赏罚，期月而□□，渠司一人以掌簿籍，堰子四人以备使令。皆以行正廉慎、勤于农事者，各□□为□□四十又五而沟之田三百亩，凡为田万三千五百□，而沟□头则取地广之家沟选二人，上下半□分掌之，头统于长，有违条约者，渠长验其多□□如□沟头行罚其不听，若不悛者则肖官刑，所罚之物贮

之以需兴造之用。□人已者倍其罚，而草□人乡人不□以示廉耻笃加□及□如律□行□□□自下而上昼夜溉田六百亩，又视渠道远近地形高下水势迅缓益以渗渠水有差，凡廿又五日十二分日之六一周，而水利均矣。其“水则”之法，于界峪□桥□□水则深□尺，则四沟并溉，以杀水势，防溃溢；又视盈缩而增损之周迎益近而民利益厚矣。其“陡门”之法，于母渠支沟各置陡门，仍旧立椿二□□□□□□□□欲其平板□其岩加印记，以防漏泄水，至则启之，溉毕则闭之，无妄洇之费，人无作堰之劳，而二用大省矣。和平悦喜，而民讼水息矣。意公□□□□□□有条如此□若□□惩以厚裕，均赋役以裕财，瘗死节以慰幽，□伟胁从以安反侧。温泉之后而□方□河上之□而晋□宁之类有不可枚举者□□□□之名，上达天聪，下兴舆颂，使民戴之如父母，□□□□则□祠□之于朱邑□□□□□□□□不□过也。虽居□者孔子适卫□其既庶□□而必以教终之盖，使民知教圳孝悌行于家，忠信著于乡，礼义廉耻之风蔼然，而□□退然而□让虽使之□□有不屑为之者矣。夫子尝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此之□□□长秦敏张全乔大用李克诚恐其久而无稽，请予文以□诸□予□嘉公为教之善而□喜四人用心之专且远也，坟乐为之书。公名国英，字彦卿，汝□上□人，承务郎小保府长史前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杨统记。

洪洞张守大书丹并题额
承务郎晋宁路总管府推官申思□□晋宁路临汾县□史常敬□晋宁路临汾县尉
承务郎晋宁路总管府推官□□□　保义副尉晋宁路临汾县□
昭信校尉晋宁路总管府判官□□忠　承事郎晋宁路临汾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　防御□□□□
征事郎晋宁路总管府判官□□□　承事郎晋宁路临汾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　□□□□□□□□
奉议大夫晋宁路总管府治中撒都□理　将仕郎晋宁路总管府提控案□兼□磨承发架□□□□□
承务郎同知晋宁路总管府事李元　□仕郎晋宁路总管府□
□大夫中书刑部尚书行晋宁路总管府事熊载　承事郎晋宁路总管府经□
□□夫中书刑部尚书行晋宁路达鲁花赤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本路诸军奥鲁劝农防御知□□事□藏 登仕□晋宁路总管府□□
大元至正廿有六年岁次丙午夏□月吉日立

碑阴

普应康泽王庙南北河渠水分如左

总计水分肆拾分

北贰拾分

上官河柒分　渠长四人已见碑文　渠司一人阴信　堰子四人郭和　王恩　刘春　王信　复定　刁旧　刁新　二老　新析　南刘　张务　卫新　卫旧　刘家　官沟　史家　崔思　段泽　李家双沟　杨八　王法　新沟　第一双沟　神霄双沟　北樊　周□　涧北　□家　冯家　泊庄　南樊　周大　徐大　徐小　乔家　李家　孙家　孙十三　刘一　杨进　观庄　青城双沟　乔家　界谷旧　界谷新

已上肆拾五沟自下而上行牌使水依此照用

陈告水利人刁钦祖　卫德　张延年　卫仪　卫德　党彬　卫礼

上中河贰分半　渠长董道顺　刘信　沟头李谦　王山　通师　柴德　郭希　王福　张简　李贤

右上官河兴夫肆佰伍拾名上中河兴夫捌拾叁名半二河各以夫数分定水口

下官河伍分　渠长尉诚　张诚　嘉昌　杨明　续荣　雒将　堰子武仲　张□　王瑞　沟头王德　尉良　赵广　刘庭　王温　韩义　游和　吴复　侯彦　单鹏　张善　陈常　董谦　刘□

北磨河伍分　渠长王□亨　党仲礼　卫温　侯思忠　堰子孙礼　张兴　沟头郭忠　李士珍　吉德义　天圣宫　郝大师　续奉先　陈定　郝义　单温　郭文道　贺希孟　梁德

庙后小渠壹分　渠长段恕　贾仲逸　沟头段德仁　安庭玉　张仁庆　王思忠　王仲宁　杜君玉　乔善夫　张复初　高德　董德

南贰拾分

南横陆分　渠长杜□祖　马温　堰子闫季卿　李恭　张仁甫　崔仲臣　史彦亨　沟头张思明　孟思义　张鹏翼　韩温义

沟头王元　张世英　孙昭甫　韩思□　贾思敬　芦子周　芦德　裴志才　闫政玉　续温甫　贾行简　霑师

南磨河肆分　渠长乔仁甫　祁鲁卿　堰子郭敏道

沟头陈君实　杜敬先　赵仁甫　翟温甫　卫克敬

中渠河叁分　渠长王复礼　乔仁甫

　　沟头蔡士　解复礼　宣师　庆师　刘信　张思甫

高石河贰分半　渠长李德仁　屈义卿

　　沟头常利宝　马思温　常从善　张敬礼　张从善　杨国英

　　沟头王敏　王思敬　王文远　贺师　段师　于益　刘才卿

李郭渠贰分　渠长王君义　张世荣

　　沟头孙善　贾和　郑仲温　王汉臣　杨彦忠　续君甫　刘宗道　尚清甫　解清甫　赵时亨　张君玉

晋掌小渠壹分半

东靳小渠半分

庙官　段和庆　段时敬　段荣孝　段德仁　段君义　段知彰

　　段君亮　段德卿　段思忠　段孝先　段国方　段敬初

　　小榆村段敬宝　段义　段继祖

庙司神霄宫住持　提点曹惠久　刘仲庸　孟仲荣　杨玄德　邓伸渊

　　上官河见界渠长周顺德　杨逊　阴直　王顺

提调监造官临汾县尹张抟霄　路吏张彧　杨锷

三　明　代

7. 嘉靖五年《平阳府重修平水泉上官河记》

赐进士及第平阳府解州判官前翰林院修撰　高陵吕楠撰　开篆关西种云汉书

平水上官河，泉出府西南三十里，平山之下。平山者，庄周所谓藐姑射山也。平水之源为金龙池，池上为龙祠，西南近条山数泉皆人平水。又东二百步为平水神祠。祠前为清音亭，东过清音之后为云津桥，而平水分流。俗所谓十二官河以溉临汾、襄陵之田者也。盖自是第一流为上官河，以至刘村夹河三十六村为田二万余亩，皆资焉。然自张家桥东过石曹涧至于赵半沟，其南支流为上中河。而居民新开饮水之处，则在其北焉。又其东为席坊桥，其北则受小石桥之平水。席坊间之山水、水多泥淤砂砾，上官河遂不复东行而南入上中河矣。于是席坊、禄井、

麻册、南小榆诸村皆受其利，而麻册洞以东二十余里无复勺水之润矣，于是上官、上中民交讼焉。太守王公曰："上中河者私也，上官河者公也。上官河博而远，上中河狭而近，不法不德则守不坚，法则民畏而讼平，德则民化而讼息，究厥病本，其在席坊桥乎。"有张滋者，善行水，遂使滋决席坊之壅，浚平水上官河之源，于是上官河滔滔东注，直抵刘村镇以复其旧。而界玉、下院、东宜、补子、塔头、段泽、马务、南刘、辛息诸村皆成陆海不圩，而稻粳茂，不雨而麻麦熟。盖虽江南湖滨不足以方其美也。而上中河之民亦分程限日均沾其泽，或有尊宾嘉客道出平阳，太守则邀谒平水神祠，坐清音亭上，瞰官河之源流，赋诗饮酒，与民同乐。歌曰："官河漾漾兮，百谷成。水无私心兮，民不争。"判官吕楠曰："王官谷瀑布泉下流为贻溪，水可灌田千亩，唐司空表圣立法，谷人以时用之，至今不废。异时太守李公义方亦作永利池、利泽渠，而赵城洪洞临汾亦甚赖焉。太守常云：'政在善俗，俗先礼让，礼让之兴在闾里，田桑鸡豚之间。'夫虞芮亦平阳属邑，昔人讼田不决，如周以平，皆惭而还置闲田焉，今犹有遗风也。于乎人孰无是心，安知他日两河之民不为贻溪永利诸渠乎？于乎上官河其永矣。"嘉靖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工兴，四月四日成。太守字公济名溱，开州人，辛未进士，前监察御史。

明嘉靖五年秋平阳府同知许其琦 通判黄钟 推官乔年　临汾知县袁准立石 县丞刘经立石

长安叶文举　上党沈铭刻

8. 嘉靖七年《张长公行水记》

张长公行水记

昔尧都平阳有洪水之儆，舜乃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于时地平而民作，又《书》曰："浚畎浍可征已。"嘉靖三年夏，王子来守是邦，岁值大旱，乃渡汾而西，将谒平水神祷焉。田有渠洐，其畎浍之迹乎？观于阡陌之间，西南其亩者，厥田滋以茂，北东望之，土燥而苗将槁焉。问之田父，田父曰："上官河塞者，于是乎四纪矣。"乃观于平山之下，平水出焉。祠其上，前为龙池，东流至于清音亭，过云津桥十二官河分焉。东出石槽涧，至于分水口，东南分渠，得水十之三，为上中河，溉辛家诸村之田焉。东北过新开口，又东北山水决其防，上官河塞焉。乃观于席坊桥之上，厥水溢于上中河，遂入于汾。曰："嗟乎，圣有遗迹，地有遗利，仁者不

为也。民有遗力，水有遗流，智者不为也。”于时，念于众将疏之。佥曰张长公其□行孚于乡，无私而好惠，盍属诸明年乙酉春二月中旬，乃属长公疏渠，自席坊西为堰，以坊山水之冲，北过禄阱桥至于小榆桥。又北夹岸而西出麻册涧北，于是乎溉麻册诸村之田。北之腾槽而东，分斗门，于是乎溉界谷（峪）诸村之田。北过西宜桥，分汧东流。又北夹西宜观东流为二汧，又北为计家沟，于是乎分溉东宜诸村之田。北为涧北沟，又北为八沟涧，东流而北西过小桥，于是乎溉段村之田。北为石桥，东流分汧，北东过卫家沟分四汧，又北过武亭桥分汧，北历五桥而分为二渠，于是乎溉刘村之田。田计二万有奇，村计三十有六，皆于上官河有赖焉。渠之广一丈二尺，深倍之，凡四十日告其成功。王子曰：“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表为山河，以戒其域，疏为川泽以导其气，区为陂塘沟洫以钟其美。今夫河水之归也，渠川之分也，田民之依而财之薮也。是故民非田弗养，田非水弗殖，民之大事在田，神之粢盛，于是乎供人之蓄庶，于是乎出国之供给，于是乎赖天下之安阜辑宁，于是乎成。凡以水无散越壅滞，田有所资也。”长公之行水也，无私则行，所无事好惠则泽溥而众服，故行无事庶乎，称智焉。泽溥庶乎，称仁焉，功四十日告成，而民争趋之，庶乎称义焉，一功成而三美具，所谓行孚于乡者，其在兹乎。乡之耆老王铭、张威率诸村之人请表其功，乃于平水祠前之西，刻石以示不忘。人皆曰长公以孝友知名，邻里乡党之贫者，长公多恤之，或病而死不能葬者，必为棺以助焉。高河之上尝总石桥之役出百金以先，尚义者斯，其素履之大者也。长公姓张氏，名滋，字宗乾，大中丞西磐先生之兄也。人故称长公云。

大明嘉靖七年岁次戊子十月初吉
赐进士中宪大夫知平阳府事前监察御史开州王溱撰
赐进士承事郎推平阳府事前工部观政临清张相篆　直
武英殿中书事德平郭谌书
赐进士文林郎临汾县事肤施董珊县丞曹州阎嵩立石
长安叶文举镌

碑阴

上官河四年渠长李子宁　刘复有　杨文□　孙鸾　第一沟沟长李文学　堰子王良　五年渠长陈胜　柴玘　高锐店头　吕禄　堰子杨复政　张光

□□ 刘□ 六年渠长杨钺 吴铭店头 黄廷玉陶家庄 蔺文美 堰子杨复政 韩漳 韩鹏

赵□店头 卢孜 新沟王有 王淮堡子 景得山

上中河四年渠长姚景龙

六年渠长张文信 单景隆 沟首张铎 许文进□□ 梁淮 张隆 宗智 李美 张太

庙后小渠五年渠长段宗 沟首王富有 乔得有 李升

六年渠长段子隆 贾子豪 沟首李复原 高泉 刘彪

下官河四年渠长刘景隆 卫得行 翟礼

六年渠长王干 王复江 张世娃 蔺世荣 维后清 堰子刘经 王世豪 沈应达

沟首张英 权隆 王世汝 王逢 钱世英 □文□

北磨河五年渠长李隆 王见 姚景 沟首姚□ 卫伯英 刘贵 单文满

六年渠长范通 陈聚 张全 芦文胜 沟首张名 张秀 范胜 王玉 杨胜 樊儿

加虎 李成 □□ 梁□

南磨河五年渠长张文政 杜景聪 沟首祁廷石

六年渠长杨得山 祁景阳 沟首马文□ 李用甫 张廷玉 许铎

南横渠六年渠长张彪 杜钺 堰子景海 □□ 沟首陈海 王周 武得恭 铎能 杜文贵 范玘 □□□ 张文秀 吉文成 段有仓 申礼

中渠河五年渠长毛仁 王怀

六年渠长王相 段迪 沟首郭汉 党全 李琴 朱成 许廷甫 王臣 王晨 许廷梁端 □□□ □凤 □□通

高石河五年渠长杨时远　郭世杰
六年渠长常琏　陈瑞　沟首芦成　赵时中　张有得　王隆

晋掌小渠五年渠长张彪
六年渠长王明　乔胜

李郭渠六年渠长张文佐　梁成

东靳渠六年渠长席文

本府管工吏　高渊　张鸾　蒲县□□
府工南科吏　崔秉彝　赵安富　□□
庙官段希文
老人杨润
石匠张儒　木匠李奉　材匠李隆□　□□□

9. 隆庆六年《院道府县分定两河水口》

院道府县分定两河水口

平阳府临汾县为势开禁口夺水杀民乞恩究正，以实边储，以除大害，以救万命事，承奉本府帖文案，照先蒙钦差兼理兵备山西等处提刑按察司分巡河东道佥吴案验，蒙巡案山西监察御史宋案验，蒙都察院山西八千二百一十号勘劄前事。仰本府官吏照依劄案内事理，即将民人周景敖等所奏一千人卷通行提吊到官查照。奏内事逐一勘究，虚心研审，务要明实。俾各输服无词有罪人犯依律议，拟具招解审应参官一并招参以凭覆究。转报本院，具奏施行，毋得违错，未便蒙此已经抄发原词行委绛州张知州、隰州齐知州拘吊周景放等所奏一千人卷到官会勘明白，词具以招，连人卷会呈本府覆审并无异。隆庆五年二月十九日招呈分巡河东道佥事刘处，转呈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饶，批该本道，呈前事，蒙批依拟周景敖等赎决发落。如照通取实收退状，缴其分水尺寸铸造铁口，并铁尺贮库，以防量验树碑衙祠，以垂永久。俱如议行详允到官案行，本府帖行，本县以将周景敖、张

文贵、任成、吕节、张文道、王得成、周尚礼、史尚富、范木、秦尚仁、周训、姚雄、杜隆等各照详允应得罪名，折纳工价追纳币赎发落。讫卷查先该绛州张知州、隰州齐知州原会议断令两河水口上官河净九尺，上中河净二尺，以后淘河兴夫，上官河四百五十名，上中河一百名。前两次铸造铁口行令销毁，照依今定尺寸照地摊铁铸造铁底、铁帮，（铁底）务令四平，不致高下；铁帮务要紧密，不许疏阔。造道府州县问官名衔字迹，仍各造铁尺一样二根，一贮府库，一贮县库，以防不时量验。各树石碑二通，一立府县衙门，一立龙祠，以垂永久。如有私开等弊，重加惩治，以杜后词，永为遵守。

钦差兼理兵备山西等处提刑按察司分巡河东道佥事刘宗岱

平阳府知府刘世昌

会勘官　绛州知州张允济

隰州知州齐仲贤

临汾县知县陈万言　徐学礼　主簿李崇信　典史靳章同立

□□□□宋仲礼　□□　□汝恩　□勉连　李芬

隆庆六年闰二月吉日

上官河渠长张洽　刑世虎　巩木　张涵

上中河渠长李腾臣　曹廷臣

督工官茹馨　乔廷玉

中直人张□□　张元□　□□□　王廷　□□□

加工石匠李秉臣李崇□

10. 万历九年《平阳府临汾县襄陵县为违断绝命事》

平阳府临汾县襄陵县为违断绝命事

万历九年十月初八日承。奉本府通判□□□文，蒙钦□□□□备分巡河东等处，□西提刑按察使宋批，该本厅呈前车，蒙批黄景冲等依拟赎完，发各余□行实攸缴蒙此案。□光蒙本道批处襄陵县□景□、临汾县李朝明，各告争水利。蒙批你府意粮厅亲勘，明的务、服二县，民心以□□词讳报。该本府通判亲诣告争

泉□，查番得元至正年间碑记，内刊载晋掌渠水一分五厘，南横渠水六分，数百年来各照渠使水，并无□兢□。于今岁秋菱，雨泽愆期，泉源渐涸，灌溉不敷。景冲等互相争告□经行令临汾襄陵二县会同□有□□照旧使水。呈蒙□□，今黄景□复行主，妄告本厅，遵依批示，亲赴渠头踏勘。得晋掌渠有泉五处流于临汾之地，其出□大视一分五厘之数，常多□横渠。有泉二十余处流于襄陵之地，冥出顾微视六分之数常少。又因晋掌渠地势高阜，非积□壅流则其流不能达。临汾南横渠地势□下，非作为陂□侧，五泉之水尽泄于南横而临汾之地，斗水不能沾矣。先年建立堤堰一道，以障五泉，俾积水以□晋掌。又于堤之中掘二口垒，以乱石渗水以滋南横。盖因地地势之高，□□水泉之多寡而调停之，损其所有余而补其于所不足，俾两利俱全而无有偏而不均之□。此良法美意之所在也。今黄景冲等要将水口乱石尽行开决，使五泉尽泄而□□示南横□竭晋掌之流在李朝明，妄将水口用灰实砌，使五泉悉壅而且流于晋掌，以塞南横之□，盖利已者不顾□。 贪得者每多无厌，经年嚣讼，□为可□，若不立为一定之规以示久远，诚恐将来之纷争无时可已。合候□示行□二县竖立碑记，□载分数□渠□正许□□乱□浮垒，临汾之民不得加以灰泥，襄陵之民不得擅行□□□，用为定例，庶事体归一而争端可息矣。问拟□景□李朝明应得罪名，具呈□详，蒙批前因枯行各县拟□会立碑记，永为遵守施行。

临汾县知县庐学礼

襄陵县知县箫大才

渠长 张宇先 □ 珊 贾得良 马行孝 屈廷月 张 威

督工官 杨 经

工房吏 杨仕孝

万历九年十二月初四日

11. 万历十四年《南横渠碑记》

碑额：南横渠碑记

平阳府襄陵县为夺水害命事。万历十四年七月初六日蒙本府知府张批处，南横渠渠长王文章、卢希孟连名告前事，蒙批□□□□□报行□下官河民刘尚礼等捏词状赴本府告批。仰临汾县查勘间报行间，又处下官河武彦章、曹世木捏称

谋杀万命事，状赴山西按察司告批，仰府速安官查报行间。刘尚礼等又捏虚词□赴分守河东道左参政刘处告批。仰临汾查报行间，本府将批□□□本县屡次关拘人犯不获，校尉陈邦明捏词赴府，长史司告启□文行府并勘，本年八月初八日蒙本府知府张，管粮通判马，理邢推官崔，因秋仲祭藐姑射山平水泉之神，□到告争水□，查照□□□刘尚礼等所执渠条界□踏勘，得下官河牛心石界外侵使南横渠水一道，日久复开。横渠泉堰即委本县知县□□同各河人民改正，仍将人卷屡发，□县遂一审得姑射山下古有坡塘清水乱泉，初年漫流遍灌，后□争讼，定立□□□四十分为率。南二十分，南横渠为首得水，□下与南磨、高石、中渠、李郭、东靳各河分使，浇灌临汾、襄陵民田。北二十分，上官河为首得水，与北磨、下官、上中河分使，俱浇临汾民田，各有分定泉眼界至，惟下官河□凹□□□□□□□□北磨河迤下，南至牛心石为界，迤下东南斜长一十二步与南横渠东北河边相邻。节年下官河□□□牛心石□□南横渠岸陆□侵毁牛心石存照。万历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夜至二更，下官河泊段村沟头赵大经□□有□□南横渠上节禁口盗开，地主李廷美等证王文章等改正。看守□告间至本月二十四日赵大经纠合渠长蔺世孝，沟首徐□朝，磨户□应科、张发良引领本河各村五百余人鸣锣、响鼓、张旗，各执棍棒，白昼强开水口。王文章等将蔺世孝等□□捉获，赵□□等□下哨棍铜锣写立拦词。杨朝汉□□供问□刘尚礼、曹世木、武□章俱□告，各杖□□。□□□□□□蔺世孝、张□□、□应科俱不应，各杖七十，招解。本府复审无异，看得龙祠泉水浇灌民田，先年□□□定泉水四界□□□□于侵夺□大径陬，因天旱，见水微细，倚恃□头纠领多人黑夜盗开禁口，及至王文章等知觉领人改正看守之间又□蔺世孝等商聚五百余人鸣金执器□□□开以致王文章下洱具告彦章、曹世木无地□□刘尚礼倚老出名□□司府放肆无忌处今既已踏勘明白相应，立石为界，□捉尚礼等前罪□呈按察司详批，如拟曹世木等各赎决余俱如照行□□□□□本县依蒙追究，纸赎并立□□各缘由缴报间蒙署临汾县事通判，马提审一干人犯相同究出，□景川□隐匿横渠□磨河伙碑与□□等一十五名各问罪名招□分寸，□详批刘尚礼等依□赎以武彦章准□赎□照行□收□各详俱，断令下官河人民侵开南横渠泉堰地界已经改正，□后查照界限泉眼使水，永为定规，强民再不得夺占盗水。日久敢有刁民□强不遵前断者，得□陈告，须至碑□。

大明国万历十四年十月　日　知县陈　典史窦　渠长上流王文章　下流卢希孟

12. 万历四十三年《阳府临汾县襄陵县两河分界碑记》

龙祠之水,以四十分为则,下官等河,北条也,剖二十分,临汾全用之。南横等河,南条也,剖二十分,临汾与襄陵兼用之,渠规尚在,沟界井然,诸无争者,不必具论。惟是下官河与南横渠壤址相接,水道相连,源头之外有枝泉三穴。其一在北,其二在南。北虽一泉,而流衍颇盛,南二泉仅足以当之。问之故老,考之册卷,两河分界处原有牛心石或又曰中心石。石既久湮乱是用长。下官人妄欲兼其三而南横人并 不让其一。喙鸣穴闻,滋蔓无已。本府会同三厅及临汾襄陵等县亲诣水滨,讲求故界,少少得其绪。始知每岁雀角之讼,初不在大,即前三泉是也。三泉无界则争,故其要在于分界。本府矢诸天日,反复指迷,恭伍求当,舆论佥协。乃画其地而两分之。据勘北一泉,原与下官河逼近,即本河旧物也。而今归之下官矣。南二泉原出南横地畔,亦即本河故有也,而今归之南横矣。剖分既明,中立石堤一道。自碑亭前分水处起,斜迤而南,至中地止,高四尺,阔三尺三寸,长一十丈,共九桩。每桩高五尺,以树不朽之疆,以止无穷之祸。本府三厅与临襄等县各称为善。招申三院,俱蒙俞允,犹恐其易败也,因议立石,表其颠末,虽然水者,千百世之利也,官兹土者,传舍也。官各为其民,民各行其私,安知今日之石不又为当年之石乎?尚须汾襄两县剖破封畛,明示三尺。自今每岁每县各报一公直渠长,同守疆界,永绝侵陵。每月朔投结到县,每季终县中报府。每岁终府申报道,杜渐防微,遵而勿失,两县正官仍于春秋二祭同赴龙祠,躬亲相视,若有作奸毁界,先犯禁令者,必重惩之。即于祠前枷示一月,从重治罪。且以其地没官,庶法行而乱止,当不至以养民者殃民矣。不至以长民者并受累于民矣。

平阳府知府高登龙　同知刘芬 通判张维纲　推官周鼎仝立 临汾知县张廷玉　襄陵知县马逢皋　勒石　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吉旦

按:民国《襄陵县志》卷二十四《艺文》所录碑文名称为“临襄两河分界说”,此处以康熙二十二年《龙祠下官河志》中所录碑文为准。

四　清　代

13. 康熙四十二年《重修龙祠碑记》

重修龙祠碑记

尝闻祭法有法，施于民则□之能择大□能□大事则祀之，又闻□梁□□□□□明□功德及□则上，而朝廷祀典攸崇□□□搆宗□□□□□□□□□□，后者固其宜也。临、襄二县水□□源□□，居民粒食，水□则知，□之□□贵□□□者□□□□龙神之祐庇□□此故□□□□□□□历年来有其□□□敢□□。概自乙亥□陡□地震，殿宇祠阁倾圮□□□□朔望，拜跪□荒地，春□□祀于□□，黄童白叟离黍同□。余简命□，兹土每逢□拜，目睹心恻，□□之南分各渠渠长□集绅衿耆□重□□祈□□□□地输财庀料。程工不日告成，塑像□装□光，建□□几，庙貌重□□□□□□□□□□宁神效灵，捍御灾患。□□农功者□第襄陵一邑已也。□□□。

赐进士出身充己卯同□□官文林郎知襄陵事加一级□东生撰文
己卯科举人署襄陵县儒学教谕事安昌张寅
岁进士襄陵县儒学训导灵中高尚志
修职郎佐襄陵县□功加十七级顶带正一品兰亭朱□鉽
襄陵县县尉关中孔明正
襄陵县儒学生员段用黼篆额
吏部候选巡检王企鲁书丹

皇清康熙四十二年岁次癸未七月庚申吉日立

南横渠渠长　王□　闫起
南磨河渠长　王□□　祁景□
中渠河渠长　□□　□金□

高石河渠长　杨振麟　□□□
李郭渠渠长　王□□　□□□
晋掌小渠渠长　胡□灵　关□□
东靳小渠渠长　席君□
庙后小渠渠长　□胜□
住持僧人　静耀

14. 康熙四十六年《重建平水龙子祠记》

重建平水龙子祠记

平水龙子祠重建,落成其乡,先生谒余述其事,求为文以记之,曰:某年月平阳旱,太守刘公檄三十四属,防民饥、修荒政。既有次第,或平水神,累著灵异祷雨倘可得。公立起,布衣草履走赤日中三十里,祷祠下甘雨、立霈风、获有年。邦人颂公,公曰:"予何力之有?是神赐也。"邦人退而谋,曰:"然则吾侪何以答神赐?祠圮於地震盍新之。"请於公,不听,曰:"御灾捍患,神之分也;坛祀神,古之制也。且百姓贫无余力,祠即圮,何新为?"再请,乃许之。公又不欲独烦百姓,助以俸钱。邦人益踊跃,材不敛而足。有鸠而集者、葺废者,构以及龙母,协电风雨之祠,罔不轮焉奂焉。工既竣,邦人曰:"向微太守之祷则神不雨,今微学士之记则祠不荣。"敢介其请余唯唯复於乡。先生曰:"圣王制祭祀,非有大功,得德於民,不在祀典。"余闻平水有神浸□灌溉之利,施及无穷,临襄两县之民既世食其德。而天灾间行,神又能以其余鼓雷霆、致风雨,起槁苗而润嘉谷,其有功德於民甚大,祀以奉之,圮则建之,按之祀典甚合。顷予以校士暇出尧都,泛汾水,望姑射之山,因观於龙子祠。壁间古碑载:"神以婴儿应刘渊募筑城,化蛇断尾而泉流。"窃怪其事不经。既出,徘徊清音亭上,忆元人毛麾作《康泽王庙碑记》,追想昔时此地花光柳色、画船游骑,仿佛曲江者,杳不可复睹以为叹。惜今余来游,去麾时以四百余年,沧桑易四海,浅沙平麓、断岸绝涧,不知其盛衰较昔何如。独龙祠尚岿然於山水清晖之际,不与昔人之风流共尽而俱亡,则以意神必有以自结於民而然者。今观於邦人之所以重建是祠也,益信。然则功德之及於民者,顾可少耶!夫民於神之功德思报之不忘如此,其於太守之功德,又当何如耶!余既复於乡,先生即录其丐文之语,而缀余言,其后授邦人铭诸石。后人览是记,於乡先生

之记述於余者，可以思太守刘公之非徒听于神，於余之复於乡先生者，可以思神与人皆当有功德之及於民也。

（作者邹士璁，见民国《临汾县志》卷五《艺文类上》）

15. 雍正五年《重修平水上官河记》

上官河泉出府西南三十里平山下，溉临襄二邑田数十万余亩。其发源衍通塞废兴之由前明太守王公秦、判官吕公楠所撰张长公行水记，修平水泉官河记，言之甚详。平阳水利之美，于斯为盛。居是乡者敬公而忘私，同心协力，修其残缺，疏其壅塞，虽万万年恒享其利，可也。乃勤惰不齐，疏导之功懈，而沙积土壅，又以塞其浚发之原举，昔时美肥之区等于石田，良可慨也。雍正四年夏之交，时雨少降，余步祷于龙子祠，见水道虽湮而渠形尚在，询之士人，始知美利可复，遂令畚插从事，泉源滚滚，应手而发，观者咤为神助，爰进庠生张射汉、吴登泰、孙翔等诏之曰："圣天子在上，动求民瘼，无虑不周，凡有益于生民者且不惜动帑以成厥事，况天地有自然之利，人力有可施之处，竟听其废而不举乎。"斯渠也，若计亩役夫，各宣乃力，未免有互相推诿之弊，而斯渠之复也难，或即面从而老弱充数，亦不免不均之弊，斯渠之复也，又难盍公举数人总理之，再举数十人分理之，按地亩之多寡为钱值之数，觅壮夫任其役，则受若值必不敢怠若事。而斯渠之复也，易如反掌矣。于是各河士庶无不踊踊，各举总理分理之人，每亩捐金一分，匝月间废者复兴，新者复创且建石堰一道，以遏山水之冲，是岁竟获丰收。今年春，总理分理之人，以其效验之捷也，民力之溥也，如上年定规，协同本年渠长，公觅壮夫疏其壅塞，修其残缺，工既竣，公议以清明上水，其河有上中河，青城河准则口仍遵旧例引灌。而上官河，分首二三，河远地广，敢不遵旧例数日灌溉一沟未免不均，今复议一十八时灌溉一沟，周而复始，众谋佥同。书其轮流经管之总理分理姓名簿来判于余，以垂永远。于以见是乡人之果能公而忘私同心协力。将见亿万年恒享其利矣。余叙其始未，未及勒石。是岁三月十五日雷鸣雨降，山水大发，走石流沙，汹勇异常，自龙子祠至席坊诸泉源，河渠冲坏数处，于是席坊以北复无勺水之润，总理分理之人仍照前规疏泉淘河，公修石槽涧、黑龙堰，各照水分而每亩出金二分，较前所费更加倍焉。然人心乐于赴功，不旬日而坏者复修，塞者复通，上官河水滔滔然北流焉，噫凡后之人享上官河水之利者，可忘厥功哉，是为记。

（作者樊钱倬，见民国《临汾县志》卷五《艺文类上》）

16. 雍正十三年《重修平水龙神庙记》

碑额:流芳百世

重修平水龙神庙记

藐姑射之山,其东有□□□觱沸混混而出引以为渠,而遍浇临襄两县之田几十余万亩,长我禾黍,不忧旱干,□□□古之平水,土人谓之金龙池者也。其上有龙□□,亦谓之龙子祠。龙子之说始于晋刘元海之时,龙以水为家,为神以主水,亦其理也。自昔相传□旱之祷,有求必应。元人碑记□宋熙宁八年封神为泽民侯,额曰“敏济”,崇宁五年加封灵济公,宣和元年加封康泽王。有唐天祐二年、宋宝元三年、政和四年感□□□□□之为灵昭□也庙旧壮丽,岁久风雨所摧,将就圮毁,前守青州刘公兴工未竟□□而去,苏州樊公因疏渠堰又略为□□亦未□,今余□雍正十有一年恭膺简命来守是郡,念三晋山灵泉流为少,苟有水利,可以资民庶,几灌溉以时,亢旸无患,因与二县长吏□□其□则□□□□□废,不称妥神,报本之义同谋,所以修复之而二县士民食求之利者翕然从之,乐输赀力。兴工于十二月,三年仲冬而庙以成□□□□年两焕然重兴非复故观矣。夫古之秩祀遍逮山川百源而八蜡之神兼及水席、水坊碹,非以云雨之泽与水泉之□皆□□□□□□□□□我□妥乎。龙神出泉山下,使两县之地皆于陆海而兴云致雨,以救高田又能偏于四境之外,固宜崇大其居,岁字丰洁矣□□□□□□□民事神之职,固乐庙貌之告成也。今夏闵雨大宪轸恤民依行令祷于百神,四月之晦随总镇冯公率文武僚属祷雨□□□□□□□足方共戴神之德。而庙貌将落成,督工、绅士、渠长求为记,故直书其事,使刻之石。夫神依于人,春秋告虔,必有福应,继自今风雨时若,□□用成,家给人足,相与含哺,皷腹以乐。圣朝太平之世而不改其勤俭之风,岂不美欤?又为作祀神之歌,以缀日后:

龙宅于水兮目阙鳞堂,新庙翼翼兮丹漆有光。泉流不竭兮滋我稻粱,亩取一种兮满家穰穰。我民报赛兮牲肥酒香,岁有□事兮引之弥长。龙出泽民兮风马云车,雷声不震兮雨则徐徐。既优既渥兮归于其居,姑山汾水兮神人与俱。坎坎击皷兮吹笙与竽,庶□居歆兮惠我农夫。

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知山西平阳府事加三级纪录三次王乔林识

中宪大夫知山西平阳府事加一级纪录之次辛廷珪
奉政大夫平阳清军总捕兼管水利车辆盐法分府加一级纪录二次李锡桓
临汾县 赵悬本
文林郎知 事加三级姚兴滇
襄陵县 彭际旸
南横渠段煌等
旹大清雍正十三年岁次乙卯仲冬谷旦立

□□□襄邑生员郭□□书
总理督工 □□□ □□□ □□□
南横渠渠长 □□□
南磨河 □□□□ 昦□□ 胡彦□ 刘□□
南磨河 □銮□ □□宽 □振邦 □文达
中渠河 玚文康
中渠河 席□□ 司□□ 席□□ 段□ 王帝宠 段成道
□□□□□□□□□□□□□□□□
勒石匠 杨林 蔺文杰

按:此碑现存龙子祠,碑名"重修平水龙神庙记",许赤瑜在《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42期中所据碑文底稿整理出之"庙貌落成"碑文系该碑文之一部,兹按原碑文抄录。

17. 乾隆十一年《重修龙祠碑记》

重修龙祠碑记 乾隆十一年岁次丙寅立

粤稽平水龙神祠由来久矣,自前朝以逮今,历代增修不可胜记。共庙形萃,龙特出,西近姑射射东邑,北连刘镇,有齐云落星之势,磅山带河之形。共清流澈湍,滚滚而出,右盘石旋,俨若虹贯,愈引弥长。溉□十万顷田,登览之际,万象森列,莫不心旷神怡,宠辱皆忘。阴阳之精,岂非天造地设,开千百造地设,开千百□观哉!每岁逢巳月望前,临襄二县士庶进香游观,比冠盖相望,儽儽如贯珠,凡

有求必应，利泽生民久矣。昭昭乎，临襄邑侯与公以旱魃为忧不忍者，乙视斯民之陷，于上年孟秋月朔三日出行，来祠祈祷雨泽；于今岁闰三月廿日仍率绅衿士庶祈祷于祀，周旋前后左右，见圣像有损坏者，即谕粉饰；侧有毁，俯首下阶，观碑观记颠仆在地。乃前日府尊县公讳，不曾建立，一时目击心伤，问□故未齐以致失悞，即刻命八河渠长捐奉相助，重为修葺，使庙貌焕然复新，丹漆如故，并前重修碑记。水之利者，众乐出资财共成嘉事。彼时，县公驾未归，邑甘霖下降，所谓诚可格天□□□□□野清流洋溢万民乐业。莅任以来，仁慈为宅，德被气外，远近咸悦。

18．乾隆十九年《重修碑》

旹乾隆甲戌年梅月念日，历考平水泽被临襄。自唐宋元明□奉龙神为主，立庙崇祀以报其本。物情成败相因，世道作述相袭。自创建而后，累代下绝，即我朝百年□数次。今值正殿梁裂椽决，后宫脊滚墙崩，以及东西廊池、大门墙壁、清音亭不无颓败，妥□不整，观者不雅。春祭时，僧人普霖会同南北河公议修理四十分，计水出资，同修正殿后宫以及清音亭，分修东西两廊，四池外墙两□□间。功程告竣，虽无雕梁刻栋，较前已改观矣。爰立石碑以垂永久不朽。是为序。

上官河总理生员孙翔撰书

上官河总理　王兴　生员阴资育　生员吴大巍　贡生尉尔玫

督工　□司秦珽　生员李缙　孟音义　生员尉三仁　杨天伟　侯世宦　陈学诗　尉良壁　吴琰　生员秦观吉　李如松　尉理　郭宽　生员张友直　高逢贞　李大祥　尉□柱　监生孟之檩　监生李月桂　史天照　李大□　尉滔　高邦贵　张巨

卫忠彦　乔□福　谢帝选　祁镛　监生王衡　王□麟　岳起振　豆自勉　徐秉仁　秦至庆　秦性　邓建基　拓英　李谕　李逢升　柏文　乔廷

渠长　三河李国栋　吉照

首河秦长□　周秀

二河李洪有　柴宗舜

青城河尉银桂　柏尚观

沟首　王拱　柴希圣　赵进才　王伸　李万方　刘文之　秦□德　周得

李天吉 曹金珠 李广 徐大中 王朝□ 王定国 王见才 张天一 彭盛年 侯璠 张□奇 贾□亮 贾金榜 周时梁 侯明海 李朋仙 柴大体 李□ 奏沛 孟养性 李洪 祁玉祥 柴闲城 杜应奎 李廷 柴自祥 邓树恩 王悉

巡水 周卜 □立 □义 焦弘信 王逢玉

下官河总理督工五渠长仝十五沟首

史文彬 吏员□□□ □直生员杜□荣 汤□严 王文□ 刘让 孟钊 曹崔 曹复荣 弋荣智 魃得富 卫永福

北磨河总理 生员伍璠 王文□,公直刘文奎 □广运 赵惟 杨廷祥

渠长 生员张因 单承绩

沟首 翟段 王尚 □世法 陈勷 卢中正

上中河总理 蔡居智 关秀 监生岂百谷 张文选 刘达 卢振常 □□吕可正 □□李毅

公直 柴仰游 关宗 孟学孔 监生李辅 闫思信 陈万良 朱棠 李明性

渠长 张伯伸 薛可禄 李□成 李□

巡水 李文祥 刘有 卢明玉 柴□

庙后小渠渠长 辛 钦

沟首 高振宗 高仰恩 高天福 赵□ 辛纪 周荣

南二十分总理李发绩

南横渠渠长 张弘□ 卢嗣祖

五陡口 侯居得 屈明芝 王心质 关明 李森

沟首 卢世通 庄礼见 杜祥春 畅学得 丁林 王文轩 王永发 吴昌生 乔登洪 张大智 张哲 白孟振 杨永公 王永发

南磨河渠长　王永思　杨宗大

沟首　杨鹿垣　李奎选　郭如林　刘正达

堰子　段君表

神首　张永贵　张大观

中渠河渠长　□永禄　郝全成　常瑄

沟首　王宗谟　解□明　赵定国　孔兴朝　梁君义　卢惠　宁文玉　杨福赐

高石河渠长　郭四通

沟首　杨芳　畅渲　杨□　郭锐　李金声　杨宁　常可成　郭大杰　常锡贵　张林止　杨长发　李柏　高长贵

李郭渠渠长　王□仁　赵立贵

沟首　王世祥　王者栋　刘学瑞　郭永福　郭应瑞　毕增福　卢君辅　段复荣　杨耀　郭振相　王定彦　乔岐

晋掌小渠渠长　侯居得　王巍生

沟首　古天寿　陈国秀　古天荣　姚君元　刘复荣　胡廷□

东靳小渠渠长　□秉贞

沟首　席端　杨国柱　席帝命

庙后小渠渠长　王国泰

沟首　宰福娃　李杰　杨业孝　屈明易　杨文奎

本庙住持僧普霖　居士李十云　石匠

19. **乾隆二十三年《重修序》**

平水回阔，平阳八景之一也，而清音亭为最，临襄浇灌实□□之。但历年头远，圣母殿脊既多倒塌，亭榭棂砌亦未备。幸县尊朱公来临此地，概窗棂之未

备，谕补葺之。宣殿其□清有志好音是怀乎，缘是集众鸠工重加修理。今已工程告成，焕然一新，行见湛思汪濊，清政与清流而并茂，而清音留遗于不□。是为序。

丙子科举人李连枝撰

上官河碑记谢豪举书

首河总理督工 生员李瑨等 渠长许□峰等

三河总理督工彭大双等渠长兰康等

青城河总理督工尉三仁等

时大清乾隆廿三年四月廿五日立

（此碑在正殿前东第一碑）

按：此碑以许赤瑜在《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43 期中之碑文底稿整理。

20. 乾隆三十年《龙子祠重修重铁禁口东石帮序》

龙子祠重修重铁禁口东石帮序 乾隆岁次乙酉闰二月初六日吉立

夫灌溉必需乎水，而水行各有其道，故经界不可以亦不正，分数不可以不明。古之人尝尽心于此，以普美利，以杜争端，功至懋矣。临邑龙子祠水利至溥玄祠四五里，许名席防村有铸造铁口、铁帮、铁底、铁帮，之南两岸俱有石条，前民奉道按之。公断遵 府县之钧谕，口要紧密，不许疏阔，底要四平，不致高下。废地亩而限以水数，上官河定口九尺，上中河定口二尺，共斟酌至公而至本也。且将分水之规口傍，铸铁牌一面，祠内立碑一甬，衙前立碑一甬，再有分水之尺，府县库内各存一根，则前人之为后人计不更深且远也乎。昔前明隆庆六年闰二月初六日，勒铭垂后，迄今二百余年。为日既久，水石相剥，其坏也，理势之必□者也。兹为水口东岸，践踏者众，石帮久已颓损，坟河合五河之人聚族公议，鸠功动众，照依旧制重新整理。兹功成告竣，首二三河仍刻石于祠内之旁，以志年月以望。后之人遇圮则修矣，公矣慎，庶美利享于矣，穷争端可以永杜也夫。

上官河总理 国李贡监生王衡撰文

平阳府孝生员张启斌书丹

上官首河总理督工生员张资育等

上官二河总理督工生员崔维城等
上官三河总理督工生员孙世千等
首二三河渠长刘振邦 孟养牲 薛缚
（此碑在殿前东侧前□□□）

按：此碑以许赤瑜在《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43期中之碑文底稿整理。

21．乾隆三十二年《龙子祠疏泉掏河重修水口渠堰序》

龙子祠疏泉掏河重修水口渠堰序 乾隆三十二年小阳之吉立

从来水之为利，固贵平，泉源之□，又贵乎河路之通，此一定之理也。故上官一河分为数口。历来旧规，每年各河公举渠长，会通绅衿士庶督工，总理于二月间起□掏挖□，事属勤劳，不过率由旧章而已。不料今岁七月二十八日，忽然天雨浩大，山水涌发，席坊村五涧水直冲上官席坊桥口□。旧有黑龙堰一道不意被水冲脱，又加泉眼之北涧水汪洋。此两处之水，不惟将泉眼壅成沙岭，并将各处水口及累路河岸□，被泥沙□立不显河迹，此亦上官河之一大变也。斯时有地之家咸蹙额□告，以谓此翻工用非同小可。幸赖本年督工协同各河渠长公议，按地起金，择日动工修理，寻迹疏掏，将各处水口并一带河路一一重新，又于泉北涧口、石堰之旁，东西用炭石填起两道石帮，以图坚固。此又创前人之所未有者也。于是工程告竣，合河之人念其勤劳，爰勒石刻铭以垂永久，庶为来兹之执事者之鼓励云尔。

上官河总理　郡痒生员张启斌撰
　　邑痒生员秦寅亮书

上官首河总理督工　监生李月桂　监生张以栻　生员高作霖　秦怀德　刁希孔　秦　钊
　　生员阴资育　典吏贺　伟　生员贺大威　张茂德　杨宗圣　王伟勋
　　生员柴万年　监生李　润　礼生王梦麟　刘　维　刘汉基　刘　绅

上官二河总理督工　生员张子宽　高福广　李天全　孟学政

崔维□ 张永言 张子考

苏 协 张朝选 雒盛年 卫众彦

上官三河总理督工 监生徐□功 监生兰攀益 祁鑢 薛清 徐唐 贡生彭云 吴六立 樊之珏 周时□ 姚君玑 吴勋 刘森 侯铭荣 仓成德

抱总兴贰义 高邦级 李万仓 郭赞 李云 吴永灿 关云明 彭大福 刘承尧 张云龙 关承先 乔尚刚 邓建功 刘成基

上官青城河总理督工 生员李 □ 礼生尉 雍 姚□□ 柏 敏 董文□ 尉天宁

尉三仁 柏□億 吉其凤 尉衍桂 尉君臣 尉木櫟

徐承显 尉宗善 谢帝□ 尉固足 乔应经 尉良幸

二 张子谷 尉善继 吴一书

上官首河渠长 刘 绘 上官青城河渠长尉 □ 乔 廷

三 李秦荣 柏封寒

住持僧人登禄

22. 乾隆五十年《告示》

特调临汾县正□□□□陞□□□加二级□□□□纪录十二次记大功□□□□□，为禁神祠以昭诚□□□□□事：照得西□平泉之旁建有龙子祠，圣水有灵，临襄沾□，春祈□□，分派两渠，至□□大修，中间则两县办庙，东则归临汾□，西□□□陵。所费□□□□□，计亩均摊，渠规森□□。今□□□郡宪□大□□□庙祈祷，见寺□□□□□□□□□□□□□□先醵金千余两，各□□正人董理□□□□□□□□□□□□□□即清音亭以及僧房道舍□□□□□□□□□□□□□□□□处上游本村固□□水利，亦□□□□□□□□□□□□□□□□昭应，旋修旋□□□又修神□□□□□□□□□□□□□持视为□□□□□□□□□□□□□□□□□□□□端漫不经心，夫□□□□□□□□□□□□□□□□□□□□□□□□□□□系既重□□□□□□□本□□□□□□□□□□□□□□□外及清音亭

□□□□□□□□□□□□□□□□□□□□□□□□□□□□□□
□□□□□□□□□□□□□□住持□□□□□□□□□□□□□□□□□□□□
□庙并□□□□□□□□□□□□□□□□□□□□□□□□□□□□
□□□□□□□□□□□□□□□□□□□□□约□□□□人□□□□□□
□□□□□□□□行□□□□□□□□□□□□□□□□□□□□□
□□样赔□□□□□□□□□□□□□□□□□□□□□□

右仰通知

乾隆五十年四月□□□

告示 □□□□□□□

23. 乾隆五十年《重修龙子祠庙左各工碑记》

重修龙子祠庙左各工碑记

平水官河泽润临襄，民食其利久矣。水之涘有龙子祠，自大殿以至清音亭，凡有工作，两邑渠长各修东西，则分任其事。兴工者使水，旧例然也。乾隆甲辰三月无雪，太守保宪虑二麦不滋，民食有缺，岁将除诣祠处祷旋，于乙巳新正二日，琼霙密布，四野咸周，竟日夜乃止。太守敬感神赐，矢愿重新爰捐廉为两邑士民倡维，时临襄渠众以公祖之诚格于神明，咸额手称庆，踊跃输赀，不数月而工成，太守援笔竹记勒诸贞珉，以垂不朽，而庙左池畔、牌坊、官房、僧舍，应临邑独修者亦次第毕举，董事诸人复以碑记为请夫神之佑，民以之敬神。太守之事神爱民颠，末俱悉前碑，兹复何容再赘？第修庙公事也，合修之庙公中之公也，分修之工公中之私也。当重葺之始士庶□举调度，曾嘱将东廊一带截出三楹改为官厅，其禅房窑顶上有楼五间，宜隔内外，易门牕，以备棲止。渠众有以踵事增华暗誂者然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议竟行。时五月，旱甚，上浣九日，太守步行三十里，楼头斋宿，余亦假馆官舍，祗候祈祷。至十二日，得雨二十，虽未深透，而求雪得雪，求雨得雨，神功叠著不止，源远流长，共分余润也。至是相誂者始谅余之补葺楼亭别有用处，非为寓目骋怀地也，渠上诸公任劳任怨，修举匪易，尚望同心绸缪，勿使瘠坠也。夫是为记。

特调临汾县正堂加二级军功加三级随带卓异加一级恩加一级又卓异加一级纪录十二次军功纪录三次记大功二次升广西象州正堂东光李早荣撰并书

教　谕卞　洐
儒学
训　导叶　楫

典史加一级邵锡基
北河二十分水利各渠廿二渠长公立
乾隆五十年岁次乙巳六月望日勒石

24. 道光八年《重修龙子祠记》

重修龙子祠记

姑射之麓有灵湫出地数弓，即成巨浸，沟分而渠络，布于临襄之交，数十村忘旱涝焉。佥曰"此龙神之赐。"以是月祈季赛，牲醴之陈无间，时兼之平郡多旱，祷雨之鼓岁口到祠，辄有感应，香烟楮火日益以盛。去冬瑞雪，今春灵雨，二麦有秋，四境如一，不止水田为独丰，而波及之民倍感焉。各口所以报神者曰"殿其敝诸是宜葺，门诸是宜饬。"后宫、前廊及清音亭连缀藻饰，未越月而晴岚金碧辉映，灵整间矣。口秋之后越有小旱，风燥尘郁，吏民皆苦之，予乃偕司马袁公、别驾王公、监汾令宣公、襄陵令周公默祷于神，而庙工适口，监工之绅耆缕述其事，以丐予文。予喜此方之民丰能俭，腴能勤，务本而敬业，能邀佑助于神也，是当记之以劝来者，口诺其请，而案牍丛集，不遑握管。今晨斋居，甫为构思，而云油雨沛，膏满四郊，枯者润，萎者起，牛驱农竟，熙熙然如有太劳之享，嗟乎，龙神所赐，岂独渠水所注，为数村之利己哉！因亟为之记，以告将来相与庆神祝于无穷云。

赐进士出身知平阳府事前京畿道监察御使翰林院编修黔南王松谨撰并书
山西平阳府总捕水利兼理车辆同知袁庆垚
山西平阳府督粮兼管如京仓通判王秉心
知平阳府临汾县事卓异侯升宣麟
知平阳府襄陵县周春阳
平阳府经历调解茅津渡县丞王玉
大清道光八年岁次戊子六月吉立

25. 道光二十三年《重修康泽王龙母神殿序》

汾水之西南有龙子祠，其中为康泽王宫，后为龙母神殿。典隆祀肆，恩普临襄，庙貌壮其巍峨，精灵通乎肸蠁。丁亥岁，太守王鹤亭先生倡修之，梓人鸠工黝人施垩，焕然一新，蔚然大备。既蒇事笞，神贶荷生成焉。自兹祷沛甘霖，驾税灵雨蒸然。暑至，忘炎景之流金，倏尔风来，拟环珮之嘎玉；亦或词客踏青，骚人携酒，剪春初之早韭，钓亭外之细鳞，水环山碧，稻供秋粳，则平水之佳景，此焉称最。邑人之获福于兹独厚矣。乃今春大风拔木，夏复淫雨连旬，前既伤于栋折，后又见其榱崩，因谋同事。共深浩叹谓修葺之宜殷，聚梓材而莫缓，踵乎前事，未敢增华，扶大厦于既倾，幸一隅之偏安。门宇壮其辉光，廊檐补其渗漏，妥神灵之得所。施丹雘而勤垣墉，介景福之无疆，出醴而降膏露，爰勒贞珉，共臚姓氏，土木兴于三旬，余曰人乐经营，钱缗费乎二百千奇。河分南北，工既竣，进庙祝而告之曰“尔其氾扫之，拂拭之，今将备酒醴，洁牲栓於以荷神庥，报神德惠，田畴而歌篝车也。”是为序。

例授征仕郎侯选直隶州州判丁酉科拔贡李绳祖撰

邑人增广生员常聚伍书

大清道光二十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即日立

碑阴

上官首二三河总理督工

生员崔景芬　庠生景爱礼　耆宾张作栋　庠生任世敬　介宾柴永坚　王长春　庠生秦鹤龄　庠生李维藩　雒昆王　监生张双文　徐咸享　卫宗尧　乔□　李士林　李文会　王尔榕　岳长清　祁沛兴　耆宾刘复杰　监生刘震　蔺延泽　介宾张溥　侯秉惠　李九思　庠生乔学修　张启英　邓永享　庠生景浚　徐佩宜　王殿招　刘廷　张纶　杨大鹏　秦万全　杨宰　渠长　李文章　刘灏　张守业

上官青城河总理督工

生员杨正谊　生员李运泰　生员吴荣泰　尉三寿　乔文昌　职员　李梓　窦长春　尉正君　张云龙　尉九寿　柏从生　尉永凝　董学诗　尉洪渍

吴耀南 张学仲 张雨龙 尉百发 乔承先 渠长 李海 董禄 霍希圣 生员吴行端 柏永顺

上中河总理督工

录阱村刘兴 监生辛元登 朱谐鸣 王廷杰 渠长张开基

西麻册监生张执元监生柴杰 耆宾张育秀 庠生刘执礼 党治邦 关开祺 渠长李茂林

小榆村介宾徐邦俊 关临兴 庠生关钦 庐先谦 渠长关学福

席坊村朱云亭 王振声 李盛宇 申炳 渠长樊子植

庙后小渠总理督工

辛春发 高恕 高岚 高峄 渠长高百荣 沟首高忠 高廷栋 高禄 辛辅汤 辛登云

赵华

下官河下册渠总理督工

监生李继宗 翟兴 曹大降 张学信 邸士贷 李德明 李大本 本渠公直张象坤 庠生张鉴 渠长陈廷选代理本渠沟首 官口沟首刘进宝

下官河桥村总理督工

监生王丰 王义 李争辉 王缙 萧智 张志恭 渠长崔大德 本渠沟首杨任达 韩家沟首关希圣

下官河东麻册渠总理督工

李植 贺成鳌 张复荣 张琮 靳炳 李河 渠长王天福 本渠沟首王德 王得禄 肖史沟首柴林茂 史家沟首庠生畅瑾 伍级沟首口口口

下官河小榆渠总理督工

关林兴 贾百贵 芦天德 贾怀玉 渠长贾汝杰 本渠沟首武云 东沟沟首庠生单扬彦

西沟沟首耿王广

下官河席坊渠总理督工

庠生樊人龙 庠生李炳焯 渠长李樟 本渠沟首张丙 录井沟首王吉 兰村沟首周麟

北磨河下当总理督工

刘福亨 公直王清泰 渠长刘汉西 公直翟钟 沟首刘兴元 李云 柏长青 苏村总理督工孙福庆 张锡 公直赵璧 杨兰 渠长王景 沟首马天龙

王义

兰村总理督工冯得仁　卫秉义　伍翰墨　伍翰章

伍级总理督工耆宾王尚本　公直李万银　樊生桂　柴永茂　增生孟锦　公直监生杜思威

卫藻荣　渠长李泽顺　渠长毕长春　沟首李泽恭　王默村沟首单学曾　东安村沟首高大吉

金殿公直李思诚　本村沟首赵梅　宁学隆　刘复兴　沟首陈全

南河总理督工卫泉礼　庠生尉秋元　武生关芳春　监生段凌云　监生雷泰复　监生张鉴　耆宾

统义　刘宏猷　常见福　吴继诚　北河住持许秀　石匠吴养成

南横渠渠长屈九达　刘阳春　堰长卫廷梁　张世贵　李正新　屈明法　贾荣第　沟首贾万德

崔文魁　畅江　孙梁　杨吉春　毕廷玉　梁复增　程文魁　梁振有 张九如　张广兴常泰来

王□　梁兴□　张廷□

南磨河渠长郭从元　杜丹梅　公直曹成星　吴世忠　霍谦　杜记孟　沟首杨连桂　从九马万福

马尚祥　侯尚礼　十甲沟首等李景　郭菁

中渠河渠长段增胜　刘官　申纪　徐增光　吴秉正　郝正文　沟首张奇才　宋清安 张杰谢栓德

霍元娃　曹文广　黄明新　刘绍南　张杰　王卫娃　王一元　李和尔　李学凤　傅志雷

炳锡

高石河渠渠长常泰 监生郭学礼　沟首郝正文　杨余青　李汾春　常开　常建功　李继春杨锡龙

李郭渠渠长王革齿　芦俊　沟首张鉴　张法克　芦英　延河清　关帝庙宋燮

晋掌小渠渠长卫全义　景言　沟首贾尊义　姚廷玉　武怀德　陈镛　蔺香　李增福　霍林姚松

李全福　毕文达　屈能长　王万德　李青枝　刘学长　屈怀德　景逢泰　屈春雨　张万桢

李美秀　刘尔俊　刘三云

东靳小渠渠长马正信　沟首马发祥　韩三乐　毕广业　南河住持任秉慧
庙后小渠渠长卢万善　首陡口公正武生许双魁　沟首尉春藻　二陡口公直刘嵩　沟首刘洪元
三陡口公直申永俊 申永恭　四陡口公直李登魁　沟首申光宗　五陡口公直段文恭　杨克恭

26. 道光年间《平河均修水利碑》

广南朱公名次琦，来摄县，定以地随粮，以水随地之制。会临汾周侯亲履亩，两邑田若税相值也。于是定平水为四十分，县各取其半，复于境内设四纲维持之 曰“水则”、曰“用人”、曰“行水”、曰“陡门”。其水则之法，县水二十分，八支渠分灌，视壤广狭为差。南横六，南磨渠四，高石渠二分有半，李郭渠二，晋掌渠分有半，东靳庙后两小渠，各分半而畎浍均矣。其用人之法，渠有渠长，司水之禁令；沟头治浇灌；堰长守陡门，皆听于渠长。违约者，渠长验其多宽之数，督沟头行罚，不受罚者有刑，诬者坐如律，而主伯立矣。其行水之法，昼夜有程，通闭有节，传牌有部次，淘河有式，动碾有候，而制防密矣。其陡门之法，筑门管渠，渠上广七尺，下广三尺，门广一尺，其夹深尺二寸，楗（堵塞）以石，毋弗平；插以版，毋弗密；锲以印记，稽以守□，毋弗一，且毖而赢缩，谨矣。议既定，编上于院司，观察大尹皆报可。

按：该碑文作者陈士枚（1794—1866），山西平定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任陕西巡抚。碑文见光绪《山西通志》卷六七《水利略二》。

27. 咸丰七年《重修龙子祠记》

碑额：永垂不朽
重修龙子祠记

康泽王庙介临襄两邑之交，距郡治一舍之地，毓灵于晋，创建于唐，志乘丰碑，前人述之详矣。曰龙子祠者，从里人之称也。祠西有泉，仰出于浅沙平麓间，如蜂房如蚁穴，汇而为池，即金龙遗迹也。由是□□分南北二条，支流派衍，脉络分明，蓄泄以时，挹注有序。临汾、襄陵水田之资其灌溉者千有余顷，民之服畴食

利已历千载焉。《礼》曰:“凡□□德于民则祀之,如神之惠,不且与禹之明德俱远乎。”故有司以岁时致祭,祀事孔明,罔敢或懈。余于岁丙辰奉命来守是郡,越明年仲春宜祭之辰,对越骏奔,文武咸在,礼既成,因周历其地,自龙母殿以至清音亭见夫墙宇有倾颓,丹雘有剥蚀。稽考旧碑,自前守黔南王公茂松重修后,垂三十年矣。爰与寅僚进绅耆而商所以新之。佥曰:固所愿是向有旧章,折简以召诸渠,首可以集事,既而鸠工庀材,计费千缗,未匝月而工兴,四阅月而工竣,庙貌维新,观瞻斯肃。落成之日,司事者请记其事于石。余喜夫工之速而民之享其利者不忘报本,且有感于王公之记以告将来,是亦守先待后之责也,何敢以不文辞。谨为至其岁月如右。

赐进士出身

钦加道衔知平阳府事前工部郎中京察一等关中王溥谨撰

署理平阳督粮分府加五级纪录十次景祺

钦加知州衔特调临汾县正堂加七级随带加三级纪录十次王应昌书丹

钦加同知衔调署临汾县事曲沃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七次卓异候升应学塗

钦加同知衔署襄陵县事厉恩绶

特授襄陵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岳云溪

镇守山西太原等处地方总兵官瑞格

调署分镇参府和昌

署右营都间府谷景昌

平阳府学教授侯玳 训导石鸣韵

临汾县儒学教谕方明谟 训导吴儁

襄陵县儒学教谕郝敦国 训导韩丕承

经历倭什泰

典史顾铭愚

典史候选知县席元灿

大清咸丰七年岁次丁巳小阳月中澣之吉

碑阴

上官首河总理督工　贡生张兆熊 介宾秦鹤龄　王尔榕　耆宾刘珽　武生王嘉

谟 拔贡李绳祖 监生刘震 监生柴简 监生张双文 乔崇 廪生张起凤 侯文学 佾生秦仞 廪生张连捷 监生范俊 庠生秦涑 张炳变 渠长张敬

上官二河总理督工 廪生崔毕裔 樊居义 李锡彤 王兆祥 张兴会 卫家舜 渠长 王华

上官三河总理督工 武生李维藩 蔺延泽 王金法 徐丕显 王正兴 吏员李长德 吏员 邓全寿 刘增龙 杨正芳 渠长曹履义

上官青城河总理督工开祺 李春寿 渠长 尉惟贤 朱春花 窦瑾

渠长 尉惟贤 张永发 周连

上中河总理督工 录井村 梁在田 王 综 辛昌谟 张开明 渠长瞿金玉

麻册村 党治邦 监生张廷佐 刘洽 庠生张桂荣 武生李茂林 秦怀林 渠长 党垣

小榆村 韩大章 曹长龄 李林 贾作砺 渠长徐锦美

席坊村 樊倍 张云仙 李杰 李栋 渠长李槐

庙后小渠总理督工 乡耆辛玉堂 高恕 高端 辛林 渠长高 竭 沟首高玉瑚 辛德金 高奋见 辛懋礼 辛登云 吴守先

下官河下册渠总理督工 耆宾李文杰 张林 曹天隆 张象贤 渠长李得隆 翟天成 邸士廉 渠长李天生 本渠沟首 李天富 官口沟首窦植

下官河桥村渠总理督工 王帅 张禧 梁作栋 王缙 王瑞麟 李永庆 渠长关大智 本渠沟首关太庆 韩家庄沟首 何明道

下官河东麻册渠总理督工 李植 张士达 杨春法 从九沈岐鹤 吏员张振纪 靳炳 渠长耆宾张复荣 本渠沟首沈岐麟 贺恭 小史沟首卫明法 史家沟沟首秦履中 五级沟首 杜金城

下官河小榆渠总理督工 贾成立 李友椿 贾挺立 陈腾蛟 渠长贾作砺 本渠沟首潘志仁 东沟沟首监生单庆维 西沟沟首靳茂福

下官河席坊渠总理督工 耆宾张云仙 张椿 李杰 渠长李雾云 本渠沟首张成选 录井沟首朱谐鸣 兰村沟首周明基

北磨河下当村总理督工 典籍刘复亨 公直李 云 郭得盛 渠长李香 梁俊德 段邦泰 沟首王世泰 梁普 从九杨克敬

苏村总理督工王行止 耆宾赵璧 武生张衔 杨元 渠长孙逢桢 沟首贺孝柴文福

兰村总理督工张英　乔复旦　耆宾卫东灵　耆宾冯得礼

五级村总理督工　贡生孟建猷　监生杜思温　伍翰章　公直耆宾　卫思明　毕乃金　张永兴　渠长武生卫发丁　王默沟首武生朱俊儒　桑湾沟首卫毓恒

本村沟首耆宾毕长太　宋一元　卫思辉

公直武生裴学易　孔万有　渠长　潘致祥　沟首　李泽惠　金殿沟首　从九乔丕显　李鳌　沟首从九刘嘉言

南横渠督工　都司吴勇　廪生常聚五　生员关起凤　王锜　渠长刘尔秀　从九段志敬　堰长武生尉士秀　卫廷温　贾步丰　从九李清选　贾松年　沟首畅秉乾　焦文耀　王大廷　王社娃　王具任　陈大立黄河清　李全　梁德成　刘逢杰　张廷珍　许泽立　孙思俊　王思兴

南磨河渠长王江清　耆宾张洵　督工张温　贡生柴长润　杜鸣　乔兴业　杜瑶

祁丰　柴世祥　郭智　沟首马万元　郭永丰　附生许俊德　从九龙潭

贺占魁　省计　吴建吉　冯従立　张大泰

中渠河渠长古钰　段芝瑜　督工　典籍解从禄　监生马为龙　从九解宗禹　生员席友正　段承业　吴璜　王赐福　段克宽　东靳沟　石椿沟　寺西沟

寺东沟　殿前沟殿后沟　东业沟　刘庄沟

高石河渠长　李汾春　乔致善　督工监生李联升　从九张慎先　沟首李迎春

从九李含春　杨邦平　常建福　杨牺凤　常建寿　李文盛　监生徐三益

从九王绎如　徐迎华　乔安行　徐应尚　生员张云飞

李郭渠渠长王占魁　郭琚　督工　王永盛　曹永成　宋燮　李万盛　省计　副生刘□□　贡生刘耀南　吏员杨惠　武生陈芳春　从九郭琳　□居信　上流沟　第二沟　郭下沟　坡里沟　双塚沟　第三沟　二十四甲　上流沟

龙尾沟　上三沟　第一沟　第二沟　第三沟　二十八甲

晋掌小渠渠长卫廷温　张万贞　督工　监生霍建□　议叙尉骏　王康　□□□

议叙尉士麟　康逢吉　姚松　陈□　武□　霍□　□□敏　□学礼　辛憨狗　刘学长　刘□□　李天禄　王万□　景逢泰　刘新义　景珠　屈怀德

东靳小渠渠长席万福　督工　从九席万禄　古□铭　马毓□　耆宾席铎但　北流沟首韩维　兴□　南流沟首　监生马毓藻

庙后小渠渠长柴悦来　首一沟　□□□　沟首　监生柴万林　首二沟　公直王□倬　沟首　□□光　公直□光宗　沟首　申永□　第四沟　公直武生

□□□　沟首　申永贵　第五沟公直　申永俊　沟首　段文□

28. 同治十三年《龙子祠重修碑记》

康泽王之神，泽被临襄，有功德于予，建祠以祀之。府尊为主，春祈秋报，两县尊分司其事，古制也。其祠巍峨宏敞，代有修理之工载在碑志，昭昭可考，顾工程当其时而必举，亦待其人而后行。有一时之人以举一时之工，斯整旧如新，祠宇不至荒废。今龙子祠距上次重修十有七年，而祠内外已皆有倾圮，穿漏之处，不足以蔽风雨，何能以妥神灵而安渠。众相约初三日，初六日十六河渠长督工，齐集本祠献庭，公议修理，有伙修，有分修，逐处同验。北自水母殿，南至清音亭，分为四节，开单拟价，各匠人投阄包做，诹吉于初十日开工。一时并起，限于四月十四日会前完工，各工匠答应同力合作，届期果如所约。是役也，工本不大，适逢县试大典未及请训，谨拟章程数条，经理各工。水母殿西山墙彻底砌以砖灰，立脊兽，并修卷棚。龙神正殿前坡翻瓦七间，东廊翻瓦七间，修东西挑角，西南三檐挑角。献庭东南挑角并修脊齐檐。大门二门补脊齐檐，重修八字照壁，西建碑楼一座。清音亭修厦、立脊、齐檐，重修东西花墙及西灶房南北四间。复重修龙神殿前左右鱼池，东西两洞掏开，西天口七眼，东天口三眼，洞口一并修好。伙修之工已讫。北八河修南厢门楼，翻瓦东廊二十八间，大修理牌楼一座，窑前鱼池一所，马棚三间，溷厕一间，筑大门边围墙，复插补雷公殿前檐，北窑前檐，暨窑前小门楼，伞儿亭。南八河修西八间，重修财神殿三间，西南厢房七间，牌楼一座，公馆一所，补厦齐檐，筑大门西边围墙，分修之工亦既勤垣墉，惟其涂茨既勤补，惟其涂丹，巍然焕然。一律重修统计，两县伙修分修一切花销共费钱一千二百贯有零，无非按水分均摊。涌跃趋事诸凡撙有节。窃以工之繁不同而人心则同，费之多寡不一而成功则一，我十六河渠长督工秉公无私，和衷共济，不辞烦劳，不务奢侈，固神圣冥冥之中佑启之灵，而亦两县人急公好义之所为也。蒙龙神河润之福施泽民于者无涯而因以报德于神者最切。工既竣，同事诸公叙开节略，属记于愚，未敢以简陋不文辞，爰据其重修巅末编次为记，敬告后之有事于斯祠者。

钦赐六品壬戌制科孝廉方正改就教职　恩贡生张兆熊撰文

例授文林郎吏部拣选知县己未恩科举人辛未大挑二等即补儒学正堂柴甲荣书丹

旹大清同治十三年岁次甲戌五月谷旦立

碑阴

上官首河总理督工　孝廉张兆熊　武生王嘉谟　生员张文翰　贡生张起凤　生员秦应期　耆宾许鉴　监工　监生范俊　监生张兆鲤　监工从九刘玉柱　武举徐钟麟　监生刁耀基　生员秦谏　贡生徐钟瑞　耆宾张天伦　武生张尔承　耆宾刘学易　典籍李景昕　渠长秦怀宝

上官二河总理督工　增生崔皋裔　贡生孟琢章　生员孟显扬　张广鉴　王申　耆宾王璞　李全　卫宗周张有见　渠长雒天章　新渠长孟豹

上官三河总理督工　耆宾蔺延泽　武生柴君栋　吏员高进明　监生柏从鸾　耆宾李秉鉴　从九李思贤　耆宾乔世昌　监生郭金富　石正顺　书识李福林　周世德　书识杨正芳　贾成美　书识吴熊　周之德　监生李常德　典籍关煜　从九吴宝英　杨怀玉　邓致中　李维成　王治平　渠长李林　新渠长　监生姚□□

青城河总理督工　生员尉惟精　李茂元　尉竭诚　尉百合　吏员尉文太　廪生李茂生　生员闫芸芳　崔茂德　尉复兴　董天修　监生谢家驸　贡生徐佩璠　吏员柏永太　乔全福　柴德润　朱生富　荀更禄　渠长武生李茂林　乔金全　王□福　□文□　陈禀福

上中河总理督工　录井　麻册　小榆　席坊　村

生员范居中　耆宾关庆　耆宾王综　监生张炳南　生员刘迎新　贡生关明德　典籍辛昌谟　监生李忻　崔金印　卢克谦　监生吕光灿　李茂春　监生张桂炘　李云　张琳 李耀园闫兰芳　从九柏茂松　渠长贡生柴作相　监生杨永茂　从九韩方直　庠生关锳　监生孟之梁　监生辛昌隆　督司贾□□　监生李□□

庙后小渠渠长　武生辛万年　高自明　督工　监生高祥　监生辛俊奎　高可兴　辛瑗　小榆沟首关瑗

下官河下册渠总理督工　监生李继宗　张鉴　牛万寿　监生邸□　张明　赵士彦　李春元　李昌　李荣　王玉　陈天□　陈□　渠长翟勤本

下官河乔村渠总理督工　监生尉廷桢　监生王治邦　关大志　杨金福　杜天保　陈松茂　李永庆　吏员张志恭　缪文明　王灿　王国寅　萧永□　渠长张□

下官河东麻册总理督工　耆宾张瓒　耆宾王天福　张富杰　沈云兴　靳煜　贺恭　张清泉　渠长张珠　本渠沟首贾富贤　沈福　萧史沟首凌纪清　史家

沟首□□□

下官河小榆渠总理督工 潘丁武 葛云□ 贾方 李金敖 贾元清 李金锋 武凤 渠长贾源泽 本渠沟首韩玉德 东沟沟首单守义 西沟曹玉杰

下官河席坊渠总理督工 典籍李芳 张忠元 张荣 李维福 申得全 渠长李相 本渠沟首张佐相 录井沟首王自成 兰村沟首张仰□

北磨河下当渠总理督工 耆宾刘重顺 公直李云 典籍荆兴 典籍张全 从九郭德胜 耆宾渠长荆茂 公直段长吉 沟首史中 史雷 段丰 毛凤飞

北磨河苏村渠总理督工 耆宾孙文桢 王□德 耆宾张克志 典籍张兴 监生杨逢春 杨万胜 孙从□ 杨酋 渠长张克梁 耆宾王景 沟首创业 李承志 耆宾华王平 监生马万福 武自慎

北磨河兰村渠总理督工 监生武继众 耆宾马金柱 复生毕志忠 耆宾张永兴 宋准元 武志和 宋则元 乔森茂 毕长尧 李秉 公直苏绍曾 毕常青 张扬义 渠长武汉秀 卫思辉 王谟春 沟首单守信 桑湾村沟首褚胜 本村沟首□□

北磨河伍级渠总理督工 监生王正寿 监生高士杰 公直王生辉 李宋春 渠长赵秀 渠长孔天聪 沟首王福生 武生裴金汤 武生刘辉 史小□ 龙廷选

南河渠渠长总理督工 从九常元福 武生刘攀桂 武生卢馨远 武生段廷杰 渠长耆宾张怀寿 生员卢锡同 埝长刘尔厚 屈天福 李盛 关金印 张克恭 沟首李松林 王明高 黄振番 吴克弟 张黑狗 张锐娃 薛长寿 吉管子 李福娃 亢得寿 徐黑娃 韩德娃李刘娃 畅秉乾

南磨河渠渠长 王宗荣 监生吴光 督工生员雷正身 举人柴甲荣 武怀瑾 从九杨天元 生员贾汉章 武生高继祖 生员张廷芝 生员师养成 王宗文 师文秀 祁一峰 柴世祥 监生杜魁 乔金元 沟首段自来 孙寿 孙绍春

中渠河渠长 解廷豪 段兆龙 督工监生徐钧 典籍解从禄 知□马学来 生员解庭芝 张斗南 段昭瑞 晋瑚 沟首席鉴 孙绍诗 赵通发 宋吉安 吴福盛 袁庶斗 刘思梅 王全盛

高石河渠长 都司常积盛 都司高及登 督工从九李含春 监生高学聪 沟首常建康 常宝盛 杨惟经 杨建柱 李世龙 李世宽 修生杨玉麟 乔鹤松 从九刘昭基 张九思 修生席义礼 武生高学敏 李□□

李郭渠渠长 张九鸣 张文德 督工生员任清远 武生孙炳南 张禄瀛 李万

盛　张九如 张双元　卢兴仁　陈威　郭为诚　从九杨慧　李成立　从九许元　沟首高吉登　生员吕攀桂　卢忠仁

晋掌小渠渠长　耆宾屈文福　王建邦　督工武兴邦　从九王寿　典籍李正兴　沟首郭林　李清□　陈蒲　监生尉世显　监生陈洪道　□□□　□□□　□□□　□□□

东靳小渠渠长　古泰　督工从九席占魁　席长金　监生马玉□　沟首席通明　韩文元　席龙兴　冯天柱

庙后小渠渠长　申克云　督工耆宾刘开元　生员刘耀斗　监生杨春荣　耆宾李登魁　申金凤沟首段文德　柴作梁　王天德　杨九思　尉□□

29. 光绪二年“恩沛伦音”碑

碑额:恩沛伦音

古圣王之制祭祀也,凡能御大灾旱捍大患,有公德于民者类皆祀之,否则不在祀典即不祀,又何为。请封号,请匾额而追崇之以贶其灵应。若龙子祠康泽王,于晋怀帝永嘉三年刘元海僭据平阳时,详见府县志,事颇怪异不经。而平水泉出平山下,可兹引溉临襄两邑之田。其利则及民也甚溥,故世祀神龙为祠水之主,称平水神。遇旱至祷辄应。宋熙宁八年,守臣奏请封泽民侯,庙额曰“惘济”,崇宁五年,再封灵济公,宣和元年加康泽王。庙有唐天佑二年,宋宝元三年,政和四年感应碑,今皆湮没无存。迨江陵黄公宰临汾,大修龙子祠,乡贡进士毛麾有《康泽王庙碑记》。明嘉靖初上官河壅塞,四纪太守开州王公有《张长公行水记》,判官吕公木再已有修《平水泉官河记》,而修庙碑记至圣则缺。洎我国朝重修者屡矣,俱有碑记。抚藩、府县以各献有匾额、楹联,足以彰神德,壮祠观矣。而未有奎藻光临之圣,犹足为千秋旷典也。我邑侯浙东许公由太原县调属临汾,睹郡城兵燹之余,各庙宇倾圮实甚,慨然兴修,坠举废之思,诸多创修,而尤以关帝庙巨工为重,禀请府宪暨镇台督修,时恩太守主修。

宫以肃朝典,修莲花池以便民汲。于修关帝庙并行不悖。□□筹经费,各捐廉俸为倡,多方募缘,重修新建,视旧制有增。此年夏秋亢旱,连祷于关帝庙王祠,及时雨沛,灵应如响。光绪元年七月间,侯据绅士等禀,以庙貌正神能御灾旱患,有功德于民,例得恳请宸翰褒扬,以彰崇报等情,由府宪转经藩宪、臬宪,具详

请奏。蒙巡抚部院鲍宪于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据情转奏，十二月初九日内阁奉巡抚鲍源深奏，神灵显□□□匾额一摺。同治六年冬，捻匪窜逼山西，临汾县城仰赖关帝神灵默佑，得保无虞。十二年夏秋亢旱，泽甚殷复赖关帝□□□□□□□□□□□□□□甘霖□深□□□□□□□□□□□□□□□一方又鲍源深祇领敬谨，悬挂临汾县城关帝庙、并城西平水康泽王庙，用答神庥。御书匾额二方□□□□康泽王庙曰河汾保障□□县敬谨刊刻悬挂。兹康泽王之匾诹吉于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同城文武并襄陵县恭诣龙子祠□□□□□□□□绅士渠长庶民等鼓乐□拜□□殿并献牲醴以酬灵贶。是盖神之功德所感应，尤龙神之灵爽所式凭。缘系□□□有龙旗龙□□两邑十六河人等触目惊心□□□祠之关乎国计民生者，如此其重且大也。凛凛然常若有龙章凤，诰在心目间，遵规使水不敢越□□□□□□深与神恩之汪□及各宪台之成民，而致为于神，固宜与山高水长永垂千古矣。事既□□□于府县宪□□谕鲍而为之记。

敕授承德郎六品职衔孝廉方正改就教职恩贡生张兆熊熏沐敬谨编次

例授文林郎己未恩科举人吏部拣选知县辛未大挑二等即补儒学正堂柴甲荣熏沐敬谨书单

时大清光绪二年岁次丙子十月谷旦立（本篇尚须补充）

碑阴

上官首河总理督工孝廉张兆熊　千总王嘉谟　贡生张起凤　介宾张文翰　贡生秦应期　监生范俊　从九刘玉柱　监生张兆鲤　武举徐钟麟　生员秦谏　贡生徐钟瑞　耆宾刘学易　耆宾靳铭　武生张尔成　吏员许凌云　监生张宗　监生李喜融　渠长张德盛

上官二河总理督工张兴鉴　王森　耆宾王璞　孟显棋　王宗汉　渠长王庚辰

上官三河总理督工介宾李长德　耆宾兰楚泽　吏员高进铭　监生樊宝镜　监生吴必显　从九李忠贤　耆宾杨太鹤　监生相从銮　王朝阴　军功李席玉　郭金城　邓致中　周工全　吴淦　李维城　渠长李天祥

上青城河总理督工耆宾李茂园　庠生尉惟精　典籍尉春魁　耆宾尉竭诚　廪生李茂生　尉百合　尉长发　崔茂德　庠生闫廷芝　尉复兴　贡生周树桂　监生樊宝镜　柴德润　薛从中　朱生富　武生乔永义　耆宾柏永泰　监生谢家驸　渠长崔茂福　乔通管　尉世昌　雷进盛　乔福盛

上官中河总理督工　录井、麻册、小榆、席坊村渠长　典籍张昌谟　监生张桂炘　张椿　都司贾文题　公直　监生吕光灿　生员生员刘迎新　贡生关明德　监生张炳南　耆宾王综　武生李茂林　关庆　李耀元　监生张林　杨永茂　韩方直　典籍李松　监生辛昌隆　张兰庄　弋云秀　耆宾李茂椿

庙后小渠总理督工武生辛万年　高自明　辛子英　高竭　渠长高树棠　小榆沟首关瑗

下官河下册渠总理督工张鉴　监生邸□　张明　李庆　李春元　景大伦　渠长李双奎　代理沟首李秩　官口沟首窦椿

下官河乔村渠总理督工关大智　杨金富　尉廷桢　杜相元　王友顺　陈松茂　渠长萧永昌　沟首萧永顺　韩家庄沟首康吉云

下官河东麻册总理督工张瓒　王天福　沈云兴　贺恭　靳立德　沈瑞　渠长张复　沟首靳煜　王得仁　小史沟首柴蛇娃　史家沟首柴国明　伍级沟首高世俊

下官河小榆渠总理督工　监生韩芳直　潘丁午　贾元清　李金锋　渠长李春　沟首张天保　东沟沟首耿春华　西沟沟首曹恒昇

下官河席坊渠总理督工李祥　申德隆　渠长王树仁　沟首张福元　录井沟首张琳　兰村沟首武致顺

北磨河下当渠总理督工耆宾刘从顺　典籍张全　耆宾荆兴　监生王恒太　渠长李连级　朔村公直武生段学让　沟受李新春　王元 王凤飞　翟元兴

北磨河苏村渠总理督工耆宾孙逢桢　武生张性　王万盛　王冠军　渠长监生杨逢春　沟首刘新林　王天寿　赵廷盛

北磨河兰村渠总理督工　监生伍济众　耆宾冯金柱　宋双元　耆宾裴金全　毕长尧　樊云山　公直耆宾苏绍曾　监生杨德杰　耆宾宋泽元　渠长耆宾毕长清　桑湾村沟首史邦杰　王默村沟首李华　本村宋廷元张扬　马金实

北磨河伍级渠总理督工　孔大聪　裴金全　公直武生赵胜　赵榆　渠长王福悠　沟首王正通　金殿公直武生刘鸿猷　耆宾史麒　沟首贾茂

南横总渠渠长王大廷　监生黄重华　武生卢天香　从九王步銮　监生段廷秀　从九常元复　堰长陈黑娃　王茂财　官金印　李沛　关丁丑　沟首张学颜　景荣　张法子　崔芳春　李合　刘峰　乔天清　李松林　刘柱娃　张黑狗　关宗舜　徐岳寿　梁宗贵　王茂

南磨河渠长武生曹养廉　杜复亨　督工公直贾册工　监生杜奎　生员王精一　从九杨天元　孙成业　从九邓万选　曹尔弼　监生柴膺恩　沟首申逢泰

张文　马童儿　吴小胎　张庄元　杜洪良　堰子翟元兴

中渠河渠长典籍解从禄　督工监生马文龙　段秀文　生员解廷芝　生员晋珩　监生席钧　监生吴鼎　沟首生员解臻芳　监生孙鉴　监生梁金贵　贡生元聚斗　千总李清秀　许元科　段铭　刘如云

高石河渠渠长杨希鳌　监生高学聪　督工从九李迎春　杨云汉　常善生　从九乔鹤法　沟首李家槐　杨修敏　杨珍　武生高学曾　从九杨玉林　监生王续亭　从九郭宗尧　从九郭庆元　从九张耀　从九席芝芳

李郭渠渠长程作乾　卢乾　督工举人邓惠　千总李清秀　生员任清远　典籍赵得禄　从九孙耀南　从九许长发　典籍闫扶清　张翼鹏　武生张九如　赵裕禄　郭维成

晋掌小渠渠长陈洪范　监生刘增川　督工监生陈洪道　徐厚堃　二十甲　陈鹏飞　耆宾武兴邦　卫廷温　议叙尉士麟　武生卫廷栋　杜文元　监生尉士熊　武生尉廷栋　康永贵　陈洪元　耆宾辛克明　古口木　陈得胜　监生霍建禄　宁赊　姚汝秀　武五斤　监生屈有营　孟五达　沟首奎文阁　李沛　李正新　张文辉　刘纯一　监生李增禄　王建邦　屈春雨　屈九如　景洪秀　刘凤岐

东靳小渠渠长监生古祥龙　督工知印马毓兰 从九席占奎　席长金 马正常　沟首古泰　段铭　马希融　古宜言

庙后小渠渠长生员刘丕承　督工生员刘增斗　从九韩钰　典籍申金垒　申克云　武生卢仰奎　沟首刘思恭　监生刘杰元　申金章　张小龙　段文德

30. 光绪十三年《拟龙子祠重修碑记》

拟龙子祠重修碑记

龙子祠，胜地名区，傍山带水，气势雄壮，风景清和，台榭插天，骚客同游。观之乐，云烟撲地，官长输祷雨之诚。灌田十余万，为一方保障。传流几千年，实两县惠泽。金鱼池下巍巍峨峨，有殿高耸而起者，康泽王行宫在焉，载在邑乘，昭昭可考。然历年既久，风剥雨蚀，类多圮漏，殊增今昔之感。咸丰丁巳，同治甲戌两次大兴土木，施以黝垩，涂以丹雘。睹殿宇之辉煌，楼阁之巍焕，暨廊廉门宇与夫祠前之清音亭规制仍旧整顿一新。人其地者自觉别有天地，美哉！一大观也。

前人已述之详矣。兹于光绪十二年丙戌冬，康泽王殿前卷棚欹然倾颓，非急为修葺，何以揭虔事神仰副国家崇祀之巨典，奈时届严冬，事未果举。至丁亥春二月，邀集临襄十六河渠长、督工量功度费，鸠工庀材。先建康泽王殿前卷棚三间，次及献庭后簷五间，又次后廊六间，二门脊厦穿漏者补修之栋楹宲桷，盖瓦级砖。腐者易之以坚，旧者更之以新。雕镂绘彩，靡不完固。虽未能如昔日之盛，亦足以妥　神灵而肃观瞻。工既竣，爰勒诸石，持志其兴事之巅末云。是为记。

例授登侍郎翰林院待诏荫生张衡撰文
郡庠优行廪生郭云龙书丹
旹大清光绪十三年岁次丁亥荷月谷旦立

碑阴

上官首河总理督工　待诏张衡　监生张炳燮　耆宾王运通　生员古永昌　监生王正已　副生秦槐林　廪生张履坤　从九徐鸿达　副生刁履瑞　监生李喜融　刘清泰　监生侯杰　秦随成　副生乔文安　张玉柱
渠长　□□

上官二河总理督工　监生崔持仁　耆宾高强　王申　王天垦　监生张有义　赵连城
渠长　张嘉猷

上官三河总理督工　监生樊宝镜　廪生关世泽　从九李恒贞　杨文雄　秦立德　军功李其林　蔺廷熠　杜长秦　王法智　关祥　李维城　徐子杰　周柏英　柴百朋　杨福杰
渠长　英泉

上官青城河总理督工　九沟总理渠长督工

上中河总理督工　录井　麻册　小榆　席坊村　生员刘迎辛　生员关明德　监生张开明　监生张炳南　廪生闫庭芝　韩方植　监生孟之梁　都司贾文灏　辛盈科　副生李光园　从九刘珏　耆宾关约　王在高　武生李玉堂　张兰庄　崔绍光

渠长　崔绍祖　职员吴履祥　吕火终　李维盛
庙后小渠总理督工　高自修　辛端正　高有　辛金铃
渠长　高自兴
小榆村沟首　张德荣
下官河下册渠总理督工　赵士云　监生邸□　李永泰　张明　吏员李昌　牛佐卿
渠长　景学成
本沟景合明　官口沟首权升茂
下官河乔村渠总理督工　耆宾关大智　吏员王辎一　监生王三元　典籍李文炳　肖永昌　俏生张堃
渠长　六品衔王国璧
本沟沟首　介宾王治安　韩家庄沟首　吴以清
下官河东麻册渠总理督工　杨文英　监生景立德　沈作杰　景戊　张秉余　沈作炜
渠长　高文元
本渠沟首　洪大量　王之耀　小史沟秦迎昌　史家沟　生员秦士昌　伍级沟　王龙
下官河小榆渠总理督工　从九韩方植　从九贾钫　训导单荐绅　监生贾源清　从九卢廷樑
渠长　李金铎
本沟沟首　从九贾源注　东沟首　俏生耿春花　西沟首　朱采丕
下官河席坊渠总理督工　耆宾张荣　李文禄　申德隆
渠长　李维城
本渠沟首　张三保　生员王镄　张仰新
北磨河下当渠总理督工　耆宾刘从顺　监生王恒太　公直　云骑尉刘振声　武生荆义和　朔村公直　段长吉
渠长　张盛业
沟首　耆宾张全　王万祥　朔村沟首　段胡掇
北磨河苏村渠总理督工　张兴　孙从孟　公直　张廷华　杨友
渠长　王辅卿
沟首　千总马万福　监生王万盛　滑天仁　武自得

北磨河兰村渠总理督工 耆宾毕长青 耆宾伍致和 宋择元 毕致中 黄元盛 卫思诚 公直 耆宾李得盛 冯金主 耆宾张永兴

渠长 王思尧

王默村 桑湾村沟首 史海泉 单庆仙 本村沟首 张荣桂 杨育英 张光桂

北磨河伍级渠总理督工 王福攸 公直 孔天从 裴金泉

渠长 监生潘致祥

沟首 监生高士杰 金殿公直 耆宾史从谦 生员陈兆庆 贾茂 沟首 史立德

北河住持 申寺元

南横渠督工 耆宾张怀寿 武生段廷杰 佾生黄协堂 生员卢希全

渠长 武生段振清 □□尹维邦

堰长 康修身 李发荣 张有光 屈春昌 徐升平

沟首 尹合邦 孙梦耀 杨天柏 李松林 孔庆阳 杜逢赐 王步月 梁富贵 段茂盛 徐黑娃 畅世云 徐方子

南磨河渠长 廪生郭云龙 郭万寿

督工 生员王维煜 监生杜立本 张可宗 乔英魁 武生曹养廉 杨乐荣

寺前沟首 杨兴 张刘沟首 段炳辉 城居沟首 许永盛 金殿沟首 张焕

崔村沟首 吴偏头

中渠河渠长 席占元 傅寻

督工 监生徐钧 监生晋玠 监生解居仁 监生晋瑄 席隆兴 郝学诗 生员解鹿鸣 耆宾段铭 从九寺行方 吴清风

四沟长 卢廷桢 从九刘作栋 生员胡薰 生员亢生辉

八沟长 乔逢庆 古韩氏 高学勤 刘体圣 段大兴 李兴升 焦清华 刘天章

高石河渠长 李家喜 乔敦行

督工 从九李含春 乔德行

沟首 武生李家骥 州判张逢城 耆宾杨廷枉 礼生高登鳌 杨协同 监生乔鹤松 常建清 从九张耀 李世荣 郭琳 常根深 徐寿 乔用行

李郭渠渠长 武生张九经 赵兴

督工　武举杨效春　生员　朱志文　生员高□贵　许河　武生张九魁　王炳□　李逢春　陈纬　程作金　卢乾　李逢泰　郭占魁

沟首　光禄寺刘鉴堂　都司刘坤　监生徐光祖　从九郭维屏　按□厅张修业　生员王德基

晋掌小渠渠长　耆宾康永贵　李学仁

督工　尉士毅　生员徐厚堃

沟首　耆宾杜文屏　武生卫廷栋　监生陈德盛　杜集森　耆宾陈洪亮　卫贵堂　辛克宽　屈有林　郭呈杰　屈有如　监生王康　生员李青遴　屈春雨　刘增州　刘凤歧　李增荣　张文耀　刘纯一

东靳小渠渠长　马希融

督工　知印马毓兰　耆宾席长金　监生古宜法

沟首　席天佑　席金铭　马调良

庙后小渠渠长　武举刘连元

督工　武生许步月　监生贾逢昌　耆宾李登仕　武生卢仰奎　申金凤

沟首　武生许占鳌　许树庆　申殿元　杨玉柱　李金凤　监生□□□　从九□□□　石匠　薛文儿　卫凤鸣　李安俭

31. 光绪二十二年《龙子祠重修碑记》(北河)

龙子祠重修碑记

平水为临襄巨浸，居民立祠以祀。其神发源于晋，建庙于唐，至宋宣和五年加封为康泽王，以其康泽万民而万民宜恭明祀者也。功德之盛，前人述之详矣。数百年来代有修理，工讫之余辄记之碑，非以矜一时之勤劳，盖隐示后人，以时加补葺耳。同治甲戌迄光绪丁亥两次鸠工，不数年复形穿漏。首事者恐成巨役，亟欲缮治，以连年歉收未果。去年夏，大雨数日，民间房屋及庙宇倾圮者甚多，而此祠尤甚。宎桷腐桡，瓦甓残败，不可以妥神揭虔。乃集南北十六河公议，使工人包揽，重新正殿及殿右之廊房二间，又新水母殿及殿后之卷棚五间，殿前之东南两挑角。凡易栋梁级瓦，若工次则大门、二门、清音亭、南小亭，或则监脊，或则齐檐，务令完善。以至大门边之照壁，周围之花墙，下及铺石水道，无不因其敝而治之。工竣复具丹雘金粧神像，此则南北十六河之所公修也。又与北八河诸公议，

揭伞儿亭及窑门前门楼之顶而易其木瓦，又齐雷神殿之檐，换东墀门之楹，更西马房之梁，易外市房之檩，新官厅之椽，筑东厦之墙，与夫水道、鱼池、诸花墙俱新。理之使仍其旧。此则北八河之所分修者也。各河诸公恐为匠民所欺，尽日监督，务求坚固，且日用饮食无敢浪费，以将民财如事。于本年季春，凡六阅月而告竣，共费钱八百千有奇。时贤堂张君首其事，来嘱予曰顷谋为碑志，南河诸君坚以各勒贞珉为便。今石已就矣，君其为文以记之。予思康泽王之德，固两县之所心香祀而顶礼崇者，此之不修如祈报何修之，而所费不赀，如罢民何若诸公者，可谓勤俭矣。后之董斯事者能以诸公之心为心，而遂时补治，无使浸成巨役，不惟有益于民，其于康泽王康泽斯民之心亦庶几，其有合也。是为序。

例授文林郎吏部拣选知县壬午科举人张　宠撰文
例授文林郎吏部拣选知县甲午科举人关世熙书丹
大清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冬子月吉日立

碑阴

上官首河总理督工　生员张心□　武生徐仲□　监生古永昌　监生王正己　□生李履瑞　□□□□文　徐鸿达　刘清泰　乔泰元　张□世　廪生张嘉棠　生员秦汝霖　任守福　张玉柱　刘□元　□廷佐
渠长　刘正德
上官二河总理督工　武生陈绍先　张桂林　典籍王文申　外□李长荣　刘继增　郝学德
渠长　卫宗仁
上官三河总理督工　监生徐恒泰　耆宾周进锐　从九郭明□　耆宾崔德兴　监生吴宗周　□□李春荣　生员吴成周　典籍李天桢　生员彭光祖　蔺廷熠　□□陈炳瑞　杨三槐　□□邓受□　李天荣　王万典　杨明奎　李玉祥　刘士选
渠长　监生邓冠□
上官青城河总理督工　生员闫允昭　生员卢佐廷　副生尉文明　生员尉成重　张林兴　吏员李润　副生尉加富　耆宾尉自顺　尉天申　尉世昌　耆宾乔务□　生员周清□　副生董文泰　典籍乔□云　武生谢德心　生员谢光庞

耆宾杨生柱　副生荀德荣　符恒昌　乔永义　李友槐　朱□治　吴之□
武生柏松山　耆宾毛正端　谢光耀　刘书林
渠长　权有泰　乔平天　崔林成　柴九浑　柏茂林

上官中河总理督工　录井　麻册　小榆　席坊村　贡生刘迎立　武生关习勤
增生关毓秀　荫生关作棠　监生张兰庄　□连鹿　议叙柏聊松　监生贾源清　生员李深　武生孟光洽　监生柴希圣　监生孟之梁　王庭兰　李耀元　周之桢　生员李权
渠长　王甫　魏修成　卢连升　贾魁元
庙后小渠总理督工　渠长辛百全　公直高自仙　高岐凤　高攀桂　辛养正　小沟沟首　关禄
下官河下册渠总理督工　生员李兰亭　耆宾赵士彦　典籍张振声　吏员景大伦　李自仁　景大鹏
渠长　军功牛左军　本渠沟首牛左贤　官口沟首窦福宝
下官河乔村渠总理督工　监生王三元　崔珍　关文德　尉廷桧　陈全福　杜忠杰
渠长　王元玺　本渠沟首　王元璋　韩家庄沟首　吴清会
下官河东麻册渠总理督工　生员靳在镕　张秉余　景戊　苏正会　沈作伟　靳住堂
渠长　耆宾靳煜
沟首　沈章　张茂和　□□沟沟首　林德溥
史家沟沟首秦良智　伍级沟　军功潘铎
下官河小榆渠总理督工　监生贾源清　韩戊申　典籍李金□　军功贾源泽
渠长　李云英
本沟　张凤　东沟　副生李文焕　西沟　武生陈兆祺
下官河席坊渠总理督工 耆宾张荣 李维禄 张发科
渠长　王文达
本沟　张登云　录井沟　生员张琳　兰村沟　郭天铸
北磨河下当渠总理督工　监生荆义德　王万祥　公直　耆宾张志　李发　朔村公直杨江
渠长　世□云骑尉□提守□　刘振声

沟首　刘从礼　李世英　朔村沟首　段学曾

北磨河苏村渠总理督工　千总马荣甲　生员张玉铭　公直　监生　王向离　孙丕立

渠长　□□杨成

沟首　杨廷盛　王添寿

北磨河兰村渠总理督工　耆宾任克会　耆宾常思辉　耆宾张天申　贡生赵金禄　樊德奎　张养新

公直　柴云明　耆宾张杰　典籍苏学敏

渠长　吏员黄思魁

王默公直　廪生单守业　沟首　监生单庆安　□□沟首　贾茂

本村沟首　李德兴　伍致魁　卫逢珍

北磨河伍级渠总理督工　孔明远　孔起禄　公直　孟冠英　李德华　王清贵　□正生　□□茂　史立志　栋兆吉

沟首　高秀岭

住持　申夺元

石匠　苏凤鸣

32. 光绪二十二年《龙子祠重修碑记》（南河）

龙子祠重修碑记

康泽王祠西灵源出姑山下，相传槁石滩中有石龙吐水，砌石为池，号金龙池，锦鱼跃焉。两岸名花逢时盛开，一带鲜韭架空常生，南环浅沙，平麓间滥泉觱沸，聚而盈乎，泚泽抉而波及临襄田千余顷，转磨百余所，清流所及悉成膏腴、甘泉，未达济以雨露，功德浩荡，无以加焉。宜子馨香百代，俎豆千秋也。至殿陛之崇隆，庙貌之巍峨及古迹仙景，前功之足录者，先达记载綦详，不待冗举。但栋宇因积久，工程宜相时而动，倘至倾圮，不足肃观瞻，何堪妥神灵！今逢春祀之陈，南北董事咸集，公议修葺，众皆欢心。一遵总渠定论，爰重修正殿，自龙母宫以及清音亭摧残是葺，秽污以洁，南北合修前后，重新庙西风、电诸祠。廊庑、牌亭、公馆、鱼池、甃洞、斋厅，惟南河独修，概行完补。经营、督监越数月而聿观厥戌焉。共计费钱八百千有奇。人民乐施，佃地亩者按公摊抖，主磨碾者依规给偿。虽工

竣效速，悉属人为，无非康泽王恩洽德普所致也。即成功，次第与北河列公分二载之，非敢矜劳施功冀后之兴者，盖前愆而建鸿猷焉。是则神人之攸赖也夫。

邑庠生员段振海撰文
儒学增生王维新书丹

南河总理督工　耆宾张怀寿　武生段廷杰　贡生李清遴　生员白燕昌　生员常抚五　武生段春华　武生刘子桂　五品尹定邦　廪生李曰仁　贡生赵步青　乡饮畅天相　佾生郭长治　武生贾荣耀　武生杜凤池　生员卢希同　州同尹维邦
南横总渠渠长　生员段子容　生员王嘉会
堰长　武荣祖　武生李膺命　张秉义　监生徐衡平　李发荣
沟首　张金荣　梁富贵　李如锦　尹合邦　张思全　李松林　孙长吉　黄振藩
王自正　关宗舜　王顺　段茂盛　常希圣　孙全德
南磨河渠长　武生张永吉　乔金荣
督工　生员雷直诤　生员柴丙元　王树梅　乔升迁　监生李大经　彭炳文　霞逢吉　杜德明
沟首　典籍郭廷英　杨邦邦　马世和　梁玉庆　张忠全　郝钿铭
中渠河渠长　监生王振业　生员晋集义
督工　监生解居仁　生员刘春山　生员解鹿鸣　生员段精一　席天佑　吴顶
席占元　监生段承道　程清　监生段安仁　员□傅寻　生员□□　监生刘□焕
高石河渠长　佾生李增茂　佾生高学明
督工　监生李增龄　从九徐　禄　杨生花　荫生高登鳌　从九常涌泉　监生张煌　佾生杨勤俭　佾生高光产　监生杨勤义　佾生高光彦　杨会友　监生乔乐善　耆宾李增禄　佾生杨兴德　常毓秀　吴国祥
李郭渠渠长　军功陈宝　监生卢兴仁
督工　增生高折桂　生员王德基　耆宾李逢春　生员杨国桢　监生朱致行　训导刘体圣　监生宋如玉　武生韩占魁　从九刘建基　张克恭　从九张

瑞麟　从九郭蓝田　五品张国庆　赵际鸣

晋掌小渠渠长　武荣祖　屈大庆

督工　贡生尉光烈　武生李膺命　典籍霍兴智　监生屈春光　武生尉光烜　刘奎元　武生陈步荣　刘凤鸣

沟首　卫廷栋　李在国　辛克明　屈克俭　郭呈杰　王小第　屈有林　张密　姚从端　武生刘福祥　辛克宽　张忠　监生卫肯堂　李光耀　张得顺　古洪林

东靳小渠渠长　古增光

督工　监生古宜法　席茂德　耆宾席长文　典籍马端本　耆宾席隆兴　古俞

庙后小渠渠长　武生许步月

督工　廪生刘瀛魁　耆宾许汤选　武生卢仰奎　贾品一　申金凤　申学曾

住持　张元

石匠　路贞祥　李永成　镌

大清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冬子月谷旦立

33. 光绪三十二年《重修献厅并财神殿等序》

重修献厅并财神殿等序

貇姑射之南，平山峙焉，其下有泉，派渠十六，溉临襄民田数百顷。按平山见诸《山海经》"平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则水似属山之旧物。"然断龙尾而出水之说，又详载于《括地志》刘渊筑城一事。人每讶为不经，余固深信其说，何者？天生圣人必有异征奇表，履帝武敏，毓之诗千古朗诵，实为教稼艺食之祖。今我两属百姓历数十百世，目不一睹赤地神之德。固与后稷相伯仲意者，天不能自善其用，特假神之力，以笃厚期人用。是表其奇轶千载，而下不祖郭璞之训，而建祠□祀迄今不衰。然日月征迈，风雨摧残，历代仍旧贯者不下十百次。前丙申去兹仅十稔耳，犹有覆者、漏竖者、崩平直者，从横岁时祀事 神弗享乃集同事合谋协虑，相材于山，取工于四，已享利者输以金，□解事者重其成。南北合修献厅，南河独修财神殿西廊鱼池甃洞角门公馆。自春而秋历几何，时而有阙。巍然有□，昂然有亭，翳有池渊。然人不负德，神用韵享，将取贻我来牟之歌以颂后稷者，颂

我康泽王矣。援记其事，并揭所由，以述此时之盛，而破旧日之或。

例援文林郎吏部揀壶关县教谕加一级在任候选知县□□□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晋集杰刘师亮熏沐撰文编次

由县考选教习邑庠增广生员王维新敬书

南河总理督工　典籍刘发福　武生段春华　廪生李青遴　千总尹定邦　武生杜凤池　俏生郭长治　生员段振海　监生李发荣　监生屈春光　议叙郭容齐　杜□才　监生解居仁　监生张□　□□杨勤俭　监生齐不倦　张捷元　五品刘清云　杜炳寅　常隆兴　监生许福庆

南横总渠渠长　生员　刘化南　白景孟

堰长　杜丙寅　□□屈九杰　武生刘福祥　李如玺　张英

沟首　赵施年　王在镐　卢大宝　张裕凤　张士元　王自俭　王天禄　崔安邦

张寅　刘德隆　崔万全　赵申火　李丑娃　王福林

南磨河渠长　王廷佐　杜学曾

督工　监生郭庆雍　杜明珠　张可宗　吴步青　耆宾王宗花　监生柴炳元　监生杨□寿　□生□□榜　耆宾张洪才　齐钟秀　张吉盛　典籍张毓秀　监生刘怀堂　典籍张荣森　生员张书□　监生师文

沟首　吴步天　杨兆祥　千总侯法尧　杨子贞　张福绥　乔登科　监生张明　贺庆成　堰子

中渠河渠长　从九解存献　监生晋集鸾

督工　监生解居仁　从九吴鼎　耆宾齐隆兴　武生段□　生员解鹿鸣　职员吴五行　监生习古元　监生张喆　张亚南　典籍解光元

四沟长　贡生孙成章　武生张兴甲　生员　李增辉　孟恩　解永昌　刘庄沟郭大德

高石河渠长　□生杨□学　俏生高学明

督工　俏生杨勤俭　监生乔乐善　耆宾常长青　从九徐禄　俏生李增茂　从九王长瑾　杨生花　武生吴铭　常毓秀　增生高折桂　耆宾李增禄　宋登云　杨会友　高望云

李郭渠渠长　监生徐复兴　赵际鸿

督工　张捷元　典籍田振邦　佾生高登鳌　佾生张思训　朱吉行　五品刘青云　从九王养正　张思和　□生乔□　刘维清　耆宾张铭　陈德荣　王仲耀　从九刘建基　监生徐书康

晋掌小渠渠长　杜秉宝　武生李膺命

督工　典籍霍兴智　生员李□命　佾生陈庆余　武生刘书祥　武生　魏光烜　陈步荣

沟首　监生陈得胜　刘凤歧　杜集森　张忠　古希尧　李在田　霍丙寅　张密　武荣祖　刘奎元　古希文　屈大得　卫光前　屈惟和　监生卫值亘　王金命　高合荣　屈克俭　李光耀

东靳小渠渠长　席茂得

督工　席天佑　古增光　席怀珍

庙后小渠渠长　廪生刘瀛奎

督工　生员刘兆安　监生许福庆　申百凤　耆宾李庆昌　耆宾李金凤　沟首　耆宾许树庆　增生贾品金　柴甲荣　乔福贵　陈全材

住持许成宝

石匠曹兴旺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桂月谷旦立

五　民　国

34. 民国四年《重修龙子祠大门二门围廊清音亭碑记》

重修龙子祠大门二门围廊清音亭碑记

龙祠之建，繇水利而创也。《水经注》："平水出壶口，东入于汾，禹贡之壶口出，一名平山。"汉应劭有以平水释□□□，称其水利由来久矣。惟祠之名杳，范不知所自。稽诸邑志，晋永嘉时平水上婴儿应刘渊募筑城，化蛇断尾出泉，名曰"金龙池"，祠之名或以此□乃质。近世科学家未有不谓为妄诞者，而《昌黎杂

说》中"龙嘘气而成云,水下土汨陵谷",《易》曰:"龙潜于渊,一方水泽汪洋,泝游不波,享其利而无□害,龙之功大矣哉。"颜曰:"龙祠以崇报神德,夫复何疑?"观祠宇中匾额丛悬,碑碣林立,前代封褒重修者诚不胜数。神之感于人者如斯,祠宇岂□听其倾圮。况散见于骚人韵士选胜登临之语者,如宋王士元之报答龙神,"醉饱余宛若泽国江乡,居陈廖之龙神窟宅,瞰平野千古,庙貌何雄";□明乔宇之"两阶丹绘敞簷楹,亲向龙宫胜处行";裴邦奇之"凌风我自骑黄鹄,破浪君能御白龙";王溱之"云护蛟龙窟,蒲浸鹳雀汀";朱知鳌之"疏□分王濑,漱液出金龙";清顾树宸之"下有老龙窟,吐泉成漫汗";郭永丰之"鱼戏如无水,龙藏疑混鳅",是皆缘龙祠而发为歌咏者也。愈以知祠之□系甚巨,不可不随时修葺,以壮宏观者用答 神庥。今春临襄两县享水利者咸议重修,议成遂鸠工庀财,于五月二十八日开始。大门彻底重建,加以绘事;二门缺者补之,漏者填之,兽脊零落者备立之;围廊十三间,鱼鳞鸟脊,花样重新;清音亭坍塌处,悉复旧观。共糜资八百余缗,由南北十六河分认。而我南八河往岁兴工,辄各置一局以理其事。此次各渠渠长治事,督工人等和衷共济,不分畛域,同局共事,以为撙节。计夫公□,少费一文,村人少一文负担。如此办公,实可为后来之圭臬。今于八月下旬日,蒇事嘱记于□□。不敏讵敢言文,然观其灿烂庄严,焕然一新,不□可以妥 神灵,且足使后之游观者览祠宇之崮然。其歌咏当不减于平昔,洵吾乡里间盛事也。是为记。

清征仕郎候选直隶州州判己酉科拔贡生李光魁撰文

师范传习所优等毕业清附生屈春魁编次

清文林朗候选按察司经历优行附贡生徐飞明篆额

法政专门学校法科毕业前任沁县帮审员张逢津书丹

中华民国四年岁次乙卯菊月吉日立

碑阴

南横总渠长　屈春魁　张成山

督工　王克昌　徐飞明　李光魁　尹廷芳　李青林　王玉盛　刘廷佐　屈春光　郭长治　段延龄　李发荣　王□玺　刘春魁　常瑞五　白景孟　李学义　段廷珠　吾钱　刘化南　段振海　杜□池　杜作霖　王有俭　黄凤翔

堰长　徐文明　屈天作　杜玉明　李申命　张天有

沟首 张思凤 张春祥 杨天禄 孙肇兴 李长会 毕通富 杜万春 武德邻 段小娃 郭福兴 崔憨儿 赵跟□ 孙月人 孙月德

南磨河渠长 郭祥林 杜保安

督工 王宗花 杜德明 荀荣先 霍逢晏 王廷佐 杨建云 郭庆维 杜福财 张□元 霍学曾 郭庆元 杨甲第 侯法□ 张荣森 杨子贞 师文溥 张清富

沟首 马兴礼 张永盛 郭向震 郭 □ 张增富

堰子 翟□亮

中渠河渠长 段德盛 段涌泉

督工 解鹿鸣 张 喆 席天佑 李行简 王振业 晋集鸾 古宜学 晋集俊 高端本 段兴义 解永俭 段贯□%% 副渠长 卢国祥 高吉利

郭下四沟长 梁思礼 尤廷佐 武大□ 许赤□ □□ □□

沟首 李 访 刘希温

高石河渠长 杨勤智 乔春墉

督工 李增茂 徐 禄 杨生花 张兴邦 常建康 英 铭 李增禄 杨兴发 常涌泉 张 燕 杨会友 张茂荣 吴克昌

李郭渠渠长 崔景云 黄云龙

督工 任长茂 计长丰 乔 炯 杨金荣 宋思杰 李吉祥 王仲耀 郭维垣 徐复兴 卢永茂 徐书康 陈得荣

四十八甲甲首

晋掌小渠渠长 杜玉明 张学温

督工 尉光熙 崔兴智 李膺命 武荣祖 宁茂泉 刘魁元

沟首 杜集森 屈春光 尉光烜 李在田 杜丙寅 张 忠 姚春荣 姚克俭 高林顺 刘书祥 高□□ □□□ □□富 王基命 贾连杰 屈惟和 辛高林 李曰杏

东靳小渠渠长 马驯良

督工 古增光 席怀珍 席洪武

庙后小渠渠长 许树庆

督工 贾品三 许嘉兴 卢有泰 申金堂 李自祥 □学俭 许保兴 乔俊义 申明礼 申其富

住持 许连城

石匠 宁吉庆 潘渭盛

35. 民国九年《重修龙子祠记》

重修龙子祠记

庚申之岁，余读《礼》，家居南八河。渠长等来告余曰“今岁雨旸时，若五谷丰登。若非平水灌溉，焉能家给人足。推原其本，岂非我康泽王之流泽甚长哉。然神既降人多福，人亦宜答神庥。”于是佥谋将龙子祠之西边凡隶南河者，莫不命工修葺，计廊房五间，牌楼一座，菜瓜神庙一座菜瓜神即夷齐也盖夷齐首阳饿口菜面故呼之为菜瓜神。自旧历七月二十六日开工，至十一月八日告竣，共需费四百九十缗，请为文以纪之。余考《山海经》孟门之山东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即今之南北十六渠是合，有渠长以董其事。光绪年间，上下游时有龃龉，下游实蒙其害。今岁，在事诸公视公事如家事，任劳任怨，上下一心，前嫌尽释，是以多年不毛之田今皆变而为膏腴，人人有鼓腹之乐，家家有盖藏之粟，虽云神之惠，然亦全赖诸君子之力。今又存崇德报功之心，而为鸠工庇材之举将见之。神其降康，丰年穰穰，而上下游之人果能和睦亲爱，长守此谦让之风，萧规曹守，岂非南八河之福欤！是为记。
前清勅授文林郎陕西靖边县知县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刘师亮撰文
四等嘉禾章众议院议员刘棫编次
省立第六中学校毕业前任绛县县视学段汝昌书旦
中华民国九年岁次庚申大阳月谷旦立

碑阴

南横渠渠长 王 义 王兆麟
督工 常瑞五 徐飞明 李发荣 黄凤翔 刘化南 屈春光 郭长治 王玺 李学义 王自俭 段廷珠 屈春魁 刘春魁 王全陞 杜凤池 段廷龄 白敬孟 丁春山
堰长 李振乾 张 荣 姚祥林 张学庆 张光斗
沟首 贾光斗 王在高 石蔚和 王新隆 孙悦仁 韩家祥 武德林 李

炳南　常小圈　孙小娃　常炳彭　刘龙娃　郭永大　崔斜娃

南磨河渠长　张　珍　乔福祥

督工　贾清泰　杨永盛　张文仁　霍逢彦　张洁盛　杜步釜　□荣光　彭清琳　王廷佐　张增富　贺增勋

沟首　杨勤义　梁德魁　郝家兴　段廷琇　马世和　英生花　刘克吉

堰子　杨祥林　马世和　刘克吉

中渠河渠长　王福财　郑学诗

督工　解鹿鸣　王振业　马端本　解永昌　马履禄　吴　顶　段可畏　曹元升　□集俊　吴明文　马登科　郑□萘

沟长　李成林　武兆麟　段四成　吴生华　梁振岳　李士义

沟首　杨甲荣

高石河渠长　李增华　郭金生

督工　常涌泉　杨守玥　杨会友　李增武　常社记　李仝喜　李增茂　张兴并　乔春墉　宋登云　吴　珍　张玉山　王常有　徐家富

李郭渠渠长　阎长庚　张正心

督工　崔景星　阎长兴　王森林　徐复兴　张耀中　任福祥　许宗尧　高光极　田庆绪　卢永茂　郭玉田　赵连元　阎行义

晋章小渠渠长　姚祥麟　屈维和

督工　尉振基　杜玉明　武荣祖　尉嘉瑞

沟首　陈德盛　尉振刚　杜丙寅　尉玉春　武兆基　辛长富　辛高林　卫福堂　古长兴

甲首　屈春光　刘凤鸣　李膺命　李在田　屈克俭　刘福祥　李曰杏　张学温　王基命　张玉明　刘魁元

东靳小渠渠长　古宜学

督工　古增光　席怀珍

庙后小渠渠长　贾品三

督工　蔡建基　申其林　贾文德　杨富康　申其有

沟首　刘振镛　申学俭　许嘉兴　王建洁　李自法

石匠　杨玉振　荆撑□镌

36. 民国十年《重修龙子祠创建南马房记》

重修龙子祠创建南马房记

平水之下有龙子祠焉。殿宇雄伟，亭阁清幽，平水至此，釃而为南北各八河，临襄两邑田亩资以灌溉，人民之沾其润，蒙其庥者无虑数千家以故。岁时致祭，罔敢或懈，有功德于民者，则祀之理固然。也岁辛酉春两邑渠首诣庙祀 神见夫庙内庙外倾圮颇多而醵金重修之，议以起，嗣经询谋，佥同康泽王殿眘引道大门、二门暨庙前清音亭归十六河同修，新建南马房四间并小门一则属诸。南八河也，工始于春三月，竣于秋八月。由是，内外整而气象一新。庶足以壮观瞻而妥神灵矣。工既竣，首事诸人求余记其事。余南河人也，重违桑梓父老之请，不敢以固陋辞爰述其颠末而为之记，以示不忘云尔。

二等教育奖章山西优级师范选科毕业举人

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张尚志撰文

传令嘉奖山西行政研究

所毕业前稷山县宣讲员 雷松秀编次

前襄陵县议会议员邑庠

生员由师范讲习所毕业 蒋九龄书丹

中华民国十年岁次辛酉仲冬月吉日立

37. 民国十六年《重修龙子祠水母殿及清音亭记》

重修龙子祠水母殿及清音亭记

今之龙子祠，即《邑乘府志》所注为“平水神祠”也，乃临襄两河展拜将享之所。前殿祀龙神，由前殿旁道而进之为穿堂，再进之为后殿。内祀龙母，殿宇恢宏，形势高耸，与前殿相望辉映。后先所以妥神灵，亦所以肃瞻仰也。第万姓既蒙其恩泽，千秋宜报，以蒸尝无如。历年久远而脊瓦残缺，风雨之飘摇，鸟虫之剥蚀，以致大厦倾圮。绅等触目惊心，不容坐视。爰与各河诸同人相商，咸愿乐事输将，急于兴修，并金装神像及殿前之门窗户牖与享。堂前之脚柱，雕饰绘画，蔚然壮观。其清音亭

之厦簷稍有塌损，与罅隙渗漏之处俱各补苴缮葺，一律修整。所需之资悉照旧规，沾水利之四十分，南北两河各二十分，纳款按水分之大小为捐资之多寡。所幸众心协一，争先恐后，不数日而资财俱备。于是鸠工庀材，刻期将事，阅月余而工程告竣。炳焕辉煌，庙貌重新。又本庙东一半旧规属北八河经管，今则东偏，动工修理。一切台阶，自二门内以至北窑地基，俱用新砖墁平，并北楼之厦房内黝垩圬镘，咸与维新。其资悉由北八河按水分均摊兴修，而南八河不与焉。落成之日，本年贤堂张君总理其事，嘱余为文。余不获辞，爰即其事而记之，以为后人之殷鉴。是为序。

清封朝议大夫花□四品衔顺天府密云县知县调署固安县知县丁未科会考一等岁贡生秦皋弼撰文

清封资政大夫同知衔四川邛州直隶州大邑县知县调署丹棱洪雅等县知县甲午科举人关世熙书丹

中华民国十六年岁次丁卯季秋月中澣谷旦立石

碑阴

上官首河总理督工　张心圣　乔　桐　刁复荣　秦彩云　秦殿华　侯兴元　王廷璧　王福庆　秦　增　张　巽柴泰星　张　麟　王寿庆　史俊德　李金全　王福贵

渠长　王普润

上官二河总理督工　王廷秀　王荣光　李春生　樊攀荣　李宗善　李建辉　张永福　刁泽昌

渠长　张　润

上官三河总理督工　关世熙　席文珍　周□祥　杨甲第　蔺捷登　杨洪昌　王圭田　徐学忠　李生义　李舒华　吴　烜　邓文荣　李鸣德　贾永秀　任善行　景奎光　李文祯　李崇通

渠长　刘安泰

上官青城河总理督工　闫建勋　卢步光　尉文明　尉继宗　柴育仁　董永发　周龙光　倪炳耀　荀屯昌　乔义刚　李士发　崔全印　杨生荣　张凤岐　□□璧　李凤鸣　尉复礼　尉生太　尉天得　段复生　乔春星　霍万龄　柏青标　权陞捷　关绍瀛　吴之绶　柏光青　柏德珍

渠长　吴之□　董瀛章　尉文玉　杨国华　卫宗康

上官中河总理督工　录井　孟　瑞　王在镐　王　泰　王协邦

麻册村蔡兆庆　刘家麟　张　钧　柏楼凤　秦良弼　杨震青

小榆　韩戊申　卢连科　关正通　曹佩武

席坊　朱经魁　李勋臣　李绍绩　樊五魁

渠长　吕文明

张明仁

关作梲

李维邦

庙后小渠总理督工

渠长　朱生辉　辛长明　朱文郁　高霍义　李荣魁　高耀斗　李福广　高顺德　王文成　高尖顶

沟首　李清

沟首　李清林　朱仙瀛

小榆沟　曹中奎　张文选

下官河下册渠总理督工　□大勋　李　瑜　李发祥　景文秀　李　珩　梁作庆　邸长德　张金声

渠长　李　瑞

副渠长　曹凤鸣

官口沟首　权步开

下官河乔村渠总理督工　张全德　缪思信　王自贵　尉逢昌　杜青山　王光炎

渠长　王全德

沟首　崔登云

韩家沟首　孟兴孔

下官河东麻册渠总理督工　吉登科　沈作荣　张永和　高奎斗　靳在鏌　沈玉印

正渠长　贺德隆

副渠长　王　全　靳如汉

肖史沟沟首　柴兆吉

家沟沟首　秦良玺　伍默赵腾蛟　赵连德

沟首　王德兴

下官河小榆渠总理督工　卢连科　韩家瑞　潘有富　李荣华

渠长　贾兆瑞
本渠沟首　贾兆奎
东沟　潘龙标
沟首　翟学礼 孔明顺
西沟　陈景耀
沟首　陈跟盛
下官河席坊渠总理督工　□□□　张槐卿　李廷绩
渠长　张　富
本沟　张明光
录井沟　王大元
兰村沟　伍登科
北磨河下当渠总理督工　梁□凤　荆枝芳
公直　张炳泽　刘文俊
渠长　张文德
朔村公直　翟元茂
沟首　刘新明　王学文
朔村沟首　张　濂
北磨河苏村渠总理督工　□□铭　张　芳　杨锦春　孙福祥
渠长　王者兴
沟首　王屯荣　马秀南　滑兆均　武天奎
北磨河兰村渠总理督工　□□敏　张文炳　宋毓秀　崔□祖　毕如玉　卫登寿
公直　任天祥　冯廷喜　杜生芝
渠长　杜作栋
王默公直　单丽绅
桑湾公直　褚世昌
沟首　关　杰　褚荣耀
本村沟首　宋曰信　乔俊耀　冯廷法
北磨河伍级渠总理督工　王□标　潘逢翔
公直　潘全德　潘自富
渠长　潘森麟
沟首　赵洪杰

金殿公直　高兆魁　郝福德

沟首　张岐

石匠泰盛厂

六　年代不明

38.《水利记》

平阳有小水利，如龙祠、雷鸣渠等是也。然渠有长，导有夫，皆自为纪纲，如官政。然其桀而悍者，率舞智力争之，或应后而争先，或应少而求多，众人之利势不能下，则群起而噪介，恃其众往往斗杀人。如郭进书等杀三人于前，卢光裕等危两县于后，狱之不大，亦其幸耳。杨天青、郭礼娃诸人尚其小，格杀也，太平稷山诸县时见告矣。此由坐镇者不足畏，故人敢雄行，亦法无蚤决，故谋始，或当议也。然各地之争，由来久矣。竖有石，划有界，即尺寸不可易也。唯是官无常案，水有壅塞，界有埋没，则争端起而桀悍者故或为壅塞埋没以生端，今欲止其争，须先其始。凡有渠之处，各埋其案，各正其疆，各检其石，府州县案皆合符断碣之文，咸录在案，农祥未兴，遍为经正。一番经正则一年难争，有争则亦易定，此或止乱息争之道也。如近日临襄之争，求诸旧碣而碣已谦移，访诸渠条而条无掌故，遂使奸人借口官无定凭，杜当阳之石，一置山头，一沉涧底，此其为虑，则今日平水之石画也。

（作者许维新，见民国二十二年《临汾县志》卷五《艺文类上》）

附表 龙子祠水利碑刻一览

序号	碑 名	年 代	公历	实物藏处	碑文整理情况
※1	□□康泽王庙记碑	金大定十一年	1171	佚失不存	乾隆《临汾县志》卷十二《杂志》
2	增修康泽王庙碑	元至元二十三年	1286	龙子祠	明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四《集文》
3	重修康泽王庙碑	元元贞二年	1296	龙子祠	明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四《集文》
4	龙神祠祷雨有应记	元至正九年	1349		明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四《集文》
※5	重修普应康泽王庙庑记	元至正九年	1349	龙子祠	
※6	兴修上官河水利记	元至正二十六年	1366	龙子祠	
7	平阳府重修平水泉上官河记	明嘉靖五年	1526	龙子祠	民国二十二年《临汾县志》卷五《艺文类上》
8	张长公行水记	明嘉靖七年	1528	龙子祠	民国二十二年《临汾县志》卷五《艺文类上》
※9	院道府县分定两河水口	明隆庆六年	1572	龙子祠	
※10	平阳府临汾县襄陵县为违断绝命事	明万历九年	1581	龙子祠	
※11	南横渠碑记	明万历十四年	1586	龙子祠	
12	平阳府临汾县襄陵县两河分界碑记	明万历四十三年	1615		康熙二十二年《龙祠下官河志》 民国《襄陵县志》卷二十四《艺文》
※13	重修龙祠碑记	清康熙四十一年	1702	龙子祠	
14	重建平水龙子祠记	清康熙四十六年	1707		民国二十二年《临汾县志》卷五《艺文类上》

续　表

序号	碑　名	年　代	公历	实物藏处	碑文整理情况
15	重修平水上官河记	清雍正五年	1728		民国二十二年《临汾县志》卷五《艺文类上》
16	重修平水龙神庙记	清雍正十三年	1735	龙子祠	《华南》42
17	重修龙祠碑记	清乾隆十一年	1746	龙子祠	《华南》42
※18	重修碑	清乾隆十九年	1754	龙子祠	《华南》42
※19	重修序	清乾隆二十三年	1758		《华南》42
※20	龙子祠重修重铁禁口东石帮序	清乾隆三十年	1765		
※21	龙子祠疏泉掏河重修水口渠堰序	清乾隆三十二年	1767	龙子祠	
※22	重修龙子祠庙左各工碑记	清乾隆五十年	1785	龙子祠	
※23	告示	清乾隆五十年	1785	龙子祠	
※24	重修龙子祠记	清道光八年	1828	龙子祠	《华南》43
25	重修康泽王龙母神殿序	清道光二十三年	1843	龙子祠	光绪《山西通志》卷六七《水利略二》
26	平河均修水利碑	清道光年间			《华南》43
27	重修龙子祠记	清咸丰七年	1857	龙子祠	《华南》43
28	龙子祠重修碑记	清同治十三年	1874	龙子祠	《华南》43
29	恩沛纶音碑	清光绪二年	1876	龙子祠	
※30	拟龙子祠重修碑记	清光绪十三年	1887	龙子祠	
※31	龙子祠重修碑记(北河)	清光绪二十二年	1896	龙子祠	
※32	龙子祠重修碑记(南河)	清光绪二十二年	1896	龙子祠	
※33	重修献厅并财神殿等序	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	龙子祠	
※34	重修龙子祠大门二门围廊清音亭碑记	民国四年	1915	龙子祠	
※35	重修龙子祠记	民国九年	1920	龙子祠	
※36	重修龙子祠创建南马房记	民国十年	1921	龙子祠	
※37	重修龙子祠水母殿及清音亭记	民国十六年	1927	龙子祠	
38	水利记	不详			民国二十二年《临汾县志》卷五《艺文类上》

注:带※号者为新发现的碑刻,其中第1通碑刻已佚失不存。《华南》42、43分别代表许赤瑜和郝平、张俊峰在《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42和43期上已公布的部分碑刻。

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于1992年，是我国最早以“社会史”命名的学术机构之一。它以山西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为依托，以山西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及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专门史、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史等硕士点为支撑，吸收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路径，长期从事社会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被誉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镇之一。首任中心主任为已故著名社会史学家乔志强教授，现任主任行龙教授。

中心位于山西大学鉴知楼，有3个专业研究室、1个博士生研究室、1个硕士生研究室、2个档案室、1个图书资料室。并配备电脑、扫描仪、投影仪、复印机、摄像机、照相机等设备，为科研、教学提供了优越的硬件环境。

中心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职研究人员8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3人，讲师4人；7人具有博士学位，1人为在读博士生；45岁以上1人，35岁至45岁2人，35岁以下5人。整个研究团队老中青搭配，职称和知识结构合理，并具有良好的合作精神和较高的科研创新能力，是一支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赞誉的高水平的科研团队。中心还承担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和中国近现代史、历史地理学硕士点的人才培养任务，现有在读博士生8人，在读硕士生30人。

近年来，中心成员在学术带头人行龙教授的带领下，密切追踪学术前沿，关注现实需求，注重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主张历史研究应“走向田野与社会”，提倡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多层次多角度地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从而形成了稳定的并具有鲜明特色的四个研究方向：(1)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2)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3)革命根据地社会史研究；(4)三晋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并开展了多项科研攻关工作，产出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学

术成果。自2000年以来，中心成员共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3项，国际合作项目4项，山西省各类项目30项；发表学术论文232篇，获得省部级各类教学科研奖励15项，出版代表性学术专著10部。为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理论的本土化构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心高度重视学术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共主办（包括联合主办）国际性学术会议10余次，中心人员参与的各类学术会议数十次。通过这些学术活动，与欧盟共同体、英国伦敦大学、日本立教大学、日本一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院校的相关学术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把中心打造成一支"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学术机构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青史有待垦天荒。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将继续秉承勤奋严谨的治学作风，立足山西区域社会，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广阔的学术视野，续写中国社会史研究新的篇章。